

# 黃花岡

商  
印  
花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太陽最紅人間最黑的年代 (社論)

從追隨專制到逃避自由

孫文批判保皇改良文兩篇

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記實 (中日決戰連載之五)

請不要再讓中山先生流眼淚

反文革第一人：上海劉文輝之死

造反派論文革

逍遙派說文革

文革造反期間被毀壞的部分古跡和文物

六月血——誰來保佑我！

憶喻東嶽

俄三家電視台披露蘇聯“8.19”政變內幕

反思民族歷史 找回民族自尊

俄國侵華的四次高潮

陳映真應以文學為自由呼喚

辛灝年歐巡五國影響廣被

歷史文化

2006 年第 2 期 (總第 17 期)

季刊

# 巴黎人權 廣場六四 紀念活動



著名民運人士蔡崇國主持六四紀念活動



巴黎一位法國女教授在發表有關六四的講演



人權廣場上參加六四紀念活動的中外人士



法國一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將發表講演



辛灝年與八九學運領袖張健合影在人權廣場



# 黃花崗 雜誌

2006 年第 2 期 總第 17 期 (增刊)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JUNE 27, 2006



大中華民國憲政前驅宋教仁烈士



## 讀者反饋黃花崗

社論

太陽最紅人間最黑的年代

本刊

3

特稿

從追隨專制到逃避自由

仲維光

11

4

## 革命與改良研討專欄

孫文批判保皇改良文兩篇

孫文

16

華僑支持孫文革命

資料

21

## 新聞追蹤

辛灝年二度應邀訪歐巡迴五國影響廣被

本刊綜合報導

23

我們都是中國人——辛灝年歐洲講演反饋

塵粒

26

## 國民革命與中華民國 專欄

### 還原蔣介石

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記實（中日決戰連載之五）

孫挺信

27

蔣介石生平報國記要（連載之一）

本刊編輯

42

雙十節讀《中國之命運》

任詮

47

也論民族英雄

陳赴義

50

當時明月在（外一首：吶喊）

王子軒

51

## 共產革命與馬列中國 專欄

### 中共發動文革四十週年

反文革第一人——上海劉文輝之死

劉文忠

53

造反派論文革：沒有文革史何來文革反思

劉國凱

66

逍遙派說文革（口述歷史）

高爾品

70

前紅衛兵文革武鬥記實美術作品選載

劉永生

81

文革造反期間被毀壞的部分古跡和文物

網文摘編

84

文革造反時期語匯

何彤收集

87

## 六四十七週年

六月血——誰來保佑我！

南雁

100

“六四”，不能為紀念而紀念

魯德成

93

憶喻東嶽

劉建安

94

## 中華文明與世界文化 專欄

俄羅斯三家電視台披露蘇聯“八一九”政變內幕 王依同 89

## 中國國際關係研究

反思民族歷史 找回民族自尊 辛灝年 105

俄國侵華的四次高潮 龍勝熊 118

關於中共賣國的幾點思考 彭曉明 131

## 時代與文學 專欄

陳應真應以文學為自由呼喚 李勇 133

中共黨軍高級將領對中共本質認識的藝術寫照 辛明 137

黃興的文采（外一首） 何彤 22

高優鏢先生的一封信 高優鏢 99

春天來了 日恩 117

## 中華自由論壇 專欄

請不要再讓中山先生流眼淚 陳榮利 140

以黨治黨有黨享殘害中國大陸華人 子口 139

唱支山歌給黨聽 紫丹 142

談中共的根基 鐘民 143

## 黃花崗雜誌公告 欄

黃花崗雜誌董事會公告 144

第 17 次財務公告 144

**編者前言：**本刊第十七期與大家見面了。這一期時值六月出版，既逢“六四”死難烈士十七週年的祭月，又逢中共發動文革四十週年的“忌年”，所以，本期不僅發表了一組紀念“六四”死難者和有關湖南三壯士遭遇的文章，而且發表了一組反思中共文革的文章。其中，“六月血”一文，驚心動魄；“憶喻東嶽”數篇，催人淚下。而“反文革第一人——上海劉文輝之死”，非但不是文革反思的歧途之作，並且恰恰將文革反歷史、毀文化、禍民族、殺人民之史無前例的血腥實質，畫龍點睛了；尤使我們明白，誰，才是反抗中共文革的真豪傑。

本刊在已經完成排版之後，才接到了仲維光先生“從追求專制到逃避自由”一文，遂撤稿加排，事後雖然得知已有網上雜誌刊出，我們依然決定在本期將之作為重點文章發表，因為好文章難得，一篇閃耀著思想火花的好文章尤其難得。本期還重新發表了百年之前孫文批判保皇改良派的兩篇文章，讀者只需要流覽一遍，就頓時會對當代的“保趙改良”、“保江改良”甚至是“保胡改良”，一言以蔽之，就是“保共改良”之本質和本相，頓時瞭然於胸。而本期發表的有關前蘇聯“8.19”政變內幕的文章，其作為一面歷史的鏡子，也對中共領袖人物和蘇共領袖人物在政治素質上作了一番重要的比較。另外，本期發表的“辛灝年歐巡五國影響廣被”一文，似乎也值得一讀。因為，這篇報導告訴我們，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我們既敢於堅持民族立場，又敢於堅持民主立場，並且一心都是為了我們全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就都會理解我們和我們追求的正確。如能配合著閱讀辛先生去歲在英國劍橋的講演錄音稿“反思民族歷史，找回民族自尊”一文，則對於提高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實有所裨益。

謝謝讀者。



## 讀者反饋黃花崗

敬愛的黃花崗雜誌社全體人士：

記得上中學時，歷史教科書裡記載過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話，「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當時年青（民國六十年間）不甚懂。現在明白了，那是爲了建立一個新中國的理想，在海內外奔波、經歷種種困難時所發出的感歎。這是令人痛心的結論嗎？我希望不是。

我深深的希望中國人不論在哪都能團結一致，一心一意地爲一個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努力。我希望先總統蔣公有一天能在歷史上有一個公正的位置。我希望你們能夠撐下去，我不知道貴社能否募捐到所需的費用，而我對自己只能拿出這少許五百塊錢而感到至深的歉意。

謹此

張翠南

十六、二 00 六

Dear Mr. John of Huang Hua Gang Za Zhi:

Thank you for valuing my suggestions and comments! I am greatly touched and motivated seeing Chinese from the Mainland fight hard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 and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三民主義 of GuoFu Sun Zhong Shan. As for suggestions, I do have a few more on my mind.

I have seen all of the wonderful speech clips of Xin Lao Shi on line either from ntdtv.com or from huanghuagang.com. However, I am disappointed that there was no 中華民國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in the background behind Xin Lao Shi in none of those speeches. Especially in the speech of 偉大的衛國戰爭勝利萬歲, there wasn't a 中華民國國旗 or the portrait of 偉大的抗日民族英雄 先總統 蔣公 中正 委員長. From time to time I would tell myself, I wished very much that I were a volunteer of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working for Xin Lao Shi so I would be able to help out in suggesting matters such as those.

I suggest that, in the future, it would be nice to have the 中華民國國旗 along with 國父 遺像 in the middle behind Xin Lao Shi when he gives speeches relating to Dr.

Sun's revolution and fight for democracy or in all of his future speech's or just a Flag as the Huang Hua Gang crew see fit! And if the speech is about 先總統 蔣公 and or 抗日, there should be a picture of him and the flag in the background.

I took the liberty of making some samples of those backgrounds I suggested. I hope this would help the HHG crew if you decided you like my suggestion!

Sincerely,

Albert Sze

黃花崗雜誌：

談一下我們同學的事情，我們班有許多同學都不相信共產主義或者現在搞的社會主義，我們都信仰三民主義，儘管國民黨並沒有做好，但那是國民黨的錯，不是三民主義的錯。

所以我們有一個同學寫信給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告訴他們自己真實的電話號碼，但過不了幾天共產黨國安的就來找她了，並且明確說他寫過信給那邊。不知道國民黨中央是否有特務，我們都不敢去想了。

所以請抱歉，我不會告訴您我的聯繫方式，爲了自己的安全。

但請給我一個大一點的信箱，這樣我可以將在上海調查採訪的真實錄音直接給您發去，而且儘量允許我只與你們的一位先生聯繫，這樣安全。

請給我信箱，但不能是你們已經公佈的信箱。

謝謝！

一位中國學生

負責人你好：

我是一位在新加坡土生土長的華人。我在一次機緣巧合中，從網路裡發現了《黃花崗》網站，並由此認識了辛灝年先生的奮鬥歷程和他的著作《誰是新中國》。《黃花崗》雜誌和《誰是新中國》使我對於瞭解中國近代史，開拓了另一個新天地。我非常欣賞辛灝年先生爲中國民主所付出的貢獻，並希望他能繼續爲他的理念與理想奮鬥。最後，我有一個請求，希望辛灝年先生能在我所定購的《誰是新中國》裡簽名留念。謝謝。

鄭少飛



# 從追隨專制到逃避自由

## ——對文革到六四歷史時期的再思索

仲維光

**編者按：**這時一篇來得太遲的文章，但又是一篇我們已經等了太久太久的好文章。作者站在真正自由民主和真正反對極權主義的立場上，對文革到“六四”這一段歷史進程，鞭闢入里地道出了，在中國，歷史的腳步之所以如此裹足不前，甚至是一再地出現“纏綿反側”，其真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原因之一，就是現代中國的幾代所謂知識精英，說道底，都不過是共產黨旗下的精英知識分子罷了。而且，不論他們怎樣地與時俱進，不論他們如何地變幻旗號，甚至將自己打扮成所謂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但只要他們與共產黨的思想關係、感情關係和利益關係，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他們，就仍然是事實意義上的“專制改良主義者”，即為了維護共產黨的權利和統治，和維護由他們所參與建立的共產黨文化，而甘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本文作者深厚的社會科學修養，堅定的人文主義精神，睿智的觀察問題能力，正確的思想和思考方法，無疑使這篇文章成了難得的好文章。而由它所道出的歷史，所揭示的思想，亦無疑會在當代中國的思想界，特別是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積極的影響；並為必將來臨的那一場巨大的社會民主變革，點燃真正屬於自由和民主進取的思想火花。

本刊排版時，得知民主中國雜誌已經上網發表，本刊即算“轉載”。

—

到今年為止，文革已經過去四十年，邁向了半個世紀的歷程；而八九年大規模的學運和其後東歐共產

黨集團的崩潰也已經十七年。無論四十年還是十七年，都是不短的一段歷史進程。因為到文化革命爆發，共產黨統治中國也就十七年，而此前辛亥革命建立的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統治則只有三十八年。

對於這兩段歷史，筆者認為，重要的、值得思索的是，為什麼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八九年專制崩潰，民主勝利，而經歷了人類歷史上可以說是最黑暗一幕——“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卻沒有借著直接對它的反彈和反思，最終推翻專制。

對筆者來說，從文化大革命到八九六四，應該說是中國處於最為有利的轉向民主的時機，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太殘酷、太毫無遮攔，涉及面太廣了！它的血腥迫害幾乎可以說史無前例，下至小民，上至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幾乎無人倖免，很多時候，整人的人很快又變成被‘整肅的物件，而這個現象甚至重複持續到八九年。在七六年到八九年間，以文化大革命時的同樣手法又整肅掉三個黨主席（後兩位稱為總書記）。然而，從文革到六四，中國終究沒有擺脫專制，直到今天不但又忍受了一個十七年，而且在這個十七年中，再次爆發了和文化大革命的暴虐與殘酷相比毫不遜色的鎮壓法輪功。現象重複，歷史迴圈，中國究竟怎麼了？

導致歷史變化的有很多偶然因素。筆者認為，造成這個現象重複、歷史迴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佔據大陸主流社會具有相當影響的知識精英在從文革到六四這段歷史中的表現和作用。這些人既包括從三十年代末期就投身共產黨，並且在黨內佔據高位的李慎

之、于光遠，在學界和文化界的劉賓雁、許良英、蘇紹智，也包括其後李澤厚、萬潤南、陳一諮、王軍濤等下一代所謂知識精英。一言以蔽之，黨、政、知識界中，置身於共產黨文化中的精英。

筆者認為不是如方勵之先生所說的，中國的農民太多使得中國實行民主困難，而是五四以來一部分知識精英，尤其是包括方勵之先生在內的兩三代共產黨文化中的知識精英，不僅追隨、協助建立了極權社會，而且阻礙、誤導了其後民眾朝向民主化的奮鬥。

筆者認為，從文革到六四，中國民眾沒有能夠徹底擺脫共產黨的極權專制的歷史教訓是，在共產黨的文化中產生不出真正具有自由、人權和民主的文化精神。如果說，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前，人們在成長中能夠自然而然地汲取到這些人類社會的優良傳統，那麼在五十年代後，在共產黨文化中，如果沒有經過痛苦地反叛，就很難獲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其結果就是使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再次流產。

我之所以單單把這一批知識精英拿出來分析，是因為從六六年到八九年這一歷史時期，特別是經歷了五七年反右，大陸社會幾乎徹底粉碎了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礎，再經過五七到六六年近十年的閉國再造後，剩下來的只有于光遠、李慎之、李澤厚等這一血緣的知識精英。老一代的，如陳寅恪、洪謙、黃萬里只剩下苟延殘喘，在社會上幾乎毫無影響。下一代的年輕人，則由於李慎之這一代人阻隔，根本不知道老一代人的存在。而于光遠、李慎之、劉賓雁這一代人，儘管有的人在社會居於要職，有的人已經遭到整肅，但是他們的意識形態、思想方法，在共產黨社會文化、知識生活中的地位卻是相同的。他們從三十年代投身革命、追隨極權主義，參與建立了共產黨社會和文化，在六六年到八九年，他們的年齡、以及位置，更重要的是整個共產黨社會發展到當時的狀態，使得他們對中國社會直接或間接地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因此筆者認為，從文革到八九年，中國的彎路和他們有直接的關係。

要清楚地描述出這批人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和作用，我認為必須澄清的不只是文革到八九這一條歷史線索，而且還有他們始終引以為豪、沒有任何反省的另外一條歷史線索。那就是他們的前半生，從三十年代開始到六十年代，他們投身建立的共產黨政權和

共產黨文化。他們是不是如自己所說的那樣，最初置身於民主潮流，最終上當受騙。如果並非如此，那麼他們就更應該從根本上反省自己，究竟是智力上、精神上出了問題，還是道德上出了問題。

## 二

李慎之、于光遠、劉賓雁等出生於二十年代前後的人，在三十年代末期投入共產主義運動。那麼三十年代中期後，整個世界，以及知識界所面臨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呢？閱讀歷史使我們發現，從上個世紀初開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極權主義象一片烏雲開始卷向人間，馬克思的預言不幸言中，共產主義的幽靈徘徊在歐洲上空。這個極權主義的幽靈不僅徘徊在歐洲上空，而且降落到歐洲大地。從一九一七年共產黨在蘇聯建立政權後，極權主義對於歐洲的威脅日漸加劇。二十年代，只有短暫的國家歷史的歐洲在已經有的二十八個國家中，只有兩個是極權主義和專制國家。此後墨索里尼、希特勒崛起，到三八年歐洲只剩下十二個民主國家，而到了四零年歐洲則只剩下英國、瑞典、愛爾蘭、芬蘭和瑞士五個民主國家。就當時的情況，說民主社會已經崩潰絕不為過，把歐洲稱為“專制的歐洲”也可謂名副其實。所以，于光遠、李慎之、劉賓雁成年時代，是極權主義對人類威脅最嚴重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自由主義、追求民主人權的知識份子開始憂心忡忡地探索極權主義問題。當代探索極權主義專制問題的幾個主要理論概念幾乎都是起源於二、三十年代。

極權主義一詞，二十年代起源於義大利對於墨索里尼政權的描述；其後在五十年代後期逐漸成為政治學中描述反思共產黨極權社會和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主要概念工具；八九年後，這個概念又有了進一步的、更深入的討論和擴展。

“政治宗教”概念是遭希特勒迫害、流亡到美國的德國政治學者埃瑞克·弗格林（Eric Voegelin）在三十年代提出的，他認為極權主義是一種基督教的政治化產物，並用它來剖析希特勒和布爾什維克所產生的政治現象。此後半個多世紀，這個理論在研究當代西方產生的極權主義問題中逐步得到充分的展開，尤其是在八九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以後。

當代科學哲學家，自由主義思想代表人物卡爾·波普（Karl Popper）則從三十年代開始，從認識論的角度全面批判了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政權，認為極權主義是歷史決定論的產物，是開放社會的敵人。波普的政治哲學思想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民主和極權主義對抗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後，生於布拉格，一九三四年移居美國的歷史學家漢斯·科恩（Hans Kohn），一九五零年在總結過去半個世紀的歷史的時候，明確提出，極權主義和革命是二十世紀對民主自由的兩個最大威脅。

這些觀點、這類傾向、這種憂慮，並非只限於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的領域。相反，如科學家愛因斯坦、波爾，以及很多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在他們有關社會問題的言論和論述中都不斷地提醒民眾和社會注意這個問題。

生於那個開放年代的李慎之、劉賓雁、于光遠先生不會看不到這一切，感覺不到世界面臨的這個威脅。然而他們選擇的卻是二十世紀對民主和自由的兩個最大的威脅——極權主義和革命，以及它的政治及文化。或許年輕人由於熱血選擇錯了是可以原諒的，例如波普在一九一六年前曾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一九八四》的作者奧維爾三八年曾在西班牙內戰中和共產黨並肩作戰。但是，當波普看到共產黨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犧牲普通人的生命，當奧維爾看到共產黨集團內部那種沒有道德約束的相互傾軋，三十年代蘇聯的大清洗，他們立即都變成了最堅定徹底的反極權主義者。具有類似經歷的還有作家紀德、凱斯勒等。

同樣，李慎之、劉賓雁等先生當然知道這一切，他們甚至能親自更多地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從井岡山直到延安時期的內部黑暗。但是，他們卻仍然是堅定的共產黨人。這種情況一直到五十年代赫魯雪夫秘密報告後，蘇聯的坦克 53 年鎮壓過東德，56 年鎮壓過匈牙利的起義後，乃至他們自己被打成右派後，他們仍然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忠於中國共產黨。這就是筆者所強調的：人們有理由問他們，是智力、判斷力出了問題，還是道德出了問題？

這是第一個歷史線索，面對這個歷史，面對過去他們批判反對過的——那些西方與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對於

極權主義的抵抗和探索，他們至少現在也應該有一點謙卑和反省吧？

### 三

第二個歷史線索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從六六年文革到八九“六四”。

這是一個令人驚異，但是很少有人思索的歷史現象。那麼愚昧黑暗，並且帶有典型的極權主義血腥的文化大革命，幾乎不需要太多知識、敏銳的辨別力就能夠看到這些。我們這一代人無法看到，是因為從我們出生，共產黨就為我們植入了他們特製的眼睛、嗅覺，乃至大腦。然而匪夷所思的是，經歷過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受過系統教育的李慎之、劉賓雁這一代人，甚至在受到殘酷整肅的時候，儘管有時對某個人、某些事有些微懷疑，但是從來沒有懷疑過黨。而尤為令人不解的是，他們居然在六六年也狂熱地跟著搞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位導師居然進出韶山三次，熱淚盈眶。

典檢這一批七十年代後被冠之“自由派”的知識份子，特別是他們從六六文革到八九“六四”間的作為，實在是讓人失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們儘管自己受到衝擊整肅，但是自覺地緊跟黨、緊跟毛澤東。七一年林彪事件後，他們稍有改變，開始對毛澤東產生懷疑、轉向鄧小平。但這也只能稱之為改變而不能稱之為覺悟。粉碎四人幫後，他們對黨充滿了更多的希望。這尤其是在右派平反後，他們大多數人重新回到黨內，回到有權有利的地位。例如李慎之先生重新成為黨的重要部門領導人，作為鄧小平的顧問陪同鄧小平訪問美國。在這個最為有利的，有可能從剛剛過去的文化大革命入手，徹底反省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極權主義問題和罪行的時候，他們所作的是“為黨”“向前看”。

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在此期間的為右派平反可說是一著“惡棋”“險棋”。說它是惡棋，因為它轉移了建立在直接傷痕上的，民眾對過去三十年，尤其是文化革命中共產黨罪行的追究。說它是險棋，因為五七年在第一線利用反右鎮壓了民眾不同意見，鞏固了專制的正是鄧小平，現在利用平反鞏固專制難道不會傷及自己？然而結果卻是鄧小平“左也是、右也是”，而這批知識精英不但沒有人對這種“自打嘴巴”提出質疑和追究，反而都陶醉於重新回來的風光。他們不



但沒有反省自己昔日在知識領域、精神領域的所作所爲，而且居然在此時又像三十年代末期那樣，再次以“自由民主派”自居。仔細思索，這其實是和鄧小平“左也是、右也是”血緣相通的一種現象。

對於七十年代末期他們爲黨的路線服務，進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教科書、宣傳化的討論，八十年代初期他們要給政治局領導人進行所謂科學啓蒙，八十年代中期由跟著鄧小平變爲歌頌胡耀邦的英明，人們只要跳出那個共產黨所營造的環境就能夠清楚地看到，在東歐，沒有一個共產黨國家的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和他們類似，沒有一個自由派知識份子會如此去做。因此，說到底他們至多是有點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中的自由主義，也就是有點不遵守黨的紀律而已，但是就這一點，他們自己的解釋也是，他們不是不遵守，而是對黨的紀律理解不同。

其實，人們就是不跳出這個環境也能夠看出他們的因循。北京大學的李德齊教授，同樣是四十年代參加共產黨，五七年被劃爲右派，但是平反後拒絕重新回到黨內。八九“六四”期間更直接抨擊了共產黨的極權專制。

爲什麼他們不去、甚至也可以說沒有能力徹底反省文化大革命問題？因爲這一批知識精英和鄧小平等共產黨高層一樣，投鼠忌器，不敢徹底否定反省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雖然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肅，但是，究其一生卻是和“文化革命”、和共產黨血肉相連。

記得八四年，我的一位同學的碩士論文是有關文化大革命中對愛因斯坦的大批判，他羅列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資料，然而，卻沒有也不想去分析爲什麼會產生這樣一個大批判，這個大批判是從哪里來的。聽他答辯的時候，我坐在台下覺得非常滑稽，因爲質詢的導師恰恰都是五十年代以來，用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辯證法對愛因斯坦、波爾等科學家打棍子的人，是他們奠定了中國的自然辯證法。他們對此毫無反省和擯棄，甚至在他們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出版的著述中，人們仍然可以看到這些內容，乃至以前的文章。

洪謙先生，中國的唯一一位正宗當代科學哲學學者，當時是維也納學派僅存的幾位成員，是劍橋大學的特聘博士導師。八五年我的一位同學去拜訪他，問

他如何看待我們的幾位導師在所謂思想解放後研究愛因斯坦等科學家的成果，他只回答了一句話，“還是貼標籤！”洪謙先生的這句話讓我思索多年，這說明，這批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對自己的思想方法沒有進行任何反省和改變，他們以爲過去給愛因斯坦貼上唯心主義的標籤是錯誤的，現在給愛因斯坦貼上列寧所說的“樸素的唯物主義”就是一大進步了。殊不知和科學思想和科學哲學，和愛因斯坦科學思想風馬牛不相及的唯物主義的自然辯證法是一根棍子，無論你如何掄這根棍子，從上還是從下，從這一頭還是從那一頭，輕或是重，都是打棍子。這種提法的改變就是十多年前筆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不過是雞蛋從大頭吃還是從小頭吃的變化而已。

檢索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差不多所有的所謂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幾乎都不能夠和此前三十年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的思想或者政治活動相比。例如魏京生七九年西單民主牆的訴求是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共產黨要實現第五個現代化。而此前二十多年，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就已經在《新階級》中徹底對共產黨絕望（筆者必須要說的是，筆者對魏京生極爲尊敬，他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能夠大無畏地以身試法）。至於根本沒有走出意識形態的政治論戰，陷入共產黨教科書框架內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和人道主義辯論，也都遠遠沒有達到五十年代在波蘭、匈牙利、蘇聯所發生過的哲學討論。而八十年代的《走向未來》叢書、《北京文化》叢書、《華夏》叢書，則更都是在有上述共產黨幹部和“知識精英”背景下產生的。它們的思想基礎、探索方向，對二十世紀歷史和政治、思想的認識，對文化和傳統的看法，對共產黨的定位和分析，都根本沒有合上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很多時候不僅錯位，而且根本上就是對立的。這就是到了八四年，北大學生居然還會在“十一”遊行中自發打出“小平，你好！”的原因——這，才是把向專制者的獻媚，當成了對自由和進步之頌歌的思想和社會文化基礎！

從文革到八九，最令人注意的是，這些號稱自由民主派知識份子，在八九年再次爆發聲勢浩大的民眾對共產黨的不滿的運動中，他們之中一部分人積極充當共產黨領導集團中權力鬥爭的代言人插手學生運動，而另外以自由派自居的一派則令人驚異地遠離運

動、遠離歷史，據說是要保持學生運動的純潔。這也是中國獨特的現象，因為稍加對比就會發現，在東歐每一次民眾對共產黨政府的反抗中，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七十年代末期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都是非常積極地參與。

保持學生運動純潔而拒絕介入，拒絕站在對抗共產黨政府的第一線，是膽怯，還是由於和共產黨統治者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實在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而事實上，正是這一切造成學生運動的混亂和無力，最終造成學生們在第一線受難！

在這一段歷史中，人們常常問，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胡耀邦和趙紫陽儘管被整肅，但是他們卻絕對不退出共產黨，和共產黨決裂，其原因就是，他們的自由化至多不過是對批評意見寬鬆一些，而無論怎麼寬鬆，他們都像毛澤東、鄧小平一樣，絕對不能影響到共產黨政權。這就是趙紫陽曾經參與對西藏民眾的鎮壓，胡耀邦在每次運動中也是整人者的原因。至死和至今還在歌頌胡耀邦的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例如李慎之們，在這一點上也和胡耀邦類似，他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思想方法，想到自己曾經積極追隨、眼下卻在設法改良的共產黨政權是和希特勒一樣的極權主義政權。

走筆至此，二零零六年出版的紀念胡耀邦文集，更是再次為我們提供了佐證。文集中一些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沾沾自喜地描述自己和胡耀邦的關係、評述胡耀邦的語言，典型地再現了共產黨的文化。就此而言，只要將西方社會、或者說一般社會中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的關係拿來略加比較，則不僅東歐的任何一位持不同政見者，例如哈威爾、康拉德、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就是中國的陳寅恪、洪謙，乃至被整肅二十多年、從地獄邊緣走過來的黃萬里都絕不會如此下筆。

從文革到八九，走過了二十多年，正是在這批知識精英的影響下，中國仍然沒有走出三十年代他們為中國社會奠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仍然沒有打出追求另外一種生活，另外一種精神，另外一種文化，另外一種政治制度，徹底拋棄極權主義的共產黨的旗幟。這本來是從二十年代以來世界上主流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奮鬥方向，但是，從文革到六四，甚至到今天，他們都在一如既往地堅持共產黨文化。

回顧文革到六四，我們應該看到自由主義精神在中國社會、中國知識界的重生，依靠他們是絕對不可能的。

#### 四

然而，影響從文化革命到八九“六四”間中國社會精神文化發展，影響八九年學生運動的，除了前述的這代知識精英自身變化發展的兩條歷史線索外，還有他們還帶來的第三個重要特點，那就是他們自覺和不自覺地隔離了下面兩代人和傳統及世界的真正接觸，有意無意地成為可以為共產黨統治所利用的“防火牆”。這道牆在歷史的演變中顯現出五個特點：

##### 1、切斷中國社會及其文化和當代世界聯繫的封閉圍牆

自三十年代末期以來，正是于光遠、李慎之，乃至李澤厚等這一類知識精英在協助共產黨，利用排他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在中國建立了封閉的社會，封閉的共產黨的文化。在中國和世界之間建立了一道有形的政治牆，無形的文化牆，阻斷了中國社會和世界的聯繫。這一批人有的人自己曾經或者一直在共產黨主宰意識形態、教育、文化和科技領域擔任要職，有的人則是文化和科技領域中共產黨意識形態的代言人。而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無論是在其位，還是在受到整肅時，這種封閉、專斷、教條的、打棍子的思想方法，都從來沒有改變過。對資產階級，對其他西方思想文化流派的排斥感情，對共產黨的感情，只有起伏，從來沒有發生過根本的顛覆性的改變。

這批人所積極協助共產黨建立的共產黨文化在中國和西方之間建立了一道有形，一道無形的封閉牆，它使得以後幾代人生活在客觀和主觀雙重封閉的世界，不僅不瞭解世界的其他部分，而且天生地排斥共產黨文化外的一切。

##### 2、斬斷中國當代和歷史傳統臍帶的絕壁

當代著名的政治學家，自由主義思想代表人物達藍道夫（R. Dahrendorf）在對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分析中說，這種極權主義的兩個顯著特點是，一是它反對近代自由人權民主思想傳統，二是全面反對人類的各種文化傳統。三十年代以後，正是李慎之、于光遠這一批知識精英，繼承了五四運動以來的多元思想中的一種傾向，在中國社會建立了第二道牆，這道牆遮罩、

隔絕中國文化傳統。“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但是“文化革命”卻是于光遠、李慎之等這一派知識精英，終生所從事的。

這一道他們所建造的唯物主義一元論史觀的牆，徹底毀滅了中國社會固有的文化、道德、倫理和秩序。這個一元史觀使得人們相信，無論共產黨如何，都比過去的封建社會和中華民國好，都比歷史上的一切時期進步。罪行不是共產黨固有的，而是中國傳統遺留的，不是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思想有問題，而是中國文化。

達藍道夫所說的極權主義文化的這個特點，這道敵視、隔離傳統的牆，至今還禁錮這中國社會的思想和文化領域。

3、轉移人們直接認識、批判共產黨罪行的防火牆  
伴隨上述兩道牆，還有第三道無形的牆，這就是上述知識精英，以他們貌似公允的批評假像，在從文革到六四，甚至可以說自四九年之後，在共產黨和對他們產生反感和反彈的民眾和青年中間無形中建立了一道防火牆。首先這道牆阻礙了人們對於共產黨各種罪行的基本瞭解和認識，轉移了人們的視線。它對於每一個共產黨的罪行，無論大小，首先解釋為某個人的失誤。他們要人們相信有一個好的共產黨領導人，有一個好的共產黨，有一個真正的、好的馬克思主義，然而事實上這一切卻從來也沒有出現過。而這種理論解釋一經走出共產黨社會的意識形態，在真正的學術領域更經不得任何推敲。

其次，在上述思想基礎上，共產黨的罪行，當代極權主義罪行被他們解釋為根源於中國傳統，而不是共產黨制度及其思想。其中尤為突出的是被某些人吹捧為“自由主義”的李慎之先生，他至死還在宣揚繼續反傳統，繼續文化革命。可以毫不為過地說，正是所謂“中國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協助了共產黨，才轉移了民眾的注意力，轉移了一些本來可以有為的當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批判方向。

這一道防火牆造成了中國知識界至今看不到百年來極權主義對於世界民主自由的威脅，看不到東歐持不同政見者和他們不一樣的追求。可以說，所有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大陸出現的、其背後有這一代“老”知識份子和共產黨官員的所謂文化運動，都具有這種特點。它使得人們對共產黨及其罪行的對抗和

認識，對二十世紀威脅人類的極權主義和革命的認識，整整又推遲了二十多年。

#### 4、阻隔年輕一代和老一代知識份子傳承的斷牆

從文革到六四，筆者還親自感受到他們建立的第四道牆。于光遠、李慎之，以及稍後的李澤厚這一知識份子群體，在上一代持有自由主義、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例如陳寅恪、洪謙和黃萬里等人，和其後我們這兩代人中間建立了一道隔離牆。它使得五十年代以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知識份子、學生根本不瞭解上一代，以及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探索。陳寅恪、洪謙、黃萬里等人，在他們眼裏是遺老遺少，是被淘汰的西方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筆者至今深以為憾的是，我在清華園生活了將近十年，其後又經常來往於清華園，居然不知道那裏住著一位頂天立地的巨人黃萬里。筆者在從事科學哲學探索十幾年後，才知道中國就有一位非常地道的科學哲學家、維也納學派的成員洪謙。而陳寅恪的獨立精神和歷史、文學研究，筆者也是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瞭解到的。

最近二十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年輕一代對於前輩知識份子、知識傳統的重新開掘幾乎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出來的，例如謝泳等人對於西南聯大，對於民國以來的知識份子的重新認識。他們幾乎都是靠自己的感覺重新發現、找到老一代知識份子，以重新開掘他們創造的財富。而于光遠這一知識群體所形成的碩士、博士導師，不僅起不到導向真正研究的文化學術領域，而且成為一堵阻斷年輕一代和世界，和中國傳統接軌的隔離牆。就是在今天，他們還是用極其輕蔑的口吻談論那些他們曾經參與批判、甚至迫害過的前輩或同輩自由派知識份子。

#### 5、直接或間接回應共產黨極權主義政治文化的回音壁

對於這道橫梗在中國社會中的牆，如果從文革到六四的二十年間，中共政府很多時候是被動地利用了這道防火牆，那麼在“六四”後的十幾年中，他們已經學會非常積極主動地利用這道防火牆，甚至把它變成一道“回音壁”，尤其是在九九年鎮壓法輪功，導致法輪功的反抗公開化以後。縱使我們自己還不明白，但是共產黨政府已經明白這道牆對他們可能產生的積極作用。

這是一道天然的防火牆，最近十年的發展使人們看到，雙方都已經非常明白這種關係。對此最典型的是對於所謂“擦邊球”的運用。共產黨集團也已經學會巧妙地利用他們的擦邊球化解社會的不滿，並以此損害、乃至摧毀真正自由派知識份子等完全與共產黨文化不相容的新的追求。他們在嚴酷打擊包括法輪功信仰在內的一切言論、一切活動同時，對這派知識精英，包括李慎之式的一般的批評，則“網開一面”，甚至允許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出國，給他們一定的活動空間。他們不僅利用這種方法導引和防止了批評升級，而且還更積極利用這類知識精英的精神和文化特質，對抗打擊真正的自由派人士、持不同政見者和法輪功。很多這類知識精英也非常會利用共產黨給與的方便，“裏外通吃”。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戴晴。今年出現的丁子霖致高智晟公開信，最近的余傑王怡在會見布希總統時排斥郭飛雄事件，也都在相當程度上染有這種性質。

另一個與此緊密相連的手法是收買政策，對於所有這類的知識份子從物質上給與各類優惠和照顧，讓他們明明也感到未來國家面臨著巨大的災難，但是由於暫時相對舒服的生活，而更願自欺欺人地沉溺於安逸。

到今天，文革四十年，“八九”十七年，特別是在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和法輪功學員對新的文化和知識的追求影響越來越大以後，這類知識精英對中國社會的消極作用越來越顯著了。

## 五

從文革到六四，細檢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經過了二十三年的發展到八九年爆發的學運，應該說還不能稱之為是一場真正的爭取自由和民主的運動，其最典型的例子是對於魯德成等潑汙天安門上的毛澤東像的處理。整個運動並沒有明確提出極權主義專制問題，民主自由問題。如同七六年紀念周恩來所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一樣，這個運動仍然只能是共產黨社會內部的一個大規模的不滿運動。它不能和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相提並論，因此可以說它仍然沒有回到三十年代後被隔絕的，在世界範圍內和傳統範圍內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和對極權主義的抵

制。

從七十年代初期對此有所感覺，開始努力尋求接續歷史和傳統的青年知識份子，直到八九年以後，接近九十年代中期，才重新慢慢找到被五七年徹底斷絕的歷史和傳統。而真正如東歐五六年匈牙利、六八年捷克、七十年代末期波蘭團結工會那樣形成群眾性的對於人權、民主、自由的追求，在中國則是在九九年法輪功遭到鎮壓之後。

在回顧、思索從文革到六四的歷史變化情況的時候，我當然不是全面否定李慎之等這兩代共產黨，或者其周圍滲透著共產黨文化的知識份子，而要說的是，他們或許能夠使得共產黨寬鬆一些，但是卻絕對不能成為我們的旗幟，特別是把他們作為“自由主義”的旗幟，因為套句馬克思的說法，他們的臀部帶有極權主義的印章。

我們支持他們是因為要利用他們可能給我們造成的寬鬆，來發展真正的自由主義。我們承認他們的努力，甚至讚揚他們的努力，但是絕對不能跟著他們。因為在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專斷的唯物論、共產黨的文化中，只有“威脅自由和民主”的“極權主義”和“革命”，而不會產生真正的自由主義思想。

從文革到六四，從六四到今天，筆者以為我們已經有能力擺脫掉共產黨文化及其知識精英對我們的禁錮、誤導：跨過斷代的鴻溝，打破封閉社會、封閉文化、封閉思想對我們的禁錮，接續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當代知識份子的獨立自由精神。

共產黨極權主義和革命是二十世紀對民主自由的兩大威脅。實際上，九一一後人們已經看到，在二十一世紀，極權主義和革命依然是威脅自由民主的兩個主要危險。但是這一次，從文革到六四，我以為我們的教訓、我們的覺醒就是，我們終於能夠站在他們對面，看清他們，對抗他們，為中國歷史、文化的連續，為真正的自由民主而努力了。

2006-6-5 於德國埃森





# 太陽最紅——人間最黑的年代

## 中共發動文革四十週年祭

黃花崗雜誌社論

### 一、文革是中共十七年持續內訌內鬥的大爆發和總爆發

歷史的事實是，中共自一九二七年開始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起，便開始了以嗜殺為特征的無休止內訌。特別是江西肅反、富田事件、川康分裂和延安整風，曾屢造翻船之險。及至造反成功，建立政權，新的內訌遂激烈開張。從毛澤東對各路“開國元勳”削藩奪兵權，到整倒高崗、饒漱石集團始，歷經數次黨內鬥爭，直至一九五九年彭黃“反黨”集團罪名成立，毛澤東固然因此而維護了自己在黨中的領袖地位，劉、周、鄧等人亦於合縱連橫之中，或助毛以滅高、饒、彭、黃，或為己而與毛暗中對抗，或拳腳相連以共同迫害人民與知識分子。一九五九年後，蓋因毛的三面紅旗造成曠古奇冤，餓死人民數千萬，劉、鄧遂趁收拾大躍進殘局，逼毛退居二線，奪權之心益盛。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委員及各省黨魁已逐漸為劉、鄧所安插，“毛主席三天不學習就會趕不上劉少奇”的中央指示，也已口頭傳達到基層黨支部。中共黨內遂有“毛家天下劉家黨”之論，從而造成了毛的大權旁落，亦導致了更大內訌與全面內訌的必然爆發。此尤不論，十七年間，特別是中共一旦“興內訌於內”，便必然要“張外鬥於外”，從而交相呼應，迭呈“中共領袖內訌、普通黨人遭殃、無辜人民橫尸”的淒慘局面。就內訌而言，毛、劉、周、鄧等鬥倒了

高、饒、彭、黃，便以所謂“高、饒、彭、黃分子”為罪名，施以大清洗。就外鬥而論，自合作化至文革前，凡黨內起風，便民間有難。一九五七年，中國大陸知識界因此而招致百萬知識分子的勞改、勞教和家破人亡。一九五九年，毛在劉、周、鄧等支持下，為鬥倒彭德懷，尤不惜餓死人民數千萬，雖餓殍遍野卻不願與聞。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劉、鄧為自保，而兩度轉移“四清”和文革的大方向，變鬥當權派而為鬥群眾，瞬間便使人民冤命連城、血肉橫飛。如果說中國歷史上唯一貧下中農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因革命成功而興胡、藍之獄，不過誅殺其黨人二萬有餘；與毛澤東同為鄉村小知識分子出身的洪秀全，為興內訌而盡殺楊、韋二黨，亦同樣不過三萬之眾，則中共十七年內訌、外鬥之株殺、迫害、連坐其黨人，再加上被枉送掉性命的無辜民眾，轟不知有幾百萬幾千萬之多。

應該說，正因為十七年內訌外鬥不止，才有文革的全國奉旨惡鬥。前者為後者的準備，後者為前者的必然。文革中，毛澤東就曾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斯諾說，他五九年就已經想搞掉劉少奇。一九六二年他又因劉趁其退居二線攫取黨權，而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以便將不抓階級鬥爭的罪名禍於劉少奇一身。一九六四年，毛一邊指使江青在上海建立勢力，借批判“文藝界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以暗示“黨內有一條修正主義的路線”；一邊發動“四清”運動，首度提出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

道路的當權派”。一九六五年一月，毛在最後作出搞掉劉少奇的決定之後，又立即指使江青及其上海幫拉開了對劉、鄧進行反攻倒算的序幕。一九六六年蓋因陰謀就緒，毛乃迫使政治局發出“五一六通知”，斬卻了劉少奇的四員大將——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文革遂轟然而起。

但是，文革與十七年持續內訌的不盡相同之處，一是十七年的內訌雖與外鬥交相呼應，但外鬥畢竟祇是內訌的曲折外化，並非中共將內訌公開化所使然。二是十七年中共的每一次內訌，因能自訌自消，固祇需要公佈內訌結果，而不公開內訌經過，對外仍講“團結一致”。三是十七年內訌毛澤東皆因權、威具在，或尚在，穩操勝券，而不必非求助於“民力”不可。但是，一九五九年之後，其權力與權威的迅速弱化，尤其是劉少奇黨中勢力的日漸崛起，已使他頗有“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之感。因而，他既不能夠穩操勝券，尤不敢掉以輕心，遂決意“利用自己在黨內國中的神秘領袖地位”，決策“發於外而攻於內”，實際上已經是“拼死一搏，以求奇效”。同時亦因劉、鄧黨中勢力，特別是在中央委員會的勢力過大，從而又使毛決心於文革爆發後，誘使對方犯錯誤，即“權付劉、鄧”，自己卻抽身事外。待到劉、鄧果如其料，依十七年內訌外鬥的老例，更為轉移運動的大方向而大派工作組，大興外鬥，大整群眾，並已造成全國血淚交迸之時，他才突然回到北京，公開拋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公開聲明“此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公開指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由是劉、鄧因整群眾而獲罪於群眾，毛澤東則因“解救”群眾而獲得群眾擁護。這樣，一場“由內謀內和由外攻內、以上誘下和以下攻上、以黨殺民和以民攻黨”的更大內訌和內亂，才算是真正爆發。毛因此而旗開得勝，文革由是而顯示了它與中共十七年內訌外鬥的巨大不同之處，便是“中共內訌的全盤公開化”和“借民之力以助黨訌”局面的形成，以及“全黨奉旨惡鬥和全國奉旨內亂”的發生。

## **二、文革使中共從一黨專制 復辟走向了毛氏君主專制復辟**

誠然，要想解開文革大亂，祇亂了劉鄧黨人，祇害了黎民百姓，卻非但亂不了中共於十七年所復辟成功的專制制度，甚至還強化了這個專制制度，並將這個專制制度完全徹底地復辟到了君主專制制度的“謎底”，就必須認清，正是“十七年”才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制”等各個方面，為文革的爆發奠定了全面的歷史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中共全面復辟專制制度和架構教政合一極權制度的成功，和它對人民實行絕對專制和殘暴統治的成功。由是，任何人一旦於中共黨內權力鬥爭中獲勝，尤其是獲得了他個人對黨的專制權力，他就能夠輕而易舉地由一黨專制走向一人專制，從而造成君主專制的復歸。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文革發動後直至其死，乃成為千萬黨人和億萬人民的最高主宰和絕對主宰，毛澤東之所以敢於“捧後宮、興閹黨”，姬妾成群、荒淫無恥，非但造成“毛之不死，江亂不已”的局面，而且形成了“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毛要民亡，民不得不亡”的“帝王氣派”，其專制的淫威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不敢望其項背，就是因為他將中共一黨專制變成了毛氏君主專制，從而在實際上走上了對於君主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

## **三、文革使中共從堅持“馬教” 治國走向了堅持“毛教”治國**

文革前十七年，毛澤東雖然深感獨尊“馬教”對於鞏固一黨專制權力卓有奇效，卻又感到對於鞏固他個人的絕對專制權力依然大有問題。因為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已經使毛意識到，是獨尊馬列，還是獨尊毛思想、毛政策和毛權力，實已成為中共黨內鬥爭的焦點。毛甚至意識到，有人已經企圖利用馬列思想來排斥毛思想，諸如中共“八大”借反對個人崇拜而張黨徒對他的對抗，實使他痛恨在心。此時，林彪因懷有個人野心，又深諳個中道理，遂於六十年代初即開始在軍隊“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權威”，甚至把毛澤東思想推崇為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直至以編選《毛主席語錄》的方式，將毛澤東的每一句話都“神聖化和經典化”，所謂“一句頂一萬句”，企圖使之完全取代馬列主義在黨內和黨外、甚至是在國內和國外的獨尊地位。而文革之所以能夠成功發動的

重要思想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在中國大陸，毛澤東思想已經比天高皇帝遠的馬列主義愈來愈具有實際上的權威性。由是，“毛澤東思想萬歲”既成為文革時期最嘹亮的革命口號，“毛澤東思想”更從此成為統帥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最高統治思想。而反對毛主席和反對毛澤東思想，亦從此成為最高罪行，而必須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共討之。從而把十七年間的兩個最高統治原則，發展成了“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思想，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毛個人在文革開始後直到他死之前的絕對專制，由是而得到了全面保證和絕對保證。從而將中共教政合一之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推向了毛澤東兼“教主”和“君主”於一身的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的極端。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專制歷史和君主專制歷史上，就中國歷代帝王從未實行過宗教統治和教政合一統治的事實而言，毛式宗教專制統治，即被“蘇化和毛化”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統治，實在是對中國專制歷史和專制政治的最高發展和極端發展。

#### **四、文革使中共從專制的等級森嚴走向了反動的血統至上**

在中國大陸，舉凡親身經歷者，無不對文革前期血統論者的橫行與暴行，以及整個文革期間血統論對於每一個人命運的巨大影響，雖然記憶猶新，卻又不堪回首。但是，文革期間產生的血統論，自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十七年間中國大陸社會嚴酷等級劃分和出身論猖行的罪惡結果和惡性膨脹。在它的前期，中共新貴族子弟因高喊血統論而私刑虐民和酷刑殺民，固已留下了血跡斑斑的罪證；其“老子革命兒革命、老子反動兒混蛋”的瘋狂叫囂，就更是表現了這一伙掌權土貴族的無知、野蠻和顛狂。在它的中後期，血統論又始終作為一種殘酷的政治原動力，而時刻壓迫著整個的世道和人心。十七年間，因出身不好而薄冰難履者，至此已冰河難渡。而由出身不好、血統“低賤”所釀成的種種個人悲劇、家庭悲劇和社會悲劇，更是生生不已。“革命”派固因權力鬥爭的風雲變幻，而造成了自身等級的暴起和暴落；“反革命”派則因文革無窮盡地擴大了它的“陣營”，連劉少奇也成了反革命，而使它的等級劃分，由黑五類擴

張到了黑九類。至於在文革造反風雲中，因跳上竄下竟一時富貴、而終身作囚者，以及曾短暫掌權的“軍宣隊、工宣隊、造反派”等時髦政治集團，亦在社會等級的巨大迭變中，嚐足了上下翻滾的喜樂和哀怨。文革之後，即便是鄧小平要借改革以救黨，中共的出身論、血統論看似壽終正寢，但僅僅是在數年之後，中共“龍子龍孫”們又迅速展現出來的全面接班、掌權和抓錢的“革命風貌”，特別是那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由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來接班，我們最放心”的理論在現實中的猖行，不僅為中共的出身論和血統論另闢通途，大獲成功，而且將中國自秦以後早已沒落和絕跡的封建貴族政治，重新予以復辟和發展，直至造成了一派倒退和腐爛的社會政治景象。

#### **五、文革使中共的殘酷鎮壓走向了鎮壓的“無法無天”**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曾不止一次地狂言過“我就是禿子打傘——無髮（法）無天”。但就事實而論，自文革前至文革後數年，無非是毛澤東無法，國家人民無天。誠然，毛澤東無法，乃是從中共十七年法守虛陳而來。國家人民無天，亦是從十七年中共對大陸人民迭行殘酷鎮壓所致。換言之，若沒有十七年中共殘酷鎮壓人民的“豐富”歷史經驗和“寶貴”政治手段，文革絕不會一開場便腥風貫日，血雨連天。其種種荼毒人民直至自己黨人的手段，更是紛至沓來、交相並作，直至“展陳而出新”。因為，對於“法守虛陳、革命即法”的十七年而言，文革所掃蕩掉的，不過是中共一整套完全虛假的法制而已；對於十七年“運動即法”這個中共最根本的法制要害而言，文革恰是中共“運動即法”的最高體現；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所創製的種種殘酷鎮壓人民的手段而言，文革不過是各種殘酷手段的公開大亮相和公開大表演；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迭造冤獄以無端整肅人民及其少數黨人而言，文革無非是將“冤獄遍中華”擴張成了“中華即冤獄”和“冤獄遍中共”罷了；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為殘酷鎮壓人民而創建的多重監獄制度而言，文革無非是將它的獄外之獄——“群眾專政”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更何況中共十七年專制殘暴統治，早已使得中華大地到處都有為劃清界限而拒不為“反

動父母”裹尸送葬的不肖子孫，卻再也沒有所謂“路見不平而拔刀相助的中華壯夫”，由是而將我們古老民族重情、重仁、重孝、重節和尚俠好義的種種優秀民族性格破壞罄盡。此無疑為毛氏“運動群眾”，發動文革，造就了先決的“人性惡化”條件。而毛澤東和中共在文革中無法無天的最突出表現，就是既連“法”的任何虛假形式都不再顧忌，又空前地發展了他的“裂民而治”手段，無限地擴張了“群眾專政”的範圍，史無前例地迫害人民，草菅人命，從而在實際上將整個中國大陸完全變成了一個暗無天日的“大監獄”。如前所述，僅在文革數年之中，被毛澤東誘以造反，挑以武鬥，釁以互鬥和大規模鎮壓而致死者，就達兩千萬之多，幾與日本十四年侵華戰爭期間被害中國軍民的數目相等。

## 六、文革使中共從架構權 力經濟走向了毀滅國民經濟

文革和文革後數年，毛澤東和中共亦在經濟上將中國大陸推向了國空民絕的境地。這雖是毛澤東以革命破壞經濟，以政治壓迫經濟，直至為了權力而不惜毀滅經濟的一個惡果，又是十七年所架構的專制經濟形態所必然要造成的結果。文革前，相對於毛澤東重權力、輕經濟和不懂經濟、卻又好大喜功而言，劉、鄧一路似因權力鬥爭的啓示，而心存發展經濟的要求。文革開始後數年，相對於毛澤東唯權是問的心態而言，周恩來似乎因“當家之難”而不敢歧視經濟為無物。是故，毛、周兩大政治集團間的長期鬥爭，便使得整個文革和文革後數年的經濟，處於無休止的“毀滅性震蕩狀態”。周恩來既要緊跟毛澤東幹革命，又不得不抓生產；江青為了革命奪權，乾脆連生產也不給抓。及至一九七四年鄧小平上台，雖痛言“積重難返”，卻又因權力到手，而要整頓經濟。然而，事不過一載，江青四人幫已唆使造反派喊出了“萬里不倒、火車不跑”的口號。鄧小平的二度政治前途，遂在毛所點燃的“批林批孔”烽煙中，再度毀於一旦。專制經濟，由是而在中共一黨之長期內訌內鬥中走向了死地。由十七年所建成的專制經濟形態，不僅成為文革和文革後數年中毀滅經濟的蘊淵，而且成為鄧氏經濟改革的強大反制力量，至今難逃其咎。

## 七、文革使中共從公開否定民族 歷史文化走向公然毀棄民族歷史文化

一個應有的共識是，中國共產黨從來就是一個外來的政黨，中國共產革命從來就是一個外來的革命，中共北京政權從來就是一家用外來的馬列洋教在中國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殘暴政治集團。所以，這個黨，這個革命，這個政權，不僅從來就將“文化”當作他們奪取政權和實行統治的一條重要戰線，而且從來都要根據馬克思主義必須“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信條，一意效法前蘇聯，鼓吹意識形態“革命”，強化思想文化統治。

文革前十七年，中國共產黨雖然明明知道“共產黨宣言”乃是誕生在封建的德意志邦國時代，卻又蓄意要以馬克思的“反封建口號”為武器，將中國數千年歷史，特別是秦漢以後早已“廢了封建、置了郡縣”的歷史，即早已從“封建貴族政治”走向了“君主平民政治”的歷史，統統都納入到“封建歷史”的範疇，從而在馬克思“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號召下，非但要和我們數千年的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實行決裂，而且要對我們數千年的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進行徹底的批判和否定，以為中共在中國建立一個只“認宗馬教、傳承蘇俄”的“馬列中國”，奠定思想和文化的基礎。猶如孫文所言，“要想消滅一個民族，首先就要消滅這個民族的思想”。

為此，十七年中，中共發動了一系列的歷史批判和文化鎮壓運動，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進行了無情的清算，對中國社會的各界知識份子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馬列中國篡立不過數年，整個中國知識界就已經在刀光血影之下，逞現一派“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這樣一種“族無前例、史無前例”的荒唐可怖景象。而中共在知識界文化界的得手，不僅為它架構“教政合一政制”和強化“專制復辟統治”，奠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基礎；而且為他數度從文化和文化界入手，以發動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鎮壓運動，找到了製造階級鬥爭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穴位和法門”。從批判電影《武訓傳》以協助建立馬列毛思想統治，到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徹底掌控對馬列毛思想的“獨家解釋權”；從誘發、擴大反右派鬥爭以全面建立思想文化專政，到一二再、再而三



地在文化界、特別是文學界“逼良爲娼”，要文學和藝術必須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更要爲中共所一再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服務；可以說，文化在中共的手中，早已成爲一個動輒得咎的“玩偶”。而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別是我們的優秀民族文化，就更是在十七年間，被淒慘地批判和否定了。

這既是毛澤東欲發動一場史無前例之政治奪權運動，便要從文化入手的由來；又是這一場世無前例之政治奪權運動，竟然被定名爲“文化大革命”的來由；更是這場所謂文化大革命一開場，就對我們民族文化首先進行了一場狂風暴雨般大掃蕩和大毀滅的真正原因。當然，也是毛澤東要他的“江皇后”和他的“林副統帥”早自六十年代初，就要從文化、文學、文藝界、甚至是國戲京劇下手，以爲他發動一場政治浩劫做足輿論準備和玩夠政治陰謀的真正緣由。

可以說，毛澤東發動的這一場“大革文化命”運動，和由他的接班人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發出的要“破四舊和立四新的革命號召”，委實將兩千年前的秦始皇驚得目瞪口呆，尤令二十世紀的德國法西斯們望洋興嘆。中華民族的歷史，終於遭遇了中共建黨以來所給予的最大浩劫；中華民族的文化，終於遭遇了一九四九年以後最瘋狂的踐踏和焚燒。

雖然自從中國出現了共產黨，“焚書坑儒”便早已不是秦始皇的“專利”；但自毛澤東發動了文革，“焚書坑儒”便被擴大到了中國社會的所有階層和各個方面。文革之中，中國人民蓋因黃陵被砸、家譜焚盡，而再難與聞自身之“根所由來”；中國人民蓋因佛堂被毀、廟堂抄盡，而從此不敬鬼神、不畏神明；中國人民蓋因“四舊”蹈火、文明毀棄，而從此視傳統的文化、優秀的道德、應有的修養猶如仇讎；中國人民蓋因從此只能規規矩矩地做馬列子孫，而絕不許再做中華兒女，因而，就算是其後因所謂改革開放而“衣食足了”，卻非但不是“禮儀興了”，而是“禮儀崩了”！今日中國大陸社會道德之淪喪、物欲之橫流，人心之腐蝕、文化之崩壞，就是中共文革前十七年種下的根子，和中共發動文革所製造了惡果。

一言以蔽之，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批判和否定了我們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文革十年中，中共更是全方位地焚燒和毀棄了我們的民族歷史和文化。中共對我

們的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所犯下的重罪與奇罪，實謂“罄竹難書”。

## 結語

總而言之，上述種種無非證明了一條真理，即：沒有中共十七年在中國大陸的專制復辟統治，便沒有文革的爆發。換言之，十七年固是文革發動的歷史準備，文革則不過是十七年專制復辟統治的大曝光。進而言之，就對中共數十年專制復辟統治的認識而言，在中國大陸，早就有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專制復辟統治較之文革開始後十年的更加黑暗性，和文革開始後十年較之前十七年的更加瘋狂性。而也正是十七年專制復辟統治的迅速建立及強化，和文革開始後十年的瘋狂倒行逆施，以及其後二十年爲自救而推行的兩度專制改良，才真正地凸現了中共整個專制復辟統治迅速由興而衰的歷史三階段。

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再來論證毛澤東時代才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了。因爲，當太陽過於燦爛的時候，你的眼前常常會一片漆黑。因爲，在中國的歷史上，確實不曾存在過這樣一個“太陽最紅”、但“人間最黑”的時代。因爲這個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的時代，確實是史無前例的黑暗，確實是史無前例的血腥，確實是史無前例地好話說盡和壞事做絕。（本文選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六章第九節，一九九九年美國藍天出版社第一版。題目爲本刊所加。其中第七節“文革使中共從公開否定民族歷史文化走向公然毀棄民族歷史文化”爲作者最新之補充）



孫文：

## 批判保皇改良文兩篇

**編者按：**一九零三年秋，孫中山先生曾四赴檀香山，並在檀香山發表了兩篇批判保皇改良的文章。這兩篇文章，不僅對康有為“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謬論進行了理性轟擊，而且對梁啟超“名為保皇、實為革命”之謀略理論和謀略行徑予以了公開揭穿。對不久以後共和革命派展開那一場“革命批判改良”的大論戰，奠定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理論基石。

本刊決定發表孫先生在百年前寫下的這兩篇文章，除掉意在從中汲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以外，更意在指出當代“保共改良”思想與百年前的“保清改良”思想，非但如出一轍，而且同氣相求。而孫先生在文中所批判的前朝“保清改良”之種種論點，當今的“保共改良”思潮皆無出其右。雖然，當年的“保清改良”派僅僅囂張數年，就已經日薄西山，並迅速為共和革命所取代；當今的保共改良派卻在海內外、特別是海外橫行霸道了幾二十餘年，單從一九八九年中共六四屠城算起，就已經是整整十七年了。個中緣由究竟何在，尚望讀者諸君思之。

### 背景介紹之一

檀香山有一家《西字早報》，是美國人辦的，在一九〇三年十月七日刊出一則報導雲：“著名中國革命家孫逸仙博士由橫濱乘西伯利亞號船於五日到埠，在本埠秘密或公開運動，華僑深信革命真理，多趨向

之。”該報又稱：“一千九百年九月，孫博士欲造成一新中國，由南省起義，傾覆專制政府，先生所統帶不過六百人，先在香港附近地方發難，意欲攻佔惠州，並約別處齊舉，取福建省為根據地。以數百民軍與四千滿洲兵對敵，初獲勝利，後因所約之黨人同時在別處起事，不果，遂令先生之計畫不成，殊可惜也。”這一則消息刊出以後，檀香山的華僑競相走告：“孫逸仙博士又來了！孫逸仙博士又來了！”像一陣春雷，震動了檀香山，使得此間的“保皇黨”分子心驚肉跳。

原來，國父離開橫濱後，一帆風順，於十月五日（癸卯年八月十五日）便到達了檀香山。檀香山本是興中會的發源地，國父一家人及其長兄德彰先生在檀島，這天又正是中秋節，親朋故舊，閤家團聚，其熱烈歡迎情景自不在話下。

國父這次到檀香山，已經是第四度重遊了。計自丙申年離此以迄這次重來，相隔整整的八個年頭。而今親朋故舊雖為數極眾，然而興中會的會員同志，卻已寥寥無幾，面目全非，國父觸景傷情，誠不勝今昔之感！何以如此？原來這其中有個變故。

在前面已經說過，在己亥年間，國父與梁啟超曾有合創新黨的計畫，因為康有為從中作梗而致擱淺。己亥年冬天，梁啟超奉康有為之命到檀香山來創辦“保皇會”，由於梁啟超對檀香山可說是人生地疏毫無淵源，所以在離開日本前，曾懇求國父寫信介紹認識檀香山興中會的同志們，矢言“誠意皈依革命真

理，誓必合作到底。”國父對人一向以誠相見，不虞有詐，特別寫信介紹其兄德彰先生及興中會的會員李昌、黃亮、卓海、李祿、鄭金、何寬、鍾木賢等同志共助梁啓超，這可以說得上義盡仁至了。不想梁啓超一到檀香山，便變了卦，別樹一幟。檀香山的一班同志，在學問上比不上梁，多被梁所說服。同時康有為對梁啓超抓得緊緊的，要他在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分會，又叫他在檀香山募捐，作為發動武裝勤王的餉源。於是，梁啓超就用了“名為保皇，實則革命”八個字作為口號，說“革命”與“保皇”，實在是殊途同歸，又詭稱曾經得到了國父的同意。德彰先生及李昌等見梁持有國父親筆函件，又知道梁啓超是維新運動的首腦分子，當然也不會想到這其中有什麼陰謀，各捐巨金助梁，德彰先生與李多馬且將自己的兒子拜梁啓超為師，求梁攜往日本留學。如此一來，使得多數的檀香山興中會會員都參加了他的保皇會分會。此時，國父在日本得到了這個消息，曾數度寫信勸阻，然而興中會的會員多已中毒過深，無能為力了。檀香山是國父最早創立革命團體的地方，梁啓超之所以能在檀香山立足，是由於國父的作書介紹，如今竟然被梁啓超用如此的手法偷占為保皇會的一大堡壘，這是梁啓超很對不起國父的行為，怎不叫國父失望。

梁啓超在檀香山竊占了國父的革命團體，國父只不過有“不勝今昔之感”，一時並未對梁加以申討，因為國父待人寬厚，樂於與人為善。可是，這時保皇會在檀香山設立的機關報——《新中國》卻沉不住氣了。《新中國》報的主筆名叫陳繼儼，又叫陳義侃，是一個保皇改良派，聽說國父已到了檀香山，又見《西字早報》有國父將在檀埠作“秘密或公開運動，華僑深信革命真理，多趨向之”的消息，深恐保皇黨的基礎將為之動搖，乃在報上惡意抵毀國父為“假革命”。這樣一來，激怒了興中會的老會員李昌、何寬、程蔚南、許直臣、黃亮、林鑒泉等十幾位同志，大家晉謁國父，要搗毀《新中國》報社，國父雖然勸慰他們不得魯莽，但也就忍無可忍，決心掃蕩保皇黨勢力，於是便在程蔚南所主辦的《隆記報》上發表了一篇富有歷史意義的振聾發聵文章，題為《敬告同鄉、論革命與保皇之分野書》。

## 孫文原文之一

“同鄉列公足下：向者公等以為革命保皇二事，名異而實同，謂保皇者不過借名以行革命，此實誤也。天下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常人置產立業，其約章契券，猶不能假他人之名，況以康、梁之智，而謀軍國大事，民族前途，豈有故為名實不符，而犯先聖之遺訓者乎？其創立保皇會者，所以報知己也。夫康、梁一以進士，一以舉人，而蒙清載湉特達之知，非常之寵，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維新，言聽計從，事雖不成，而康、梁從此大名已震動天下。此誰為之，孰令致之，非光緒之恩，曷克臻此？今二子之遁逃外國而倡保皇會也，其感恩圖報之未逞，豈尚有他哉？若果有如公等所信，實則革命，則康、梁者，尚得齒於人類乎？直禽獸不若也！故保皇無毫釐之假借，可無疑義矣。如其不信，則請讀康有為所著之《最近政見書》，此書乃康有為勸南北美洲華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談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圖保皇立憲，而延長滿洲人之國命，續長我漢人之身契。公等何不一察實情，而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己之欲，推人之欲；而誣妄康、梁一至於此耶？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實明明出諸於梁啓超之口，是何謂誣？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真誠無偽耶？而何以梁之門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視梁為公敵為漢仇耶？梁為保皇會中之運動領袖，閱歷頗深，世情寢熟，目擊近日人心之趨向，風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覺為革命之氣所動盪，偶爾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業報》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壞，忽言愛同種之過於恩人光緒，忽言愛真理之過於其師康有為者，是猶乎病人之偶發癡語耳，非真有反清歸漢，去暗投明之實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氣者也。康既刻心臣服以表白其保皇之非偽，而梁未與之決絕，未與之分離，則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端，其所言革命屬真，則保皇之說必偽；而其所言保皇屬真，則革命之說亦偽。又如本埠保皇報之副主筆陳某者，康趨亦趨，康步亦步，既當保皇報主筆，而又口談革命，身入洪門，其混亂是非，顛倒黑白如此，無怪公等向以之為耳目者混革

命保皇而為一也，此不可不辨也。今幸有一據，可以證明彼雖口談革命，身入洪門，而實為保皇之中堅，漢族之奸細。彼口談革命者，欲籠絡革命志士也；彼身入洪門者，欲利用洪門之人也。自弟有革命演說之後，彼之詐偽，已無地可藏，圖窮而匕首見矣。若彼果真有革命之心，必聲應氣求，兩心相印，何致有攻擊不留餘地？始則於報上肆情誣謗，竭力訾毀，竟敢不顧報律，傷及名譽，若訟之公堂，彼必難逃國法。繼則大露其滿奴之本來面目，演說保皇立憲之旨，大張滿人之毒焰，而痛罵漢人之無資格，不當享有民權。夫滿洲以東北一遊牧之野番賤種，亦可享有皇帝之權；吾漢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種族，則民權尚不能享，此又何說？其尊外族抑同種之心，有如此其甚者，可見彼輩所言保皇，為真保皇；所言革命，為假革命，已彰明較著矣。由此觀之，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摧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與任公私交雖密，一談政事，則儼然敵國，然各有志，不能相強。總之，劃清界線，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說保皇，彼輩保皇何必偏稱革命？誠能如康有為之率直，明來反對，雖失身於異族，不愧為男子也。古今來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異種，舍忠義而為漢奸者，不可勝計，非獨康、梁已也。滿漢之間，忠奸之判，公等天良未昧，取捨從違，必能審定。如果以客帝為可保，其為萬劫不復之奴隸，則亦已矣。如冰山之難恃，滿漢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國之可恥，四萬萬漢族之可興，則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庶漢族其有豸乎？書不盡意，餘詳演說筆記中，容出版當另行呈政。此致，即候大安不既。弟孫逸仙頓。”

## 背景介紹之二

國父的這一篇文章，把梁啟超所發明而保皇會所藉以蠱惑人心的“名為保皇，實則革命”八個字，一刀砍成兩段，明明白白地劃清界限，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這實在是最有力的宣傳檔。此外，國父為了端正視聽，鼓吹革命，喚醒華僑免受保皇黨人的欺騙，並在荷梯里街戲院與利利霞

街華人戲院作大規模的演講會。先後舉行了好幾次，每次總是連續兩三天，聽眾非常踴躍，每次都有千餘人自動前往聽講。聽眾中，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戲院容量很大，當時並無擴音設備，李昌、蔚南等都擔心國父的聲音能否達到全場？其實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國父演說之前，總有幾句開場白，開場白之後，換來的總是一片掌聲和歡呼聲。於是，他稍頓一頓，向前走幾步，將手舉起，聽眾便肅然，屹立不動，國父這才開始演講。國父每次演講都很成功，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次，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荷梯里街戲院的演說會，那次，國父的講題是“中國救亡圖存之道”，他那宏亮的聲音中仿佛有電力，他的話句句是真實的，每個字都印入聽眾的腦海裏了，待他講完，群眾中響起了如雷的歡呼聲，大家仍不想離開，國父均能不假思索，予以明確解答，聽眾皆表悅服。翌日，《西字早報》便刊出了這樣一篇報導：

“昨日下午，著名革命家孫逸仙博士在荷梯里街戲院演說，勇敢而言曰：革命為唯一法門，可以拯救中國出於國際交涉之現時危慘地位，甚望華僑贊助革命黨。聽眾接納，表示熱誠。先生身穿白麻衣服，頭上短髮，恰似一呂宋人，其言論舉動，顯出有感人羣之力，加以態度溫柔，秩序整肅，真乃天生領袖。彼謂首事革命者，如湯武之伐罪吊民，故今人稱之為聖人。今日之中國何以必須革命？因中國之積弱，已見之於義和團一役，二萬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輩四萬萬人一齊奮起，其將奈我何？我們必須傾覆滿洲政府，創設國民，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又在利利霞街華人戲院演說，聽者亦座為之滿，無容足地。何寬為主席，公演訖，雄辯滔滔，徵引歷史，由古及今，謂：漢人之失國，乃由不肖漢奸助滿人入關，征服全國。他深信不久漢人即能驅逐滿人，恢復河山雲。”

檀香山的華僑，聽過國父的幾次演說鼓吹革命之後，耳目為之一新，風氣為之大變，從前誤入保皇會的，也有不少人登報要脫黨，甚至指責保皇會是漢奸奴隸。這下子陳儀侃更慌了，既懼於國父的言論宏博，感人最深；又害怕僑胞退黨者眾，於己黨不利。於是，他使用了一個化名，寫了一篇“敬告保皇會同志書”，刊登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陰曆十一月十一日）的《新中國》報上，說他們主張保皇是為愛



國，反對革命是爲了怕列強乘火打劫來瓜分中國，希望君主立憲是認定君主立憲爲共和的過渡。這更是混淆視聽的無稽之談。爲揭發保皇理論的謬誤，澄清一般華僑對於革命的觀念，於是，國父又寫了一篇“駁保皇報書”，登載在隆記報上，來駁斥陳儀侃。

## 孫文原文之二

“陰曆十二月二十九日，檀埠保皇報刊有“敬告保皇會同志書”。此書出於該報主筆陳儀侃之手，而托他人之名，欲間接而駁仆日前之書也。書中所載，語無倫次，義相矛盾，可知作者于論理學（LOGIC），一無所知，於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更惛然罔覺，所言事實，多有不符，牽強附會，本不欲推求詳辯；然其似是而非之理，最易惑人，故逐條駁之，以塞毒談，而辟謬論。彼開口便曰愛國，試問其所愛之國爲大清國乎？抑中華國乎？若所愛之國爲大清國，則不當有“今則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之一語，自其口出。若彼所愛之國爲中華國，則不當以保皇爲愛國之政策；蓋保異種而奴中華，非愛國也，實害國也。彼又曰中國瓜分，在於旦夕，外人窺伺，乘間即發，各國指認之地，照會政府，不得讓與別人云云。曾亦知瓜分之原因乎？政府無振作也，人民不發奮也。政府若有振作，則強橫如俄羅斯，殘暴如土耳其，外人不取側目也。人民若能發奮，則微小如巴拿馬，激烈如蘇威亞，列強向之承認也。蓋今日國際，惟有努力強權，不講道德仁義也。滿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區盡失，發詳之地已亡，浸而日削百里，月失數城，終歸於盡而已。尚有一線生機之可望者，惟人民之發奮耳。若人心日醒，發奮爲雄，大舉革命，一起而倒此殘腐將死之滿清政府，則列國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窺伺瓜分之事哉！既識引管子之作內政以寄軍令，何以偏阻漢人行革命而複祖邦？今日之作內政，從何下手？必先驅除客帝，復我政權，始能免其今日簽一約割山東，明日押一款賣兩廣也。彼滿清政府不特簽押約款，以割我賣我也；且爲外人平靖地方，然後送之也，廣東之新安縣廣州灣已然之事也，倘無滿清之政府爲之助桀爲虐，吾民猶得便宜行事，可以拚一死殉吾之桑梓。彼外國知吾民之不易與，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則彼雖食欲無厭，猶有戒心也。今

有滿清政府爲之鷹犬，則彼外國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拱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滿清政府，別無挽救之法也。乃彼書生之見，畏葸存心，不識時勢，不達事體，動輒恐逢人之怒。不知我愈窺伺，我能奮發，則彼反敬畏，豈有逢人之怒之理哉？如其不信，吾請陳儀侃日日向外人叩頭，日日向外人乞情，試能止外人之不照會清朝以索地否？清國帝後今日日媚外人矣，日日宴會公使及其夫人矣，媚外人之中，又與俄爲最親慝矣；然而據其發詳之地者則俄也。不逢人之怒，莫過於今日之清帝後，以儀侃之見解，則必能免於瓜分矣，信乎否乎？既知中華亡國二百六十年矣，不圖恢復，猶竭力以阻人之言恢復言革命，是誠何心哉？彼固甘心以殉清朝之節，清亡與亡，清奴與奴，洵大清之忠臣義士矣，其如漢族何？而猶囂囂然執“毋寧”二字以罵人爲白奴，是真強辭奪理矣。彼曰：革命之說，原本大易。又曰：中國固始終不能免於革命。其言是矣。乃何以又曰：中國今民智爲萌芽時代。夫大易者，中國最古之書，孔子聲辭，稱湯武革命，順乎天也，豈由湯武至於今，經二十餘朝之革命，而猶得謂之萌芽時代耶？其所引法國三大革命曰：經盧梭、達爾文、福樓特爾諸大哲學家提倡建設，而不知達爾文乃英人，當法國第一次革命之時，彼尚未出世；當第二次革命之時，彼尚未成學；當第三次革命之時，彼尚未聞名於世。其第一部著作，名曰：《生物本源》，出版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當時英國博物家尚多非其說之不經。迨十餘年後，始見重於英之學者；又十餘年後，始見稱於世人。今該主筆大書特書曰：達爾文有與提倡法國三次革命之功。彼所指之達爾文，或是達爾文之前身乎？想該主筆必精通三世書矣，否則何以知之耶？又雲：法國死於革命者一千二百萬人。該主筆當識吾人之革命，不起于京師，想亦熟聞法國之三大革命皆於巴黎矣，而巴黎之外，無死於革命者。試問巴黎當時人口幾何？作者知之乎？且巴黎雖經三次之革命，而未遇揚州十日之事，無廣州洗城之慘。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於革命，三次計之，亦不足此數，毋乃該主筆以一人轉輪數十次計之乎？若此則非吾所敢知。彼既曰：革命之結果，爲民主政體也，胡又曰：有建設者謂之有意識之破壞，無建設者謂之無意識之破壞，彼等是否建設，吾不敢知云云。夫革命破壞也，民主政體者建設

也，既明明於革命之先，定為民主政體矣。非意識為何？曰政曰體，非建設為何？該主筆以一手之筆，一時之言，其矛盾有如是，斯亦奇矣。彼又嘗謂中國人無自由民權之性質，仆曾力斥其謬，引中國鄉族之自治，如自行斷訟，自行保衛，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雖不及今日西歐之美，可足證中國人稟有民權之性質也。又中國人民向來不受政府之干涉，來往自如，出入不問，婚姻生死，不報於官，戶口門牌，鮮注於冊，甚至兩鄰械鬥，為所欲為，此本於自由之性質也。彼則反唇相稽曰：此種野蠻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彼言？仆既雲性質矣，夫天生自然謂之性，純樸不文謂之質；有野蠻之自由，則便有自由之性質也，何得謂無？夫性質與事體異。發現於外謂之事體，稟賦於中謂之性質。中國民權自由之事體未及西國之有條不紊，界限軼然，然何得謂之無自由民權之性質乎？惟中國今日富於此野蠻之自由，則他日容易變為文明之自由。倘無此性質，何由而變？是猶琢玉必其石具有玉質，乃能琢之成玉器，若無其質，雖琢無成也。彼又曰：中國人富於服從權勢之性質，而非富於服從法律性之性質。試問無權勢可以行法律乎？今日檀島，若政府無權勢以拘禁處罰犯法之人，其法律尚成法律乎？夫法律者，治之體也；權勢者，治之用也，體用相因，不相判也。今該主筆強別服從法律與服從權勢而為二事，是可知彼於政治之學毫無所知也。彼又曰：立憲者過渡之時代也，共和者最後之結果也。此又可見彼不知立憲為何物，而牽強附會也，夫立憲者，西語曰：CONSTITUTION，乃一定不易之常經，非革命不能改也。過渡者，西語曰：TRANSITION，乃變更之謂也。此二名辭，皆從西文譯出，中國無此成語也。該主筆雖不知以為知，而妄曰 CONSTITUTION 乃 TRANSITION 時代，何可笑也。推彼之意，必當先經立憲君主，而後可成立憲民主，乃合進化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為破天荒者則然耳，若世間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則我可以取法而為後來居上也。試觀中國向未有火車，近日始興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則中國今為火車萌芽之時代，當用英美數十年之舊物，然後漸漸更換新物，至最終之結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車，方合進化之次序也。今彼以君主立憲為過渡之時代，以民主立憲為最終之結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壞，而始得至

於民主之域也。與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為便耶？夫破壞者，非得已之事也，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專制之時代也，必先破壞此專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憲也。既有力以破壞之，則君主民主隨我所擇。如過渡焉，與其滯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岸，為一勞永逸之計也。使該主筆若不知民主為最終之結果，其倡君主立憲猶可說也。乃彼既知為美政，而又認為最終之結果，胡為如此矯強支離多端相辯難也？得毋以此事雖善，誠為救中國之良劑，但其始不倡吾師，其終亦不成於吾手，天下上等之事，必不讓他人為之，故必竭力阻止，以致不成而後已，是重私心而忘公義也。彼又曰：會外人何以圖羊城謀惠州，而利用洪門之勢力？不知革命與洪門，志同道合，聲應氣求，合力舉義，責有應盡，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門之宗旨，而令洪門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又仆前書指以滿洲之野番，尚能享皇帝之權；而彼則曰：豈不見各國憲法云云。仆所指乃當今清國專制之皇權，而彼引各國憲法以答，真強為比例，擬於不倫矣。彼又曰：所謂保皇者自我保之，主權在我，非彼何我也，不得謂為滿奴云云，此真夢夢也。今光緒皇帝儼然在北京，日日召見臣工，日日宴會公使，有時游頤和園，有時看西洋戲，何當受彼之保，其言之離事實，何相遠之甚也。彼又曰：今則驅除異族，謂之光復舊物，不得謂之革命，此拾人之唾餘，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其書中最得力者，為托某氏之言曰：弟前十年故為彼會中人，今已改入保皇會矣云云。其是否屬實，姑毋容辯；但據其所述誓詞，則知彼非門外漢，亦升堂而索入於室也。不然，豈有下喬木而入幽谷者哉？不觀其他之入保皇會者乎？多以保皇為借名而誤入者也。該主筆又從而引申其說曰：蒙古與滿洲且不辨云云。蒙者蒙古也，滿者滿洲也，豈於蒙滿之外，更有此言也？可知其平日荒唐謬妄，強不知以為知，夜郎自大，目中無人，真不值識者一哂。仆非文士，本不欲與八股書生爭一日之長，興筆墨之戰；但以彼無根之學，以訛傳訛，惑世誣民，遺害非淺，故不得已而駁斥之。倘彼具有天良，當知慚愧，早日悔悟，毋再現其醜也。又其人存心刻忍，觀其所論蘇報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災樂禍之心，毫無拯弱扶危之念，與保皇會友日前打電求救之意，亦大相反背，其手段之酷，心地之毒，門戶之

見，胸度之狹，於此可見一般。今特揭而出之，以質諸世之公論者。”

### 背景介紹之三

檀香山的華僑們，經過了國父與陳儀侃的這場筆戰，又聽過國父多次的演說以後，看清楚了革命與保皇的確是兩回事，也漸漸瞭解愛國與救國也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參加國民革命。於是，若干曾經一度上了梁啟超的當，或灰了心的興中會會員，又紛紛重新集合於國父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旗幟之下。一般的愛國華僑，也由於國父的精神感召，救國之心油然而生，革命的風氣，與時俱進。希爐埠的華僑們，很想聽到國父的革命主義，大家特推毛文明為代表，邀請國父前往演說革命主義。

那毛文明，就是庚子年在廣州西城寶華大街長老會上力勸史堅如“勿再入險地”的毛文敏。因堅如事發，怕遭連累，才改名為毛文明，逃到檀香山希爐埠任傳教士。說起來，他雖然未見過國父，可是他在庚子年與史堅如同時加入了香港興中會，也可以算是老同志了。

因希爐埠的華僑，因久儀國父的丰采，由毛文明等人代表負責籌辦，舉行盛大歡迎會，恭請國父前往演說革命主義。國父在檀島各埠雖然演說了不少次，但每次都是自行主動召集的，而公開歡迎大會的，這還是第一次。國父非常欣慰。歡迎會的位址，是假座希爐埠的耶穌教堂，自動前來的歡迎群眾，總在三千人以上。

國父在演講之前，曾興奮地告訴大家：“餘頻年奔走革命，到處均有演說，所講者不下千數百次，而每次皆自動召集，有公然開歡迎會者自貴埠始，貴埠僑胞熱心革命，誠可謂加人一等。”

國父講演完畢，李昌、毛文明等均向國父建議：檀島僑胞，經國父數月之鼓吹，耳目為之一新，原興中會已趨式微，應謀復興。國父接納，即於當日在檀香山正埠溫逸街三樓，招人入會。檀埠的何寬、鄭金、李昌、程蔚南、鍾水養，希爐埠的毛文明、黎協、黃振、盧球、李華根、劉安石、賀唐安、黃義、鄭鑒等同志，他們非常熱心，到處聯絡同志，並吸收新同志黃旭昇、曾長福等數十人，請國父主盟，依例

當天宣誓，辭曰：“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如有反悔，任眾處罰。”誓詞與東京特設“革命軍事學校”之誓詞完全相同，會名也不用興中會原名，而改用“中華革命黨”五字，國父之所以要改訂團體名稱，是由於國父此時已蓄意擴大興中會宗旨及組織。

## 華僑 支持孫文革命

為了便於在華僑中開展革命活動，孫中山先生於一九零四年一月，在檀香山加入洪門致公堂。同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頓致公堂見到了孫中山。此時司徒美堂是推著車子上街去賣豬肉的攤販，還留著辮子，穿著滿裝。美堂聽了孫中山講解的革命道理後，茅塞頓開，決心追隨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活動。但孫中山卻婉言謝絕說：「你這精神可嘉。但目前你還不宜參加，以後需要時一定會找你，總之，你放心好了！現在，希望你在生活上節省一點，留下點錢以後支持革命。」此事，令司徒美堂對孫中山敬佩不已，他請孫中山搬到致公堂宿舍，由司徒美堂等人負責料理他的起居飲食。美堂與孫中山為友，在波士頓五個月，兩人經常與孫在一起促膝談心，暢談國家大事。

一九一一年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國內的同志致電在美國的孫中山，表明急需經費十五萬美元。接電後孫中山焦急萬分，寢食不安，美堂認為，若發動洪門兄弟，五元十元的募捐，緩不濟急，便提議將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和維多利亞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樓抵押出去，以後再募款贖回。大家對此一致贊成，於是很快便如數把款項籌足，迅速匯回國內。

辛亥革命爆發第二天，孫中山從報上得悉「武昌為革命黨佔領」的喜訊，非常興奮和激動。他考慮到成立共和國將要碰到外交和財政等方面的困難，決定先赴倫敦進行外交活動，然後再回國。但他當時卻身無分文。十月十三日，司徒美堂在紐約街頭碰到孫中山，他大感意外，詢問孫中山為何還不啟程？孫中山告訴他去倫敦的旅費尚無著落，司徒美堂即與阮本

萬、聖策、伍欽準、黎觀長等五位華僑，馬上湊足路費送他上船。十二月廿五日，孫中山回到了上海，司徒美堂即以美洲致公堂總理身份，發動美洲各地致公堂通電三十多封，表示擁護孫中山出任南京臨時政府的總統。後來，孫中山電邀司徒美堂擔任總統府監印官，司徒美堂卻覆電說：「我不會做官。」

司徒美堂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是因為他深感祖國貧弱的恥痛。爲了中國的富強和獨立，他和許多愛國華僑一樣，爲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 黃興的文采 (外一首)

何彤

在革命先烈中，兼有俠情與儒風的，黃興當是其中最著名之一；在戰場上，他是指揮千軍的勇將，而他詩文又與豪氣相輝映。

黃興是湖南人，體格魁偉，隻手能舉百鈞。爲了鼓吹革命，他一方面結交知識分子，組織華興會，後又加入同盟會。另一方面又打入江湖會黨，組織同仇會，使他在歷次起義時，有基本的力量。

雙十武昌起義，黎元洪臨時擔任都督，不旋踵黃興趕到，立刻被拜爲戰時總司令。因此，維繫雙十起義的戰果，終至肇造民國。

武昌起義前，他曾撰對聯一付，以示抱負：「能爭漢土爲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

他並常配一印，文字簡潔而豪氣渾厚，印文爲：「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露布，是「捷報」的意思。

另外，他在領導三二九廣州起義失敗後，曾填詞一首「蝶戀花—弔黃花崗」，詩情真切沈深：

轉眼黃花看發處，爲囑西風，暫把香籠住。待釀滿枝清豔露，和風吹上無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紛飛，氣直吞狂虜。事敗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長無語。

這次起義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革命隊伍中的確出了“鼠子”。本來在起義時兵分四路，有一路因出了內奸，彈藥未全運出，有槍無彈，不敢發；有兩路指揮者臨陣退縮，也未敢動。只有黃興親自率領的一路（主力）一百幾十人直冲總督府，終因寡不敵衆而敗。

黃興的對聯工麗流暢，含蘊宏深。無論緬懷戰友，還是詠唱山河，興之所至，皆成佳聯。如題安慶大觀樓並悼徐錫麟烈士一聯，豪邁雄健，感情充沛，讀之使人蕩氣回腸，感奮不已，聯雲：

登百盡樓，看大好河山，天若有情，應識四方思猛士。 留一抔土，以爭日月光，人誰無死，獨將千古讓先生

又如題黃州蘇東坡紀念館聯：

才子重文章，憑他二賦八詩，都爭傳蘇東坡西遊赤壁。 英雄造時勢，待我三年兩載，必盡說湖南客小住黃州

1912年5月15日，南京各界舉行黃花崗之役死難烈士追悼會，黃興親撰一挽聯雲：

七十二健兒，酣戰春雲湛碧血，  
四百兆國子，愁看秋雨濕黃花。

此外，黃興還有不少題贈聯留存世上，聯聯切人切事，語語精光四射。

## 讀林覺民《與妻書》有感

一封家書赴死前，便將英名留身後。  
真情滿紙催人淚，字字九鼎重千秋。





## 辛灝年二度應邀訪歐

# 巡迴五國 影響廣被

〔本刊綜合報導〕繼去年 6 月應邀訪問英國和瑞典，在倫敦政經學院、牛津、劍橋等大學和斯德哥爾摩僑界作巡迴講演之後，今年，歷史學者辛灝年先生復應歐洲大陸華僑的邀請，於 5 月 12 日至 6 月 12 日訪問歐洲，巡迴德、法、荷、比、西五國，途經丟什朵夫、法蘭克福、漢堡、柏林、阿姆斯特丹、海牙、布魯塞爾、馬德里、西哥利亞等著名城市，講演由原定的四場增加到八場，外加一家新聞媒體的座談，其受歡迎程度之高，特別是他的講演所引發的熱烈反應，不僅使此行影響廣被，而且使此行影響深遠。

全球華僑民主和平聯盟歐洲總盟和德國支盟、歐洲中山學會和西德華僑協會在邀請辛灝年先生赴歐講演時，所提出的講演主題，就是“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崛起對台灣的影響”。用辛灝年先生自己的話來說，這是他在歐洲講演的第一主題。在這個主題裏，辛先生講了四個問題：

法蘭克福



一是“一個中國的歷史形成”，提出了中國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國家概念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國家概念”的理論。指出直至 1937 年 11 月 7 日，前蘇聯在

中華民國境內篡立那個俄屬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前，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上，從來就只有一個中國。

二是“兩個中國的出現及其歷史、性質和命運”。辛先生既用歐洲諸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比較，論證了中華民國的民族性和進步性，又在對馬列黨族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比較中，證明了馬列中國之反民族性和反進步性。指出馬列中國既非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更非中華民族的民主進步國家。

三是“中共的改革開放造成了馬列中國崛起的兩個真相”。所謂相對真相，即是指中共 26 年改革開放，使中共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上出現的相對進步和專制統治的被迫弱化，實際上只是一場歷史大倒退中的有限進步和局部恢復；而中共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不進步，甚至是倒退，則是中共 26 年改革開發的絕對真相。

四是“兩個不同中國的不同崛起，勢必對台灣產生完全不同的影響”。大中華民國將在中國大陸人民二十年歷史反思基礎上的重新崛起，將會消除國家分裂和一國兩制的危機，從而為中國的民主統一鋪平道路；而馬列中國果真是崛起了，便是“中華民國的徹底滅亡和台灣民主制度的悲劇結束”。所以，辛灝年先生才苦口婆心地告訴在場的台灣僑胞們，“只可以用民主抗拒專制，切不可用獨立對抗統一”。因為只有這樣，才會使台灣人民安心，大陸人民開心，西方民主世界放心；反之，要是用獨立對抗統一，則只能使台灣人民不安心，大陸人民不開心，西方自由世界不放心。他最後呼吁說：“中國一定要走民主統一的道路，中國一定能夠實現先民主、後統一和真繁榮！”（主題講演錄音記錄稿將另發）

漢堡



辛灝年的主題講演，引發了強烈的反響，在法蘭克福、漢堡、海牙和馬德里的四場主題講演中，在場的台灣僑胞，尤其是原來懷有台獨意願的台灣朋友，非但無一人予以刁難，而且均表示“這樣講我們無話可說”，可謂相當認同。德國的著名化學家、也曾贊成台灣獨立的著名人士李健夫教授等人，對辛先生講演所表示的贊同和對先生的熱情邀請，其在在情景，均使辛先生倍感安慰和鼓勵。

赴歐後，除掉主題講演之外，辛先生還應歐洲其他華僑團體、民運團體和歐洲大紀元時報的邀請，分別在巴黎和布魯塞爾發表了同一個專題的講演：題目是：“我們應該反思什麼？告別什麼？尋找什麼？追求什麼？”。在比利時魯文大學發表了“誰是我們的民族國家？”的講演。在柏林工業大學則針對眾多聽眾所提出的問題，對中國的歷史、現狀和東西方政治歷史文化的比較，作了三個多小時的即興講演。上述講演均受到了熱烈的歡迎，特別是許多中國留學生的歡迎和討論。



一些慕名而來的中國留學生青年，為辛先生的講演研討會帶來了十分熱烈和歡樂的氣氛。有些中國留學生為連趕兩場講演，連考試都在所不顧。大陸華僑劉卓行先生自奧地利乘坐了四個多小時的火車趕到法蘭克福聽講演，還執意捐出 500 歐元以招待辛先生夫婦。台灣華僑、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著名的西班牙拉·拉固拉大學教授陸錦林先生，從鄰近北非洲



的一個島上乘坐兩個半小時的飛機趕到馬德里聽講演，並參預主持了辛先生在西班牙的講演會，與辛先生產生了深深的共鳴。他對辛先生的講演評價說：

“能夠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裏，通過對歐洲各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歷史的比較，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中華民國的前途何在；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裏，又能夠將中華民族的中國和馬列黨族的中國進行歷史、性質和命運的比較，從而得出了一個令人悲哀而又振奮的結論；並且也是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裏，還能夠將中共改革開放的種種真實面，進行客觀的描述，使得我們終於看清楚了這個改革開發的性質和命運；實在是太不容易了，真是講得太好了！”



由於辛先生此次赴歐講演，其內容為許多人所從未遇聞，不僅在相當程度上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對大中華民國的信念和對中華民國台灣的信心。中華民國台灣駐歐洲一些國家的代表處長、辦事處長和許多外交官員，後來也聽取了辛先生的講演，特別是對辛先生“要以民

主抗拒專制、不要以獨立對抗統一”的說法，感受頗深，很以為然。

著名的吳寶章先生不僅到場聽取了辛先生的講演，而且第二天還專門來到巴黎的四季青飯店，趕在辛先生就要離開巴黎之前，與辛先生促膝而談。當辛先生對來訪的吳先生說，他也將是花甲之人，明年就不想再繼續講演之時，吳先生的一席話，頗引發了他的深思。年長的吳先生說，“灝年，你還要講，還要多講，因為，現在仍然是啓蒙時代，這是我們的使命，也是你的使命啊……”

好一個“啓蒙時代！”吳先生的這句話，真的是為我們的時代作了一個最深刻和最準確的總結，他將一切被窒息的思想、所有被欺騙的人心、一再被玩弄的靈魂和形形色色的盲目追求，都點化在這一個需要重新“啓蒙”的時代之中了……

也許，辛先生真的是責任未了，就象吳先生的諄諄之言那樣：你說的，不就是“過去是什麼，將來應該怎樣嗎？”

辛灝年先生告訴本刊，希望藉此機會謝謝此次所幸會的所有歐洲朋友，特別是全僑盟歐洲總會副會長高晴宏博士、會長黎萬檀博士、國民革命軍老將軍許能先生、自由亞洲電台駐德國記者——著名大陸旅歐學者仲維光先生夫婦、比利時歐都商務所總裁蔣學敏先生夫婦、德國的著名民運人士費良勇先生、彭小明先生、潘永忠先生，法國的著名民運人士——八九學運領袖張健先生、德國的著名泛藍人士余大猶先生，柏林、巴黎、布魯塞爾、馬德里的大紀元時報記者——周蕾女士，葉敏先生夫婦、張健平博士夫婦、明法先生夫婦、楊立新博士、時育紅女士等朋友們，西班牙的民運人士王策博士夫婦、賀雁犁先生、耿晨先生和中國旅西班牙作家黃河清先生，以及所有為他的歐洲之行付出了太多精力和時間的朋友們。

辛先生還特別要向來自澳洲，卻為跟蹤拍攝他的講演而延誤了歸期的著名攝影藝術家——法輪功普通修煉人夏建國兄妹，表示深深的謝意。

辛灝年先生的此番歐洲之行，自然還有許多故事插曲可言。但最令人不屑的，還是那一隻無形的手，似乎總在暗處揮舞。從辛先生赴德簽證所遭遇的麻煩，到辛先生在馬德里居然被一家航空公司毫無理由地拒絕登機，連機票也被竄改，就不說那種公然的如

影隨行般的“監視和監聽”了……這隻手無非是在告訴辛先生：你的一切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下。

然而，辛先生總是平靜地告訴他的朋友們，他只是、也永遠只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人而已。

## 辛灝年歐洲講演反饋

# 塵粒：我們都是中國人

（報刊文章轉載）

原大陸知名作家，現旅美歷史學者辛灝年先生上周在荷蘭舉行了一次“從歷史角度看中國”的演講，筆者聽後感觸很深，受益匪淺，讓我意識到不僅是要做一個有民族氣節的中國人，也要做一個有民主意識的中國人。

海外華僑都常有這種經歷，無論你是來自台灣或大陸，當你和西方人第一次相處，人們總會問：“你是中國人嗎？”有的台灣人會說“我是台灣人”，因為她不認同自己是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中國人。但在西方人的眼中，無論是台灣人，還是大陸人，都是中國人，因為都擁有同樣的祖先，同樣的傳統語言文化。

從前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寡婦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從小就獨立，做事敢闖，年紀一大就離家出去做生意，見的世面多了，思路也開闊了，錢賺了許多，沒有時間回老家；小兒子生性保守，跟著媽媽一起，從來也沒離開家鄉，一直還習慣地過著過去那種生活。有一天，大兒子回家探親，知道媽媽死了，弟弟還過著貧窮的生活，而且弟弟的思想跟自己差距很大，怕弟弟連累他，二話不說就走了，也不想再回去。鄰村有個信過邪教的富人，他假惺惺地對那個小兒子說：“我來幫助你，讓你擺脫你的貧窮，不過你要把你老祖宗留下的東西和思想全部去掉，不然會束縛你發財，這樣我才可以幫你。”弟弟聽他講得好象“有道理”，果真把老祖宗留下的東西燒個一乾二淨，弟弟後來學著富人的騙術，居然也富了起來，更把邪教當祖宗供了起來。哥哥後來聽說後，想來阻止但已為時太晚。

這個故事使我想到了了一個不恰當的比喻，故事裏的大兒子就在台灣，小兒子便在大陸。大兒子在外接受資訊多，有民主意識，而那一氣之下就走了的大兒子，該多像那個想台獨的中國人。小兒子從來也沒離開家，從小就被共產黨的馬列邪教籠罩著，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民主，也不知道民主會給他帶來更好的前途和命運；只知道自己死後“要去向馬克思報到”，而不是向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直至孫中山報到，卻反而懷著所謂的“民族”意識，只會咒罵哥哥背叛“中國”。其實，做弟弟的，在不知不覺中早已漸漸地失去了他的“民族之根”，而自己卻被蒙在鼓裏。

如果台灣是一個好哥哥，何不為弟弟作一個好榜樣，就像我個人理解辛灝年先生說的那樣，台灣自己要保住民主的發展與穩定，既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而形成一股親共勢力，也不做一批激進的台獨分子，更不要在台灣不斷地製早內鬥，以免共產黨鑽空子，“用民主對抗專制而非獨立對抗統一”，保住台灣的民主自由與和平環境，為弟弟擺脫共產黨反民族的專制統治，做一個明亮的燈塔。

大陸出來的中國人，都誤認為自己是有民族氣節的中國人，其實自從共產黨統治了大陸，我們都在不知不覺中就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根”，甚至錯把馬克思列寧當成祖宗，“死後去見馬克思”已成了大陸人的口頭禪，自己早成了“馬列子孫”還不知道，哪里還敢談什麼中華民族的氣節？許多大陸人把愛共產黨誤認為愛中國，反黨就是反祖宗，反民族，民族和民主概念混為一團，情願要“民族”而不要民主。其實，共產黨早就用“破四舊”把我們祖先的文化給剷除掉了，大陸人的家譜更是早已被共產黨燒光了，我們真的連誰是我們的祖宗，什麼才是我們的民族文化，都搞不清楚了啊！

畢竟我們都是中國人。所以，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都要愛中國，每一個中國人都要愛民主。既不當一個只講民主、忘記民族的中國人，也不當一個只要民族、而不講民主的中國人。大家都來一致認同既要民族又要民主的孫中山才是我們的國父。辛先生在演講中提到，要解決兩岸問題，要先民主，後統一，如果兩岸關係沒處理好，只怕會使大陸人不開心，台灣人不安心，西方人不放心。

（大紀元 6 月 6 日訊）

# 還原

## 蔣介石



### 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紀實



#### 中日決戰（連載之五）

大陸 孫挺信

#### 戰機轉旋

1

1938 年夏季。

日軍鋒芒畢露，大舉進攻。中國軍隊處於節節抵抗的局面。戰況十分慘烈。

但是，蔣介石認為：由於日本的侵略戰爭，在總體上與德、意兩國的對外擴張政策是一致的，這就勢必損害美、英等國的利益。因此，他堅信中國的孤軍奮戰狀況定有轉機。

1939 年 10 月底，在第二次南嶽軍事會議上，蔣介石曾向他的將軍們鼓勁打氣。他說，自德、意兩國在歐洲發動侵略戰爭起，東方和西方的戰爭就緊緊聯在一起了。因此，中國的抗戰就決不是孤立無援的。

蔣介石心中有數：日本人要打敗中國不可能，中國人要單獨將日本軍隊打出中國去，在短期內也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在會上提出，中國問題的解決，有待於世界問題的解決。我國我軍今後的任務就是堅決抗戰。決不和談，決不妥協，一定要堅持到最後勝利。

其實，這一場已經在東方和西方打起來的戰爭，使世界許多國家都感到有被捲進戰爭旋渦的危險，尤其像美國這樣在世界各地有眾多“利益”的國家，面臨的嚴峻問題是：要麼參加戰爭保衛“利益”，要麼坐等失去這些“利益”。

美國總統雖然在法律上享有對外宣戰的大權，但是，羅斯福要讓美國參戰，卻絕對不會像大日爾曼民族的“偉大領袖希特勒”和義大利的“偉大領袖墨索里尼”那樣，憑個人或幾個人的意願就可以宣戰那麼方便。

美國的政治制度，制約著總統個人的意志，避免了美國過早和盲目參戰。彼時，美國人民已經掀起了“反對將美國人民的子弟送去做無謂的犧牲”的反戰運動，使得羅斯福政府不能不忌憚國民的心理。在二次大戰前的一個較長時期中採取了“中立”政策，盡一切努力避開大戰旋渦。就是在希特勒德國大肆入侵波蘭，英、美利益受到嚴重威脅時，羅斯福還發表演講，向持反戰態度的美國人民宣佈：“這個國家將仍是中立國家——我希望美國能避免這場戰爭，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再保證，你們的政府將為實現這個目的而盡一切努力。”

為了避免惹火燒身，美國政府在不過分刺激侵略者的情況下，對反侵略國家曾悄悄給予一些經濟援助。同時，美國政府和商人，與日本等侵略國家的商貿往來照做不誤，仍然大賺其錢。

1940 年 9 月 27 日。德、意、日三國簽訂了意在恫嚇美國，阻止其援助被侵略國家的軍事同盟條約。條約中用十分露骨的字眼警告美國：“如果締約國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歐洲戰爭或中日衝突中的一國攻擊時，應以一切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相援助。”



羅斯福敏銳地意識到了這種警告，趕緊向美國人民發出警報：“美國文明從來沒有遭到過現在這樣的危險。”

此時，美國對參戰問題，仍持慎重態度。

1940年12月7日。

蔣介石收到駐美大使胡適博士發來的電報。主要內容有三點：

- 1、美國會批准借一億元鉅款援助中國抗戰。
- 2、已在美國購買一部分飛機。
- 3、中國政府擬雇用美國飛機師一事，美國也準備給予大力支持。

同時，胡適還告訴蔣介石，“旬日以來此間政府所能為力均已盡力做去，其不能為力之處，皆因美國並未參加戰爭，亦不願捲入戰爭。想中國領袖自能諒解。”

可是，此電發來僅一個月零四天之後，胡大使又給蔣介石發回一篇長長的電報，以激動的心情向他報告，說，羅斯福已改變不願參戰的態度，美國的政策也有大的轉變。

1941年1月10日，胡適大使致蔣介石電：

美國之國際政策，數月來急轉直下，羅總統上月二十九日之廣播詞，與本月六日之致國會詞，均為最重要之大政宣言。其要旨凡八點：（一）公然承認美國百十七年來之安全，實由於英美海上之合作。英若顛覆，美必孤危。（二）公然承認民主國家之政治哲學與侵略國家之政治哲學勢不兩立，絕無妥協之可能。（三）公然指出九月二十七日柏林三國盟約是侵略國家對美國之威脅。（四）公然指出美國現時所以暫能避免戰禍只是英華蘇三國之苦力抗戰，使戰禍不波及美洲。（五）故六日國會詞明定美國政策三大綱：（甲）以全力經營國防。（乙）對任何為自由而抗戰之勇敢民族，美國皆承擔充分援助之義務。（丙）道義與本國安全均不許美國默認一切犧牲他國自由換來的和平。（六）為貫徹上述政策計，美國必須加速增高生產力，使全國成為民主國家之大兵工廠，凡敢於抗拒侵略之民族所急需之物資，美國應盡力供給，倘一時不能付現款，亦應許其繼續採辦，俟戰事結束後，陸續抵還。（七）此項援助並不違反國際法。亦並非戰爭行為，若侵略國家單方欲作如此解釋，認為戰爭行為，美國亦不受其恐嚇。（八）吾人所期望之新世界，不是世界侵略者，所號召之新秩序，乃是一種道義的秩序，至少要使世界任何民族皆享四種

基本自由：（甲）為言論自由；（乙）為信仰自由；（丙）為解除窮乏之苦；（丁）為解除侵略之危害。以上八條為羅總統兩篇大文章之要旨，其魄力之雄偉，立言之大膽，均為三年來所未有。

……

1941年1月，羅斯福在總統換屆競選中，戰勝對手威爾基，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和唯一連任三屆的總統。1月20日，羅斯福在總統就職典禮上的演說，向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闡明了他對世界的看法，以及世界面臨的嚴峻現實，未來的兇險和美國政府的態度。他說：

“……對我們來說，由於事態的急劇發展，現在已經到了稍停片刻和作一番審查的時候——重新想一想我們在歷史上佔據了什麼地位，重新看一看我們現在和可能扮演什麼角色。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將因遲鈍而冒真正的危險。”

羅斯福認為自己從1933年到1940年這兩屆執政期間，採取了正確的對內對外政策，既避免捲入戰爭，又避免了國內的危機，使美國得以休養生息，從而增強國家實力。他把這些都歸功於美國的民主制度。

他在演說的最後說：

“……1789年，我國第一位總統在他的首任就職演說中作過預言，他的話宣佈了美國的命運——這些話似乎完全是針對今年1941年說的：‘人們理應當然地、滿懷深情地、也許是最後一次地把維護神聖的自由之火和共和制政府的命運系在美國人所遵命進行的實驗上。’如果我們丟掉那支神聖的火炬——如果我們讓它在懷疑和恐懼中熄滅——那麼：我們就會拋棄華盛頓經過如此英勇和成功的鬥爭而確立起來的命運。為了維護美國的精神和信念，我們現在和將來都完全有理由在國防事務中作出任何犧牲。

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的險惡形勢，我們的堅定決心是捍衛和維持民主的完整。”

## 2

希特勒一直堅定地認為德國與美國免不了有一場較量。

希特勒戰略的秘訣是：遠和近攻，並且一次只攻一國。因此，收拾“山姆大叔”只有等到收拾了英國佬之後，才能動手。

希特勒清醒地看到，隨著戰爭的殘酷進行，交戰雙方在人力物力上大大消耗，遠在太平洋西海岸的資本主義暴發戶美國，其雄厚的經濟實力，令人望而生畏。

阻止美國參戰是希特勒全球戰略的一貫原則。

1940年9月的軸心國軍事同盟條約，實際上是企圖恫嚇美國，阻止其在幕後煽風點火、偷偷摸摸支持中、英等國。這一舉動，卻被羅斯福政府將計就計，作為法西斯集團對美國文明的挑釁和戰爭威脅，向美國報警，以期贏得全國民心一致，支持政府參戰。

希特勒派駐華盛頓大使的主要任務，就是用盡一切手段，包括賄賂國會議員，試圖津貼作家和資助“美國第一委員會”，來支持美國孤立主義者，使美國在戰爭中不參加到法西斯侵略者的敵人方面去。

1941年上半年。

希特勒在決定進攻蘇聯而尚未發動之前，低估了俄國的抵抗力量，認為憑德國的軍隊，可以輕易打敗蘇聯。於是，竭力慫恿和鼓動日本進攻英屬新加坡，其目的在於迫使英國迅速屈服，從而使美國不參戰。

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獨裁者認為，只要日本在太平洋英殖民地領土上狠狠教訓了英國人，卻尊重美國的利益，就會使美國更加害怕戰爭。同時，美國由於受到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威脅，就能有效地將美國的兵力牽制在該地區，而無法幫蘇聯的忙。

為了給日本的南進打氣，希特勒向日本駐德大使松岡將軍許諾說，一旦日本南攻英屬領地，造成日、美衝突，德國將對美宣戰。

1941年6月22日。

希特勒以五千多架飛機，一百九十個師的兵力，從北起波羅的海、南至黑海的三千公里戰線上，向蘇聯發動閃電進攻。雖然取得了巨大勝利，但是，希特勒也感到蘇聯疆土之遼闊，這是他的納粹軍無法一口吞得下去的。面對這一新的情況，希特勒馬上改變了要日本南下攻英的打算。在納粹軍進攻蘇聯的第六天，他就迫不急待地要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急電德駐東京大使歐根·奧特，要他盡一切努力使日本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向西伯利亞進攻。

7月10日。

德國在蘇聯的進攻繼續勢如破竹。德外長再次給駐日大使去電，以更加迫切的心情要求日本出兵，會攻蘇俄。他說：“我要求你用一切辦法繼續要求日本儘早參加對俄國的戰爭。日本參戰越早越好。德、日兩國的目標當然是在冬季到來之前，在西伯利亞鐵路上會師。”

當時的日本出於兩方面的原因，未能使希特勒的戰略企圖如願以償。

一方面，日本陸軍幾乎大部深陷於中國戰場，無力抽兵北進。另一方面，日本海軍卻熱衷於南進太平洋。隨著東條英機控制日本局勢並於10月就任內閣首相以來，他認為日本陸軍久留中國戰場，不可能再有大的作為，但陸軍配合強大的海軍，在太平洋上還可以大顯身手，因此，日本政府狂妄的南進計畫，已經付諸實施，並進一步加快了準備步驟。而對希特勒的要求，則虛與周旋。這就是日軍不出兵西伯利亞的真正原因。

史達林通過多方渠道基本摸透了日本的意圖，得以放心大膽地從西伯利亞抽調了五十多萬大軍，轉到西線，大大加強了西線蘇軍的反擊力量。

1941年12月8日（當時時間12月7日）。

日本終於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棋盤上，投下了一顆最冒險的棋子——奇襲珍珠港，向美國人開戰。

珍珠港事件使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幾被全殲。

當天，天皇發表廣播講話，對美、英兩國宣戰。

珍珠港事件的同日，羅斯福總統向美國人民宣佈，此日為美國國恥日，發誓領導美國人民報仇雪恨。美國朝野內外，各階層人士的意志一下被珍珠港的火海給熔煉到了一起。羅斯福政府順利通過了國會審核，並於第二天宣佈對德、日、意法西斯處於戰爭狀態。

日軍奇襲珍珠港，對美、英宣戰的消息傳到中國，艱苦抗戰的中國軍隊，從前線陣地到後方重慶的街頭，將軍和士兵都一片歡騰，慶賀世界反法西斯戰線的形成。

12月8日凌晨，蔣介石在重慶郊外黃山鄉居接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告急電話，立即返城，上午八時召開高級幕僚會議，決定正式對日本、德國和義大利三國宣戰。同時決定，向美、英等國提議，組成反法西斯同盟，並提出三項原則：

1、成立太平洋同盟和聯軍總司令部，推舉總司令，由美國領導該同盟。

2、要求美、英、蘇與中國一同對日宣戰。

3、太平洋戰爭勝利前，聯盟各國不許單獨對日媾和。

日本在珍珠港的大轟炸，在希特勒看來，他的這位亞洲夥伴簡直是神經錯亂，是發了瘋。避免同美國開戰，是他從戰爭初起直到現在，都竭力努力的事。但是，現在大錯鑄就，無可挽回。爲了將日本更緊地捆在他的戰車上，也爲了鼓舞德軍士氣，他不得已而於 12 月 11 日硬撐面子，對美宣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此進入了全球性戰略轉折時期。

1941 年 12 月下旬。

羅斯福邀請英國首相邱吉爾訪美，共商反法西斯戰爭大計。英、美參謀長取得一致看法，認爲德國是舉足輕重的軸心國家，打倒德國是勝利的關鍵。因爲只要德國一失敗，義大利的失敗和日本的崩潰必然跟著而來。這就是同盟國的“先歐後亞”戰略方針。

1942 年元旦。

美、英、中、蘇等二十六國在華盛頓發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宣言》，決心共同對軸心國作戰，決不單獨媾和。

《共同宣言》的發表，標誌著反法西斯的世界力量正式結成牢固的作戰實體。自此以後，各國反法西斯軍隊相互支持，緊密配合，協同作戰，統一部署，逐步取得並擴大戰役、戰略主動權，直至最後取得二次世界大戰的徹底勝利。

### 3

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後，動用海陸空軍，像切豆腐塊似地，輕而易舉地把美、英、荷苦心經營的南亞諸島國，一塊塊地切了下來。

1941 年 12 月 25 日，香港數萬英軍向日軍第 23 軍投降；

1942 年 1 月 2 日，日軍佔領了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1 月 23 日，日軍南海支隊在拉包爾登陸；並佔領該市；

1 月 24 日，日軍攻佔巴厘巴板；

1 月 30 日，日軍東方支隊佔領安汶島；

2 月 4 日，日海軍航空隊對爪哇海域荷屬東印度艦隊進行攻擊；

2 月 9 日，日軍佔領望加錫；

2 月 10 日，日軍佔領班格爾馬辛；

2 月 14 日，日軍空降部隊佔領蘇門答臘島；

2 月 15 日，日軍攻佔英軍遠東軍總司令部所在地新加坡。英軍司令官白西華向日軍第 25 軍投降。日軍攻佔新加坡時，繳獲各種山炮三百多門；高射炮一百門；要塞炮五十四門；步槍六萬多條；汽車一萬多輛（比中國全國的汽車還多一倍餘）；向日軍投降的英軍各級將官和士兵共十萬多人。

日軍統帥部在開戰前判斷，攻佔新加坡至少需一百天時間，實際戰鬥整整縮短了一個月。攻佔新加坡要衝，日軍實際上已突破南方要域作戰的關鍵。

5 月初，日軍南方軍佔領了菲律賓全域。至此，西、南太平洋上的菲律賓、泰國、馬來亞、新加坡、印尼、緬甸、香港、關島、威克島、俾斯麥群島、新愛爾蘭群島、新不列顛群島、中所羅門群島、吉伯特群島、新幾內亞島等，盡爲日軍佔領。

1941 年 12 月 13 日。

這是個異常寒冷的日子。

皇宮內，陸軍參謀總長杉山元正以無比興奮的心情，向天皇報告第 23 軍進攻香港九龍的情況。他說：“第 23 軍對香港方面的進攻，比想像的要順利得多，我軍於 12 日輕易地奪取了九龍市區，正向半島其他地區擴展戰果；掃清殘餘英軍，可以預料，香港指日可下。”

一提起香港，天皇心裏不禁掠過一絲陰雲，這陰雲來自中國軍隊的巨大威脅。天皇問道：“進攻香港，是否考慮到中國軍隊會向廣州或九龍半島方面進攻？”

這倒是個不容輕視的問題。很快，杉山元就得到來自中國的報告：在長沙附近，暫編第 2 軍 8 日以後開始移動；在岳州東南地區，第 4 軍也好像要經株洲南下。

日軍大本營立即指示駐武漢的第 11 軍司令官阿南惟畿中將：重慶方面以大集團軍向廣州背後方面移動，企圖牽制我軍，大本營期望你軍發動一場果敢的攻擊，以牽制敵軍。

阿南將軍決定向第九戰區發動進攻，旨在牽制中國軍隊增援香港。但無論是大本營還是阿南軍司令官本人，都沒打算要進攻長沙。

阿南以第 11 軍主力第 3、第 6、第 40 師團和獨立混成第 9 旅團，以及澤支隊，配以飛行第 44 戰隊和軍直炮兵、工兵、戰車和海軍艦隊部隊，從岳陽方面向長沙進

攻。同時，命令第 34 師團再加一獨立旅團從南昌方向在南潯路一帶佯攻。

12 月 23 日。

阿南將軍發出進攻命令。

12 月 24 日。

第 6、第 40 師團從新牆河北岸發動進攻；第 3 師團、獨立第 9 旅團和澤支隊隨後投入戰鬥。

日軍來勢兇猛，意在創造一個大陸上的勝利奇跡，與太平洋上的奇跡相媲美。

第 9 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對日軍的進攻不屑一顧。在這之前，九戰區曾與第 11 軍進行過兩次大會戰，薛某早已摸透了眼前這匹“野驢子”的脾氣，成功地總結出了他的“天爐戰法”。

“天爐戰法”即後退決戰。根據長沙地區的地形特點，在後退中創造“天爐”，即徹底破壞道路，中間地帶實行空室清野，在伏擊地區縱深配置兵力，以逆轉敵我戰鬥力對比。待敵侵入決戰地區之後，從四面八方以強大火力聚殲之，猶如天然巨爐熔鐵，將敵燒為灰燼。

薛嶽擺下的“天爐”陣如下：

第 27 集團軍總司令楊森以部分兵力配置於新牆河南岸至汨羅江地區，以誘使日軍進入“爐中”；

王陵基第 30 集團軍主力，從武陵、修水調到平江地區，羅卓英第 19 集團軍從上高調到瀏陽、株州、醴陵一帶，與王陵基集團軍在長沙東南面形成百里側擊態勢。第 73 軍從益陽推進到寧鄉，在長沙西面處於機動態勢。

素有打硬仗著稱的第 10 軍堅守長沙城。在長沙城西湘江對岸的嶽麓山上配置 155 毫米榴彈炮兵一個旅，支援城防作戰。

此時，蔣介石從重慶打來電話，指示薛嶽，“我第二線兵團應由戰線稍為後退，佔領外線有利位置，以主動把握戰機，容敵先攻長沙，我則乘其進攻受挫時，集中全力從各方面攻擊敵人。”

顯然，蔣介石的意圖與薛嶽的“天爐”相吻合，兩人構思的都是一場在後退中包圍敵人，再行殲滅的大戰。

此次會戰，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1 年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31 日。日軍大舉進攻，第九戰區各部隊節節抵抗，誘敵深入。

第二階段：1942 年 1 月 1 日至 4 日。日軍進攻長沙城，鑽進“爐中”，第九戰區各軍將敵包圍。

第三階段：1942 年 1 月 4 日至 15 日。第九戰區“燒烤”日軍，敵軍決計突圍。

第一階段戰鬥。

1941 年 12 月 24 日，夜。中原大地，風雪彌漫，天寒地凍。

阿南為了就近指揮，把軍指揮部推進到岳州，在這風雪交加的夜裏，他向集結於新牆河北岸的部隊下達了進攻命令。

第 6、第 40 兩個師團，在強大炮火掩護下，徒步冰冷的新牆河，向南進攻。

楊森集團軍第 20 軍之 133 師，在新牆河南岸第一線陣地上，頑強阻擊，使敵無法進展。

25 日拂曉。

阿南命令第 3 師團和澤支隊投入進攻，並增強炮火力量。天亮以後，第 44 飛行戰隊的飛機也一齊出動，對守軍陣地狂轟濫炸，掩護地面部隊進攻。

守軍第 20 軍在第一線與敵激戰三天三夜，予敵大量殺傷，隨即按照預定計劃撤出戰鬥，退避側後。

12 月 26 日。

阿南司令官根據飛機偵察的情報，對汨羅江南岸的第 37 軍，做出了錯誤的判斷。該軍本來是在此吸引敵軍主力，阿南卻完全上了當，對他的部隊發出了這樣的命令：

敵第 27 軍以第 60 師、第 95 師在甕江、桃花、桐子山、湖源山、磨石山一線，又以第 140 師以花門樓至周家灣一線，佔領陣地，企圖長期作戰。……

於是，阿南命令第 3、第 6、第 40 各師團主力，加快進攻速度，向汨羅江岸推進，務於 12 月 29 日天亮前，向汨羅江南岸進攻，以迂回包圍第 37 軍，並吃掉該軍。

日軍這三個主力師團爭先恐後向前突進。第 3 師團跑得最快，於 27 日上午就趕到了滔滔作浪的汨羅江北岸，於當天下午，提前強行渡河。

第 27 軍 99 師與敵第 3 師團勉強打了一下，便不知撤向何處去了。

阿南見第 3 師團攻過了江，大喜過望，決定擴大戰果，命令其他師團加緊渡河，快速迂回包圍 37 軍。

但是，當第 6 師團和第 40 師團趕到汨羅江畔時，江水卻陡然上漲，不能涉渡，江上的橋又被中國軍隊給炸

了。日軍這兩個兵團只得冒著嚴寒在汨羅江上進行艱苦的架橋作業。

12月28日。

正急於殲滅第37軍的阿南中將，猛然發覺自己以前的判斷有問題，因為第37軍的三個師不但沒有在原來的陣地上作長期死守，連短期戰也不準備打了。其中第60師已由大湖嶺、梧崗源、大平嶺一帶退去，第95師的情況更複雜，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也弄不清楚，好像要以金井為中心，在象鼻橋東側南北高地一線，向西配備。

其實，薛岳已將第37軍調歸王陵基集團軍。王司令正指揮該軍向側面山地後退，以便空出大道，讓日軍去攻長沙城。

日軍各主力兵團根據阿南的命令，渡過汨羅江後，由於找不到攻擊目標，處於徬徨之中。

是進是退？阿南也徬徨了。直到12月29日下午5時許，偵察機才從天上向他報告：“敵軍正向長沙後面退卻。”

進退維谷的阿南司令官，狠了狠心，決定向長沙進攻。本來，他進攻長沙這樣遠距離的大兵團作戰，是需得到南京的中國派遣軍總部和東京大本營批准的。可是現在，阿南已顧不得那麼多了。因為他親率大軍出擊，已在新牆河岸付出了不小的代價，現在就這樣灰溜溜的退回去，未免太損大日本皇軍的面子。

12月29日，傍晚。

阿南又一次錯誤判斷中國軍隊的運作，以為是在退卻逃跑，於是，發出了進攻長沙的命令。

- 一、敵有向長沙和金井方向退卻之跡象。
- 二、本司令官決定以主力向長沙方向追擊。
- ……

各師團接到進攻長沙的命令，爭功取勝心切，又爭先恐後朝長沙撲來。

第3師團士氣最高，晝夜兼程，一路上未見到一個中國兵的影子。一路順風，於12月31日下午，趕到了瀏陽河畔，爭相涉水過河，向長沙城挺進。

第6師團於12月30日下午進至麻石山、鴨婆山地區，遭到37軍95師阻擊，只打了幾個鐘頭。日軍見中國軍隊甚少，無意在此糾纏，直向長沙奔去。

第二階段戰鬥。

1942年元旦。長沙地區濃霧緊鎖，寒風凜冽。

第3師團大隊人馬在濃霧中向長沙城挺進。一路上風聲鶴唳，仍不見一個中國士兵的蹤影，都以為中國軍隊已被大日本皇軍嚇破了膽，逃得無影無蹤了。將到長沙市郊，日軍便看到了飛機從天上投下的一面標誌佔領長沙的太陽旗。

第3師團數萬官兵頓時歡呼雀躍，狂呼大喊，今晚將在長沙城熱熱鬧鬧地慶祝元旦。

上午11點鐘。一顆信號彈劃破濃霧緊鎖的天空。日軍第3師團在豐島中將指揮下，開始向長沙城進攻。

日軍前面出現一些零散的中國軍隊。他們見了日軍，掉頭就往市區裏跑。

日軍見了這情形，士氣更加高漲，不顧一切地窮追猛進。豐島師團長據此估計，最遲到當天黃昏，便可佔領長沙全城。晚上即可在城裏放假休整。

其實，這些零散的中國軍隊，是第10軍的前哨警戒部隊，其任務是故意逗引敵人的。

第3師前鋒的野聯部隊猛追到城邊，突然遭到守城的第10軍猛烈射擊。日軍後續部隊源源趕到，陸續投入攻城戰鬥，直打到黃昏6點半，仍未能前進一步。

豐島中將命令師團直轄的夜襲部隊——加藤大隊投入攻城。加藤大隊長親自帶領部隊趁黑夜“摸夜螺絲”，結果，被守軍全殲。加藤本人也被打死。加藤身上帶有日軍出動以來的計畫、命令等重要文件。豐島恐其落入守軍手中，組織大批人馬搶屍，結果，加藤屍體被守軍搶去。

守軍從加藤身上搜出重要文件，當即送交戰區司令部。薛岳從這些檔案中判斷出日軍糧秣彈藥將盡的情況，禁不住拍案大喜：“一紙雖輕，勝過萬挺機槍！”

第3師團在城東南苦戰兩天兩夜，死傷盈野，仍然毫無進展。

1月3日，拂曉。

第6師團主力趕到，從城東北發起進攻。下午1時許，日軍一部攻佔了城外陣地。日軍正在陣地上歡慶勝利，湘江西岸的守軍榴彈炮群突然怒吼起來，炮彈如急風暴雨般落到城外陣地上，炸得日軍血肉橫飛。

一千多名日軍向湘雅醫院守軍進攻，被岳麓山上飛來的炮彈，盡數炸成肉泥。

攻城已經是第3天了，日軍彈盡糧絕，只能靠飛機空投接濟。有的部隊子彈打完，只得和中國軍隊拼刺刀。



第 11 軍司令部裏，充滿了失敗洩氣情緒。軍參謀長、副參謀長和作戰參謀們，都一致主張中止攻城，盡速撤退。

阿南司令官火爆爆地把部屬們狠狠訓斥一通：“第 6 師團今天早晨才剛剛投入攻城戰鬥，自然還未取得戰果，現在中止攻擊，實屬過早不當。”

阿南將軍還蒙在鼓裏，他的厄運在五天前就已注定了。

1941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薛岳向第九戰區部隊下達命令：

一、敵已渡過汨水，企圖進攻長沙，我軍決定採取向心攻擊，一舉圍殲敵軍。

二、楊森副司令長官應以第 58 軍自長樂向安沙，以第 20 軍自清江口向石子鋪搜索並攻擊敵人。第一次攻擊到達線：在湘江東岸從東、南、北三個方向對長沙構成牛圓形包圍圈。具體位置為安沙、赤石河、春華山及柒梨以東、東山以南一線。第二次攻擊到達線：在第一次到達線內側，具體位置為石子鋪、望仙橋、長橋、郎梨市、東山一線。

三、王陵基副司令長官應以第 37 軍自甕江向望仙橋、以第 28 軍自三角塘向長橋搜索並攻擊敵人。

四、羅卓英副司令長官應以第 26 軍主力自洞陽市向郎梨市，以第 29 軍主力自金潭向黃花市，根據情況向郎梨市，以一部向渡頭市或東山，以第 4 軍向長沙南側分別攻擊。

五、第 10 軍固守長沙，第 73 軍固守岳麓山，待各兵團進至第二次攻擊到達線，即應斷然反攻。

六、第 99 軍第 197 師應防禦湘江，洞庭湖岸。第 92 師應自三姐橋，第 140 師應自栗橋，分別專攻撈刀河之敵。第 99 師應固守湘江東岸陣地，並派一支有力部隊向栗橋、福臨鋪攻敵側背，截斷其補給聯絡線。

七、各軍以 1942 年 1 月 1 日零時為期開始攻擊，4 日夜前即應進入第一次攻擊到達線。

1942 年 1 月 3 日。

日軍攻城第 3 天，第九戰區各路大軍正日夜兼程，從四面八方朝長沙壓來。

東南面，羅卓英的第 79 軍、第 26 軍、第 4 軍各部，已快迫近長沙；

東北面，王陵基指揮的第 37 軍和 78 軍，分左、右兩路，沿金井至長沙的公路，快速挺進，也已迫近長沙；

西面，第 73 軍守衛在湘江西岸，隨時準備反攻；重炮兵旅居高臨下日夜轟擊著攻城的日軍。

北面，楊森的第 20 軍和 58 軍，已斷日軍歸路，並配合二十萬民眾，大肆破壞日軍後方公路、橋樑。日軍後勤運輸已被完全卡斷。

1 月 3 日，夜。

阿南終於感到情況不妙，下令撤退。

1 月 4 日。

蔣介石致電薛岳將軍：“此次會戰，舉世矚目。各部務必不惜任何犧牲，發揚高度攻擊精神，施行堅決勇敢之包圍、聚殲殘敵，以求獲得空前勝利與光榮戰績。”

薛岳向蔣介石回電表示：“本次會戰岳已抱定必死決心，必勝信念。”

薛岳向所屬各部轉達了蔣介石的命令，嚴令各集團軍總司令、各軍長、師長，務必確實掌握好自己的部隊，倘有作戰不力，貽誤戰機者，定按革命軍人連坐法重處，決不姑息寬容。如果敵人從某部隊作戰境內安全逃跑，即嚴懲該部各級主官及幕僚。

1 月 4 日，拂曉。

長沙城郊東南角天空出現紅色閃光信號彈——中國軍隊對日軍的包圍已經形成。

第三階段戰鬥。

1 月 4 日下午。

第 3、第 6 兩師團，在長沙城郊丟下累累死屍，向北突圍。卻被羅卓英、楊森兩集團軍分割包圍，並分別加以痛擊。

日軍處於極大困境，而且各部隊都拉扯著大批輕重傷兵，行動更為困難。從長沙城外突圍時，僅第 3 師團司令部就躺著七百多名傷兵，有的部隊情況更嚴重，拖累更大。

4 日深夜。羅卓英所部第 53 師在沙湖橋附近，將第 3 師團的野聯部隊團團圍住，發動勇猛攻擊，兩軍短兵相接，互相混戰。中國軍隊連連打出照明彈，竟相投擲手榴彈與敵拼殺。

第 3 師團司令部和石井聯隊經過一夜苦戰，於 5 日凌晨來到瀏陽河畔，又陷入張德能第 4 軍的重圍。中國

軍隊在嘹亮的軍號聲中，朝敵人衝殺。敵軍旗被中國軍隊迫擊炮彈炸飛。兩軍在師團指揮所展開慘烈的肉搏戰。敵又一個聯隊趕到，才把豐島師團長救了出去。

經過四天四夜反復拼殺掙扎，第 3、第 6、第 40 師團只向北挪動了幾十里路，均未突出重圍。

1 月 8 日。

阿南決心來一次困獸鬥。向重圍中的各兵團下達命令：“堅決圍殲青山市以北地區之敵。”

青山市以北主要為楊森部隊。

是日，第 6 師團按照阿南司令官的命令，全力向青山市以北迂回，結果，被從架梨市、黃花市追擊而來的羅卓英集團軍第 4 軍，第“軍和王陵基集團軍之 78 軍包圍。全師團立即被中國軍隊斬成三塊，層層圍住，分別給予毀滅性打擊。

與此同時，奉命由北南下策應大軍突圍的獨立第 9 旅團，也在青山市以北影珠山鑽進了楊森之 20 軍的“口袋”。其先頭部隊山崎大隊，自大隊長以下於當日被全數消滅。

第 6 師團各部被分割包圍，互相不能救應，且彈盡糧絕，毫無戰鬥力，有的沖進民房搶食生米、生菜。

阿南司令官派飛機前來救應第 6 師團，但雙方混戰成一團，飛機在天上打轉，不知把炸彈往哪兒扔。

阿南接到飛機上傳來的上述報告，萬分震驚，立即命令第 3、第 40 兩師團火速前往救援。

此時，第 40 師團在白沙橋一帶正被 37 軍圍攻，不能自拔。第 3 師團殘部趁中國軍隊主力圍攻第 6 師團之機，終於脫出重圍，逃至汨羅江岸。但該師團已死傷慘重，毫無戰鬥力，不敢再南下救援第 6 師團和獨立第 9 旅了。

第 6 師團和獨立第 9 旅團在青山市以北的重圍中血戰至 1 月 12 日，大部被殲。後在大批九七式轟炸機的轟炸掩護下，神田師團長和其殘部才僥倖逃出重圍。

1 月 15 日。

殘敵在飛機與炮兵掩護下，逃過新牆河，本次會戰結束。整個會戰，日軍死傷共為：五萬六千九百四十四人，被俘一百三十九名。

第 27 集團軍總司令楊森的部隊在打掃所轄地區戰場時，因日軍屍體太多，無法處理，便令平江、長沙、湘陰三縣出動民工若干，挖了三個大土坑，將日軍屍體集

中掩埋，一個坑即有數千具屍體。楊森派人在坑旁立上石碑，上刻“萬人坑”三字，以作標記。

此次長沙會戰的勝利，是自珍珠港事件以來，同盟國軍的第一個偉大勝利。

英國《泰晤士報》評道：“十二月七日以來，同盟國軍唯一決定性之勝利系華軍之長沙大捷。”

倫敦《每日電訊報》刊文：“際此遠東陰霧密佈中，唯長沙上空之雲彩確見光輝奪目。”

美國記者福爾門實地採訪湘北戰場後，撰文報導：“中國第三度的長沙大捷，證明了一個原則，那就是中國軍隊的配備若能與日軍相等，他們即可很輕易地擊敗日軍。”

日軍中央統帥部認為，此次慘敗，使部分將士的必勝信念發生了動搖，需要年餘始能恢復。

阿南軍司令官對自己獨斷進攻長沙，造成如此慘敗的後果，曾向日軍統帥部表示愧疚。

## 4

中國軍隊在長沙的出色戰鬥，提高了蔣介石在同盟國中的威望。當長沙會戰還在緊張進行的時候，羅斯福即電蔣介石，建議將中國和英屬緬甸、法屬印度支那劃為中國戰區，成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請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1 月 3 日，蔣介石復電美國總統，表示願意就任此職。當日，同盟國宣佈了蔣介石就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決定，並委任美國陸軍中將史迪威為聯合國軍計畫參謀部參謀長，兼任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協助蔣介石指揮中國戰區的部隊作戰。

長沙大捷後的二十二天，美國政府宣佈：給中國五億美元的貸款，以援助中國抗戰。

美國如此慷慨地出錢援助中國，主要原因在於四年多來的戰爭證明，中國人特別能戰鬥。這對於拖住日軍，緩解西、南太平洋美軍壓力，完成“先歐後亞”的同盟國軍事計畫，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美國政府宣佈貸款予中國的當天，羅斯福致電蔣介石。他說：

中國軍隊對於殘忍侵略者的抵抗，喚起了美國人民和一切其他愛好自由的人民最崇高的讚揚。中國武裝與非武裝人民在將近五年裏實行堅決的抵抗，以反對在裝備上遠為優越的敵人，他們面對巨大的差異所表現出來

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使其他聯合國家的戰鬥人員與人民全都受到激勵……

1942年2月9日。

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突然飛抵印度訪問。此事立即引起日本方面的猜測、恐懼和不安。

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鈞俊六大將滿腹狐疑，心裏嘀咕道：“在我軍攻佔新加坡前，蔣介石偕同宋美齡訪問印度，其目的何在？”

這位總司令官百思不得其解，便令其總參謀長連夜去見汪精衛。汪精衛也摸不著頭腦，搔著腦門說：“我對重慶方面的情報一無所知。不過，蔣介石此行目的十分明顯，其一，對印度民眾表示友好；其二，就從英、美獲得借款之事進行磋商。”

鈞俊六大將認為，事情肯定並非汪精衛說的那麼簡單。他在心裏繼續嘀咕：“元首既然親自出馬，必有重大目的。是不是為了實地看看印度有無實力參加同盟國的協同作戰？”

蔣介石此行目的到底何在？鈞俊六大將仍吃不准，又把納粹德國派駐南京汪偽政府的大使史塔瑪請來共進午餐，借此分析蔣介石之行的真正目的。

這位聰明的日爾曼人說：“蔣介石的印度之行，與本次世界大戰總的戰略格局有關。德國自伊朗東進，日本自緬甸西進，攜手壓迫印度。這是希特勒元首的理想和戰略。因此，蔣介石訪問印度，目的在於形成重慶、緬甸、印度的聯合屏障。”

鈞俊六大將這才恍然大悟：唉呀！蔣介石是要組成使印度參加而排除日本的泛亞細亞同盟！也就是要在亞洲組成以中國為核心的軍事大同盟，來對付日本和德國！”

鈞俊六總司令官馬上向中央統帥部提出對策：“傾全力向緬甸進攻，以切斷印、中之間的聯繫。同時，在攻取緬甸時，必須向中、印兩國中的一方或兩方擴大戰果，即儘量將日軍佔領的中間地帶擴大。否則，中、印的聯合，不但打破德、日的亞洲計畫，還將使日本在亞洲的既得軍事成果也陷入兩面夾擊的困難境地。”

蔣介石印度之行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戰略目的。這一點也正如德國人所分析的那樣。

當時，日軍南進節節取勝。1月21日，東條英機首相在議會上發表施政方針演說，提出建設大東亞的構想。接著，在日軍繼續橫掃太平洋諸島國的情況下，東

條首相向太平洋沿岸尚未遭“橫掃”的國家發出恫嚇聲明：“緬甸、印度、荷屬東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如果自願參加日本的大東亞建設，謀取獨立，日本將予以協助。”其言外之意就是說，這些國家如果起來反對統治他們的西方宗主國，日本不但不對他們進攻，而且還會大力協助他們的“民族革命鬥爭”，趕走殖民者，讓他們“獲得獨立自主”。

印度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印度人與英國人之間隨著民族壓迫的加劇，其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其民族主義者和各政治黨派分為兩大陣營：以甘地為代表的陣營要求印度獨立自治，與英國有矛盾，但同時又表示強烈反對日本的侵略行為；以拉斯·畢哈利·鮑斯為首的一方，則明確企望依靠日本的武力，趕走英國人，從而實現民族“獨立”。

日本政府在1942年1月間，決定在日本佔領區內編成印度獨立軍。此事得到流亡在德國的印度民族主義領袖巴斯·錢德拉·鮑斯的大力支持。此人挺身而出，投身於推翻英印殖民統治的武裝鬥爭。在日本的印度民族主義者成立了印度獨立聯盟會，拉斯·畢哈利·鮑斯為會長，並被推為印度國民大東亞代表，以迎合日本的大東亞建設。此人發表聲明：依靠日、印合作向印度的民族獨立前進。東條首相也宣佈了日本援助印度獨立的方針。

日本軍方制定並得到天皇批准的對印工作，即是以反英宣傳來爭取印度民心，使之成為倒向日本一邊的國家。

處於如此複雜矛盾旋渦中的印度，如果弄不好，就將成為一個反英和日的國家。

蔣介石既任中國戰區統帥，負責東方戰場的戰事，深感拉攏印度的重要。他在分析了東亞各國情況之後，於1942年1月托羅斯福向邱吉爾轉達他的意見：其一，鑒於目前複雜的國際局勢，英國應明智地主動允許印度獨立自治，以緩和英、印之間日益尖銳起來的矛盾；其二，如果英國同意蔣介石以上意見，蔣介石將親往印度，調解英、印矛盾，勸說印度各黨派參加反侵略陣線，共同對付日本的侵略擴張。

羅斯福把蔣介石的意見轉告了邱吉爾。英國政府方面對如此尖銳的印、英矛盾，亦深恐印度發生民族戰爭，將其目前捉襟見肘、自顧不暇的局面再扯開一個口子，因此對蔣介石的印度之行也表示歡迎，並希望蔣介

石在離印時發表勸告印度人民與同盟國全面合作的宣言。

在這種背景下，蔣氏夫婦於 2 月 9 日由重慶起飛，經雲貴高原及緬甸，於第二天午間到達加爾格達。分別與印度各黨派領袖人物會晤。蔣介石使出渾身解數，向印度民族領袖們反復申明：“倭寇之所謂東亞新秩序，只是一種掩護侵略的手段。倭寇之目的，完全在奴役各民族以自飽自肥，印度人民不要受其欺騙”等等。

蔣介石在轉達了邱吉爾政府關於允許印度自治的許諾後，對消除英、印隔閡起了和解作用。印度人民的“聖雄甘地”，當著蔣介石的面表示：“我們不與英人合作，系有限度之不合作，主要在於英人不給我們自由平等地位。現在，英人既然同意給印度以自由平等地位，英、印聯為一氣，共同抵抗侵略，絕無問題。”

蔣介石在印度逗留期間，還與印度其他朝野人士及盟國駐印度軍政頭面人物懇切會晤，盡力把仇恨之火引向日本侵略者。

2 月 21 日。

蔣介石離印前，發表了《告印度人民書》，希望中、印兩大國共同為人類自由努力，對於英國致誠摯之期待，深信必能從速賦予印度以政治上之實權。蔣介石在聲明中稱：“余夫婦此次訪印，留駐半月，得與印度軍政當局，以及一般友好，開誠商討吾人之反侵略計畫，與彼此共同奮鬥目的，幸獲一致之同情與全力贊助，殊覺愉快……。”

同日，蔣介石與宋美齡離開印度，飛往緬甸臘戍前線，視察中國戰區緬甸戰場戰況。

此時，根據 1941 年 12 月簽訂的《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中國編組了遠征軍，由杜聿明將軍率領第 5、第 6、第 66 三個軍入緬作戰。

蔣介石以最高統帥身份，威風凜凜地察看了陣地，接見了部分官兵，聽取了杜聿明的彙報，並作了指示。然後，帶著夫人和隨員登機回國。不料，他的座機剛飛上雲端，就被一群日本飛機咬上了。

座機內頓時異常緊張，人人感到末日來臨，宋美齡已開始作升天祈禱。

蔣介石也瞅見了敵機，黑壓壓一大群，一共是十八架。心裏也是一陣緊張，但他一轉念：我身為一國元首，東方戰區最高統帥，若驚慌失措，有失威嚴。再者，生死在天，命中註定，怕死是死，不怕死亦是死，

何不聽其自然，死了也留個英名在世。這樣一想，他心頭的慌亂也就煙消雲散了。蔣介石乾脆正襟危坐，擺出一副軍人的威儀，還拿出書來，自顧專心默讀，似乎對眼前的厄運不理不睬。

機上隨員均為之肅然。

也可能是蔣介石命不該絕，其座機竟然奇跡般地逃脫敵機群的追擊，安全返抵昆明機場。

## 5

1942 年 10 月 10 日。

美國費城獨立廳的自由之鐘，敲響了三十一下（中華民國三十一週年國慶日），為中華民國政府，為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遙致敬意。

是日，在重慶舉行的國慶大典上，蔣介石以激動的心情宣佈：

“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束縛，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國父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亦完全實現。我國同胞，自今日起，應格外奮勉，自強自立。”

中國在抗戰中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越戰越強的偉大力量，使得西方政府和軍隊上中層人士不得不改變鄙視華人的觀念。因為中國已經以一個軍事強國的姿態，屹立於反法西斯陣營之中。

美國軍方認為，承認中國是反法西斯的四大列強之一，其最大的價值，在於對世界人民起到了鼓舞士氣和政治方面的影響。

羅斯福卻以更遠的眼光，對中國的地位作了更加全面和確切的評價：沒有中國人的抗戰，世界將被法西斯打垮。他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拿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反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割掉埃及，斬斷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若真到那步田地，所謂的同盟國陣線將不復存在。

基於當時侵略與反侵略軍事力量的對比和戰後美、蘇兩大陣營力量的對比，從這種世界大格局考慮（羅斯福認為，中國在美國的支援扶助下，可以建設像美國那樣的制度，成為美國在亞洲取代日本地位的強大而忠實

的夥伴），羅斯福決心力排眾議，堅定地把中國拉入美、中、英、蘇四大強國之列。

羅斯福提出，戰後應把世界各地的許多島嶼和殖民地從弱國手中收回。由某種形式的國際託管機構來管理。其實，他要把殖民地從原來強大而現在變得軟弱了的老殖民主義手中奪過來，交給由美國、中國這樣的新的強國（也就是新殖民主義大國、強國的代名詞）來統治。劃分中國戰區時，羅斯福就把法國在亞洲的殖民地——印度支那諸國全部囊括在中國戰區範圍，就是其真實意圖的毫無掩飾的暴露。

1842年10月7日。

時任駐美大使的魏道明向蔣介石發來密電一道，說羅斯福希望戰後同蔣介石面談，商討美、中共同管理西南太平洋諸國的大事。密電如下：

今日訪美總統，除接談情形已摘要電部外尚有表示，性質較為機密，謹另陳如下。總統謂建議甚欣慰。彼對大局與鈞座意見完全一致，甚望戰後與鈞座面談西南太平洋問題。如越南遲早均應獨立，然越南不知治理，恐須經過一訓練時期。暹羅情形稍好，戰後或可即行自治。瓜哇可於範圍內任其自治，波羅洲則迥然不同；馬來情形亦甚困難。吾人決無統治他地之心，如菲律賓前曾要求獨立，奎松先生來時，對其原則予以承認，但須有相當時期，俾具自立能力。此事關係太平洋前途甚大，故希望能與鈞座商決之。

1942年5月以來，美、英兩國先後通過各種渠道向蔣介石轉達，願意主動廢除近百年來與中國歷屆政府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另訂平等條約。10月，魏道明大使又一次從華盛頓打電話給蔣介石：

今日美國務卿面交關於取消治外法權等問題草案約共十八條，要點如下：（一）取消領事裁判權。（二）1901年9月7日辛丑合約應認為當廢止，同意在此協定下美國享受之權利即予廢止，並將與中國合作向他國政府商洽解決北平使館區域移交問題。（三）上海及廈門公共租界認為應歸還中國管理，同意美國所享受之權利即予廢止，並將與中國合作向他國商洽解決該兩租界移交問題。（四）規定互相內地雜居及通商。（五）依照國際公法原則與應有例重定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美國務卿聲明兩點：1、美政府草擬此條約從最大範圍著想。2、在商洽期內草約內容表示嚴守秘密。

蔣介石對這件事可真正激動了一陣子，在當天的日記本上寫道：“……接獲美、英自動放棄治外法權之通告。此為總理革命以來，畢生奮鬥最大之目的，而今竟由我親手達成，心中快慰，實為平生唯一之幸事。”

羅斯福在同英國領導人商討即將成立的聯合國機構時，提出由四大強國組成執行委員會。這個機構決定一切重大問題，並擁有和行使聯合國員警的權力。羅斯福主張由美、中、英、蘇行使管理和決定整個世界的命運，此雖然是霸權主義的主張，但中國能享有如此特權，在那之前的歷史中，尚屬首次。

## 6

1942年4月18日中午。

融融的陽春氣氛中，日本人正在快樂地享用午餐。不少國民都陶醉在南進部隊節節取勝的捷報聲中，大和民族在太平洋上的無敵行動帶來的無尚榮耀和自豪感，在不少日本國民臉上都能看到。

12點15分。

在東京中央大本營陸軍部的一個大院內，高參們已用過午飯，正在大院裏踱步和交談。突然，天空中響起了一陣巨大的轟鳴聲，仰頭一看，只見一架大肚子飛機貼著房頂迎面沖來，一張令日本人“厭惡”的白種人的面孔從機艙露了出來，向下張望。

高參們驚愕不已：那不是美國人嗎？哪里來的美國人？他怎麼可能出現在日本本土的上空？

那架大肚子飛機連同那張令人厭惡的臉從他們頭頂上一晃而過，消失在林立的房屋後面。飛機過後，平地卷起一股強大的狂風，把庭院的花草小樹都幾乎給吹折了。

轟！轟！幾聲巨響。

高參們還沒回過神來，那架大肚子飛機扔下的炸彈已經在房屋群中轟然炸響一大片，房屋像亂七八糟的破片，飛上半空，又緩緩落下。

接著，又有三架同樣的美國轟炸機，超低空呼嘯而來，機上的機關槍像魔鬼眨眼似地閃爍，一路掃射過去。



東京的警報終於開口大叫起來。真是一呼百應，霎時間，整個東京都是怪叫的警報聲；全市一片混亂，市民都在驚慌失措地抱頭鼠竄。

這些美國飛機像平地刮起的一股旋風，把日本的太平世界攪得七零八落。它們從水戶方向飛來，席捲了千葉、東京、橫濱、橫須賀、名古屋、四日市、和歌山、神戶以及新瀉等地。

日本飛機慌裏慌張地起飛迎戰，但終因美機飛行技術太高超，太低空，沒法追蹤攻擊；日本的防空高炮，對這批身懷絕技的美國佬，也因其超低空飛行之速度變換，難以捉住目標而無可奈何，任其在大半個日本的領土、領空上姿意亂轉，扔炸彈、扔燃燒彈、打機關槍。

三個小時零十五分鐘之後，他們把炸彈、燃燒彈、機關槍子彈都傾泄完了，才從日本南端的九州上空，向中國大陸方向遽然離去。

日本陸海軍部裏吵成一團：這些傢伙從何而來？他們的飛機到底是多少架？有的報告說只有兩架，有的說有幾十架，有的報告說一共有一百多架。有的猜測是從美國本土橫跨太平洋而來。不可能，因為太平洋太寬了，當時無論哪種飛機也飛不過這漫漫無際的太平洋。

有的說從阿留申群島飛來。也不是，因為日本海軍早已對阿留申方面進行了嚴密監視，沒有發現那裏有什麼動靜。

日本陸軍部認為，是美國在太平洋上某處航空母艦上起飛的。

日本海軍部卻堅決不認賬。因為自南進以來，海軍方面一直在向國內報捷，千百次地宣佈已把美、英軍打得落花流水，僅有的一點力量，被日本海軍趕得遠遠的，日本本土以外遼闊的海疆已成為日本海軍的領地，絕無美、英艦隻，更談不上航空母艦了。

海軍部還倒打一耙，說襲擊東京等地的美國飛機是從陸上飛來的。其理由有三條：第一，空襲日本的美國飛機是陸上飛機而非海軍艦載飛機，陸上飛機不可能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第二，這些飛機空襲日本後，飛向了中國大陸；第三，只有從中國大陸起飛，才有可能轟炸日本後安全返航。況且在 1938 年時，中國轟炸機就曾有過類似的冒險行動。

美機從中國大陸起飛的說法占了上風，日本陸軍部感到汗顏。

美國飛機實際上是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的；一切都出人意料，充滿了神秘的冒險色彩。

實際的情形是，為了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鼓舞美軍的士氣，在羅斯福總統的支持下，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決定以一次大的冒險行動，襲擊日本本土。組成一支由十八架經過改裝的 B25 雙引擎陸軍遠程轟炸機隊。挑選曾數次打破飛行速度紀錄的冒險家、海軍中校詹姆士·杜立特為隊長。

杜立特的冒險轟炸機隊，由海軍“大黃蜂”號航空母艦秘密運至日本東部海域，待飛機起飛後，航空母艦就不聲不響地返航而去。因此，美國轟炸機從何而來，就顯得神秘莫測。

奇襲取得圓滿成功。杜立特中校指揮著奇襲隊朝中國大陸飛來，於當夜分別降落於江西、浙江的五山、衢縣、麗水等機場以及桂林機場。有一架飛向了蘇聯哈巴羅夫斯克，安全著陸。有一架飛機在浙江省象山海面不慎墜落，三名機組人員跳傘後失事，不幸身亡。還有一架搞錯了方向，於 18 日半夜降落到了南昌機場，當即被南昌日軍包圍，五名高鼻小夥子被日軍俘虜。

19 日中午，對美國飛機來路仍摸不著方向的日本大本營，得知在南昌俘獲五名美軍機組人員，立即命令派遣軍總部嚴加審訊，查清敵機起飛地點。

五名倒楣的美國飛行員當即被飛機載送到南京。由鈞俊六總司令親自組織審訊。在動用了各種刑具之後，美國飛行員們忍著拷打折磨的疼痛，一個個仍然吊兒郎當地胡亂“招供”。

有的招供說是從中途島的海哀爾（法國的地名）島起飛的。有的說是從莫賴爾（西班牙的地名）島起飛的……

鈞俊六大將只得把這些亂七八糟的供詞，如數電報大本營。

大本營陸軍部隊認真研究了審訊報告，得出的結論是：美國轟炸機可能是從中途島、阿留申群島、澳大利亞等地方起飛的，到底從何處起飛，還是說不清楚。

原來，被日本人描繪為世界上最自私的美國人，其自我犧牲精神也是很頑強的。杜立特等人出發前，上司曾交待，在未脫離日本空軍攻擊前，如果被日軍得知轟炸機隊是從航母上起飛的，美軍“大黃蜂”和同航的“企業號”航母將遭到日軍報復而覆滅。

這幾位美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在日本法西斯的嚴刑拷打下，誓死不吐真情，使美軍以兩艘航空母艦為基幹的龐大艦隊安全脫離了險境。

4月21日。

五名美軍俘虜被押送東京。在日本大本營進行了連續四天四夜的突擊審訊後，仍一無所獲。後來，在確信航空母艦安全返航消息後，他們才說出真正的起飛地點。日軍覺得受了這些該死的美國飛行員愚弄，不禁惱羞成怒，不久，便將他們殺害了。

日軍大本營認為，由於杜立特這次空襲成功，今後，美軍將以廣闊的太平洋某個島嶼或航空母艦為基地，轟炸日本，然後飛向中國大陸降落。或者從中國大陸起飛轟炸日本。又據可靠情報，中國空軍在美、英扶持下，正在重建。

在當時情況下，中國大陸各地的機場中，在浙江、江西省的機場群，特別是麗水、衢縣、玉山等地的機場，對日本的威脅最大。

大本營決定進行轟炸浙江機場群的航空作戰。從南方軍抽調飛行第62戰隊（重轟炸機）至南京，飛行第90戰隊（輕轟炸機）至廣州；又將南方軍飛行第84中隊（雙座戰鬥機）的主力調至廣州，隸屬中國派遣軍指揮。

東條英機覺得僅用空軍轟炸還不夠。於是，又派步兵從陸路進攻，以徹底摧毀浙江機場群。

4月30日。

大本營命令派遣軍總司令鈿俊六大將，以步兵四十多個大隊兵力，配合航空兵摧毀機場群。

鈿俊六大將接到命令卻不以為然，認為浙江方面的第三戰區主力才是心腹之患，殲滅顧祝同的第三戰區主力才是當務之急。

於是，這位於1939年9月至1940年7月曾任日本陸軍大臣的總司令官，根本不買他的後任東條英機的賬，按著自己的構想，調集了步兵八十二個大隊為基幹兵力；準備東西夾擊，殲滅第三戰區主力。

這是日軍從1937年蘆溝橋事變以來至1942年間，第二次使用這麼大的兵團作戰。（第一次是1938年武漢會戰，日軍地面部隊為一百四十個大隊）

5月5日。

東線開始進攻。

日軍第13軍第70、第22、第15、第116、第32五個師團，和第40師團之河野旅團等部，共54個大隊，從浙江杭州、寧波之間向西進攻。隨後又增派三個大隊投入戰鬥。

5月31日。

西線開始進攻。

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遭到毀滅性打擊的第11軍第6、第3兩師團，經過五個月的補充整訓，已恢復了戰鬥力。第6師團竹原支隊和第68師團之井手支隊從南昌向三江口進攻，以牽制第九戰區在該地區的部隊，掩護第3師團和第34師團主力沿浙贛鐵路向東進攻。

第11軍地面部隊有二十五個大隊投入戰鬥。

海軍駐南昌部隊同時在長江中、下游配合進攻。

蔣介石和顧祝同開始的戰略意圖是：以最小兵力配置於浙贛鐵路西段，對付第11軍的進攻；戰區主力集中在浙贛鐵路東段的衢州一帶，相機與敵決戰。同時，以一部兵力退到浙贛線東段之兩廂，開展遊擊戰破襲戰，襲擾第13軍後方。

大戰初期，第三戰區僅以小股部隊節節抵抗，日軍因此進攻神速，僅九天時間，就推進到了金華週邊。並從東、南、北三面對金華形成合圍態勢。

日軍第13軍司令官決定於5月25日開始，對金華發起總攻。

這時，顧祝同權衡雙方兵力，敵處於優勢，氣勢洶湧而來，鋒芒畢露。若在金華、蘭溪地區決戰，於我不利。遂命令在金華的第一集團軍等部，於5月23日夜，向衢州轉移，不與敵決戰。僅留第88軍在金華、蘭溪地區阻止、遲滯敵人。

5月25日。

日軍未察覺第三戰區主力已轉移，仍按原計劃，以第15、第70、第22三個師團和第40師團之河野旅團，全力向金華、蘭溪進攻。

我第88軍將士，在山嶽水網地帶和敵進攻的路線上，大量埋設地雷。又利用有利地形構築堅固陣地，以山炮、迫擊炮狠狠打擊進攻之敵，迫使日軍每向前推進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價。

日軍以絕對優勢兵力，猛攻四天四夜，仍未能拿下金華和蘭溪。

5月28日上午。

第 15 師團長酒井中將帶領司令部參謀人員及副官，騎著高頭戰馬，親自到蘭溪前線督戰。酒井一行在蘭溪北面約三公里處，戰馬踩響地雷，連人帶馬墜入血泊之中，酒井中將左腿被炸飛老遠。接著，附近又接連有人觸響地雷，隨行的兵器部長、獸醫部長等人盡被地雷炸死炸傷。

酒井師團長被炸身亡，在日軍中引起極大震動。因為在日本陸軍史上，“在職師團長陣亡，自陸軍創建以來還是第一個。”

5 月 29 日。日軍主力同中國第 88 軍血戰五天五夜，終於攻取了金華和蘭溪。這時，他們才發覺撲了個空，不但沒圍殲住第三戰區主力，連第 88 軍這會兒也不知哪兒去了（第 88 軍完成阻擊任務後，便轉入敵後開展遊擊戰去了。）

5 月 30 日。

第 13 軍此時才弄清，“敵第三戰區主力集結於衢州附近，顯然企圖進行頑強抵抗。”

鈿俊六大將決定在衢州地區與中國軍隊決戰，一舉殲滅第三戰區主力。令第 11 軍兩個多師團沿浙贛線向東進攻，第 13 軍從金華地區向西進攻。戰略構想是：兩軍於衢州地區會師，包圍夾擊第三戰區主力。

6 月 1 日。

第 13 軍主力沿衢江兩岸浩浩蕩蕩齊頭並進。北岸：第 32、第 116 兩個師團；南岸：第 15、第 22 兩個師團和河野旅團。

6 月 2 日。

遠在重慶的蔣介石對家鄉浙江的這場大戰，十分重視。日軍使用牛刀殺雞戰術，出動了如此多的地面兵力，目的是要找第三戰區主力決戰，以便一舉殲滅之。決戰，是日軍求之不得的。於是，蔣介石電令顧祝同司令長官，原定在衢州的決戰不打了，立即放棄衢州，主力轉移外線，爭取積極、主動地開展遊擊戰。

顧祝同根據蔣介石的命令，指揮主力向衢州南北山區轉移，僅留部分兵力，利用現有陣地打擊敵人。

日軍預定於 6 月 3 日夜包圍衢州中國軍隊。可是，天公震怒，雷霆大作，暴雨傾盆。衢江和附近縱橫交錯的大小河流，河水暴漲，惡浪洶湧。暴雨連續下了三天三夜。

遠道而來的幾十萬日軍，剛發起攻勢，就被澆了個落湯雞，各路大軍受阻於江河岸畔；，望洋興嘆。江河

上的大小橋樑，在這之前盡被中國軍隊炸毀；民船也早已堅壁清野，見不到個影兒。

日軍冒著瓢潑大雨，在洪水和泥漿中與即設陣地上的中國軍隊苦戰四天半，付出了慘重代價，於 6 月 7 日早上，撲進衢州城，這才又一次發現，第三戰區主力早不知遁向何方。

日軍千里勞師，連續撲空，其戰略目的徹底失敗。真是偷雞不成，反蝕把米，吃盡苦頭，損兵折將，為此還創造了陸軍有史以來第一個師團長戰死沙場的記錄。於是惱羞成怒，在佔領區內大肆清剿、屠殺百姓以復仇。同時，還狠狠地破壞衢州等地的飛機場，把水泥跑道也挖了個底朝天。最後，竟撬走二百公里長的浙贛鐵路鋼軌了事。

日軍大本營陸軍部記載：

因受杜立特空襲的刺激，於 4 月 30 日發令摧毀浙江機場的作戰。最初計畫投入四十幾個大隊，預定從 7 月 15 日開始撤退，7 月末作戰結束。但由於中國派遣軍擴大了作戰規模，投入了八十二個大隊的兵力，並附加了拆除鐵路的附帶任務。8 月 19 日開始拆除，直到 9 月末部隊才結束作戰返回原駐地；其作戰規模相當原計劃的三倍。而且由於突然發動作戰，不容選擇時機，在雨天的惡劣條件下作戰，部隊甚為疲勞。這是只有日本軍才能完成的艱苦作戰。但只怕是一次得不償失的作戰吧！事實上，由於發動這一作戰使 1942 年為解決中國事變進行的大作戰受到了影響。

## 7

1942 年 5 月中旬。

在日軍南進的凱歌聲中，鑒於對華和平工作已經絕望，日軍大本營提出了進攻重慶、徹底滅亡中國的設想。

5 月 10 日，前往南京佈置浙贛作戰的大本營陸軍部田邊參謀次長，與鈿俊六進行了密商。田邊通報了大本營對華新方針。即：現在南方作戰大致告一段落，今後日本對外戰爭的重點，重新轉為處理中國事變，無論形勢如何變化，日軍都需傾注全力儘快徹底解決中國問題。

田邊說，統帥部已決定在 1942 年 9 月以後發動西安作戰（50 號作戰），以大約五個師團的兵力，突破黃河

天險，殲滅西安平原胡宗南的主力，攻戰西安和寶雞，以取得從北方進攻四川平原的出擊地。統帥部計畫於1943年春季以後，發動進攻四川的作戰（51號作戰）。設想以八個師團從西安方面攻戰成都平原；以三個師團從宜昌方面進攻重慶。51號作戰的目的是徹底覆滅國民政府，結束中國戰爭。

田邊指示中國派遣軍按照50號和51號作戰要求，立即著手進行秘密準備。

日軍大本營陸軍部作戰部長田中，是積極主張進攻重慶的關鍵人物。他認為：如果能攻佔重慶，勢必影響印度和整個西亞，並促進打通印度洋，與德、意軍協作，有轉變全盤戰局的可能。因此覆滅重慶國民政府是促進徹底征服亞洲的唯一辦法。

杉山參謀總長、田邊參謀次長和田中作戰部長等統帥部上層，都一致積極主張進攻重慶。但統帥部的一些課長、班長們卻有不同看法。認為日軍不一定能攻下重慶，即使攻下了重慶，也不一定能使蔣介石喪失抵抗力。6月27日，第11軍司令官阿南將軍得知統帥部正在策劃進攻重慶後，感到非常吃驚。因為他作為在華日軍野戰主力——長江主戰場的指揮官，已在長江中游兩岸的武漢、長沙地區同中國軍隊主力多次較量，最瞭解蔣介石部隊的戰鬥力，因此也最有發言權。他認為憑日本現有國力，不可能進攻四川，也不可能徹底覆滅中國。

6月15日，陸軍部起草了進攻四川作戰的計畫大要。即：從關東軍抽調一百五十架飛機，加上華北、華中原有的三百五十架，共為五百架飛機；作戰所需陸軍地面兵力，合計為三十四個師團，進攻的重點放在長江的宜昌方面。

6月底，統帥部決定連續實施西安、四川作戰方案，取消50號作戰，將兩個作戰計畫統稱為51號作戰。即西安作戰為進攻四川的序戰。設想中的51號作戰，直接用於地面進攻的陸軍為十六個師團和兩個獨立混成旅團，空軍為兩個飛行師團。其規模超過整個太平洋作戰的兵力。另外，在中國佔領區需部署十五個師團和十四個獨立混成旅團，作為對付敵後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遊擊部隊以及進攻四川的預備軍，總計需用地面部隊四十二個師團以上。

中國這塊骨頭，確實難啃。

7月以後，由於日本南方軍在太平洋上的進攻逐漸受到美、英軍強有力的抵抗，以及中、美空軍的聯合和

加強，日軍大本營深感將受到太平洋上和中國大陸兩面夾攻的危險，對進攻重慶的作戰準備加快了步伐。

8月25日。

杉山參謀總長指示將51號作戰改為5號作戰。26日，召集將參戰的中國派遣軍總部、華北方面軍、第11軍、關東軍後勤和航空部隊參謀會議，傳達了5號作戰計畫，並就有關問題進行商討。

派遣軍各部最瞭解中國軍隊實力和戰鬥意志，對5號作戰提出了非難。他們的主要意見是：

第一、 質問大本營，5號作戰的目的是為了殲滅敵軍，還是為了佔領重慶？

第二、 如果是為了殲滅敵軍，則派遣軍的野戰主力第11軍就不必進入四川，深入到地形極為險惡複雜的重慶，在武漢附近尋求戰機就行了，因蔣介石的主力大部集中在長江中游兩岸地區。

第三、 統帥部應該看到，武漢地區的第11軍以八個師團，一個混成旅團，同長江北面第五戰區，西面第六戰區，南面第九戰區，共約一百個師團的中國軍隊主力相對峙，完全處於被包圍狀態，能保住武漢佔領區已經很不錯了。如果我們視而不見，置之不顧，大舉西進，只能是自取滅亡。

關東軍也反對抽兵南下。

海軍開初竭力支持陸軍進攻重慶，但是，進入9月以後，卻突然轉向反對進攻重慶了。然而，杉山總長和東條英機召集大家來是研究如何進攻重慶，而不是討論該不該進攻重慶的問題。

統帥部已下最大決心，決定在實施5號作戰時，再向中國增調三十六萬兵力。東條英機說：“進攻南方的地上兵力為三十六萬，而5號作戰計畫使用的兵力相當於南方作戰的三倍，堪稱百萬大軍的大遠征！”

杉山元和東條英機都認為：要實現大東亞戰爭的最後勝利，只有首先打敗中國，從長江中下游的水網地域抽出身來，否則，太平洋上的勝利等於零。

9月3日。

鈿俊六大將在南京召集華北方面軍、第11軍、第13軍、第23軍和第3飛行師團等部參謀長會議，部署5號作戰準備工作。

10月以後，太平洋戰事對日軍日趨不利，美軍已開始反攻，日軍接連受到重創。10月25日，日軍第2師團在瓜島發動總反攻，遭到失敗；11月14日，第38師團

分乘十一艘輪船增援瓜島，遭到美海軍艦隊攻擊，有六艘運兵船被擊沉，第 38 師團損失慘重；12 月 8 日，駐守新幾內亞巴薩市的日軍守備隊被盟軍全殲……

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的失敗，抽調日本國內兵力於中國進行 5 號作戰，變成了抽調各地兵力增援太平洋戰爭。對重慶的進攻變得日漸困難。

11 月 7 日，陸軍部秘密與中國派遣軍司令官聯繫，決定中止 5 號作戰。

12 月 10 日。

杉山元總參謀長經請示天皇同意，決定中止 5 號作戰。並向鈿俊六大將正式發出命令：中止 5 號作戰。

12 月 7 日。

鈿俊六在南京召開各方面軍、各軍司令官會議，心情沉重地宣佈：由於太平洋戰爭的失利，原定於 1943 年春季進行的 5 號作戰，決定正式中止。在諸軍司令長官眼前，一場規模空前的百萬大軍的大遠征作戰，像一個氣泡似的還沒有吹出個樣來就破滅了。

12 月 18 日。

於 6 月 29 日自阿南之後接任第 11 軍司令官的塚田攻大將，偕同高級參謀藤原武大佐等人，乘飛機從南京返回武漢。座機飛臨安徽太湖上空，被駐紮在大別山區的第五戰區第 21 集團軍之 138 師官兵發現，立即搖動高炮，瞄準飛機就是一陣狠揍。

塚田攻大將的座機被炮彈擊中起火，拖著濃濃的黑尾巴，墜毀於太湖附近；飛機爆炸後燃燒，大將和隨行人員無一生還。塚田攻司令官於蘆溝橋事變前就擔任陸軍部第三部部長。於 1937 年 11 月轉任華中方面軍參謀長，後任南方軍總參謀長，是日本陸軍中立下顯赫戰功的名將。

藤原大佐曾任第 56 師團參謀長，是在緬甸作戰中享有英名的高級軍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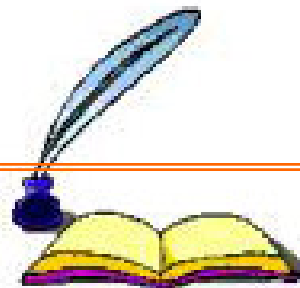
這兩位日本高級將領在異國他邦，折戟沉沙，拋屍荒野，罪有應得。

（待續）



## 蔣介石生平報國紀要

（連載之一）



**編者按：**一部《金陵春夢》，算是把蔣介石丑化到了家。縱然是中國大陸二十年反思，已經多少還了蔣公些許清白，至今仍難敵勝利者共產黨八十年來對他的萬般誣蔑和栽贓。時至《金陵春夢》的作者唐人，其尸體終於蓋著中國共產黨的黨旗，並被公佈為生前乃是享受中共正廳級待遇的“革命作家”了，我們才知道，原來，那是共產黨要他做的“遵命文學”，實則是“造謠文學”。為此，當本刊欣聞美東黃埔軍校同學會要為蔣公出版一本“生平報國紀要”時，黃花崗雜誌雖然人窮財短，只捐助了一千美元以助壯舉，但雜誌社自主編以下之義工，卻“連戰”五日，用“魔鬼”的速度（印刷廠誇獎語），為這本書的印刷出版盡了一份心力。現在，本刊根據歷史的事實，大陸人民反思的結果，在對已出版的《紀要》作了少數必須的修改、刪節之後，決於本刊連載，以饗讀者，特別是我們一心相予的大陸讀者。

蔣公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姓蔣氏，浙江奉化人。曾祖諱祁增，字懷盛。祖諱斯千，字玉表。父諱肇聰，字肅菴。母王氏。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五年（清光緒十三年，西元一八八七年）一歲。

.....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年（光緒十八年，西元一八九二年）六歲，始入家塾，跟隨任介眉受業。次妹瑞菊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九年（光緒十九年，西元一八九三年）七歲，仍就讀家塾，課餘與群兒嬉戲，好作軍隊戰鬥狀，自爲大將，部勒指揮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八歲，改從蔣謹藩讀《大學》、《中庸》。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九歲，春，復從任介眉讀《論語》《孟子》，六月又隨蔣謹藩讀《禮記》。七月初五日，父肅菴卒，享年五十四，葬於村北之桃坑山右巔。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光緒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年）十歲，讀孝經。王太夫人始教禮、樂。與兄錫侯析產。蔣公與弟瑞青居報本堂西廂舊宅，錫侯居東廂。始遊雪竇山，見妙高峰愛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光緒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十一歲，讀《春秋左傳》。隨王太夫人遊天童育王靈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四年（光緒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十二歲，讀《詩經》，間習古文辭，學作制藝。三月二十三日，弟瑞青瘍，年僅四歲，葬於石鱗隄祖墳左旁百餘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三年（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十三歲，往嵊縣葛溪，隨姚宗元讀尚書。在書塾見竺紹康，異其氣貌，心儀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二年（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零零年）十四歲，赴榆林村，隨毛鳳美讀《易經》。王太夫人親教誨勞作，藝桑灌園，以鍛練其身心。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一年（光緒二十七年，西元一九零一年）十五歲，赴崎山下村，讀於皇甫氏，始學作策論。始遊鎮海招寶山觀海。遵母命，與原配毛氏結婚。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年（光緒二十八年，西元一九零二年）十六歲，赴岩溪村，隨毛思誠溫習《左傳》，圈點綱鑒。應童子試，見試場規律陋劣，心恥之。

中華民國紀元前九年（光緒二十九年，西元一九零三年）十七歲，赴縣城肄業鳳麓學堂，受新式教育。

中華民國紀元前八年（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零四年）十八歲，仍肄業鳳麓學堂，爲改良校務，爭諸當事者，力持正義，幾乎被開除學籍。

中華民國紀元前七年（光緒三十一年，西元一九零五年）十九歲，赴寧波，隨顧清廉於箭金公學，讀《周秦諸子》、《說文解字》及《曾文正集》，並研究性理之學。顧先生傳授孫子兵法，並講述民族大義，始有出國學陸軍之志願。

中華民國紀元前六年（光緒三十二年，西元一九零六年）二十歲，正月赴縣城，肄業龍津中學堂。四月東渡日本，肄業東京清華學校，冬返國。在東京識陳其美。

中華民國紀元前五年（光緒三十三年，西元一九零七年）二十一歲，夏赴保定，肄業陸軍部全國陸軍速成學堂。聞日本教官侮辱中國言論，起而折服之，幾獲罪。年終應考留日陸軍學生獲選。

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西元一九零八年）二十二歲，再東渡日本振武學校肄業。由陳其美介紹加入同盟會。讀「革命軍」一書，益醉心於革命。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年（宣統元年，西元一九零九年）二十三歲，仍在日本肄業振武學校。三月十八日，長子經國誕生。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宣統二年，西元一九一零年）二十四歲，初次謁見總理孫中山，傾談國事，總理稱許蔣公爲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畢業振武學校，升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團爲士官候補生。竺紹康逝，蔣公收撫其舊部，並慰恤其家屬。

中華民國紀元前一年（宣統三年，西元一九一一年）二十五歲，武昌起義，蔣公微服回國至滬。陳其美令主持攻浙，任攻浙先鋒隊指揮官，蔣公率敢死隊炸浙江巡撫署，虜巡撫增韞。別軍攻將軍署，旗營亦降，取下浙江。返滬任滬軍第五團團長，助陳其美謀定江蘇。

中華民國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二十六歲，總理就任臨時大總統。「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陶成章謀刺陳其美，破壞革命，蔣公怒殺之；遂辭滬軍第五團團長，東渡日本習德文。創辦軍聲雜誌，著「征蒙作戰芻議」、「軍政統一問題」、「革命戰後

軍政之經營」、「蒙藏問題之根本解決」、「巴爾幹戰局影響於中國與列國之外交」等篇。冬回國鄉居。

中華民國二年（西元一九一三年）二十七歲，袁世凱暗殺宋教仁，罷免「國民黨」籍四都督，向五國銀行簽訂大借款，陰謀顛覆民國，民黨群起聲討，推陳其美為駐滬討袁軍總司令。蔣公奉令攻「江南製造局」，失敗，從事秘密活動，然後東渡日本。

中華民國三年（西元一九一四年）二十八歲，公奉總理令主持滬寧討袁軍事兼任第一路司令，負滬西進攻任務，事洩，袁捕之急，公乃赴日本。旋奉命赴哈爾濱，視察東北形勢。書告總理，述歐戰趨勢，並倒袁計劃。歐戰起，返日本覆命。總理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

中華民國四年（西元一九一五年）二十九歲，袁世凱推翻共和，在北京稱帝。陳其美就任淞滬司令長官，召蔣公回國任機務，謀運動「肇和艦」及襲取「應瑞艦」，並攻奪陸地各官署，失敗。

中華民國五年（西元一九一六年）三十歲，春，公率楊虎等攻取江陰要塞，佔領五日後退出。夏，陳其美被袁刺殺殉國，蔣公孤身冒死收尸歸葬，並撰文哭之。後北上觀察政局。秋回滬。

中華民國六年（西元一九一七年）三十一歲，春，公留滬聯絡寧、紹同志，圖肅清袁氏餘孽。秋，總理在粵組軍政府，並就任海陸軍大元帥，謀北伐，公撰「對北軍作戰計劃及滇粵兩軍對於閩浙單獨作戰之計劃」，備受總理讚許。

中華民國七年（西元一九一八年），三十二歲，春，奉召赴粵，在途中寫上「今後南北兩軍行動之判斷書」，到粵就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職，擬定第一期、第二期作戰計劃書，並親加督戰。夏，辭職返滬，旋奉命赴閩就粵軍第二支隊司令職。冬，攻取永泰，旋奉命停戰。

中華民國八年（西元一九一九年），三十三歲，秋，蔣公辭職回滬。冬，遊日本，後返國。總理改組「中華革命黨」，擴大吸收黨員，成立「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九年（西元一九二零年），三十四歲，蔣公奉命赴閩，參加作戰任務，並上第三期攻擊及作戰計劃。陳炯明任公為粵軍第二軍前總指揮官，公婉拒，回鄉侍母。

中華民國十年（西元一九二一年），三十五歲，奉命赴粵，商籌大計。六月十四日，母王太夫人逝，享年五十八，蔣公哀慟守制，總理電令奪情，乃赴粵桂，後請求回鄉葬母，葬畢又赴桂，在途中撰擬北伐作戰計劃書。

中華民國十一年（西元一九二二年），三十六歲，蔣公到桂謁總理，商決出師日期，建議移大本營於韶州。後陳炯明有異志，阻礙北伐，蔣公憂憤成疾，辭歸。夏，總理自桂回粵，免陳炯明職，陳率部叛變，總理避居「永豐艦」，蔣公聞難受命赴粵，後護總理脫險到滬，並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揭發陳逆罪狀。冬，奉命任東路討賊軍第二軍參謀長，赴閩計劃進剿。

中華民國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年），三十七歲，「國民黨」本部軍事委員會成立，被任為委員，後又任命為大本營參謀長，蔣公辭東路討賊軍參謀長職，專辦大本營機務，扈從總理親征。秋，奉派赴俄報聘，並考察政治及黨務，冬返國復命。

中華民國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三十八歲，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開辦軍官學校，創立黨軍，奉派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夏，到校視事，奉命特任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秋，奉命兼任長洲要塞司令。軍事委員會改組，蔣公仍任委員，後奉派為各軍軍事訓練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又奉命兼粵軍總司令部訓練部部長。大本營移設韶州，蔣公派軍校第一隊學生，隨駕護衛總理。陳炯明勾結列強，資助商團叛變，謀顛覆革命基礎。

冬，革命委員會成立，蔣公奉派為「革命委員會」全權委員，負責弭平商團事變。在粵之警備軍、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飛機隊、甲車隊、兵工廠衛隊、陸軍講武學校、滇軍幹部學校均奉命歸蔣公指揮。新軍改稱黨軍，蔣公奉命為軍事秘書。總理離粵北上與段祺瑞籌開國民會議，陳炯明又復蠢動。

中華民國十四年（西元一九二五年）三十九歲，二月，率軍校教導團及粵軍，第一次東征，不到一個月，攻克東莞、石龍、平湖、深圳、淡水、平山、海豐，直搗潮、汕、梅縣。三月，總理逝世於北平，蔣公在軍中發哀告全軍將士書，回廣州祭奠，並整理校務，後返軍次，就潮汕善後督辦職。大元帥府改組為

國民政府。四月，中央任蔣公為黨軍司令官。五月，「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蔣公在軍次發給證書。六月，楊希閔、劉震寰叛亂，蔣公奉命兼廣州衛戍司令，回師討叛平之。沙基慘案起，蔣公憂憤成疾，日記獨立自強標語以自針。七月，軍事委員會成立，蔣公任委員，建議革命六大計劃。八月，廖仲愷遇害，人心激憤，中央組織特別委員會，任蔣公為委員，負責政治軍事及警察全權處理廖案，平定時局；胡漢民出國。「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畢業。黨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公任軍長。九月，奉命為東征軍總指揮。十月，第二次東征，首戰惠州城，連戰皆捷，群賊就殲，東江大定。「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及軍隊政治部發展小組組織，黨內理論混淆，互相排忌，蔣公在汕頭說明國共界線，打破隔膜，制止革命勢力之分裂。十二月，凱旋廣州。

中華民國十五年（西元一九二六年）四十歲，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蔣公出席報告軍事，並在軍校招待代表，講演各代表對黨負繼往開來的使命，與解決黨內糾紛的意見。代表大會選舉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蔣公當選執行委員，後由執行委員第一次全會推公為常務委員。「黃埔軍校」第三期學生畢業。

二月，軍事委員會任命蔣公為國民革命軍總監，蔣公婉辭。兩廣統一委員會成立，蔣公提議早定北伐大計，應支援西北國民軍。共產黨反對北伐，百般撓阻，蘇聯顧問鮑羅廷把持黨政，進行挑撥離間之陰謀。

三月，「黃埔軍校」改稱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蔣公仍任校長職。共產黨煽動「中山艦」叛變，謀加害於蔣公，後發覺逆謀，迅速處置，事變遂平，汪兆銘避嫌離粵。

四月，西山會議派違反黨章，在上海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蔣公通電反對，制止破壞黨紀。建議中央請整軍肅黨，準期北伐。中央黨政聯席會議推蔣公為軍事委員會主席。

五月，第二次全體執委會開會，蔣公為主席，決議接受海內外請願北伐案，發表宣言。

六月，中央常會決議，委任蔣公為中央組織部部长。中央全體執委及各省市海外黨部聯席會議開會決議，迅即出師北伐，並任蔣公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又決定對內對外政綱政策。聯席會議決議，「中國共產黨」應造送其加入「國民黨」之黨員名冊於中央組織部，俾消滅猜疑，共同努力，完成革命，為共所拒。政治委員會決議任蔣公為國民政府委員。

七月，中央決議任蔣公為中央黨部軍人部部长，又推為常務委員會主席。蔣公於同月九日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誓師北伐；北伐前，蔣公發表演講，強調革命的指揮不能統一、意志不能一致、努力不能團結、命令不能實行，一定要失敗，所以大家必須犧牲個人意見，堅固團結，為中國爭獨立自由。

八月，進駐長沙，發表討吳佩孚宣言，督令各軍進攻，先後大戰於汀泗橋、賀勝橋，克之。

九月，公督攻漢口、漢陽，克之；圍攻武昌將下，贛戰告急，蔣公面進攻城機宜畢，移師入贛督師。令潮汕部隊進攻閩省。

十月，軍校第四期學生畢業，蔣公在高安軍次電勉之，並令畢業生悉調前方參戰。攻克武昌後，生擒劉玉春、陳嘉謨，至此，吳佩孚在武漢軍力全部消滅。令入閩部隊，攻破周蔭人主力，調贛參戰。先後攻克樟樹、豐城、建昌、德安、永修、撫州，孫傳芳乞和，拒之。

十一月，攻克九江，南昌守軍負隅頑抗，蔣公親臨督戰，克之，孫傳芳在江西軍力於是消滅。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移設於南昌。蔣公通電各省促人民自決，先後攻克漳州、泉州，福建平。

十二月，閻錫山請加入國民革命軍。中央政府自粵遷鄂。蘇俄及中共決議“迎汪復職，以與蔣分權”，誘促汪兆銘出主黨政，同時大肆攻擊蔣公，誣為新軍閥，高唱提高黨權，並散發傳單。蔣公在南昌發布告黃埔同學書，闡明革命立場，力主黨內團結。蔣公先後佔領衢州、嚴州。

中華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四十一歲，一月，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成立，蔣公指示進取全浙事宜。政府會議決議中央黨部與政府暫駐南昌，在鄂各“左派”委員於蘇俄顧問指使及共黨拉攏下，堅持反對，蔣公努力斡旋，赴牯嶺邀各中委會晤，消弭隔閡。九江英兵殘殺國人，蔣公建議對外方針，以和平不辱國格為主，並提請任命閻錫山為國民革命軍北路總司令。

二月，蔣公為挽救大局破裂，力主黨內忍讓團結，贊助國民政府駐武昌，中央黨部駐漢口，克復杭州。發表宣言，接受中央宣傳大綱，通令改善士兵生活。

三月，佔領蘇州。武漢黨政機關受共黨操縱，一切政令，違反三民主義與總理遺教，形成暴民政治，蔣公在南昌發表重要文告，力勸同志，堅守國民革命立場，維持國家社會秩序，團結一致，解救民眾痛苦。先後克服上海、南京。入南京時，北伐軍中之共黨著意挑釁英人，殺害外僑，遂形國際衝突，英艦炮擊南京，蔣公嚴電阻止事態擴大，靜候政府以外交方式解決。

四月，武漢政府下令突免公職，蔣公作書告全國同志，表明革命責任，不容諉卸，誓必負責完成北伐。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共黨破壞革命，危害國本之逆謀，決議非常緊急處置案。解散上海總工會等非法組織，徹底清除共黨分子。十八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蔣公發表告民眾書。二十一日，軍委會自粵遷南京辦公，蔣公發表告全體將士書。

五月，蔣公決定繼續北伐作戰方案，分全軍為三路進攻。組織清黨委員會，全國各省厲行清黨。先後克復揚州、泰州、滁州、蚌埠。

六月，克復鄭州、許昌。公電勸閻、馮合作，進取北京，並望馮規劃武漢。

七月，清江浦克復，孫傳芳通電下野。蔣公抵徐州，馮玉祥來會，舉行徐州會議，決定聯名通電北伐，並由馮勸請武漢政府剋期取消。張宗昌派員來談輸誠。雲南易幟。四川劉湘通電歸附中央。蔣公奉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徐州失守，渡江督戰。

八月，反攻徐州失利，下令退卻，電呈國府，自請處分。寧漢分裂益甚，為避免目標，冀便團結，發表下野宣言，辭去本兼各職，回鄉掃墓。南京成立特別委員會，並改組國民政府。

九月，決定出國考察外交，並研習經濟、政治、社會、哲學、軍事。二十八日，自滬東渡日本。

十月，在日研究日本對華政策。國民政府對武漢下討伐令。

十一月，與日首相田中義一會談，告以中日兩國相處之道。十日，自日返國。公開始研究宗教。汪兆銘在廣東成立政府。

十二月一日，與宋美齡女士於上海結婚。國民政府發討伐廣東令。特別委員會取消，中央黨部恢復，決定召開四中全會。共產黨在廣東暴動。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決議請蔣公復職，並負責籌備四中全會，各方紛電促公再起，蔣公乃決定回京，以安民心。

中華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四十二歲，一月四日，進京呈報正式復職。中政會決議任蔣公為北伐全軍總司令。迭電馮、閻及各將領準備北伐。

二月，二屆四中全會開會，提黨務政治徹底更始案。四中全會推蔣公為軍事委員會主席。九日，扶病渡江視察前線，十五日，赴開封與馮玉祥面決北伐大計，中政會決議蔣公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並命統歸公指揮。

三月，赴杭檢閱，過滬會商財政。迭令白崇禧早定湘局，合力北伐。軍官團開學，公以團長親臨主持。蔣公對日本記者坦白講演，盼日勿妨礙我國民革命之進行。部署軍事畢，蔣公於三十一日渡江北伐。

四月，進駐徐州，發表告前方戰士書，告全國及海外同胞書，告北方將士及北方同胞書，告友邦人士書，並電外交部切實負責保護外僑。召集總指揮與軍長及參謀長政訓主任分別舉行會議。手撰誓師詞，決定戰略，遂下令動員。中央發表北伐宣言。令駐兩湖各軍加入北伐，編入第四集團軍，以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國民革命軍所向克捷，連續攻克郟城、台兒莊、鄆城、韓莊、臨城、棗莊。第三軍團在魚台失利，蔣公電令各軍赴援。張宗昌下總退卻令，惟孫傳芳糾集餘部尙圖頑抗。下旬，迭克鋸野、嘉祥，經西關克濟寧、滕縣、界河、魚台、汶上、鄒縣、大名。日本出兵山東，阻我北伐，蔣公一面與日交涉，一面委朱培德為前敵總指揮，積極北進。逆軍反攻濟寧，蔣公親赴界河督攻兗州，以挽救之。續克寧陽、兗州、曲阜、金鄉。蔣公巡視最前線，決定第二期作戰計劃，並下令催各軍迅速前進。連克萊蕪、平陰、泰安、肥城，赴泰安，督攻濟南，並決定濟南克復後，即渡河追擊，不使日本阻我行進。

五月一日克濟南，日軍出阻，造成「五三」慘案，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犧牲。三日至五日，日軍在濟垣橫行滋擾，向我軍襲擊挑釁，蔣公嚴戒我軍勿予還擊，並嚴令入濟南部隊，於三日夜退出城郊，派員

# 《中國之命運》

任 詮

與日軍師團長福田商約束部隊，未得要領。四五兩日，仍繼續放槍發炮，並引張逆宗昌以飛機炸我司令部，蔣公爲完成北伐，忍辱勿較，限令我軍星夜渡河，僅飭留李延年步兵團駐守。六日移節黨家莊，繼續提兵北進，並籲召汪、胡回國，又切告奉系早日覺悟。日本阻礙陰謀於是粉碎。連克平陰、禹城、石家莊、臨沂、德州、定縣、張家口。公進駐石家莊督師。克復保定。蔣公在軍次，預籌裁兵方案及國防計劃。

六月，張作霖出關，被日軍遣人阻擊於皇姑屯斃命。克復平津後，蔣公以任務完成，回京，提請解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中央懇切挽留。蔣公呈請設裁兵善後委員會，並迭電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李濟探徵意見，以期協調一致，實施裁兵。公巡視武漢，迭次講演，發揚統一思想。

七月，公赴北平，祭奠總理，並往南口追悼陣亡將士。發表整軍意見及裁兵方案，並決定由第一集團軍率先裁編，以爲之倡。回京促開五中全會，以推進建設。

八月，舉行北伐全軍陣亡將士追悼會。籌開五中全會，糾紛迭起，蔣公赴滬斡旋，終於開幕，決議開始訓政，推行建設等要案。全會通過國民政府之組織，並推蔣公任國民政府主席。蔣公赴滬治病，病中對直魯殘部下攻擊部署要旨令，並遙理重要國事。

九月，胡漢民等歸國，蔣公勸邀入京共負艱鉅，並與諸老同志協商，組織政府，開始訓政。回京駐軍校，整理軍事教育。

十月十日，就任國民政府主席職。五院組織成立。發表訓政時期施政宣言。成立法制局。設置外交研究委員會，研究廢止不平等條約的步驟。宣告關稅自主。

十一月，制定國璽。實施禁煙。出巡蘇、魯、皖各地，檢閱軍隊，並考察地方政教及民生利病。美國首先承認我關稅自主，各友邦均贊同，惟日本則極端反對。

十二月，頒佈海關稅則。東四省易職，通電服從國民政府，全國統一告成。（第一部分）



老師經常說我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幸福一代。上學的時候就唱「我們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從小學到大學都一直在讀毛澤東的書，記得我第一次知道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是從中學語文課文裡看到的，毛澤東說：「我們這個大會有什麼重要意義呢？我們應該講，我們這次大會是關係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命運的一次大會。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中國之命運》）；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論聯合政府》）。我們這個大會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全中國人民解放出來。這個大會是一個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大會，是一個團結全中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爭取最後勝利的大會。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被打敗。即使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也還是有這樣兩個前途。或者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就是說，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或者是另一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就是說，一個老中國。一個新中國還是一個老中國，兩個前途，仍然存在於中國人民的面前，存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面前，存在於我們這次代表大會的面前（《兩個中國之命運——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

當時我想讀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但是，一個字也看不到，只是在毛澤東的另一篇文章《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中看到一點批判文字，進而毛澤東爲了批判《中國之命運》，竟編唱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曲，我也是才知道的。

彈指間幾十年過去了，我的世界觀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轉變成了「三民主義」者。又到了「雙十節」，我想慶祝它的最好方法，就是拜讀《中國之命運》。今非昔比，我找到了《中國之命運》，如饑似渴的讀完了它，感到它實在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本難得的好書，怪不得毛澤東組織了共產黨的筆桿子大肆批判它，怪不得我們幾十年來連一個字也看不到它？在目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面臨第三次“合作”的時候，在台灣和中國面臨和平還是戰爭的時候，在中國共產黨是否進行政治制度改革的時候，在中國面臨新命運的時候，重讀此書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 一、《中國之命運》的歷史背景

1、確實，蔣介石在 1943 年發表《中國之命運》的時候，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中國已經因為自己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通過國際反法西斯組織，廢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國家取得了獨立自主的權利，實現了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面臨建設新的民主中國，就是實現「三民主義」的後兩條「民生主義、民權主義」。所以，蔣介石說：「百年來，由國恥所造成的不平等條約，激起我全國國民一致要求的雪恥圖強運動，革命倒滿由於此，抗戰建國亦自此而來。在雪恥圖強運動之中，事實的經過，已經證明惟有國民革命的路線最徹底，亦最為正確。時至今日，國民革命已有初步成功。今後我中國國民自惟有遵循此成功路線，以達到抗戰的目的完成，建國的理想實現之境域。」顯然，在這個時候發表《中國之命運》，是「指向建國目標——就是心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五項建設，努力實行文化經濟與國防合一的整個建設計劃」。

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是國民黨，這是毫無疑問的，國民黨領導全中國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開展了殊死的搏鬥，正面戰場和抗日前線，都是國民黨的軍隊在和日本軍隊戰鬥，成百萬的國民黨官兵犧牲在抗日戰爭中；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而共產黨幾十年來一直宣稱自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是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殊不知，共產黨才是

造成日本侵略中國的罪惡黑手，是共產黨造成中國的分裂，才使日本有機可乘，發動侵略戰爭，是故，蔣介石分析說：「然而，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之後十年之間，在事實上，則因帝國主義者的干涉與反革命勢力的妨礙，使經濟建設不能如期推進，而在理論上，則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潮，平分了當時的經濟學界。共產主義者，致力於其所謂『土地革命』與『農民革命』，軍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壞我國和平的農村。他們對於民族工業，毫無愛護的心裡，惟以憎恨、鬥爭之說，灌輸於社會和青年之中，以阻礙生產的進步。於是資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其影響更大而更深。」

2、全面抗戰尚未爆發，共產黨就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召開了「瓦窯堡會議」，遵照斯大林的命令，提出建立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利用特務說服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制造所謂「逼蔣抗日」，使共產黨和共產黨的軍隊變成國家軍隊，再以合法的身份繼續分裂中國。及至全面抗戰已經爆發，中共又召開「洛川會議」，提出到抗日戰爭的後方去，建立所謂抗日根據地，實質是佔領土地，實行「高築牆，廣積糧，緩稱霸」的專制時代“打天下”的策略，旨在保存和擴張實力。1939 年，中共將領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按：應該是數次扒鐵路、炸橋梁的小仗，而非大戰），即被毛澤東批評「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後來則被毛澤東整肅。到了四十年代初，也就是抗日戰爭的艱苦相持階段，只圖擴張、不打日寇的毛澤東已經敢說：「第一，（我們）有一個經驗豐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萬黨員的強大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有一個強大的解放區，這個解放區包括九千五百五十萬人口，九十一萬軍隊，二百二十萬民兵」。共產黨終於在抗日戰爭中擴張了自己的力量，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則是腹背受敵，元氣大傷。共產黨已經不把國民黨放在眼裡了，他們對國民黨已經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在 1940 年 1 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已經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就是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就是被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就是被融通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可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都要建立自己理想的國家，蔣介石爲了闡明國民黨的建國方針才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他說：「既然任何黨派，任何力量，離開三民主義與中國國民黨，決不能有助於抗戰，有利於民族的復興事業。這一點顯明的事實，是應該為全國國民尤其是知識份子所徹底認識。」

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毛澤東又發表《兩個中國之命運》，並且讓「陳伯達駁斥蔣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以便對中國人民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系，鞏固我黨自己和影響美英各國、各小黨派、各地方乃至文化各方面。」

抗戰期間，國共兩黨不同的路徑導致不同的命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支持下，在中國共產黨不打日寇、專攻國民黨的戰略下，在毛澤東打著民主建國旗幟的欺騙下，國民黨的命運是悲慘的，被共產黨趕到了台灣。而歷史經過半個世紀才證明了，當時確實是中國之命運的關鍵時刻，而毛澤東並沒有給中國帶來光明的命運，相反復辟了封建專制制度，造成八千萬人民無辜的死亡，一直到今天，大陸人民還生活在悲慘的命運之中。而國民黨並沒有給台灣人民帶去黑暗的命運，相反，台灣實現了自由民主的理想，在兩蔣時代，成了中國第一個三民主義模範省。

## 二、《中國之命運》是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性文獻

1、《中國之命運》全面徹底正確的總結了中國的五千年的歷史演變和儒家文化底蘊。就是「中國的五千年的歷史，即為各宗族共同的命運紀錄。此共同之紀錄，構成了各宗族融合為中華民族，更由中華民族，為共禦外侮以保障共生有而造成中國國家悠久歷史。這一部悠久歷史，基於中華民族固有的德性，復發揚中華民族崇高的文化。我們知道的中國國民道德的教條，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中國立國的綱維，為禮義廉恥。」

《中國之命運》特別的總結了中國近代現代歷史，用了大量的文字論述了不平等條約之廢除，是信仰三民主義的結果，其中又特別提出了北伐和抗戰，就是「國民革命初步成功，是中國全體國民百年來繼續不斷的奮鬥，與五年來艱苦抗戰的收穫。但是，最

近三十年間，國民革命卒能將二千年君主政體推翻，三百年滿族專制顛覆，乃至於將世界上最殘忍最堅強的不平等條約撤廢。由此可知只要我們國民羣策羣力，信仰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向國民革命的大道邁進，是沒有不成功的。」

2、《中國之命運》最可貴的是高瞻遠矚地看到了共產主義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的反動本質，就是「五四以來，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他們對於中國文化，都是只求其變而不知其常的。他們對於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跡，而不求其精義以裨益中國的國計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學子，喪失了自尊與自信。其風流之所在，一般認為以為西洋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中國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至於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國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論，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其結果他們的效用，不過使中國文化陷溺於支離破碎的風氣。這真是文化侵略的最大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

當然，我們縱觀中國的現代史，就可以證明，正是共產主義才給中國造成了民族傳統文化的最大破壞，共產黨把共產主義貫徹到大陸，破壞了所有的有型的傳統文化和無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繼承了五四反傳統文化的特點，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下，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破壞殆盡，使中國人民在物質貧困和精神貧困中悲慘的生活。如果沒有兩蔣的國民黨在台灣保留下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之復興基地的話，那麼中國要恢復傳統文化，將比恢復被秦朝破壞的傳統文化還要艱難得多。毛澤東說「說我是當代的秦始皇，不對，我們比秦始皇殺人多，破壞的多了。」今天，我們每個中國人都要看到台灣、香港、澳門的存在，這對恢復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將有著重要的作用。而保衛中華民國的台灣，就是保衛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雖然許多台灣人，沒有認識到這些，只以台灣一島的利益為重，不想為整個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貢獻力量，怕中共的戰爭，怕中共的導彈。還有些台灣人則幻想中共的和平，甚至為此而企圖「挾共治獨」，這些人無疑已經成為目前台灣最危險的政治勢力。

### 三、《中國之命運》是民族復興的法寶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就是「自太平天國舉義以來九十三年之歷史證明：惟有我們國父倡導的國民革命與三民主義為我民族復興的唯一正確的路線。辛亥革命，以及今日抗戰建國，皆依此路線，不徘徊，不退轉，勇往邁進，不達目的決不中止。」

《中國之命運》的中心思想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是「國民革命」，就是我們說的民主革命。中國人民之所以取得了民族獨立和民主制度，就是在三民主義的指導下進行的。我們的中國現在還沒有完成統一，還沒有復興民主制度，所以，還要繼續實行三民主義才能完成中國的統一。台灣金門島上就有一個大標語；「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才是全中國人民的呼聲，這才是中國人民最大的公約數。

當前，中國又面臨著命運的選擇，也如毛澤東說的「一個黑暗的中國，一個光明的中國」。現在，我們已經不會被中共欺騙了。大家都知道，光明的中國就是在大陸建立民主制度，或者說在大陸復興民主制度；黑暗的中國則是中共在大陸繼續實行共產主義制度，用武力用戰爭統一中國，而不是用三民主義，不是用和平的手段。歷史雖然走進了新的世紀，但是中共的反動本質卻沒有變化，還在搞什麼「統一作戰」，搞什麼「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教育」，搞什麼「逼台抗美」，搞什麼控制「言論自由」，搞什麼「和平崛起」等等，我們千萬要提高警惕，堅決制止法西斯主義。2005年9月21日，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澤奧利克曾發表講話曰《中國往何處去？》敦促中國實行民主制度。他說：「中國的行動，連同缺乏透明度的問題可造成風險。難以預料中國將如何運用其力量，將導致美國及其他國家做好兩手準備處理對華關係。很多國家都希望中國走『和平崛起』之路，但誰也不會以自己的未來作賭注。中國軍事現代化快速發展，實力得到增強，使人們對擴充軍備的目的產生質疑，並提出中國缺乏透明度的問題。美國國防部最近就中國的軍事態勢發佈報告，不具有對立的性質，儘管中國的反應有這樣的情緒。美國發佈的報告記錄了事實，其中包括我們對中國軍事瞭解的情

況，還分析了幾種可能出現的其他情況。中國若想緩和這些憂慮，就應公開介紹本國的國防經費、意圖、原則和軍事演習的情況。」並且警告說這是中國面臨兩個命運的選擇。可見，美國是很少這樣指出一個國家的問題的，美國及民主國家面對中國的倒行逆施，是不會無動於衷的。

總之，《中國之命運》發表半個多世紀以來，儘管因為中共佔領了大陸，在漫長的歲月裏被淹沒無聞，但它的內容和思想，卻通過中國改革開放的形形色色窗口，潛移默化地在大陸重新傳播開來。可以說，整個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無不體現在《中國之命運》之中。今天，在紀念辛亥革命和雙十節的歡樂日子裡，我們重讀《中國之命運》，真是倍感親切！最後讓我以梁啟超的話來與讀者共勉：「再說那民主精神。咱們雖說是幾千年的專制古國，但咱們向來不承認君主是什麼神權，什麼天授。歐洲中世各國，都認君主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是君主的所有物。咱們腦筋裡頭，卻從來沒有這種謬想。咱們所篤信的主義，就是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

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個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為根基、以台灣民主制度為榜樣、以「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真正的新中國，必將得以再造。

## 也論 民族英雄

陳赴義

在黃花崗雜誌第七期「國民革命與中華民國」大論戰專欄中，對於蔣介石是否為民族英雄，各評論家有人贊成，有人反對。

贊成者以「蔣介石領導民族抗戰，獲得勝利」為理由，認為蔣介石足以成為民族英雄。

反對者則以「俄國期大林雖也領導二次大戰勝利，但之後對人民殘酷統治，造成二千多萬人民不正

常死亡」為由，認為不可因蔣介石領導抗戰勝利即可認為其足以成為民族英雄。

似乎贊成者與反對者之理由都有其道理。

而我個人則提出，根據歷史，我們在什麼條件下，會稱某人為民族英雄？依此條件，來論蔣介石是否為民族英雄，似乎才會有比較客觀的標準。

舉個例子：唐太宗有貞觀之治，我們有沒有稱唐太宗為民族英雄？好像沒有，可見帝王就算是造成盛世，我們似乎也不會認為其為民族英雄。

而岳飛呢？他即不是帝王，最後也被奸人害死，但我們確認為他是民族英雄，為什麼呢？因為在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中，一向不是以成敗論英雄，而是依其精神對民族的影響來論英雄的。所以歷史上「奮力抵抗外敵，為國捐軀，節操氣壯山河」的人，例如：岳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鄭成功，就都會成為人們心中的民族英雄。

所以，若將蔣介石視為帝王（或稱國家領導人），那指揮國家民族戰爭勝利，好像也不該被稱為民族英雄，反而是抗日名將——張自忠將軍等為國為民戰死沙場者，可被稱為民族英雄了。但若以蔣堅持到最後之奮戰精神對民族的影響，比起汪兆銘求和失敗主義，或毛澤東不抗戰，背叛民族，暗中求擴張而言，那稱蔣為民族英雄，似乎也不為過。

我個人比較支持蔣為民族英雄，但都不是上述的理由。我認為蔣足以稱之為民族英雄，是因為他堅持反共的精神，他對共產黨將對民族造成危害的瞭解，遠勝於當時的任何人，歷史的發展也證明了他反共的正確性。就像岳飛被秦檜害死了一樣，雖然在國共內戰中他敗給了毛澤東，但站在民族的立場，蔣介石是民族英雄，毛澤東是民族罪人，就像岳飛是民族英雄而秦檜是民族罪人一樣，歷史最後一定會還給他一個公道。

我們的歷史是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而是以精神論英雄的。



散文詩：

## 當時明月在



（外一首）

大陸青年 王子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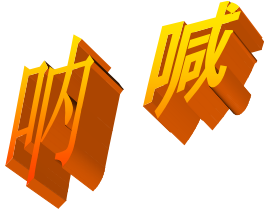
那是一個戰亂紛飛的時代，那是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那是一個民族淪亡的時代。有一個人，他站了出來，說了兩個字：北伐。他成功了，這個國家漸漸走出泥淖，開始了艱難的復興之路。

那是一個蹣跚起步的時代，那是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那是一個強敵壓境的時代。有一個人，他站了出來，說了兩個字：抗日。他成功了，這個國家漸漸走出沼澤，開始了艱苦的的重建之路。

那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那是一個赤禍肆虐的時代，那是一個陰謀顛覆的時代。有一個人，他站了出來，說了兩個字：剿共。他失敗了，這個國家漸漸走向了地獄，開始了血腥的沉淪之路。

那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那是一個國土淪陷的時代，那是一個江山變色的時代。有一個人，他站了出來，說了兩個字：保台。他成功了，這個島嶼漸漸走出了恐懼，開始了平穩的民主之路。

這是一個極權統治的時代，這是一個草木皆哀的時代，這是一個渴盼變革的時代。四個時代，同一個人，三次成功，一次失敗，成也豪邁，敗也榮哉！身處第五個時代，人人都想說兩個字：腐敗。壯士扼腕，才俊束手，仰天長歎：當時明月還在！



腐敗的種子，  
糜爛的思想，  
在曾經孕育了  
數千年輝煌歷史的中華大地上，  
污染， 散播。  
那人心阿，  
經受了太多磨難；  
那鬥志阿，  
經歷了太多打擊；  
被迫躲在污水河裏，  
逃避， 同汗。  
革命，  
曾經無比神聖的兩個字，  
而今因為魔鬼的偽造，  
變得一文不值，橫遭唾棄。  
那曾經為無數先輩艱辛奮鬥的光輝事業，  
只因為一九四九那一次殘酷的失敗，  
而致灰飛煙滅。  
中國，  
痛——並快樂著；  
中國人，  
在絕望和麻木中過活。  
在這片土地上，  
數不盡的醉生夢死，  
在這座危樓上，  
唱不完的肉麻讚歌。  
是誰在吶喊？  
是誰在呼喚？  
是誰驚醒了這行將就死的沈默？  
在那舉國虛偽的歌頌聲裏，  
在那萬民齊喑的沉沉死寂裏，  
傳來你驚心動魄的一聲斷喝：  
誰是新中國？！

振聾發聵的文字，  
滿含熱淚的訴說，  
縱使那寫盡王朝敗象的紅樓夢，  
不及你鐵證如山的審判！  
即便那千古流芳的史記，  
難比你一針見血的批駁！  
霎時間冠冕堂皇的詭辯失去了效用，  
迷途的正義回歸它本來的居所。  
精心打造的謊言望風披靡，  
一潰千里；  
外強中乾的屠夫歇斯底里，面如土色。  
漫天的黑幕下，  
一個又一個堅定的靈魂毅然站起！  
那一代又一代的奴顏卑膝惶愧無地。  
看吧！  
那沉睡的東方巨龍正在蘇醒，  
聽吧！  
那烏雲密佈的天際一聲又一聲霹靂！  
長江在怒吼，  
黃河在咆哮，  
那華夏大地上滿懷熱血的中華兒女，  
怒髮衝冠， 枕戈待旦！  
那災星肆虐的旗幟就要倒下，  
那金光四射的太陽即將升起！

後記：敬送《黃花崗》兩首拙陋的詩作，如能僥倖發表，稿費免付。能否收用，請回通知。



# 反文革第一人

## 上海 劉文輝 之死



劉文忠著《風雨人生路》摘編

摘編：楊 錚

一九六六年秋末冬初之夜，朔風卷灑黃葉，寒氣特別凝重。"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上海灘，成千上萬人還湧聚街頭，熱烈爭辯，無法入眠。一輛灰白色的警車突然駛出日暉新村，披著昏黃的路燈光，車頭閃爍著兩道血紅色的巨眼火花。

"胡……鳴……" "胡……鳴……"，警車駛向肇嘉浜路時驟發出一陣陣揪心裂肺的警笛聲，掠過街道兩邊梧桐樹投下的團團濃影，輾碎滿地黃葉，風馳電掣般地左轉右彎，飛速前進。街道中央綠化地中正在七嘴八舌議論風聲的人們，個個驚得目瞪口呆，鴉雀無聲。

這時的我，二十歲毛頭小夥子，被反铐雙手，押在車內後座中間。左右兩邊，兩位荷槍實彈的公安戰士緊緊地夾住我。當我側臉向車窗外觀看路徑，意測車子行進目的地時，公安戰士的粗強大手把我的頭摀得低低的，使我幾乎喘不過氣來。約莫半小時左右，警車風風火火駛進一所大院戛然停住。公安戰士打開車門，把我推搡下車。

我從此開始了為期 13 年的囚犯生活，而同時坐在另一部車裏的輝哥，卻永遠沒有來。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天家裏經歷的恐怖之夜，和之後又經歷的更恐怖、更悲哀的事。

家裏。那天夜裏三姐躺著心裏慌慌的，臨睡前看到輝哥一直抱著小外甥女呆坐了兩個小時，三姐似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在床上久久難以入眠。只聽見上下樓梯的腳步聲比平時多得多。接近午夜時，起風了，寒流一陣緊逼一陣，三姐的心也是陣陣抽緊，迷迷糊糊一夜未睡著。天還未亮，凌晨五點，老父親下樓來，驚恐兮兮地說，文輝、文忠都被捉去了。三姐、大姐與母親，一下子跳起來，問什麼時候的事。父親說大約深夜九、十點鐘，民警沖上來先抓走文忠，再押走文輝，便衣認真仔細搜查，連一角紙屑都不放過，直到凌晨三點，拿了文輝寫的一大捆東西才離去。三姐很後悔，傍晚聽說派出所開緊急會議，早有心靈感應的預兆，為什麼夜裏不上樓去看看，見見我倆兄弟，尤其是文輝哥，一旦有個三長兩短，就怕從此永訣了！次日上午九點光景，派出所民警小唐來我家，把父母叫到屋外站著訓話，說什麼你兩個兒子都是反革命，你們要老實配合政府揭發交代。三姐問："他們到底犯下什麼罪？"唐說："反正是反革命罪！"那天一夜北風呼叫，第二天人們都穿上了棉衣。三姐問，什麼時候可以去送棉衣棉被？唐說，上面會通知你們的……大約過了一星期後，派出所才通知家屬可以把棉衣服送進去。三姐一直擔心輝哥與我在監牢中將被凍成什麼樣，何況我是個殘疾人。她常與大姐、

一、



父母親一起嘮叨掛念，闔家紛紛落淚歎息。爲我倆兄弟擔驚受怕，多少個夜晚難安睡。

尤其當輝哥遇害被槍殺，噩耗傳來，闔家痛哭，恐怖萬分。那是 1967 年 3 月 23 日下午三時許，母親和大姐抱著未滿一周歲的三姐女兒，從外邊回家，看到一大群無知的鄰居，瘋狂地擁向我家門口，越聚越多，不僅有我們村居民，還有鄰村的，數百人把我家團團圍住，水泄不通。我家房後邊花園籬笆被推倒，樹木花草被踐踏履平，我家四室的門窗被砸碎。人群聲嘶力竭叫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劉文輝、劉文忠、劉宗漢！" 派出所民警沖在前面，逼著我母親，高叫"快快交出四角槍決劉文輝的子彈費！" 我父親劉宗漢早已被里弄專政隊押著，跪在家門口，頭上戴著高帽子，上寫"反革命分子劉宗漢"，名字上被紅筆打了大叉叉。父親脖子上掛著一塊厚重大牌子，上寫著"鎮壓反革命分子劉文輝"，背上被用墨汁寫著"嚴懲反革命分子劉文忠"，劉家人姓名無一不打著叉叉。父親已被瘋狂的"革命群眾"打得頭破血流。面對家門口這場驚天動地的劫難，母親緊緊抱著驚嚇得大哭的幼嬰外甥孫女，堅強地擠進人群往家裏走。一些造反派與不懂事的小孩子，一起抓起地上的泥巴與垃圾，向我母親身上扔去。母親急忙用頭、手、肩掩護懷抱的嬰兒。我大姐嚇得跺腳大哭。她的十多歲兒子，想上前去保護遭打的外公外婆，反被一群紅衛兵揪出去打了一頓。另外兩個 6 歲、10 歲的外甥都嚇得躲到床底下大哭。附近群眾都聞聲趕來觀看，人山人海，"打倒"的口號此起彼伏，驚心動魄。派出所民警與造反派頭頭跟進我家中，擲出兩張槍殺劉文輝的判決書"。我母親強忍著眼淚，拿出四角錢。他們拿到子彈費，擠出人群指使紅衛兵、造反派說"對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 這場暴虐一直持續到天黑……晚飯後，又有不少人向我家 4 室門窗擲石頭，把幾扇窗子的玻璃都打碎了。

在昏黃的電燈下，大姐顫抖著雙手，驚恐萬分地打開民警擲下的那份《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落著眼淚輕聲念給母親聽。判決書上羅列著劉文輝罪行：1957 年"瘋狂地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大肆污蔑我歷次政治運動和各項方針政策"，1962 年"爲首組織反革命集團，陰謀劫船投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後，竟針對我黨中央關於無產

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編寫了反革命的'十六條'，分別散發到全國八大城市十四所大院校，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咒罵我偉大領袖；瘋狂攻擊我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是'窮兵黷武主義的新階段'，社會主義制度是'戰爭的策源地'，誣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是'全民大迫害'。同時大肆宣揚資產階級的'和平、民主、平等、博愛'，竭力吹捧蘇修、美帝……" 法院宣稱劉文輝"是一個罪大惡極、拒不悔改、堅決與人民爲敵的反革命分子"，爲"確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判決反革命犯劉文輝死刑，立即執行"。另一紙是法院給劉宗漢的"通知"：反革命犯劉文輝，已由本院判處死刑，並報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我院於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將劉犯文輝執行槍決。"

剛剛經受殘酷批鬥的老父，不顧頭頸撕裂、腰腿劇痛，顫巍巍地伸手從大姐處拿過這二張奪命紙，抖抖索索地撫摸著，連聲長歎："我劉宗漢作了什麼孽，要遭到如此報應啊！我害了輝兒，我株連全家，我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 父親的哭嚎催人淚下。從不落淚的母親，嚎啕痛哭了一夜。一家人失魂落魄，個個坐到天明。第二天，有關槍決罪大惡極、死心塌地現行反革命分子劉文輝的公判海報，貼滿上海大街小巷，自然首先貼到了我家住的日暉四村弄堂口，貼到我家 12 號大門牆上。從這以後幾箇月中，整村 288 戶人家，加上附村許多居民，都象參觀動物園一樣，天天圍著這個出了三個反革命分子的"殺、關、管"人家，指指點點，議論紛紛。

我曾追問父母："你們沒有保存輝哥的骨灰？" 父親痛苦地說："在那種殘酷瘋狂的年頭，哪個有膽量去要骨灰。" 又含淚說："也好，這個倔強兒子，遲早會被他們殺害，早走，免受了數不清的折磨。"

夜深了，父母親、大姐們邊泣邊訴那恐怖的記憶……輝哥沒有留下骨灰，沒有墳地，沒有人敢在清明爲他燒上一把香——蒼天是何等地不公啊！

被群眾專政得多年來沈默寡言的父親，有一天夜裏悄悄地告訴我："文輝在臨死前寫下一封血書，夾藏在棉被夾襖裏面。" 又說，輝哥遇難後，派出所通知他到監獄領回遺物，包括這條棉被在內。他取回家後，母親在拆洗時，發現了夾藏在裏面的血書。父親暗地裏收藏了幾個月。因爲他經常挨批鬥，天天爲這



封血書提心吊膽。雲南工作的五哥回滬探親，里弄專政隊強要他上台揭發批判父親，嚇得他沒住幾天就回了雲南。臨走，父親把暗藏的血書交給他，五哥暗地藏行李箱內。回到了雲南。見文革環境殘酷，危機四伏，只得把輝哥的血書分句拆開，一段段抄錄下來，然後把原件燒毀了。我連夜寫信給五哥，向他要輝哥遺書的內容。不久，我終於讀到了敬愛的輝哥臨死前寫下的血書內容。我眼淚滾滾，輝哥啊，這是您在走完短暫人生旅途之際，向天地發表的戰鬥檄文，一身正氣沖雲霄，滿腔熱血灑征程，千年萬載的人讀了您這篇鮮血寫成的戰鬥檄文，能不為您捨身反抗邪惡的狂潮所震撼？能不為您睿智敏銳的洞察力所折服？能不為您超人才華、蓋世雄略所惋惜？

我這裏再一次含著熱淚，一字一句地把輝哥的遺書全文抄錄下，公諸於世，讓每一位有正直良心的人評一評，我三哥劉文輝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是"徹頭徹尾、頑固不化的現行反革命"？還是在濁浪滔天的文革時代，"人昏昏而他獨醒"地站立在高天九霄，敢於誓死捍衛真理的勇猛鬥士？

## 劉文輝遺書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四時許，我在法警強力馴逼之下，在不大於五平方的私堂與外人隔絕，由檢察院一人給我檢察院起訴書，五分鐘後仍由他代表中級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執行。僅隔二小時左右，高級人民法院就傳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事實上，我的上訴書剛寫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證明我使他們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來反抗他們的殘忍，此外說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麼遵紀守法啊！莊嚴而鄭重的法律程式手續總是到處被他們強姦。

此遺書一定要保存好，讓我死得明白。我說它是私堂並不汙誣它。我的親人，我將死去，我為什麼被害，因為我寫了二本小冊子：《冒牌的階級鬥爭與實踐破論》《通觀五七年以來的各項運動》，此稿被紅衛兵抄去。另一本是傳單"反十六條"，其中分類分條為："窮兵黷武主義的新階段"，"主流和曲折"，"敢字當頭，獨立思考，反對教條，自作結論"，"論羣眾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對毛的階級鬥爭理論"，

"正確對待同胞手足"，"區別對待黨團幹部"，"警惕匈牙利抗暴鬥爭的教訓"，"民主主義者在抗暴鬥爭的旗幟下聯合起來"，"關於自殺與拼殺"，"武裝鬥爭的部署"，"裏應外合"，"知識份子問題"，"主張部隊研究它、批判它"。此傳單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導線。你們瞭解我的情操，它可以用詩概括之："從誣'反、右、壞、修、資'。非資非奸非乖暴。反右幸嘗智慧果，抗暴敢做普魯米。鎖國應出土玄裝，焚坑猶落揭石子。今赴屠場眺晨曦，共和繁榮真民主。"

我是個實行者，敢說更敢做。如今就義正是最高的歸宿。我在經濟上對家庭大公無私，在政治上為祖國大公為人。這正是你們有我而自豪之處。所以我要求你們不要難過，不要從私情上庸俗地讚揚我，應明智些不因當局的壓迫、愚弄而誤會我的生平。我相信死後我國的民主主義者、共產黨中的現實主義者朝著世界潮流行駛。中國是會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毛作為個歷史人物對中國人民是有功績的，但自55年後就轉化到反動方面去了。整個世界在變化，但他竟這樣昏聩、剛愎自用、居功自傲，自翊為救世主，以至內政、外交竟是亂弱難定，估計越來越冒險，將成為我國的災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強制人民服從己意，清除異己，其方式退居幕後，暗施毒箭，指使親、寵、奸，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愚弄羣眾，混淆是非，獨夫欲名，玩億萬性命，冒天下之大不韙，孤注一擲，拼其偉大理想之實現。

我堅決反對鎖國排他主義、軍國主義、反民主自由、反經濟實業、焚書坑儒主義、階級鬥爭惡性報復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對所謂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謬論。所以作為匹夫有責，我就願意敢與毛鬥爭。這才是死得其所，重於泰山。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誤解我，不相信我。我的正義行為一時不易證明就留待日後吧！

外甥們成長吧！要相信烈士遺書的價值。我的血不會白流。請把我的詩與血書銘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視親人能見到我立碑的榮幸。等毛政權倒台後，作為烈士的我必能恢復光榮，洗滌家庭所蒙受的污垢。我在第一所1211，在滬監牢號167（761號）。我的手與腳被銹著，不准我寫信和要求見親

人。此遺書是寫上訴書時偷寫的，請秘密妥善保管。請你們將此書交給我弟弟，另有我詩詞七首分別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是：

"龐然世界二瘋子，毛林發作幾下抽搐，幾下嚎叫，踞功自傲，誇口最舵手，世界革命談何易，漩渦急轉碰石岩。迫害毛急，億萬命竟玩忽，獨夫欲名，惟君命有所不受。須自主，沉舟側畔千帆過，民意歌蓋君之代，天皇戰歌遭唾罵。頂禮膜拜，必戰災情勢急。"

有朝一日將它發表。臨刑前十分抱憾，不能著手寫心中久已策劃的，創辦一份"人人報"，開闢"層層說"專欄，其內容針對毛反動方面公佈天下，切希望有人接任。

今天三月二十日閻羅殿的判官到監獄來，催我明或後將開羣眾大會要我態度老實，言明將視態度而改判與否。我鬥爭很激烈。我當然立志於"將頭顱鈍屠刀，血濺汗道袍"，也即站著死，不跪著生。這是必然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遺恨是不能做更生動更重大的貢獻與人民。如今我可謂風華正茂，血氣方剛，更因毛江河日下，氣息奄奄之際。我多麼想活下去，再來個反戈一擊其死命啊！我應當為祖國為人民多做事啊！

但我確信我的上訴只能在毛政權垮台後提出，我將向人民上訴毛的階級鬥爭理論與實踐是反動的是奴役廣大人民的；我將向先烈們上訴毛貪天之功為己功，把先烈血換下的事業作為實現自己野心的本錢；我將向社會賢達上訴，毛焚書坑儒迫害異己，愚民毀綱，亡國亡民；我將向祖國上訴，我作為愛國志士反對毛的戰爭政策，毛的鎖國排他主義；我將向世界人民上訴，我是個國際主義者，我反抗毛所謂解放三分之二人類的謊言野心。

我將死而後悔嗎？不！決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來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軀來摧毀的，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

輝

寫於1967年3月20日

敬愛的三哥文輝的一片丹心、滿腔碧血，都在紅色恐怖的槍口下化為灰燼。大上海啊！您怎能眼睜睜地瞧著，你最優秀的兒子被無產階級暴政所屠殺！黃

浦江啊！你可以作證，這位優秀的青年曾幾年來風雨無阻，從浦西滬東船廠騎自行車趕到復旦去上夜校。東海啊！你應該記得，有位年青人在海島上天天傍晚在你的懷抱中遨遊萬米，鍛煉體魄，每夜你可以看到他坐在一間蚊蟲叮咬的小屋內苦讀至深夜，燈光不息。祖國啊！為什麼中華民族最愛國的仁人志士，要為你拋頭顱，灑鮮血。麻木、愚鈍、盲目、迷信的善良人們，你們在高呼口號"打倒反革命分子劉文輝"、"劉文輝死有餘辜"的時候，你們扮演了一個歡呼著把耶穌釘在十字架的角色。劉文輝"反文革十六條"的戰鬥檄文，他所預言十年文革的種種災難，都一一降臨到你們頭上。他用自己的腔熱血，都喚不醒你們的靈魂的覺醒。

像劉文輝那樣敢於挑戰毛澤東，諍諍鐵骨，直面死亡，在千百萬人中也難產生一個啊！在他的英勇行為面前，無數的共產黨人應感到渺小和無地自容，問心有愧啊！為什麼拯救國家於危難的千斤重擔，要劉文輝單槍匹馬，一個人去挑？為什麼席捲中華大地的文革狂瀾，要劉文輝獨自去挽？輝哥精神的偉大在於他超越了死亡。他生命是短暫的，精神卻是永恆不死的。他的精神頂天立地。然而天地間唯有歷史才是公正無私的審判官。至高無上的"法院"終將宣判"文革"罪惡滔天，宣判毛澤東倒行逆施，遺臭萬年。宣判劉文輝無罪有功，還劉文輝赤子之心的清白。輝哥英魂常在，永遠托體山河，義士高風，將吹暖人間。我心默默叨念："輝哥的鮮血不會白流。"

## 二、

我的三哥劉文輝，在我們家庭中，無愧為佼佼的頂樑柱。他是父親蒙冤遭難後，全家處於斷絕生活經濟來源、遭受種種打擊迫害的危難境地時，劉家的剛強不屈的脊樑骨。16歲自高中輟學，進上海滬東造船廠當學徒。很快學會數種技能。滿師後評為四級工，晉升為技師。調進工廠檢驗科。這在上萬人的滬東造船廠，不能不算是佼佼者。他要求進步，入團，成為車間支部書記。靠近黨。他的事蹟曾上過報紙。

他把每月工資的80%（40元左右）交給母親，支持家用。經常主動要求加夜班，得了夜班費也寄給母親。

業餘他積極地學習毛主席著作，還讀了上海外國語學院的夜修班和復旦夜大學。在精神上影響與鼓勵弟妹們奮發向上。

1957 年中共中央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號召全國人民大鳴大放大字報，向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及一切腐敗作風開火。年輕有為、血氣方剛的輝哥按照毛澤東的話，幫助黨整風。他挺身而出，在座談會上大鳴大放，向廠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提意見，又貼出大字報，向工廠黨委書記生活上腐敗作風開火。他一心要將黨內的腐敗風氣整頓乾淨。結果卻被內定他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反對黨的領導，"反黨反社會主義！"

1958 年春，父親戴上 "歷史反革命" 帽子，在徐匯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上，劉文輝表露對父親如此宣判不公平，向法官申辯了幾句，公然懷疑黨的莊嚴法律，如此這般算起帳來，劉文輝確是個徹頭徹尾的右派分子。

按說 1957 年反右鬥爭已勝利結束。不料共產黨要 "補課"，於是 1958 年春天，劉文輝這個青年工人就被補戴上了 "右派" 帽子！

輝哥這次的上當可稱 "不大不小"，對他年輕氣盛、鋒芒畢露、嫉惡如仇的品格，給了當頭棒喝。他從此被調出廠技術部門，戴右派帽子在車間裏勞動。親身經歷時代的不公，看透了世態炎涼，飽嘗了人情冷暖。但在逆境中他加倍堅強，刻苦學習，探索與品嘗了人類思想光輝的智慧果。開始追隨胡適思想，獨立思考、不盲從、不迷信、大膽懷疑，小心求證。又向中國古代傳統的孔孟儒家文化探索、研究，一連研讀了先秦諸子百家書籍，通讀司馬遷的《史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曾國藩的《曾文正公家書》……同時他又向外國思想家求索，從古希臘的哲理，到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宣傳人文主義的世界名著，以及法國、英國、美國、俄羅斯的著名作家的經典著作，他捧讀再三……沉浸在中外古今知識文化的海洋裏，鑽進了現代文明思想的智慧寶庫中。特別認同現代思想家胡適倡導的 "民主、自由、平等" 的學說，對毛澤東一貫強調的階級鬥爭理論，發生了懷疑。毛澤東早年就說："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但從解放初的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批胡適、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反胡風、直至 57 年反右派，這樣一路鬥，一路反下去，毛也許 "其樂無窮"，卻搞得廣大百姓尤其

是知識份子人心惶惶，寢食不安。象這樣，新中國能建設好嗎？

被冤枉戴上 "右派" 帽子的輝哥，對家庭對我們兄弟姐妹一如既往地關心備至，體貼幫助不斷。

上海滬東造船廠在浙江舟山嵎泗島幫助開設修船基地，建設嵎泗機械廠時，他主動辭去上海工作，調往嵎泗廠。他希望你過更清貧、清靜的生活，換來充裕時間，可以更自由支配，更利於刻苦學習。舟山當時是個窮地區，嵎泗更是個小島，工人們大多缺乏文化知識，生活單調，業餘時間不是酗酒就是賭博，惟獨輝哥挑燈夜讀。為了專心安靜自學，他搬出工廠集體宿舍，在附近漁民家租房居住。

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出了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的戰鬥動員令。這是 1962 年，神州大地經歷了 "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農村人民公社化）的折騰。毛把經濟建設上的失誤，歸結於忽視了 "階級鬥爭"。於是，登高一呼，全黨無不應，狠抓 "階級鬥爭"，處處呼風喚雨，從社會、機關、企業、學校波及千家萬戶。

我們劉家，可稱為階級鬥爭的 "重災區"。老父親是 "歷史反革命"，三兒子劉文輝是右派分子。1963 年寒假中，輝哥叫我到無錫家鄉大哥處體驗生活。我在那裏看到，大哥家住房依然破舊簡陋。晚上大嫂與三個侄女睡在一間七、八平方米的破舍裏，我與侄子睡在柴房草堆上，大哥一個人卻去一處荒無人煙的半島上看夜，以掙得幾個工分的口糧。白天，14 歲的大侄女帶著三個幼小弟弟，去鐵路邊撿煤渣，去荒地挖野菜。大哥曾不斷上訴無錫縣委，申請困難補助。來人一看他家確是當地村裏最一貧如洗的特困戶。但說，劉文德檔案袋裏塞著 "特嫌" 的結論，是 "內控改造" 分子，不屬於下鄉務農人員的政策補助對象。我就所見所聞寫了一份《無錫農村南劉巷農民窮困生活考察報告》，如實反映貧困、饑餓、潦倒的當地農民生活境況，不少人暗中詛罵 "人民公社"、"大躍進"，甚至罵共產黨。不知怎麼讓二哥知道了，他把我叫到蘇州，嚴肅批評了一頓。並說我 "小小年紀，中輝哥毒太深"，警告我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毀了自己。輝哥知道了，趁返滬探親期間帶我一起回老家看望大哥，與大哥共榻徹夜傾談，鼓勵大哥設法開墾荒地，生產自救，不要對上面政策存有什麼幻想。看著像豬圈一樣

的農舍，侄子侄女們吃的是山芋、南瓜、野菜燒的稀粥，我們兄弟都掉了淚。回上海時，三哥把自己身上穿的厚厚的工作棉大衣脫下留給了大哥，寒冬穿著單薄夾衫趕回上海。

春節期間，二哥也返滬探親，同三哥一見面，就提起了我寫的這份"報告"。那天午飯後，二哥、三哥與我一起，相敘在家中內室裏。各人泡好一杯茶，把房門關上，鄭重其事地討論起來。二哥說我不該單憑個別事例，偏聽偏信，把新中國已經人民公社化了的現代農村，一團抹黑，把農民生活說得窮愁潦倒。這是否定了國家大好形勢，是個嚴肅的政治立場問題。三哥說小弟到無錫老家文德大哥處親眼目睹缺衣少糧、艱苦貧困的實際情況，又看到農村中許多農民生活，大家都在生死邊緣上掙扎。小弟是如實反映，不是人爲抹黑。不能昧著良心大喊'形勢一片大好'。二哥說現在社會上有些人借著自然災害發生的困難，全盤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優越性，倡狂向黨反攻倒算。你卻指使小弟去暴露農村的陰暗面，正是迎合了這股反動思潮向黨進攻。這是又犯了政治立場錯誤。一切服從黨的領導，跟黨走，做黨的馴服工具，這不僅是每個共產黨員的天職，也是每個革命青年應有的品質。

"跟黨走，聽毛澤東的話，父親不是這樣嗎？他不當漢奸，不去台灣，送你去參軍，支持你去抗美援朝，結果呢？還不是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大哥不去台灣，回應黨的號召，支持邊區建設，做好抗美援朝後方給養工作，去安東鴨綠江邊，結果呢？還不是受迫害，打成了'內控分子'？再說，你是黨的基層幹部，明知毛澤東設'陽謀'，要陷害廣大知識份子，號召給黨整風是'引蛇出洞'，你爲什麼不提醒自己兄弟我一聲，眼看到我成了'出洞之蛇'！難道你當了黨的馴服工具，站穩了階級立場，連兄弟手足之情，父子養育之恩都忘了嗎？你是盲目地跟黨走，盲目地聽毛澤東話，全是愚昧、盲從、奴隸相！"

"哐啷"一聲。二哥氣得把手捧的茶杯重重地向桌子上一放。嚇得我目瞪口呆，連連打圓場地插嘴道："二哥、三哥，不要吵了，都是我那份調查報告惹的禍。其實這只是一篇習作，練練筆，實在沒有像二哥說的那樣嚴重。"

"小弟"，二哥轉向我："你還年輕，千萬別學你三哥的樣子，毀了自己前途！"

"我……我……"我吞吞吐吐地想辯白。看看二哥鐵板的臉，又看看三哥氣得通紅的雙眼，說"我至今不覺得三哥有什麼錯……"什麼？你還不清楚？他的立場十分危險，照他這樣發展下去，勢必會走向自取毀滅的道路！"

"嘖！嘖！"三哥連拍了兩下桌子，"我不會做馴服工具。我是個堂堂正正的人，我相信事實，相信真話，相信獨立思考！不相信任何人的謊話，也不考慮個人的前途，更不貪生怕死！"說完，狠力地拉開房門，沖出去了。

二人鬧得不歡而散，我心頭忐忑不安。在以後的春節兄弟姐妹見面時，二哥三哥同樣發生了類似的爭論，倆人一談起時事形勢，就會吵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

二哥是黨和解放軍部隊裏多年培養出來的幹部，他不理解輝哥歷經冤屈的切身感受，不認同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認識，更不允許激烈的反抗精神，所以長期對毛的極左路線執迷不悟，赤膽愚忠，甘願做一個馴服工具。但後來經歷了十年"文革"浩劫，他的認識也起了變化。我們敬愛的輝哥慘遭文革暴政殺害。在徹底平反昭雪後，全家人到輝哥墳上燒香磕頭，沉痛悼念這位忠烈獻身的義士，劉家的殊榮。年近花甲的二哥也終於反省過去的愚忠，顫抖地拿著毛筆，飽蘸紅色顏料，修復輝哥墓碑上的遺詩，默默肅敬，被這位光明磊落、坦蕩一生的大兄弟所折服。這是後話。

### 三、

一九六六年春末的一天上午，我匆匆忙忙趕到上海十六鋪碼頭出口處。心頭沉甸甸的：前幾天突然接到輝哥從舟山嵎泗廠寄來的一封信，信上簡單幾句話："我已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遣送回上海老家監督管制，定於某日某班船抵十六鋪碼頭，望來接我。"

這猶如晴天霹靂，頓使我們全家惶恐不安，猜想怎麼好好地已摘了右派帽子，又戴上了反革命帽子，而且要遣返老家管制？上面的幾位哥哥都已出外工作，離開上海，幾位姐姐都已出嫁，父母年老，惟獨由我按時到碼頭迎接。中午時分，我翹首瞻望，左等右等，約莫在全船乘客全部出來後，看見輝哥手提一隻大包和行李箱，由一個解放軍陪著，身邊還有二個

工人似的，向出口處走來。我趕忙迎上前去，在出口處拾過輝哥手裏的包裹，正要招呼講話，那個解放軍問道："你是劉文輝的什麼人？"我答"弟弟"。"你們父母為什麼不來？" "年紀老了，走不動了。" "那麼好，現把劉文輝交給你。他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遣送回老家監督管制。有關他的政審材料，我們已給上海公安局、街道里弄寄去了。"這時，默立在一旁的輝哥才介紹說，他是廠裏的軍代表，二位是廠裏的支部書記與保衛科長。他們"交接"完畢，一起離去。我跟著輝哥，提著他的行李包裹，急忙乘公共汽車回村。地區街道派出所已派民警在我家等候。輝哥與我踏進家門，民警馬上嚴肅地對我父親與輝哥宣佈，"從今開始，劉宗漢與三兒子劉文輝，一起被監督勞動，掃垃圾、掏陰溝……，定期向里弄專政隊彙報思想，接受管制改造。"

輝哥回到家中，我們才知道他又出事的經過。由於嵎泗位於舟山群島之中，特殊的沿海地理位置，使他能長年收聽到海外一些電台的廣播、特別是美國之音。當時大陸全部封閉，最高當局推行愚民、壓制、混淆視聽的階級鬥爭政策，中國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外面情況。而輝哥瞭解和看清世界與中國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他長時期博覽群書，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反對"專制、獨裁、暴虐"；厭惡對人民推行愚民封鎖政策。他勇於奮鬥，要改變他的右派困境，所以想出國去尋找新的生活和世界。為此，他攻讀英語，學習研究西方政治、經濟、歷史、文學等書籍，在嵎泗常獨自一人出海游泳，增強體魄。船廠許多人佩服他的才學和人品。他結識了少數幾位志同道合的船廠工人、船員、船老大和來實習的大學生。他們曾商議偷偷潛上漁船或客輪駛出公海尋求政治避難。後來在64年"四清"運動中被膽怯者出賣。出事後輝哥一人把主要責任承擔下來。當時搞的"四清"運動政策規定，坦白者"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三哥坦白後，因為只屬企圖，沒有行動，原望"從寬"處理。但1965年底"四清"工作組卻報當地法院立案。嵎泗縣人民法院經審理宣判："劉文輝系一世仇分子，思想本質極端反動"，"組織叛國投敵集團，妄圖投靠美帝，背叛祖國"，"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判處管制三年，交群眾監督改造。"輝哥沒能實現自己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卻帶來災難的厄運。

我村本來是一個"歷史反革命"劉宗漢掃垃圾、掏陰溝，現今開始，增加了一個剛交三十歲的新生反革命，父子倆人每天一早同去監督勞動，同去接受派出所與里弄幹部的訓話，同時遭受鄰居與過路群眾的嘲笑、白眼、奚落。派出所民警與里弄專政人員，隨時隨地將父子倆拉到里委會，叫來幾個年輕力壯的里弄小夥子對他倆批鬥，動輒揪摑年已七旬的老父的頭，對新管制分子劉文輝敲頭踢腳，任意凌辱人格。

我自中學畢業後，因家庭出身是"反屬"，無法繼續升學，只得在家按輝哥給我制定的計畫勤奮自學。由於輝哥的長期影響和教誨，我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逐漸形成。1965年我進了一家200多人的小廠——徐匯五金廠。我被分配到新產品車間學自動車床，不久由於我"好學、聰明、人品忠厚"，受廠領導培養，抽調進廠辦公室，擔負全廠宣傳與統計工作。

"四清運動"開始，上面派人來廠蹲點搞"四清"。我被告知像我這樣出身的人，在廠部辦公室負責宣傳與統計工作是不合適的。我聽從輝哥囑咐，辭去廠部辦公室宣傳職務，要求仍下車間去當工人。

自從輝哥回家後，儘管白天接受監督勞動，夜晚卻指導我讀書，密切關注廣播與報上刊登的新聞報導，擔心國家時局日益惡化。階級鬥爭緊鑼密鼓，華夏神州一天比一天"黑雲壓城城欲摧"、"山雨欲來風滿樓"。

輝哥從拾回上海的幾大包裹的中外名著、報刊雜誌中，抽出一份1965年11月10日的"文匯報"，上面刊登著姚文元的大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他指著這篇文章說："這是毛澤東階級鬥爭的又一顆重磅炮彈。姚文元批判的《海瑞罷官》作者吳晗，當年是胡適在北大的學子，現今是北京市副市長，是個著名的明史專家。這樣名聞國內外的大學者可以公開點名批判，說明毛又要刮起階級鬥爭的暴風雨了。"

當時全國報刊上不斷展開對《海瑞罷官》、《海瑞罵皇帝》的批判圍剿，輝哥把收集到的有關報刊材料攤在我面前，借著昏黃的電燈光，一一指點給我看，他說："看來問題並不只是批判吳晗，而是直指整個北京市委。"又說："毛是借'罷官'一事做文章，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現在彭老總又要吃苦頭了……"說著搖頭歎息，憂心忡忡。報上還刊登林彪



委託江青召開的 "軍隊文藝座談會紀要"，竟然斷言 "十七年來文藝黑線專了政"。輝哥憤憤地說："怎可全盤否定建國十七年來文藝工作者的集體成績呢？不但否定，而且個個戴上了 '黑線專政' 的帽子，一棍子打死，看來要把中國知識份子一鍋端了！荒唐！荒唐！"

5 月 10 日，《解放日報》刊登了姚文元又一篇大文章《評 "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割記〉的反動本質》。據說，這是毛澤東指明要批判的。《北京日報》為此公佈了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的材料，對 "三家村" 進行批判，但很快被中央指責為 "假批判，真包庇"。姚文元在大文章中直接上綱上線："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割記》中，貫穿著一條同《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一脈相承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污蔑和攻擊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攻擊黨的總路線，全力支持被 '罷了官' 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翻案攻擊，支持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倡狂攻擊。" 文章中還公開宣稱：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不管是 '大師'，是 '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到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什麼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他們，踏倒他們。" 緊接著，全國報紙與廣播，就開始了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的瘋狂圍剿。

輝哥告訴我姚文元是早被魯迅先生諷刺、批評的姚蓬子的兒子，自己出身一塌糊塗，現今竟高舉棍子，硬是把人家往死裏打。又說，鄧拓原是人民日報總編輯，是從延安時代開始緊跟毛澤東的有才華的革命知識份子，現任北京市委文教書記，他寫的《燕山夜話》不僅文采好，而且含義深邃，是本好書，毛卻把他拋出來打倒，看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彭真他們也要遭殃了。果然，緊接著中共中央發佈了《五·一六通知》，在全國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被中央宣佈為 "獨立王國"，全體領導統統打倒。中共中央又宣佈以宣傳部長陸定一為首的中央宣傳部為 "閻王殿"，"砸爛閻王殿，小鬼鬧革命"。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歷史浩劫，狂瀾橫流，浸淫中華大地。輝哥一再喃喃自語："國家與民族的大災難來臨了。"

由批判《海瑞罷官》揭開序幕，批判《三家村》戰鼓轟鳴，《五·一六通知》號令天下，毛澤東親自指

揮的文化大革命狂瀾席捲長城內外，猛襲大江南北，震破天涯海角。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刊登、中央電台廣播了北大聶元梓等人向學校黨委書記陸平與北京市委彭真等人開炮的第一張大字報，並配發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國一夜之間，全國億萬民眾奮起回應，廣大造反派、紅衛兵小將結隊殺向社會，紛紛闖進民宅，揪鬥地、富、反、壞、右分子，打倒反動學術權威，大批大批的社會名流、聲望卓著的人士被紅衛兵押著戴著高帽子上街遊鬥，成千上萬人家被突然抄家，打、砸、搶、抓、抄，焚書烈火徹夜熊熊，坑儒手辣空前絕後。儘管老父親與輝哥天天低頭在里弄賣力地掃垃圾、掏陰溝，從早到晚不講一句話，三日兩頭去派出所、里弄專政隊彙報思想，違心責罵自己，但仍然逃不脫抄家批鬥的厄運。

66 年恐怖的紅八月，我家連續遭受幾個中學紅衛兵組織的抄家。他們是根據派出所提供的 "反革命人家" 地址名單，不分白天黑夜，隨時隨地高唱《造反有理》革命歌曲，跑步衝鋒般地打上門來。一闖進二樓 16 室我家門，他們七手八腳翻箱倒櫃，搜尋金銀財寶，認為凡是 "反革命" 家中，必然是過去的地主資本家，沒有哪個不私藏著金銀財寶的。不料我家長年累月吃飯都成問題，原先母親的陪嫁首飾已變賣得所剩無幾。他們搜尋不到就抽出皮帶，兜頭攬腦地抽打我父親，老人急忙踉蹌後退，輝哥挺身上去阻擋。這時，在底樓 4 室內抄家的紅衛兵小將們大聲歡呼 "抄到了！抄到了！" 樓上這批小將蜂擁下去觀看。那是我母親三十多年前陪嫁品中僅留的幾隻手鐲、翡翠、玉片。他們獲得至寶，紛紛你搶我奪，一塊較大的純碧好玉被打碎在地，有些小將還從地上搶奪碎片。另幾個紅衛兵從我母親箱櫥裏抄到珍藏半個多世紀的幾幅國畫，那是我外太公，清末江南著名大畫家胡公壽的親筆丹青。中學生們不知它為何物，幾個人有趣的傳觀，有一個大喊："封資修四舊，還看什麼！" 搶上前一把奪過，雙手把它扯撕得粉粉碎，還把團團碎紙擲出窗外，邊跳邊高叫 "大破四舊，徹底砸爛舊世界！" 旁邊紅衛兵們一起跟著呼喊："砸爛舊世界，建設紅彤彤的新世界！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先前闖進我 16 室的紅衛兵小將們，見在底樓 4 室撈不到油水，沒有戰績，趕緊又奔上二樓，到我室內殺回馬槍。他們根據在派出所獲得的情報，我父親曾在解放前當過國民黨專員，是個反動大官，硬逼著我父親交代罪證。老人被嚇得抖抖索索，連說 "我……我是個臨時專員，沒……沒有做過什麼壞事……" 他們絕不相信，訓斥他 "狡賴"、"頑固不化，死路一條"，沖上前去又抽皮帶打他。這時，一個細心搜查的小將，從一本舊書中抖出幾張發黃的照片，欣喜地大喊 "抄到了，抄到了！" 他們一起哄著觀看，原來是我父親當年戴著大禮帽，穿著筆挺的西裝，在同聯合國救濟總署派來的外國軍官握手，背後是巨大的萬噸輪船。有幾張照片上還有國民黨軍官與美軍人員，在秦皇島碼頭督運貨物。其中有一張是父親和陳納德將軍在機場交貨後的合影。紅衛兵小將一見戰果輝煌，指著照片，又點戳我父親的臉面，大聲喝問："你這個老反革命，還不老實交代，你自己看看，當年你這個國民黨大官僚耀武揚威的反革命樣子！你老實說，這在哪里？幹了什麼反革命勾當？"

面對小將們吼叫亂罵，老父親定了定神，認真地回答："這是我代表當時政府與人民，去接受蘇聯和美國在抗戰勝利以後，通過聯合國發給中國的戰後慈善救濟物資……"

"老反革命還在騙人，當時政府是蔣介石反動政府，怎代表人民？你還在放毒"，未待老人說完，一個年紀大些的中學生搶上打斷說，"蘇聯是蘇修，美國是美帝，它們怎會發善心向中國撥救濟物資呢？……" 這群不懂歷史背景的孩子們，自以為是，反復批鬥我老父親。

"喏，這張照片，" 老人大概因對往事的驕傲使他頓時勇氣倍增，伸手過去揀出張照片說道："這是在秦皇島碼頭，我指揮工人把國際救援物資搬運去解放區，旁邊站立的有伍修權領導同志" 又說："那張照片上的美國人是抗戰英雄、飛虎將軍陳納德……" 有個年紀大些，估計是高中生，從父親手上奪過照片，端詳起來，正要駁斥老人 "狡辯"，突然旁邊那個細心搜抄者，又從另一本書中抖出一張大照片，頓時大叫："不得了，這個老反革命還拿槍！" 他們聚過去一看，原來是老人當年做京劇票友時，化裝演出國民革命軍與北洋軍閥作戰的劇照。這下子，紅衛兵小將 "掃四舊" 革

命行動戰果累累，戰鬥士氣大振，幾個紅衛兵一起揪著老人，勒令他低頭認罪。父親膽小怕事，唯唯諾諾，任憑他們摠頭，將七十歲的老人硬揪他彎腰 90 度雙肩背翻。父親大呼 "痛啊！痛啊！" 血氣方剛的輝哥一個箭步上去扶持父親，大喊 "你們講點人道主義，我父親是古稀老人了，你們怎可……" 話未說完，一個紅衛兵揮舞皮帶朝輝哥身上猛抽一下。輝哥急忙轉身去奪他皮帶，混亂一片，父親老淚縱橫，嘶啞地叫喊 "作孽啊，作孽！"

大概是老人慘烈的嘶叫震顫了青年人的幼稚良心，大家頓時罷手不語，室內寂靜下來。那幾個細心搜查的紅衛兵，把輝哥堆放在床底下紙箱裏的中外名著，一本本抄翻出來，翻一本撕一本，揀他們認為好看的，一本本扔進一隻大紙箱內準備帶走。輝哥一生節儉，卻愛書如命，十多年來收集購買了不少心愛的書刊，並勤奮閱讀，在許多書中留下他的批註心得。紅衛兵們抄搶他的書，等於搶劫他的寶貝；輝哥急忙上前向他們解釋：你們撕的這些都是中外名著、進步書籍，有費爾巴哈、黑格爾、聖西門、傅立葉、歐文、考茨基、柯卡普、普列漢諾夫……都是馬列主義，毛澤東的啓蒙老師。紅衛兵哪聽他的解釋，依然照搶、照撕不誤。輝哥真想從他們手中把書奪下來，阻止他們濫撕惡行。這下又得罪了這批小霸王，他們根本不懂這些書正是馬恩列斯毛的老祖宗，顯然懵懂無知，四五個沖上來對輝哥拳打腳踢，皮帶亂舞，並要用繩子將輝哥捆綁起來。邊罵 "媽的，這傢伙多反動，家裏藏了這麼多 '封資修' 書籍，不是外國、就是孔孟的書，沒有一本是革命書籍，全部把它燒掉，看他還怎麼看。"

我從工廠下班，回家遲了，進門看到，馬上過去拉開怒火抗爭的輝哥。這時，一個小傢伙至多 16 歲模樣，竟揮舞帶銅頭的軍用皮帶敲我父親頭，我沖上去大喝道："不准打人！你們不要欺人太甚！七十多歲老人經不住這般打，你的爺爺奶奶可以這般打嗎？" 這夥人見我理直氣壯，雖然腿腳殘疾，但腰粗背闊，渾身有力，知道來者不善，頓時被嚇住收回皮帶。其中有個中學生是里弄附近的，認識我，兇狠地指著我鼻子訓斥："狗崽子，你家一個老反革命、一個中反革命，你是小反革命子弟，你識相點，否則連你一起揍！"

輝哥怕我牽連吃虧，急忙叫我出去。我剛走出門，帶隊的造反派攔著我，喝令"不許出去，想轉移窩藏材料嗎？"並上來把我的口袋一一翻遍。他又叫紅衛兵"繼續搜查，注意死角"。於是我家裏又是一陣乒乒乓乓打砸聲，所有抽屜都翻過了，所有箱櫃都打開了。家裏凡是值點錢的東西都被抄拿去了，一個紅衛兵頭頭走出門，不甘心又返回我家，強行搶走了家中唯一值錢的一台收音機。我上前攔著他說："收音機不是四舊，為什麼要拿走？"。這小強盜蠻橫地瞪著眼說："有人反映劉文輝深夜收聽'美國之音'，我們要沒收，拿回去檢查，如有問題，回來總算帳，當心你們狗命。"說完抱起收音機揚長而去。可以說，從物質到精神，都被一夥又一夥強盜搶劫一空。抄家是一波一波的，聽說各學校的紅衛兵組織都去派出所所要四類份子的名單，而各單位的造反派也有單位的組織部提供名單，先是公開的黑六類份子，後是暗藏的階級敵人。因為有偉大領袖的政策指示，他們憑著手臂上的"紅衛兵"、"造反派"袖章，並以"人民"和"革命"的名義抄搶民舍，法律和秩序蕩然無存，人民的基本權利被肆意殘踏。當時，上海經常能聽到某某單位同事隔離審查了，某某領導靠邊進了牛棚，某個同學爸爸被批鬥，某某熟人自殺了，某某親戚家被抄了，人們生活在恐懼之中。一些所謂出身不好的黑六類分子，每天上班出門都提心吊膽，要跟家人沉重告別，唯恐今晚回不了家，突然失去了自由，被抓、被關、被隔離。那年代誰都沒有了保障，平時的積怨、妒忌，同事鄰居之間的不和，背後暗箭和誣告，都可以造成任何一個人的被鬥爭、被抄家，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時期。

社會上的抄家、批鬥陰風，像傳染病那樣迅速蔓延、猛烈發展。我家這樣的重點被反復抄、多次搶。

難以忘懷的紅八月！這一月全國有多少人家被抄、被鬥？十萬戶？一百萬戶？一千萬戶？也許更多。是最偉大的領袖授權紅衛兵和造反派，來抄家來批鬥的，這是世界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事，是最偉大的領袖做出來的最偉大的事？

文革像火山爆發噴起沖天的烈焰，它吞噬著大地、吞噬著生靈、吞噬著一切。有一天我拿回家一迭宣傳材料中，有一份北京來的紅衛兵戰報，上面報導了北京近郊大光縣三百多名四類分子被殺害，最大的

八十歲，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人家被殺絕。這份戰報上還印了當時文革紅人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公安局一次會議上的講話："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國家還是公安機關，不要受約束，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這些講話促使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殘害四類分子的種種暴行，波及面之廣，是歷史上罕見的。輝哥讀了這份簡報，憤恨地指著家裏牆上掛貼的毛澤東像說："文革是通過群眾專政即暴民專政來達到群體絕滅的目的，使中國無數死難者註定要做無主的冤魂。將來總有一天，歷史和人民會向這個禍國殃民的暴君清算這一筆筆血淚賬的。否則天理不容。"

中國大亂了，上海更大亂了，世界聞名的大都市上海，頃刻變成了一個腥風血雨的大海洋。原來整潔的南京路十里長街，成了大批大批紅衛兵、造反派作惡橫行的恐怖之路。許多紅衛兵手裏拿著剪刀，隨時隨地搶上去剪過路小姑娘的長辮子，剪過路人的所謂"小褲腳管"，燙髮婦女更被殘暴地剪得幾乎成了光頭尼姑……十里長街頓時成了處處慌亂、處處痛哭的難民路，不少不法之徒、流氓阿飛趁亂調戲凌辱婦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下剝光婦女的上衣……。這裏已沒有了真理，沒有了正義，沒有了憐憫與同情。有的是獸性大發作，人性遭毀滅性的殘暴虐殺。就在這個混亂世界上，不斷傳來北京紅司令、紅太陽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紅衛兵小將們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他的親密戰友，紅副司令林副主席煽動道："紅衛兵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的殘渣餘孽——你們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取得的光輝的成果，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全國所有的學生都不讀書了，領袖要他們起來革命，利用他們"造資產階級的反"。歷史上哪個國家會如此荒唐？可是這樣的事在中國，在和平時代竟然發生了。全國的學生都在遊蕩，批鬥自己的老師，爲了這個"文化大革命"，整整一代的中國青年都被剝奪了學習的機會。爲一個目標，緊跟領袖打倒所謂"中國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

天天報上刊登、廣播宣佈、一批又一批黨內走資派，不管他資格多老、地位多高，紛紛被打倒，廣大

的知識精英被殘酷批鬥、凌辱人格，上海文化廣場上，三天兩頭召開萬人大會，批鬥一批又一批反動學術權威，在會場上把批鬥對象——年老的白髮教授學者們打倒在地，再踏上幾隻腳……世界東方的大上海，到處打砸搶，到處大字報，到處批鬥會，到處是下跪和做“噴氣式”，到處出現虐待狂。人們開始變得只有愚昧自私和野心勃勃，在毛澤東教導下紅衛兵造反派的“革命性”代替了人性，他們決心不把這些知識份子老師、黨內走資派、四類分子折磨死，絕不甘休。憲法猶如一張“草紙”，國家什麼工作都可以放下、癱瘓。惟獨“革人命”的專政機器卻在無情地瘋狂運轉。批鬥、戴帽、關押、勞改、打死、槍殺……。從中央到地方各省市，一批又一批所謂“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紛紛“落馬”，罷官，挨批鬥；一批又一批所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出示眾，關進牛棚，投入監牢。人們只有在高壓的暴政下苟延殘生。

在這昏天黑地的日子裏，輝哥幾乎每天夜都在家徒四壁的昏黃燈光下，默默奮筆疾書，時不時會對我憂心忡忡低聲說：“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將給毛澤東徹底搞砸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其間，8月5日，毛澤東親自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欽定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是寫得何等好啊”！嚴厲指斥“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領導人”（指劉少奇、鄧小平及各省市領導）“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實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8月8日，全會通過了毛澤東親自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來的7人擴大為11人，林彪位列第二，成了毛澤東接班人。劉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會議並沒有重設中央副主席，但會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原副主席職務和鄧小平總書記職務都不再提起。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而實際上，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鄧小平都被排擠出中央領導崗位，成了所謂“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首號、二號人物，遭受批鬥。會議公報天下，廣大造反派、紅衛兵小將們鑼鼓喧天，萬眾歡騰，熱

烈盛大地慶祝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歷史性勝利。而輝哥卻一連幾夜輾轉反側，睡不著覺。我看見他，神情變化異常。有幾個深夜，我已睡了一大覺醒來，見他竟還呆呆地端坐在書桌邊，不知在沉思玄想些什麼。

當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公佈後，輝哥就聯繫《海瑞罷官》《三家村》一起，對我分析說：北京大學向來是中國政治運動的是非之地。吳晗是胡適門下弟子，胡適的思想在北大師生中影響根深蒂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在北大，中國現代一批最傑出的思想家誕生在北大。可以說，那裏是培養中國知識份子獨立思考的搖籃。毛澤東批吳晗他們、支持聶元梓等人大字報，就是首先向北大開刀，向全國知識份子的核心堡壘開刀。輝哥還憤慨萬分地對我說，毛澤東從對知識份子下毒手開始，向黨內棟樑骨幹開刀，現今要向一起打江山的老戰友、大功臣、身邊的同事開刀了。剛剛開過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毛澤東在黨中央“清理隊伍”，是對劉少奇、鄧小平——一個國家主席、一個共產黨總書記——的一場大規模的圍剿迫害運動。果然不久，北京許多高校聯合成立了“批劉火線指揮部”，國家主席劉少奇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公民權利，被十多萬紅衛兵團團圍困酷烈批鬥，遭受殘無人道的迫害，又對總書記鄧小平逼令“深刻檢討”。輝哥一再憤憤地感歎說：“這還像個什麼樣的國家？這還像個什麼樣的黨？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在默默地思索，他在深層次地考慮：在這文革禍水滾滾，狂瀾滔天，國家、民族與共產黨的生死危急關頭，他該如何抗爭。

八年多的“右派”災難與“現反”帽子，不僅沒有壓垮輝哥，反而使他磨練得一副錚錚鐵骨，在人間煉獄中煉出來一雙火眼金睛。他刻苦自學大學英語，與一些在交大、外語學院當老師的中學老同學交流、探索、辯論，朋友們都敬佩他超人的敏銳洞察力，那種擺脫禁錮的犀利智慧。自從戴上“現反”帽子被遣返上海老家後，除了白天受監督勞動，幾乎天天夜晚讀書思考不斷。“文革”全面開始後，儘管屢遭非人的批鬥、抄家、殘酷虐待，他思想的車輪卻依然在奔馳不息。他個人的行為被日夜監視，但敢於抗爭的輝哥不甘寂寞，常叫我從廠裏與社會上儘可能收集各種傳單、資料，帶回家給他閱讀、研究。我白天在單位裏

跟著大家一起高呼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參加大批判，抄寫大字報。下班即跑到各大學和文藝部門，幫輝哥到處收集各種運動資訊與材料。每當我帶回一大卷紅紅綠綠的紅衛兵小報、街頭散發的傳單，交到輝哥手上時，他總是如獲至寶。一個完全被管制監視的人，誰能料想到，他卻比任何人都要全身心認真地在投入這場轟轟烈烈的政治大運動。三哥認為毛澤東推行的"階級鬥爭"造成了一個崇尚仇恨、鬥爭的政黨和國家，它不能給人民帶來和平、幸福、和諧、平安。他認為中國人不應該在愚昧無知的社會中生活下去，要改變，要覺醒。如果一個民族發展到沒有人敢出來抗爭、揭露，那麼這個民族就沒有希望了。他認為總要有人出來，總要有人犧牲，他劉文輝就是應該帶頭出來抗爭的人。

說句真心話，輝哥當時的異常大膽、毫不自顧的冒險行動，常使我提心吊膽。他提出自己要出外去看街頭大字報。我自小對他言聽計從，但這件事卻使我頗感為難。他這樣的身份怎可拋頭露面出去呢？他設計，深夜十點鐘後，悄悄躲過鄰居的監視，叫我把自行車推到附近市民新村處，找個暗角落等他。第一次我試著這樣做，他輕手輕腳摸到市民新村約定的牆角邊，騎上我的自行車，轉眼消失在朦朧夜幕中。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中，一夜無法安眠。天濛濛亮，他溜回家中。輝哥親身去看到了大字報的海洋，從中看出毛澤東身邊一群寵、奸、親信們如何手段卑鄙、伎倆橫惡，踐踏真理，大放謬論。有一次，在復旦大學，有不少大字報在受北京譚力夫鼓吹的"血統論"影響下，大肆宣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輝哥在半夜看到無人，就在大字報空白處，用粗體鋼筆字寫上："這對聯不是真理，絕對錯誤。人所受的影響主要來自社會而不是家庭出身。一個人所受影響好壞，從實踐中產生。不懂得人的思想是從實踐中產生這道理，實際上違反馬列主義原則。舉一例子，中央文革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均出身不好，也會有反動血統，借這位譚兄的謬論，他們有什麼資格領導文革？他們也應屬被打倒之列。"輝哥回家得意地告訴了我。我既擔心又好奇，第二天也去觀看。聽大學生都在傳說，不知是誰，竟敢指桑罵槐，既批評了譚力夫的謬論，又點了中央文革各位領導的名，戳穿了他們的老底，厲害，厲害……"輝

哥一直在深思，並躍躍欲試，當時社會上，特別是大學的大字報完全處在無政府失控狀況。他打算借大學校園各派組織混亂局面，尋找機會揭露文革這場陰謀。

白天，輝哥照樣在里弄與老父親一起掃垃圾、掏陰溝，晚上，他照樣一連幾個通宵地去大學院校串聯，沒有合過眼。雙眼熬得通紅。誰都不知道，他恰恰在對著文革的腥風血雨衝鋒陷陣，他早已把個人的安危、自身的勞累、命運的生死置之度外了。有一天夜裏他在一所大學校裏，看到傳抄的一個右派分子的恐嚇信，內容揭露五七年反右鬥爭是對知識份子的迫害，而這次文革是場更大的迫害。作為反面教材，這封信被全文張貼出來，在大學生中引起了軒然大波，這從另一角度啓發了他。他說，也想寫一篇巨型的大文章，全面揭露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禍國殃民的大陰謀，借各派混亂之手，以反面教材寫成大字報貼出來，使它震撼中國大地。他還說，現今真的需要有人像普魯米修斯那樣，在這文革黑暗年代裏，點燃一把熊熊烈火，照亮中華大地，使人民覺醒，擦亮眼睛，辨別真偽，讓億萬民眾團結起來，阻止狂瀾，遏制逆行逆施的毛澤東及其禍國殃民的路線。輝哥告訴我，他已經寫成了兩本小冊子，一本名為《冒牌的階級鬥爭與實踐破產論》，另一本是《通觀五七年來的各項運動》。他心中還在策劃，想著手創辦一份《人人報》，開闢"層層駁"專欄，通過大字報的形式抄寫貼到大學校園中去……不料過了幾天，又一批紅衛兵闖進我家，將已抄多次的家中，再一次作地毯式抄查，竟將輝哥寫好的、分散暗藏在殘書堆中的那兩本小冊子手稿全抄去了！幸好那些初中生幾乎似文盲，看不懂什麼，據說他們把輝哥所有寫的東西，亂七八糟揉成紙包包，不知扔進哪個垃圾箱去了。雖然不見專政機關來追查政治問題，但輝哥心裏默默傷痛了許多天，因為他歷時兩個月的戰鬥成果被一場無妄之災銷毀了！

敢作敢為、不屈不撓、誓死抗爭的性格，使輝哥心裏燃起了更猛烈的鬥爭怒火。到了9月28日深夜，也許他已深思熟慮了，猶如黃繼光孤身撲上敵人碉堡的機槍洞口那般，斷然地攤開了中共中央"十六條"公報，叫我去門外放哨、望風，以防有人突然撞進家來壞了大事。他伏案奮筆疾書了4個小時，寫成了《駁





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萬言書。第二天夜裏，輝哥要我與他一起復寫成十四封長信，每封信有十張信紙厚。我一邊抄寫，一邊心裏陣陣顫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彈，向著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向著禍國殃民的階級鬥爭謬論，猛烈開火……輝哥說，這是要殺頭的，但他早已不怕殺頭了。輝哥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寧願做當代的顧炎武、譚嗣同、中國的普魯米修斯！輝哥決定，要我趁國慶日休假，趕去杭州向全國北大、清華、復旦等 14 所最著名的大學投寄這 14 封匿名信。我有點猶豫為難，對輝哥說："中國是大家的，不是你一個人的，你一個人改變不了什麼，何必撞到當局者的槍口上呢！""人人都像爸爸這樣逆來忍受"，輝哥回瞥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親，輕聲而擔憂地說，"全讓毛澤東一人專制獨裁，為所欲為，中國遲早會退到封建舊社會去！"接著他果斷地激勵我："我們年輕人再不能繼承爸爸的軟弱可欺了，而要發揚母親的傲骨抗爭，學習歷代志士仁人 '挽狂瀾於既倒' 的大無畏精神。古今中外，反專制反獨裁，必然有人以身許國，拋頭顱、灑熱血，喚起苦難而軟弱的民眾奮起反抗，那末，今天就從我劉文輝開始吧！讓

我來當"反文革第一人"，讓我來拋頭顱灑鮮血吧！"說畢，他猛然站立起來，面對窗外漆黑色的夜空。在他銅像錚錚、視死如歸的身影邊，我也熱血沸騰，打消猶豫，臨危授命，欣然答應去杭州投寄。這也就是不久之後我也被投入牢獄的原因。

我還記得輝哥在《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中那觸目驚心的話語："反對毛的階級鬥爭理論"、"毛的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是窮兵黷武主義的新階段"、"文化大革命強姦民意，瘋狂迫害民眾，是全民大迫

害"，"民主主義者在抗暴鬥爭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他直言指出："當權者人人正裝，登天安門城樓掀起瘋狂的紅衛兵運動，高唱世界革命，控制報刊廣播，操縱全國輿論，對內暴行專政，鎮壓知識份子，焚書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猶過之。處人人唯唯諾諾不敢言，陷社會暗無天日，使神州大地百業俱廢，遍地饑餓，窮山僻鄉，白丁文盲。工人不幹活，農民不種田，學生不讀書，教書者牛棚勞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號。武鬥傷民，抄家捕人，殘無人道……"這絕不是一封意氣用事的匿名信，而是輝哥用鮮血眼淚凝鑄成的驚世檄文、醒世憤言，如黑夜中一顆飛馳的流星，光芒頓時照亮了世界；如黑暗中的一道強烈的閃電，猛地撕破了漆黑的混沌……。

我的輝哥就是這樣地拼死都要獨挽"文革"狂瀾，毫不顧顧惜自身命運地走向了他人生的不歸之路。



# 造反派論文革： 沒有文革史何來文革反思

劉國凱

**編者按：**本刊主編辛灝年先生曾致書本文作者劉國凱先生，坦承自己不贊成劉先生的“人民文革”理論，並以黑格爾的名言——“用別人的概念來標誌和證明自己的理論，極可能落入別人的陷阱”贈送劉先生，以為共勉。但是，劉先生認為“沒有文革史，何來文革反思”的立場是對的；反過來說，“沒有正確的文革反思，又何來真實的文革史”，則同樣正確，甚至更為正確。當然，根本的問題，還是“為何反思文革”與“反思文革什麼”？

## 一、「徹底批判」呼聲的意義及偏廢

文革四十週年已屆，文革反思之聲四起。何謂反思？就是事情過後回過頭去思考。分析事情為何發生；判斷事情的性質；研究事情的各種效果以及對今後有何借鑑等等。反思可以從整體著眼，如果事情的規模非常巨大，也可以就事情的某一部分、某一章節進行反思。當今，對文化大革命反思的主流話語實際上還停留於相當粗糙的層次。一場內容極為豐富龐雜的社會大波被官方極為簡單化地判定為「浩劫」、「動亂」。而這「浩劫」、「動亂」又簡單化地歸結為「皇權主導下的全民發瘋」。這個官方的「判定」和「歸結」得到所謂學術界以及民間大多數的認同。在此基礎上官方和學術界以及民間基本上都得出同樣的共識：文化大革命是百分之百的壞事物。中共建政以來搞過許多政治運動。對那麼多的政治運動，官方與民間的評判總是大相逕庭。唯獨對文革，官方與民間竟有如此的共識，這到也真是咄咄怪事。不過，官方和民間還是有齟齬之處，那就是民間要求對文革進

行更深入的批判，如巴金之要求建立「文革博物館」之類。但是官方卻要淡化處理、就此止步。官方的處理程式是，既要徹底否定文革，又要免談文革。這個齟齬的謎底何在？在於民間對文革作「徹底

批判」的目的是想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發動文革大禍的毛澤東，而官方儘管在高層內部對毛澤東發動文革微詞甚多，但卻絕不願在社會上公開批判毛。民間的「徹底批判」要求無疑有其重大的積極意義。因為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公開正面的批判一旦啟動，其深度、廣度將不會局限於這一點上，而勢必會導致對中共政治體制的重新評判。這有當年赫魯雪夫的批判史達林可作參照。它將導致共產黨政治制度面臨全面危機，這也就是官方為什麼拒絕「徹底批判」的原因。但是，民間的「徹底批判」呼聲儘管具有重大積極意義，卻也有其偏廢之處。文革固然給國家民族帶來一場大禍，可是在大禍之中有沒有閃光的東西？在這場大禍中民眾究竟都是毛澤東的奴才走狗，在助紂為虐，還是有些民眾在這場社會大波中借助種種契機去進行反抗，去爭取、維護自身的權益？文革大波有沒有造成共產黨神聖光環的暗淡？有沒有造成中國社會思想上的覺醒？而且「徹底批判」把矛盾鎖定在毛澤東身上是否全面？毛固然是罪魁禍首，但是文革中許多血腥事件是否都與他直接相關？如1967年3月的青海趙永夫大屠殺；1968年7月的廣西韋國清大屠殺。把「徹底批判」的矛頭只指向毛澤東，顯然將複雜的事情作了簡單化的處理，使許多慘案的直接主導者逃脫正義的審判。

## 二、沒有文革史何來文革反思

具有重大積極意義的「徹底批判」呼聲尚且有其偏廢之處，更遑論把文革大波一古腦判定為「全民發瘋」的謬誤觀點了。為什麼會產生這些偏廢、謬誤？

在於時至今日中國還沒有真正的文革史。對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進行反思都須有個前提，就是反思須以事實作根據。否則反思就成了憑空臆想、盲目推斷。對文革作整體反思須以全國文革史作依據，對文革中某些重大事件作反思亦須以該事件的記錄為依據。迄今為止中國文革史修編狀況如何？就官方而言，僅廣西修編了一部內部讀物《廣西文革大事記》。其他就是某些文士的個人行為。如王年一的《大動盪的年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簡史》。這些標榜為文革立史的書籍，其實史料片面、行文粗糙。基本上是按照中共高層的政治意圖對歷史作相應的切割。從這類書中，人們絕對看不到文革大波中民眾許多力圖掙脫，乃至已經掙脫官方羈絆的抗爭行動。一場內容極為豐富龐雜的文革大波，在他們的筆下就成了「清宮秘史」和「全民瘋狂」。另一部「文革十年史」，其作者是嚴家其先生。只是，此書走的亦是官方路線。（此書問世早在 1986 年。以嚴家其先生的民主理念，如果是近年問世，想會有大相逕庭的謀篇佈局。）除了這幾本以史為名的書之外，就是某些官方名人如吳德、汪東興、徐景賢等人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的真實性、可讀性須作別論，但有一樣可以斷定的是，這類回憶錄將更深地把人們對文革的觀感導入了「清宮秘史」的死胡同。然而，文革大波決非只涉及社會上層的宮廷陰謀、名人角力。如果說以史命名的著述和名人回憶錄對人們有「秘史導入」效應的話，那麼更多的文學作品就在製造哈哈鏡，對文革大波作了極端歪曲化的描繪。在這方面，正直的文革史學家宋永毅先生作過相當完整的統計。他指出自 1976 年 10 月到 1983 年「把『造反』作為一個罪惡的公共貶義詞的文章，共有 1229 篇之多！」當今流行於世、認為文革中的群眾運動系屬「全民發瘋」的觀點，以及造反派是林彪四人幫的走狗、是文革浩劫的製造者的觀點，在相當程度上是來源於這些文章的誤導。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這些文章並不都是官方直接手筆，有許多系來自獨立文人的筆下。甚至連我們尊敬的巴金老人都有所涉及。如果說在中國國內有中共官方有形無形的壓力和導向的話，那麼在海外應不致有曲意迎奉的動源，可為什麼在海外一些華文報章的文藝副刊上亦可常讀到這類文章呢？中共對海外華人報章固然作了相當的滲透，但那些文藝副刊當不屬中共「統戰」的主要目

標。合理的解釋是，由於那 1229 型的文章產生了強大的戈培爾效應，使很多人對文革大波的瞭解都來源於那 1229 型的哈哈鏡中的歪曲形像。可見，儘管四十年歲月的流逝，使人們本來可以定下神、靜下心來反思文革，但是由於中國目前文革史修編的極端滯後，使反思非但可能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甚至更可能使反思誤入歧途、墜入陷阱。文化大革命各地走勢、形勢相較，既有其個性也有其共性。應予明瞭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以省級為單位的。一省之類，文革的走勢、形勢基本相同。省與省之間則有所差異甚至大相逕庭。故此，修編文革史應首先修編各省的文革史。在此基礎上修編全國的文革史。只有在真正能如實記錄當時社會各個領域、層面、側面的文革史問世後，文革反思才能有堅實的基礎，不至被哈哈鏡導入胡思。

### 三、中共扼制文革史修編的原因

一段歷史的修編有賴於史料的收集。史料來源有兩個途徑，一是口頭相傳，二是當時的書面文字記錄。口頭相傳會有無意誤傳和有意誤傳，而且還有輾轉相傳的偏離效應。書面記錄亦會因當時記錄者的不同立場、不同觀點而至有所側重取舍乃至隱匿誇大。故此，修編文革史是一件極為艱巨細緻的工作。四十年的歲月逝去。許多當事人已經作古。當年二十歲的小青年也年屆花甲。口頭相傳的史料漸將稀薄。文化大革命在 1968 年夏季鎮壓中結束後，（筆者持三年文革論）又持續有 1969 年的「清理階級隊伍」、1970 年的「一打三反」、1971 年的「清查五一六」。在經年的政治清算和處決狂潮中，原來流落民間的文革書面文字資料大都在持有者的恐懼中銷毀、失散。中共當局當然掌握著一定數量的書面文字資料。但這些資料被共產黨視為國家機密，不准外泄。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正直的研究者想修編不落當局話語系統的獨立文革史，恐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1999 年，海外的文革史學家宋永毅為修編文革史曾專程回國收集文革資料，不料被中共逮捕。罪名是竊取國家機密。後幸得西方學界大力聲援救助，共產黨在將他羈押近一年之後不得不釋放。於此可見中共政權對真正文革史的修編懷有多麼大的戒心。戒心之生系因一部真正的文革

史對中共政權將發生摧毀性的作用。中共對文革的經典官方評判是「十年浩劫」、「十年動亂」。再由禦用文人，和某些心智昏亂的獨立文人把「浩劫」、「動亂」的罪責加諸到「造反派」民眾的身上。但這一切必須以中共的偽文革史為依據和基礎。一旦真正的文革史如實反映當時世事的文革史問世，情況將發生徹底變化。真正的文革史將會告訴人們，劉少奇、鄧小平這兩個至今仍裝成文革受害者的大人物，在1966年6、7月間怎樣翻臉無情地把許多共產黨省級大員打成修正主義分子以向毛澤東交賬；又怎樣心毒手狠地在大中學教師中、機關幹部中、大學生中、甚至工人群眾中大搞第二次反右，大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將會告訴人們，1967年早春各地軍方怎樣把大量民眾打成反革命份子，予以逮捕監禁。青海趙永夫怎樣喪心病狂、慘無人道地向手無寸鐵的女中學生開槍掃射。將會告訴人們1967年夏季的武鬥是哪些群眾組織挑起的，是怎樣加劇的。哪些群眾組織是濫施暴力者；哪些群眾組織是被動防衛者。將會告訴人們，湖南道縣、廣西賓陽一類大屠殺是怎樣發生的。屠殺者是誰；被屠殺者是誰。屠殺者為什麼要、為什麼敢去屠殺，被屠殺者為什麼被屠殺、為什麼不敢反抗屠殺。……真正的文革史還將告訴人們許許多多幾將被歷史塵埃所湮沒的故事。如湖南的張九龍、雷特超等人在1967年的文革高潮中怎樣密謀組織以推翻中共政治制度為目的的地下政治組織。廣州的曉兵怎樣單槍匹馬地在街頭絕食，為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被剝奪了居住、工作、生活權利的人們呼籲請命。最後他受盡折磨，犧牲在共產黨的監獄中。廣州幾千名學生、工人、機關幹部怎樣在烈士陵園廣場絕食，要求軍方釋放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群眾。這場持續幾天的鬥爭終於取得勝利。……於是，一部真正的文革史既揭露了共產黨的斑斑劣跡、猙獰面目，還記錄了民眾的反抗乃至許多可歌可泣的鬥爭事件——「人民文革」，這對當今民眾此起彼伏的維權鬥爭一定會起到借鑑和鼓舞作用。正由於如此，中共政權就絕對要扼制真正文革史的修編。

#### 四、中共的反思遠優於民間的反思

中共政權雖然扼制真正文革史的修編，但它卻不動聲色地在進行反思。它的反思與民間的反思取得了一個共識，就是再也不要搞文革了。中共控制著大量文革資料，自然也從中提取了許多思緒。而且，由於中共高官「站得高、看得遠」，他們從自身的和其他高官的文革經歷，深知文革對共產黨政權危害之大。他們從慘痛的經驗中得出結論：共產黨內部無論有什麼矛盾鬥爭，都必須黨內話黨內說，黨內矛盾黨內解決。絕不可象毛澤東那樣把黨內矛盾拿到社會上，去借用民眾的力量來解決黨內鬥爭，以至讓民眾中的膽大妄為、居心叵測、仇視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者逮到興風作浪的機會。民間的反思也表達為不要再搞文革了。民間出於對「破四舊」的反感；對「紅色恐怖運動」的憎恨；對群眾之間武鬥暴力行為的反對；對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的厭惡；對大人物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操縱、利用、拋棄、鎮壓民眾的深惡痛絕，如果文革分期定為十年的話，民間還有對「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迫害運動的極為恐怖的記憶，所有這些而至民眾提出再也不要搞文革了是很可理解的。但是，這一基於殘缺不全的史實所作出的反思也是片面的。因為它沒有看到文革大波其實有很不利共產黨政權的一面。民間的這種淺層次的反思實際上把文革看成一個不可分解的整體。不知道文革這個化合物可以分解成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兩個內容。而且官方文革還可以進一步分解為毛澤東的文革清洗和地方官僚、軍方的文革鎮壓。如果說文革絕對不要再搞，那應是指官方的那個文革。至於人民文革，歷史當然不可能簡單重演。存在於1966年秋冬到1968年夏的人民文革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再發生。但是，那種趁著共產黨內鬥而造成的歷史契機，利用共產黨內部矛盾所造成的縫隙，去撕裂共產黨的政治結構；去打擊共產黨的統治秩序；去維護爭取民眾應有權益的鬥爭精神和鬥爭策略，是應予以去借鑑和繼承的。從這點意義上來說，人民文革應該再搞。兩相比較可以發現，當今中共官方對文革的反思遠優於民間對文革的反思。中共官方反思到了點子上。而民間的反思是跛腳的。共產黨在大罵文革時，它心裡面實際上是在罵人民的那個文革。而官方文革鎮壓民眾的那一套它還在實行。拼命叫嚷要「徹底否定文革」的鄧小平不是在1989年搞了比當年青海



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更大規模的大屠殺嗎？同樣聲稱「絕不再搞文革」的當今中共領導人不是又在訕尾開槍殺人嗎？毫無疑問，中共政權在「絕對不要再搞文革」的表面宣稱下，實際上仍在使用官方文革的手段。它「絕對不要再搞文革」的真實目的是通過這一宣稱來從思想上繳民眾的械，震懾民眾不可使用文革時期民眾使用的抗爭手段。反觀民間的反思，竟也附和著中共的調子，高叫絕對不要再搞文革。可是官方才不聽你那一套，它照搞它官方文革那一套無誤。而民間則在這個高叫中自動解除了思想上的武裝，不去研究借鑑人民文革那種借助各種歷史契機去衝擊共產黨政權，爭取維護民眾的權益的鬥爭策略。

### 五·「人民文革」論的構建以史為據

在文革四十週年即將來到之際，我完善了「人民文革」之說。此文在《北京之春》06年元月號上發表後，立即掀起軒然大波。有人極表贊同和支持，也有人情緒極為激動，迫不急待地來進行反駁。坦率地說，對此我胸有成竹。因為我的反思是建築在真正文革史的基礎上。那就是我1971年秘密撰寫的《文化革命簡析》；1996撰寫的《廣州紅旗派的興亡》；2005年撰寫的《基層文革泥濘路》。這三部共四十六萬字的著述雖遠不足為文革立史，但其記述的許多史實用以支撐起「人民文革」說力度尚屬從容。本來，對歷史問題進行研討；對觀點進行商榷是有積極意義的事情。可是，細讀近期的一些反駁文章，不難發現它們都不是在作嚴肅鄭重的討論，而是在發洩一種情緒。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不屑於以史實為據而輕率地妄下結論。除了下筆之心氣浮躁、思緒混亂；行文之不著邊際、雜亂無章外，文章的作者們大都是自話自說，並不能對「人民文革」作出針對性評判。稍微能談得上是觀點的，如「反官僚不反體制毫無意義」論、「專制統治者與人民合一」論、「專制政權下反迫害無正義」論等等其實都不堪一駁。在較正常的駁論不能達其目的後，文章作者常求助於胡攪蠻纏的詭辯。如筆者明明在鞭笞伐撻官方文革，肯定人民文革，而那些文章的作者們在羅列官方文革的種種劣跡後，再突然氣勢洶洶地轉過頭來責問筆者，這樣的文革你還要再搞一次嗎？鑑此，筆者更加深悟

「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一語是何等的言簡意賅。對堅持偏見者已沒有必要與之再作理論。共產黨的名言是「相信群眾、相信黨」，這無疑是半虛偽、半含玄機的政治套話。而筆者則說：相信人類歷史、相信社會正義。筆者七十萬字的文化史論，白紙黑字、存留人間。一切留予歷史和社會去評說。

### 六·歷史之錘在敲打撰史者的良知

翻閱幾本所謂的文革史著，不覺感慨萬千。這些號稱數十萬字的著述竟然連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平的第二次反右，和1967年2、3月遍及全國的鎮反運動都不予提及。這是偶爾的疏忽嗎？當然不是！真實緣由是什麼呢？是鄧小平及鎮反運動的實行者、或他們的繼承人都位高權重。而且這位高權重的人們正在給作史者以優渥的待遇。由此筆者不禁想起一個史學界裡眾所周知的歷史小故事。西元前548年齊國國君與大臣崔杼之妻私通。崔杼憤而殺之，並另立國君。齊國史官伯據實記錄：某年某月某日崔杼弑君。崔杼見文怒而殺之。伯之弟仲繼書「崔杼弑君」。崔杼再殺之。其弟季繼而再寫。有南史氏聞崔杼已殺兩人，推想弟季亦將遭不測，遂毅然進京，繼死難史官兄弟之業。半路得知崔杼不敢再殺弟季始折返。這是上古，近古亦另有一故事。明成祖朱棣靖難奪權，此行為堅持正統名分觀之文士所不齒。朱棣為正其名分、制服天下名士，令最負盛名之文士方孝孺為之撰詔。方孝孺拒之。朱棣怒曰：「不從誅爾九族！」方孝孺凜然答曰：「便誅十族奈何！」於是一場誅十族之大禍由此而生。看看中國古代文士之傲然風霜、錚錚鐵骨，再看看當今中國文士之趨炎附勢、奴顏媚骨，不覺仰蒼穹而長太息！然而，中國正直文士之風骨幸而未絕。宋永毅先生回國搜集文革資料被囚而矢志不改。最近又在籌畫「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之大型歷史作業。為撰真正文革史作厚重鋪墊。想中國文革史卷將由此開啟新的一頁，人間正氣、社會正義由此伸張，國家民族當受益匪淺！





我知道，逍遙派在文革中，是最讓雄糾糾的紅衛兵和氣昂昂的造反派們看不起的。但我不能撒謊，因為，我真地是做了整整十年的逍遙派，何況我的那些同窗和我一樣，如今都還活得很是清醒。

# 逍遙派說文革

根據 2004 年 10 月一次“口述歷史”採訪錄整理補充

高爾品

## 要想了解文革——得先了解十七年

文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中共十七年持續強化專制極權統治的一個大惡果，是中共十七年不斷內訌內鬥的總爆發，是中共十七年對外對內一切倒行逆施的總表演。不了解、不研究十七年，就沒有可能了解文革之所由來；不了解、不研究十七年，就同樣不能了解中共文革之種種瘋狂行徑的歷史成因。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述：文革，不過是使中共從一黨專制復辟走向了毛氏君主專制復辟，使中共從堅持“馬教”專制統治走向了堅持“毛教”專制統治，使中共從專制的等級森嚴走向了反動的血統至上，使中共的從殘酷鎮壓走向了鎮壓的“無法無天”，使中共從架構權力經濟走向了毀滅國民經濟，使中共從公開否定民族歷史文化走向公然毀滅民族歷史文化……。

今天不談理論，我還是從自身的命運說起。

我清楚地記得，1958 年 5 月 18 日的夜晚，我的父親和安徽省的一萬八千多名知識份子一起被逮捕了。

第二天早晨，當我來到學校時，早讀還沒有開始，卻發現班上有七、八個同學都哭喪著臉，聚在教室的後門口，一個個全低著頭，也不說話，等我也站到他們身邊時，才知道，他們的爸爸也被抓走了。判刑之後才知道，罪名都是“右派加歷史反革命”，“判決書”都是法院統一油印的，上門只是填寫了不同的名字而已。

也就是從那一天開始，我們就被學校、老師和所謂出身好的同學，指罵為「小右派」，「小反革命份子」；如果我們去看所、勞改農場或勞改工場去看了自己的父親或母親，回來就要被變相地批判和鬥

爭，不是被叫起來罰站，就是罰我們打掃衛生。可以說，我們無時不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之中。尤其是在 1962 年之後，那時，人們剛剛熬過了餓肚子的歲月，毛澤東又開始“大抓階級鬥爭”了。雖然那個時候，我的父親已經被“保外就醫”，但是，我們仍然屬於“五類份子”的家屬。父親是要在街道上被監督勞動的，每天早上必須按時去掃大街。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他還算是“幸運”的，因為他沒有被弄死，我那個教了一輩子書的舅舅就在勞改農場被活活地餓死了。我們還沒有家破人亡，因為我的大哥大姐還能夠寄錢回家，養活我們的父母，供我和我的小哥上學，我們才沒有停學去拉板車、賣冰棒或撿垃圾，沒有討飯，沒有從此陷入要活不能、欲死不得的境地。所以，我們已經感到很滿足。雖然恐懼的陰影從來不會在我們家裏的每一個人心頭消失過。

我想著重說的是，其實，從 1949 年以後，恐怖就一直就深深地籠罩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身上，除了那些“騎在老百姓頭上的解放者們”，再就是那些“自認為被解放了的無產階級和貧下中農們”。中國共產黨當時就有四千萬黨員。這些黨員中的掌權者們，從中央到地方，到每一處農村，到每一所小學校、小商店——凡是中國領土所能達到的地方，都由他們統治，都由他們說了算。在 57 年的反右派鬥爭中，一個普通人，祇要說了一個黨員的“壞話”，或向一個黨員提了意見，就會被打成右派份子，就會被勞教勞改，家破人亡。

而這個統治集團又是由什麼樣的人組成的呢？

一種是 1949 年前就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因打下了江山而掌握了政權的人，他們被分配到全國各地，自上而下被“分封”為各級各行各業的大官和小官，

人人都有了一塊“領地”或“領域”。中共據此復辟了自秦漢起就已經被推倒的中國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個“洋教專制復辟政權”，確立了它的“馬列黨族分封制度”。

另外一種，則是靠分化人民所製造出來的。共產黨把人民中的一部份，硬要說成是領導階級的組成部份，他們當然祇是一些虛假的統治者，比如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自然，在他們當中，還有其它社會成份中，確有一部分獲得了提拔或重用，特別是每一場政治運動中所“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們——他們當中確有人青雲直上，從而入黨做官被“加封”，從此“由賤而貴”。

這樣，那些所謂成份好的一一黨的幹部及其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及其子弟，還有所謂的積極份子，各色各樣的先進人物們，他們便成了這個國家的“主人”；而那些被共產黨打倒的地主富農資本家，沒有被處決的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及其家屬和後代，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包括從來就是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小商販、無業遊民等等，就都成了被打擊、被壓迫和被改造的對象。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整個中國社會已經成爲一個壁壘分明的社會。一小部分人在實際上統治著整個中國，另外一大部分被黨統治的人，有的雖因戴著“高帽子”而跟黨走得洋洋自得，餓著肚子也要天天高喊共產黨萬歲；有的卻在恐怖之中一邊被迫喊著共產黨萬歲，一邊卻在暗中痛苦地呻吟和掙扎。

這種狀況，直到文革爆發，已經持續發展了整整十七年。十七年間，由於共產黨特別地提倡階級鬥爭，大抓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貧下中農對地主富農的鬥爭；不斷地煽動所謂的人民群眾，去鬥爭所謂的階級敵人，去鬥爭所謂的剝削階級和那些所謂出身不好的人——有“歷史問題”的人，有“現行問題”的人；再加上毛澤東又一貫認為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是可以“製造”的，也就是根據他和共產黨的需要，能夠“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要緊就緊，要松就松，要多殘酷就能夠多殘酷”；從而發動了十數次政治運動，以迫害、甚至是公然地和大批地屠殺他的階級敵人們。所採用的方

式，全部爲文革所效法，只是不像文革那樣完全公開化，擴大化，甚至擴大到了共產黨各級官僚們自己的頭上。十七年間，單單被毛澤東和共產黨以各種方式予以迫害並置於死地的，就達六千萬之數，比其後文革十年的枉死者，整整高出三倍以上。這就是 1979 年鄧小平要以平凡冤假錯案來“收拾人心”時，被平反者絕大多數都是文革前十七年的被冤屈者，或乾脆是十七年中的冤魂。

似乎特別要加以說明的是，十七年間，自始至終，共產黨都在通過一切形式的理論、文學和藝術，對全社會進行了長期的和從未間斷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教育，從而不僅製造了全社會的思想恐怖，而且在實際上造成了人民對所謂舊國家、舊社會、國民黨反動派、地主和資本家、直至美蔣特務、蘇修特務及一切“階級敵人”的深仇大恨。所謂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早已經被當成歷史的垃圾，掃出所



有的舞台了；而馬列的鬥爭和專政文化，更是在共產黨政權的刺刀逼迫之下，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深入了新一代青少年之心。很多人都不明白，海外的人更不明白，十七年間，爲什麼看上去文質彬彬的大學教師、大學生，中學教師和中學生，就不用說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了，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轉臉之間居然都能紅口白牙地去公然誣蔑和陷害別人，都敢掄起皮鞭去抽打自己的老師，用自己的皮帶活生生地抽死那些與他無冤無仇的同事、同學、朋友，甚至是老人、婦女和小孩，還臉不變色心不跳。其實很簡單，

因為，十七年的“教育”——階級鬥爭的教育，製造階級鬥爭的教育，所謂“憶苦思甜”式的教育方式，瘋狂的、殘酷的、長期的、甚至是不間斷的殘暴鎮壓行爲，早已經將“仇恨”培養好了，早已經將“對所有敵對階級曾經是怎樣掄起鞭子毒打和殺害我們階級兄弟的仇恨”，甚至是“革他們的命”的決心與方式，深深地扎進了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心底。再加上十七年、特別是六十年代伊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熱愛情結”，也早已經在全社會特別是青少年中發酵，就象當年的德國青年對希特勒的“狂熱”一樣。於是，文革便在這樣一個社會基礎和心理基礎上，在傾刻之間就被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在全社會、特別是在青少年中煽動並發動起來了。

## 二、要是有槍——她就打死紅太陽！

文革爆發那年，我十九歲，面臨高中畢業，是老高三，六六屆，也是中學生裏面年紀最大的那一屆。我因為父親 57 年被打成右派，所以我屬於黑五類子弟，也就是「地富反壞右」裏邊的右派份子子弟。

像我剛才講過的那樣，文革爆發前的十七年，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動了十幾次政治運動，已經殺害和餓死了將近六千萬中國人民。因此，文革一經發動，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政治運動又來了，又有一批人要被處決，被勞改，被勞教，被鬥爭，被踐踏，被逼自殺了。文化大革命剛剛發動的時候，毛澤東就親口對江青說過：“這一次，又有很多人要自殺了……”因此，文革剛剛開始，我的內心就是一片驚惶，知道政治運動又開始了，也不知道什麼樣的災難和厄運又會降臨到家人甚至我的頭上來。我們全家，包括親屬和朋友，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1966 年全國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就定在 7 月 1 日。我是應屆高中畢業生。我的成績，在學校也算得上是第一流的了。母校也是安徽的第一所重點中學。可我知道自己是考不取的。為什麼？因為我是右派份子的兒子。五七年以後，特別是毛澤東大抓階級鬥爭之後，五類份子的兒子非特殊情形是絕對不允許上大學的。無數優秀青年的痛苦命運，都已經對此做了鐵證。但我畢竟是年輕人，不到黃河心不死，我還是刻苦學習，準備考試。

1966 年 6 月 18 日晚上 12 點剛過，住在我對街的一個同學，他叫胡國齡，是我中學時代最要好的同學，突然輕聲叫著我的名字，敲響了我家的大門。待我躡手躡腳地跑下樓去，剛打開門，他就一步踏進來問我正在幹什麼。我說，“我正在做題目”。他說，“不要做了，我們考不成大學了”！因為他家有收音機，剛剛聽到的新聞，原定 7 月 1 號舉行的高考，因為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被宣佈推遲半年。後來不到兩個月，高考制終於被取消。誰想，這一取消就取消了 11 年，一直到 1977 年才恢復高考。我們這一批 1966 年的高中生，是在 1977 年，也就是 11 年以後，才被共產黨准許考大學的，第一年還要“政審”。

高考推遲了，學校裏的文化大革命也全面開始了。紅衛兵“興起”了，到處抄家鬥人。像我這樣的人，首先是不准革命的，因為我成份不好，是革命對象的家屬。文革以前，我們班 39 個人中，好象只有兩個成份不好的；文革以後，我們班忽然有了 30 個出身不好的，祇有 9 個出身好的了。但是，這 9 個人就統治了我們 30 個人。我們 30 個人祇能乖乖地跟著他們去抄別人的家，帶著他們抄自己的家。反反覆復地抄著，在抄家的過程當中，鬥同學的父親母親，又讓自己的父親母親去被同學鬥爭。一個十九歲的青年，在中國的古代都可以結婚成家生兒育女了，他還要跟著別人、或是帶著別人去幹這樣的事情，你想想那個社會是個什麼樣子？

那個社會，表面上極其高昂，天天在喊口號，刷標語，處處都是革命的“紅海洋”，可是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有多少人家在哭泣，又有多少人在為自己的父親、母親、丈夫和妻子被打死鬥死，或者被逼自殺而偷偷地哭泣。父親母親被打死，被鬥死了，還要被逼參加批判自己父母屍體的鬥爭會。如果你表現出悲哀，你流了眼淚，那就輪到鬥你了。我的同學當中，有被迫給父親貼大字報，揭發父親反動的；有被迫給母親貼大字報，逼得母親跳樓自殺的。我那時作為一個五類份子的兒子，心裏的感覺用「如履薄冰」都不能形容，成天心驚膽顫。

我雖然成份不好、但成績好，被老師認為是很有才華的，吹拉彈唱，繪畫書法，我樣樣都能拿得起來，可這些卻使我成了一個“修正主義的苗子、封資修的接班人和反動學生”。所以，我心里一直在緊張

地等待著哪一天大字報會貼出來。終於有一天，是在八月初，批判我的大字報終於被貼出來了，首先，就是揭發我跟反動父親劃不清界限；其次，揭發我說過“魯迅要是活在現在，也會打成右派”。這話我真的說過，那還是讀高一年的時候。就這兩條，如果沒有毛澤東爲了利用學生幫他造反打劉少奇，及時地發佈了“十六條”，策略地禁止學生鬥學生，我這條命大概不會活到今天。所以，我也應該“感謝”毛主席。

順便想說一說的是，十七年中，你要問到中國人對毛澤東的感受，大家都把他當成一個最偉大的領袖，當作“人民的救星”。報紙上是這麼說的，教科書是這麼說的，社會上是這麼說的，每一個父母也是這麼對子女說的。所有的人，從最有思想的知識份子，到目不識丁的農民，他們都會這樣來回答你，而且大多數人也都這樣認爲。但以我對自己青少年時代的回憶，即便是在那時，我以爲還是有很多有知識的人對他抱有反感。但，第一是不敢深想，第二是想了也不敢去講，第三就是那種恐懼的心態，使他們強迫自己認爲，自己所想的是不正確的，是反動的，起碼是要倒楣、要坐牢、甚至是要殺頭的。至於文革一開始，就把毛歌頌成了“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自然誰也不敢說個不字。

串連開始了。

由於在文革前的十七年裏，中共一直是依靠各級黨委來發動運動、領導運動，來整所有他們想要整的人的。文革開始時，劉少奇也是照樣辦理，派工作組，打反革命。再加上當時劉少奇的勢力太強，中央委員和各省省委書記絕大多數都是劉少奇的人，這樣一來，毛澤東想要整掉劉少奇的整個班底，就不可能了。所以毛才會下決心利用自己已經被神話了的領袖形象，和數十年來已經形成的權威地位，再加上高高在上的神秘光環，決心“從下而上”，而不再是“從上而下”；決心“由外及內”，而不再是“由內及外”地來發動這場政治運動，發動群眾和學生起來造反，號召北京學生大串連，要他們到全國各地去點火，去衝擊黨政機關，把全國各地的反都造起來。而各省的共產黨書記們在一個地區統治了那麼長的時間，一般人是鬥爭不了他們的。可是，毛主席從北京派來的紅衛兵，卻能夠把他從家裏抓出來，掛上牌子，進行批判鬥爭，連他們都被鬥了，下面的火也就

自然燒了起來。而爲了把劉少奇和他的黨徒們一網打進，爲了保證一切都是爲了“打倒劉少奇”這個文革的大方向不被轉向，毛就不能不進一步向全國發出革命造反的號召，就要允許全國的紅衛兵和青年學生一起去串聯，而不能再象運動初期一樣，一部分可以革命，一部分卻不准許革命。而他發動的手段，就是在北京接見全國串聯到京的紅衛兵和青年學生。所以，連我這樣的黑五類子弟，都可以參加串聯上北京了。

8 月底，我們全班同學決心集體走路去北京看毛主席。我們過了長江，只沿著鐵道走了一小段路，就扒上火車趕到了北京。

那一天，8 月 31 日，在整個天安門廣場上，在五十萬年輕學生高呼著“毛主席萬歲”的時候，我心里所感覺到的，還是“恐懼”這兩個字。雖然廣場上絕大部分學生都懷著無比的真誠和無比的崇拜，在高喊著「毛主席萬歲」，但是，這裏面一定有因爲恐怖而高喊萬歲的人，因爲痛苦害怕而高喊萬歲的人，心裏埋藏著不滿卻要求自己高喊萬歲的人。我舉一個例子，我的一個女同學，這個人的名字我現在還是不能說。那一天，我和她一起就坐在天安門廣場升五星紅旗的漢白玉台階下面，等著毛主席、賀龍和林彪乘的軍用吉普車開過來。車終於開過來了，我們立即狂熱地高喊起「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來了。我回憶自己當時的心情，是不得不跟著喊，還要努力喊得別人都聽得見，其實我心裏一點也不想喊。可一邊喊，一邊心裏還直哆嗦，連我自己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激動、還是在害怕，反正是什麼感覺都有。而我身邊的這個女同學，她雖也舉手喊毛主席萬歲，可就在大家都發了瘋、根本注意不到她的時候，她竟突然在我耳邊低低地又是急促地說了一句話：“要是有一槍，我今天就打死他！”那一刻，雖然她把我嚇得連心臟都不會跳了，但是三十多年來，我在內心裏卻一直埋藏著對她的深深敬意和佩服，一直把她看成那個敢於刺殺列寧的俄國女社會革命黨人卡普蘭——儘管當時，我在萬分緊張的那一刻，曾猛地回過頭來死死地瞪了她一眼。因爲我知道，如果這句話被誰聽見了，她，甚至包括我在內，就會被立即踩死在那面血紅的五星紅旗之下，連逮捕和鬥爭都用不著了。

### 三、父母逃過一劫，我做了逍遙派



毛主席接見完了，我們這些成份不好的，就被班上那幾個出身好的紅衛兵召集在一起訓起話來了。說北京的紅衛兵已經講了，任何成份不好的人，都必須立刻離開北京，要我們當天就滾去安徽。我們班上那幾個成份特別好的幹部子弟，就把我們這三十個人趕到了北京火車站。那一天，北京火車站前的廣場上，一眼看去，全都是一片“花頭”——男的，大都頭髮被剃光；女的，全被剃成了“陰陽頭”；臉上冒血的，身上帶血的，正在挨著紅衛兵的皮鞭子卻一聲也不敢吭的；還有就是被嚇得驚慌直叫的孩子，滿廣場都是。紅衛兵們——北京的高幹子弟們，穿著軍裝，帶著紅袖標，手裏拿著皮鞭和軍用的寬皮帶，就在他們的身上任意地抽來抽去。後來我才聽說，這一批人，總數約有四千，全是被紅衛兵遣返原籍、送回老家、接受貧下中農改造去的。其中有一個少年，現在已經是美國的一位高級工程師了，在舊金山工作，還曾是民運人士，他告訴我，當時，他才十歲，說起那時的情景，他仍然耿耿不已。因為紅色的首都北京是不能容許“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弟們生存的。

你想，當時我是什麼心情？我是一個從小就愛好文學的人，讀了很多書，又多多少少受了些家庭的影響，對中國歷史、外國歷史多少瞭解一點。我看到這種情況，除了恐怖以外，就是一種厭惡。我不敢仇恨，但我有厭惡感。我這種人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不是很多的，因為我明確地對這場所謂的革命感到“厭惡”。與那些至今還在海外懷念他、甚至是歌頌它的人，實在是“風馬牛不能相接”。

當我們這三十多個人剛剛走進北京火車站的時候，就突然聽到一聲「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歌聲。原來是北京的一隊紅衛兵們，正唱著這首歌，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在北京車站的大廳裏面。這時，我們突然看見一對紅衛兵走到一個穿著褐色香雲紗衣褲的老太太面前，大聲喝問她：“你來北京是幹什麼的？”

老太太忙說：“我是來看兒子的。”

其中一個女紅衛兵又問她：“你從哪裡來？”

“我從香港來。”老太太哆嗦著回答她。

女紅衛兵又問：“你的兒子在北京是幹什麼的？”

老太太忙忙地說：“我的兒子是冶金部的局長，叫X X X……”

那個女孩子連話也沒有聽完，就立即嘶叫道：“他是叛徒，早都被我們打倒了！”

說著她就舉起手中的那一跟帶銅扣的寬軍用皮帶，唰的一下，便從老太太的頭上抽了下去，鮮血立即從老太太的臉上噴了出來，老太太就這樣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

那一刻，我們都瞪大眼睛看著，誰都不敢吭一聲，直到這一隊紅衛兵又高唱著「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歌聲，從我們的身邊揚長而去。

那天，從北京上車以後，我就擠在衛生間裏面，足足站了十八個小時，第二天才到蚌埠，轉了車，過了江，到了家，我就問父親說：“你解放前當校長、做教授的時候，對家鄉人很好，你還說幫助過三十多個家鄉的老百姓，你說的話，都是真的嗎？”我說，“你一定要說老實話”。

父親說：“我沒有跟你說假話，我救過很多人。我還救過很多共產黨。”

我說：“那好，那你就聽我一句話，馬上跟母親回老家。”

我怕他不明白又解釋說：“北京瘋狂的紅衛兵運動已經開始了。不僅是鬥爭，貼大字報，到處抄家、打人，甚至可以毫無顧忌地去打死五類份子。我們學校的紅衛兵，他們雖然把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趕了回來，但他們很可能跟在後面就回來了，因為他們學了北京的‘革命經驗’，一回來就要大張旗鼓地幹了……”

“爸”，我說，“你比較鎮靜，媽就不一定了，她很愛面子，如果讓你們倆站在家門口，鬥爭你們，剪你們的花頭，你恐怕還能忍受，媽媽可能會一頭撞死算了，撞不死也會被他們打死……”

我的父親出身貧寒，但我的母親卻是大家閨秀出身，我特別擔心她過不去這一關。

我一點半鐘到家，三點鐘說服了我的父母，四點鐘之前我已經趕到派出所，把我父母的戶口主動遷到了老家農村。派出所居然一點也沒有刁難我。

我父母終於在家鄉躲過了這場浩劫。做為被強迫改造的內容，每天早上，我父親必須去鎮上掃一條小街，除此以外，鄉親們很照顧他。是他一生的德行救了他。七五年，當他戴著“右派帽子”死的時候，不單許多鄉親主動為他送葬，鎮革命委員會主任的母親



還主動叫人將自己的壽材抬到了我們的家裏。這是後話了。

那天夜里，我把父母安頓好之後，凌晨四點，我就過江回到了在蕪湖的家，我那兩個八歲和七歲的外甥女，竟立刻從樓上撲下來，哭著說，“小舅，家被抄了，你的胡琴也被砸斷了……”。我一看，整個家被砸得一塌糊塗。那天晚上，我就坐在地上，一左一右抱著兩個小外甥女，睜著眼睛直到天亮。

就是在那個漆黑的夜里，我下了一個決心：決不參加這場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這就是我，作為一個1966年的高中畢業生，從沒有參加過任何一個造反隊的根本原因。因為，以我當時淺顯的歷史知識，我已經確認：這絕對是一個“不講天理和毀滅人性”的革命。

我承認，我做了整整十年的“逍遙派”，但我讀了十年的書。那十年，我幾乎將我所能夠搞到的“封資修”全讀完了，而且還讀得很系統。如果我這一生還算是多少有一丁點真成就，實在與這十年關係很大。為此，我今天還是要感謝我的那幾個同學，他們常常去抄家，查封圖書資料，發現了一些有價值的“封資修”書籍，他們就會偷偷讓我撿回來，我便把它們當成了寶貝。

我這樣的人，雖不夠資格參加文化大革命，但自己也是不想參加這場所謂的文化革命的。我是另外一種典型，說是“反動學生”的典型也行，1968年秋，當軍宣隊和工宣隊進駐上層建築、也進駐了我的母校時，那個強奸了我們27位女同學的軍宣隊長和整個就是一個流氓的工宣隊長，就公開的說過“高爾品是全校最反動的學生”。

我承認，若是按文革的標準，而且不論是哪一家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標準，我都是最“反動”的。因為，我不但在文革十年間未參加過任何一次造反，而且整天都在讀“封資修”，並且認真做筆記，寫心得，不單將中國的一些古典文論，比如《文心雕龍》里面的許多篇章都背得滾瓜爛熟，而且還自己寫了一本“西方哲學史綱要”，對西方的哲學家們如數家珍。我每天天不亮就要起來練二胡，卻只拉名曲、絕不拉革命造反歌曲——諸如“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之類。在文革中，我拉二胡拉出了名，卻沒有為“革命宣傳隊”宣傳過一次“革命”。我只在一

位同班同學因武鬥被打死以後，在他的追悼會上為他拉過一次“江河水”，那是唯一的一次。我每天的功課，就是讀書、拉琴和寫字——年少時，故鄉找我要字的人可不少。還有，我祇要有機會不戴毛澤東的像章，我就不戴；祇要有機會不讓我讀毛主席語錄，我就不讀（如今，許多人聽我講演，都誇我的記性好，但我卻背不出幾段毛主席語錄。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只引用了兩句毛主席語錄，等到書印刷出來，才發現“最高指示”居然掉了好幾個字）。我與那些雖然出身不好、卻非要拼命去參加文化大革命、爭取造反的資格、或是非要拼命去表現自己“革命”的人，確實不一樣。但我理解他們，就象我理解有許多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能將毛澤東的像章活生生地別在自己胸前的肉上，以表示他們“革命”，表示他們對毛主席的“忠誠”……。其實，說到底，他們還不都是讓那個時代給活生生地逼迫出來的嗎？對他們首先應該是理解和同情。

但是，我似乎更應該承認的是，我並非是因為覺悟和覺醒，才會有這般“反動”的表現，不是。我只是逃避，只是厭惡，卻絕然沒有上升到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高度，一丁點也沒有。因為在鐵桶一般的黑暗之中，在專制的血腥味已經成為整個時代的氛圍之時，我們的先人和前輩曾經不屈不饒地為自由和民主獻身的故事和業績，早已被玷污在共產黨和共產革命的血淋淋神話之中。如今還活著的人，誰又能說，誰又敢說，他是那個時代的民主和自由的追求者和戰鬥者？如果有，並且敢於表現出來，那麼，他就只會象“反文革第一人”——真正敢於造“毛皇帝反”的上海英雄劉文輝一樣，會立即被槍殺在毛澤東黨主專政的龍陞之下。雖然，那個時代，似乎也還有幾位為了高舉紅旗而犧牲在紅旗之下的勇士，但那與歐洲中世紀曾忠誠地慘死在宗教裁判所里面的殉道者們，又有什麼區別？我欽佩他們，但不認為他們就是民主和自由的先驅。就不說那些自始至終都在高喊著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英雄們了！我同樣理解他們，但那不過是時代所造就的荒唐鬧劇和無邊罪惡而已。他們本身又何罪之有？一九八六年夏天，也就是中共發動文革二十週年之際，那位二十年前曾領著紅衛兵抄了我家、卻又扑了一個空的同學，他叫陳敬農，想來看我，想向我道個歉，但又怕我不願見他，便請另外

一位同學轉告給我，說他想起當年的事情，就很內疚，想當面道個歉。我不但沒有拒絕見他，還特地請他來家裏吃飯。席間，我看他仍然有不安的表情，就真心地說：“那種歲月，不論是你這樣造反抄家的，還是我這樣被造反抄家的，都是受害者，都是受騙者，罪惡全在毛澤東一人，你我何罪之有？”因我說的真誠，他也顯得很是感動。我們又成了好同學。聽說，他如今在事業上很有成就。

### 文革的客觀效應——朦朧的覺醒開始了

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叫做“反動派總是要搬起石頭來砸自己的腳”。毛的這一句語錄，我不知道是否又記錯了。但毛肯定有過這樣一句類似的“最高指示”。

然而，毛確實是自己搬起石頭來砸了自己的腳。因為，正在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作為億萬人民心中的紅太陽，被捧到了眾神之神的巔峰地位，卻終於被歷史無情地摔了下來。那倒不是因為他矯情時說的，是因為“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而是物極必反，“泰極否來”。是因為他作惡萬端，必然要“現世現報”。而這個現世現報，就是林彪事件所帶來的，人民對他的最早覺醒，雖然只是朦朧地開始了覺醒而已。

從文革爆發到林彪事件以前的4、5年間，我因為接觸過很多像我這種出身於知識家庭的人，所以，我知道，在社會上有很多的人，在內心深處對毛澤東的文革實際上是深惡痛絕的，他們與一些在文革初期及後來的造反中“領過風騷”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頭頭們確實有些不一樣。那時，儘管我們也必須站在人群中高舉著紅寶書高喊毛主席萬歲，實際上我們心裏明白，他完全是在倒行逆施。但是，大部分人卻由於盲從、害怕和恐懼，而不願也不敢這樣去想。

可是，林彪事件卻使得中國大多數的人，對毛澤東和他的文革開始有所覺悟。全國人民通過林彪事件發現，所謂文化大革命極可能是一場騙局。不論是毛澤東要打倒的人，還是曾跟著他要打倒別人的人，都被他整慘了。而“571 工程紀要”所揭露出來的“毛澤東是絞肉機，是 B-52 轟炸機”的可怕說法，就更是使人民在心頭轟然一征。大家在討論文件時，雖然個個

都講，毛主席他老人家真英明；回到家卻偷偷地說，林彪好象沒有說錯呀，毛也太不是個東西了，還不如讓林彪真的把他干掉了才好呢！

所以說，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覺醒，是從林彪事件開始的。這是文革十年當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儘管人們非常痛恨林彪站在毛澤東身後舉著小紅書的諂媚形象；痛恨他在文革當中，曾利用手中的槍桿子為毛澤東維持過那個浸透著人民鮮血的萬惡政權……可是，他的死，他所遭遇的“913 事件”，確確實實還是讓大多數人對毛澤東及其四人幫有所覺醒。但那時，絕大多數人，主要還是認為，那是壞人當道；而被毛鬥爭和打倒的劉少奇、朱老總和陳毅等許多老幹部，還是好人。其實這一批人，祇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挨了整，他們在文革之前的所有政治運動中，都是打人和整人的；他們在之後的一九八九年，其大部分都是支持鄧小平在北京屠城的，如果他們還活著的話。當然，那已經是後來的認識了，當時的中國人還沒有覺醒到這個份上，包括我本人。周恩來死的時候，我還流過眼淚。今天，我覺得自己同樣愚蠢和可笑。

林彪事件後，我中學的一位數學老師曾經在深夜的學校大操場上跟我說過一句話。他說，“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監獄……”。他還說，“我知道你不會出賣我，我才敢對你這樣說……”

那一天是 1971 年 12 月 31 日。

那個夜晚，我們只遠遠地走在操場的邊上，卻不敢穿過操場，走到另一邊去。因為操場的另一邊是一個土坡，土坡上挖著一個長幽幽的小“山洞”，“山洞”裏放著上百具棺材，全是武鬥中被打死的學生和工人屍體，還沒有下葬。

深夜回來以後，我因為內心充滿著苦痛和窒息的感覺，就伏在我的小床上寫了一首詩，題目叫“一九七一年的月亮”，一百五十多行，至今我只記得其中四句了：

……

我們空虛而又憤懣，  
我們鎮定但有膽怯；  
面對著一九七一年的月亮，  
用我們冰冷的笑聲向它告別……

雖然告別了一九七一年的月亮，卻還是迎來了一九七二年那個風狂雨暴的中秋。那天傍晚，我坐在小閣樓裏，面對著雨後窗外那一片“枝樑橫折、翠葉紛劈”的中秋景象，雖痛心疾首於“竟大地精英，瞬遭劫掠”，但還是為“一腔熱血”所鼓舞，大著膽子“揮毫奮書、洋洋灑灑、狂歌聊發吐衷曲”，最後甚至敢於“笑蒼穹，看煙飛雲斂處，皎皎明月”了！當我把自己“放狂”的時候寫下的這首詞，偷偷地卻又是得意地讓我的大哥看時，沒想，他只疾速地掠了一眼，便三下兩下地把他撕了個粉碎。從來儒氣甚深的大哥，年輕時的北大才子，此刻竟然低聲而又急促地瞪眼對我吼道：“你自己不想活，還想害一家人都活不成嗎？！”

確如大哥所說，要是被發現了，那就跑不了要遭殃，特別是我這等出身的人。那時，我還偷偷地寫過一部長篇小說——那可是我此生所寫的第一部小說，題名叫“春瀾”，就是寫我們這一代人在文革中苦難歷程的。可惜的是，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因被我的老師逼迫，將它偷偷地燒掉了，雖然我的老師寬慰我，說我將來一定有出息、有成就，但是，那一刻，熱烘烘的火焰，就象是燒著了我的心，那種心疼，是不能用語言來形容的……

這不能形容的心疼，這充溢著太多激情的青春苦痛，卻使我想起了一九六八年的那個夏天，也就是在武鬥最激烈的那些日子裏，我曾與我的幾個好同學一起聚首在我住的那個破爛小閣樓上。那一天，面對著血紅的殘陽，我曾即興揮筆寫下了一首詩：“青春的血沸騰在胸際”，並立即由在地區文工團拉提琴的同學王小明，將他譜成了曲子。於是，一時間，小明的提琴，我的二胡，革命宣傳隊大吳的手風琴，還有幾位同窗高聲嘶喊的“伴唱”和拍桌子打板凳的“伴奏”，便一起在我的小閣樓上“沸騰”起來了——青春的血，痛苦的血，就這樣洶湧在那個“太陽最紅、人間最黑”的歲月裏面……它當然與那個造反時代的主旋律背道而馳，與那些還涌動在街頭、高喊著要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各派造反洪流大相徑庭，更與那些正在為互相仇殺而呼嘯的子彈毫不相干……雖然，在他們的眼睛裏，我們不過是一群不敢革命的懦夫，甚至只是幾個還沒有受到懲罰的階級異己份子而已……可

惜的是，他們倒真地把我們忘卻了。而我們，卻因此而獲得了一丁點“喘息和自由”。

當然，“鬧”夠了之後，我們還是要後怕的。但我們也有不怕的理由，因為除掉我，小明和大吳畢竟都是革命宣傳隊的，是拉革命樣板舞劇——“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的”……。

從林彪事件一直到毛澤東死，雖然文革還不能算已經結束，但毛澤東的君主式軍事獨裁統治，卻穩定下來了。他終於能夠做到“叫劉少奇死，劉少奇便不得不死；要彭德懷亡，彭德懷便不得不亡；讓林彪從天上摔下來、林彪就不得不從天上摔下來”的殘暴君王了！

不過，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終於發現，周恩來在黨內國中的威信已經超過了他。為了搞掉周，他又搞了一次“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運動，又發動了一次造反，弄得全國上下雞飛狗跳……。毛如此這般地倒行逆施，不僅使老百姓開始了覺醒，連他的那些黨徒們也有很多開始覺悟了。曉得大家全是他的“炮灰”。曉得他就算是一個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壞皇帝！

當然，對毛澤東的死和周恩來的死，當時人民的表現是截然不同的。毛澤東死後第二天的下午三點整，中央電台向全中國廣播毛死了。我的一個同學，匆匆忙忙地跑到我家裏來，跟我輕聲喊道：老毛駕崩了！我說，死了？（他說：）死了。我說，怎麼辦？（他說）上街看看去……正說著，另幾個同學又來了。我說，那好，就一起上街看看去！等我們走到街上一看，街頭喇叭裏正“沈痛”地廣播著悼詞，但大街上，卻沒有一個人哭，沒有一個人喊。每一個人的臉都鐵青著……什麼叫恐怖？這就叫恐怖。因為每一個人都不敢說，不敢笑，甚至連哭都不敢。誰都不吭聲。看到了熟人，也祇是瞥一眼；碰到當官的，連眼光都不敢與之相對。當然，還有一種眼神，是有“會意”的意思的，但外人是看不出來的。比如我們。那一天，就有一個工人，因知道毛澤東死了，居然寫了一首詩，曰：“紅太陽落山了，大地一片漆黑……”，結果因被造反派揭發他是誣蔑“永遠不落的紅太陽”，而被逮捕，還判了三年刑。你們說荒唐不荒唐？

我們幾個人就這樣在大街上逛著，一個同學突然問我，“你身上還有錢嗎？”我說，“我身上還有七塊錢”，那時侯我一個月的工資只有 28 元零 5 分。但我因突然意識到了他話里的意思，便立即低聲地說：走，吃飯去！說這話時，我的那種不敢跑到臉上的快活，還有那幾個同學聽我說這話時的快活，那一雙雙眼神，簡直就沒法形容！是的，毛澤東死了，我們心裏是真快活，是真的快活得不得了！說著，我們就走到蕪湖當時最大的一家飯店，名叫“同慶樓”的，可等我們走進去時，我們全傻了，因為已經全部坐滿，祇在拐角上還有一張空桌子。那時才下午五點多一點，六點鐘都沒到。但滿是顧客的同慶樓裏，卻沒有一個人講話，沒有一丁點哭聲，滿大廳裏面，祇聽到酒杯碰得啪帕的響！全在“撞杯”呢！於是，我們每人都把身上的錢掏出來了，湊足了 10 多塊錢，八菜一湯地大吃了一頓。我從來不喝酒，但那天，我喝了，而且喝的是高粱，喝得頭一點也沒有暈！我第一次知道自己還挺有酒量。

所以，文化大革命有一個客觀效應，表面上，它的轟轟烈烈的殺人鎮壓是史無前例的；但是，它對中國人民的迫害，特別是在精神和心理上，卻不及文革前十七年。由於它擴大了「反革命」的陣營，在全中國把那麼多的共產黨幹部都變成了反革命，它使人民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承受力，變得前所未有地強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在度過了 1966 年的那個殘酷的夏天之後，我們的心情，比文革前 17 年，比父親被打成右派的時候，感覺反而還輕鬆了一點。為什麼？就是舉目一望，人人都是「反革命」，心理壓力和精神痛苦自然頓時有所減輕。文化大革命當中，許許多多曾經整人害人的共產黨幹部跟被他們整治迫害的階級敵人住在同一個牛棚裏，一道接受批鬥和凌辱，被整治和迫害的人民，其心理自然就得到了一種想象不到的調整。雖然這種調整本身就是“被扭曲”。所以，1979 年，當鄧小平為了收拾人心，而採行平反冤假錯案的時候，我們就發現，大多數被平反的，都是在 53 年的三反五反、54 年的思想改造、55 年的肅清反革命、56 年的社會主義改造、57 年的反右、59 年反右傾、62 年的狠抓階級鬥爭和 64 年的四清運動中遭受迫害者……海外華人，西方學者不瞭解中國，特別是那些台灣學者們。他們都把文化大革命

看做是共產黨對人民作孽最多的一個階段，其實共產黨作孽最多的是文革前的 17 年。因為，正是在 17 年裏，共產黨用制造階級鬥爭的殘酷手段，制造了人與人之間的仇恨，離間了所有人之間的正常社會關係，毀滅了中華民族幾乎所有的好文化，扭曲了人民原本單純的心靈，培養了整整一代政治變態的青年，更連續的發動了十幾次殘酷的政治運動，才終於為毛澤東發動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做好了歷史的全部準備。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在黨內與劉少奇爭權奪利的問題。可是高高在上的毛澤東，面對著早已掌握了實際權力的劉少奇，他要靠通常的黨內鬥爭的方式已經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了。所以，他必須是拼死一搏，以求絕處逢生。所以他才要發動紅衛兵，發動群眾，發動不知真相的人民，起來幫助他搬掉自己政治上的敵人劉少奇及其同夥們，結果是曾經將毛吹捧到“神”的地位的劉少奇，徹底地被毛和他的紅衛兵、造反派們鬥垮了。我倒是但願那個時候，中國真地還能有另一個革命，一個真正敢於造專制魔王毛澤東反的真正人民革命。因為，人民要是真的有覺悟、有權力、有力量也發動一場徹底推翻毛澤東和共產黨之極端反動、殘暴、黑暗統治的人民革命的話，那該有多好！

可惜的是，朦朧的覺醒才剛剛開始，離開真正要走上向共產黨發動革命造反的覺醒，還“路漫漫兮其修遠”矣！

因為直到一九八九年春天，那些曾說自己在文革中就敢於並已經造過共產黨反的人，竟依然在哀求著共產黨“推行改良和施行仁政”；甚至在一九八九年那個大好造反時機中，那三位真正要造毛澤東共產黨反的湖南青年壯士，居然還被送進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嘴鋼牙之中；以致到了今天，我們一些在文革中造過反、現在倒真的是在搞民主的朋友，都還擺脫不了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至深“戀情”……就不說一些還在年復一年地高喊著反對革命，高喊著要對至死都在迷信暴力鎮壓的共產黨實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將中共黨魁吹捧成為舉世無雙之“明君”的朋友們了！

### 一個逍遙派眼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

首先應該明確的是，不論是哪一派紅衛兵和造反派，都是毛澤東、共產黨發動文革的受害者、受騙者，只不過他們與“被造反和被迫害者”的“遭遇方式”不同罷了。因為一切的血海深仇都應該記在萬惡的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頭上。我想，“理解萬歲”這句話，用在這裏，才是最好不過的了！這便是一個當年逍遙派“自醒”的結論。

我們確實需要自醒。

還是說當年的事情吧。

那時，在我的同學當中，成份好的造反，成份不好的，由於毛主席發佈了“十六條”，說學生不准鬥學生，但都能造反，所以大家都造起反來了。他們之間，當然也互有鬥爭，因為在老紅衛兵和新紅衛兵之間，還是明顯地存在著很深的隔閡的，而大部份隔閡甚至仇恨，還是來自文革前的“壓迫和歧視”和文革初期的“迫害與仇恨”。但他們一是都要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這一點上，他們從來“不敢不一致”；二是共同去鬥爭那些地富反壞右老五類分子和“叛徒、內奸、工賊、特務、走資派”新五類分子，特別是鬥爭那些 49 年以後已經被鬥了不知多少遍、祇是還沒有被鬥死的人，各派紅衛兵造反派都不敢落後和不甘落後。在文革當中，我好象至今還沒有聽說過，有任何造反派紅衛兵，保護過他們，保護過他們這些過於苦難的人民，保護過後來被證明都是冤假錯案的各類份子們，即共產黨的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們——難得他們都不算人民嗎？特別是在他們遭遇鬥爭、迫害、酷刑、甚至是種種非人的摧殘，以至於痛苦地被劫奪了寶貴的生命時……。相反，更多的卻是“助共為虐”。雖然，我理解，因為，我也不敢——誰敢呢？誰曾敢過呢？劃清界限還來不及呢，不劃清界限就能當上造反派頭頭嗎？

我還想說是，當時參加造反的人，其出身、背景和具體的動機確實並不完全一樣。但他們雖有差別，但不論是哪一隊紅衛兵，哪一家造反隊，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都是要堅決緊跟照辦的，都是在高喊著要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哪怕真的是心有“異端”者也絕然不敢不如此，雖然——這樣的人是極少數。但我在前面說過，不論是何等何樣的造反派，他們在批判、鬥爭和迫害“地富反壞右”和“特

務叛徒走資派”的時候，“起碼在表面上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運動初期曾不許造反的人，或曾經被鬥爭過的某些人，其中確實存在著因報復心理和對抗心理而舉旗造反者。比方說，在我們中學，就有由幹部子弟、團支部書記和成份好的同學所組成的紅衛兵大隊部，簡稱“紅大”。另外還有一個叫做“敢死團”，其中有一部分是在運動初期被整過的，但也有人曾跟著別人整過其他同學。這兩派雖然帶著他們之間的新仇舊恨互鬥，但對毛澤東的任何偉大號召和最高指示，他們都是一概地堅決執行，從來沒有、也從來不敢有任何抵制。這一點必須認識清楚。因為文革所有的造反者，都必須高舉著毛澤東思想的紅旗，高舉著誓死保衛毛主席的紅旗，高舉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紅旗，高舉著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的血旗，才能獲得造反革命的“許可證”。這是文革所有造反派的根本特征，毫無例外可言，也不可能有例外。

我這樣說，因為我是旁觀者，而不是“參加者”。我身上缺少為誓死保衛毛主席而造反的感情要求和“理性”動力。姑不論那種為誓死為保衛毛主席而造反的感情和動力，究竟是真誠的，還是盲目的，抑或還是“莫須有”的，甚至當真是要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也不論“打著紅旗反紅旗，必被紅旗所打倒”，反正他們都不屬於“為人民而造反”的感情範疇和理性標準。

在 1967 年的夏天到 1968 年底的瘋狂武鬥歲月裏，各方造反派雖然擁有著大量的武器和彈藥，其互相間的武鬥雖然震驚了全國，讓人民膽顫心驚，卻絲毫也沒有震撼毛澤東剛剛重建的殘暴革命政權。因為，不論是那一方造反派所射出的子彈，雖曾奪取了無數的、無辜的青春和生命，卻沒有一發子彈是要“為人民”而射向獨夫民賊毛澤東和他的無產階級殘暴政權的！各類造反派們是在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而互相惡鬥，是在為期望毛主席他老人家承認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而相互射殺，甚至僅僅是因為自己充當了炮灰的委屈而自輕自踐自身寶貴的青春和生命……

有一點特別重要，是所有的人都不該忘記的，那就是：毛澤東雖用“路線鬥爭”，來殘酷打擊他自己在黨內的敵人們；但毛澤東為了保證他路線鬥爭的勝



利，卻從來沒有忘記、也不敢忘記要繼續“製造和調節”階級鬥爭，並且要把階級鬥爭這根“弦”永遠都繃得緊緊的。這便是他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更是他在大講“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之時，卻一再地要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原因。當然，這也就是毛澤東於旨在鬥倒黨內走資派的同時，卻一定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根本原因。因為，在他看來，階級鬥爭才是他進行路線鬥爭的保證。而唯有將所有的階級敵人都壓迫得、鬥爭得、打擊得依然不敢亂說亂動，他的一黨專政照舊固若金湯，他才能真正獲得自己進行路線鬥爭的勝利果實，才能實現他對自己那個黨的一人專政、即黨主專政。也就是說，雖然鬥倒鬥臭了劉少奇，可共產黨的天下，還是他毛澤東和共產黨的。不了解這個癥結，就不能了解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雖然風急浪高，卻能夠安然奪權的根本原因。而“這也才是意在藉口打倒走資派、其根本目的卻是要徹底打倒毛自己政敵的文化大革命，其結果，真正遭殃、遭難的，還是無數無辜人民的真正原由。而在整個文革過程中，那根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階級鬥爭之弦，基本上就是由各地造反派在幫助他繃得緊緊的，特別是在公檢法被砸爛之後，和在結合了造反派頭頭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這個新生政權之後。在大抓階級鬥爭、大打階級敵人上，各色造反派均可謂毫不相讓。雖然，我相信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是不不得已而為之，但畢竟還是“為之”了。

整個文革當中，無數冤死在紅衛兵、造反派，和後來由他們參加組成的“革命委員會”，或乾脆是由他們組成的“專政隊”手下的知識分子和無辜民眾，都早已對此作出了無數血腥的證明。

一直到 1968 年底，當毛澤東的批臭打倒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偉大革命部署早已完成，各派紅衛兵、造反派卻因為大打派戰而“干擾”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時，毛澤東先是開始對不聽話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實行“勸壓”，隨後則派出軍宣隊和工宣對佔領上層建築取代造反派，接著便決心要對那些曾為他充當過炮灰、如今卻滿肚子委屈、因而開始不聽他話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實行鎮壓了。雖然，有一些地區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進行過抗爭，甚至是不惜生命地予以過反抗，但是，正是因為只是為充當了炮灰的

委屈而反抗，而不是要為悲慘的民眾而反抗，他們的反抗才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就注定了要被徹底剿滅的下場。雖然不可否認，他們當中也出現了覺醒者，對毛澤東和共產黨也有了最初的覺醒，甚至也出現了極少數真“想”造反者，但因民主和自由的根本覺悟尚很遙遠，巴黎公社的反動原則〔——反對三權分立、要求立法與行政合一，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還在蠱惑其心，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血腥信仰還根深蒂固，共產黨帶著污血的革命紅旗還在向他們閃耀著暗淡的光輝，他們的下場當然是可想而知。因為，高舉著魔鬼的旗幟而想反抗魔鬼，結局只能是被魔鬼所吞噬。所以，當毛澤東和共產黨將他們該殺的殺，該剿的剿，大致收拾停當之後，便乾脆把我們老三屆中學生全部下放到農村，將拿著工資的大學生送進軍懇農場，就是將那些曾經按照他的號召去造反的，而今卻有些不聽話的“革命小將們”，全部送到農村去接受貧農下中農的“再教育”。說穿了，就是把他們分散開來，以便將他們淹沒在貧下中農的汪洋大海之中，去接受“思想改造”和實行“勞動改造”……

紅衛兵和造反派終於成了一頁血腥的歷史，雖然那血色的革命造反紅旗上，浸透了無辜人民的鮮血，甚至是他們自己的熱血。

悵望千秋一灑淚，文革已去三十春。歷史自然會將人類發展史上的種種浩劫，在與那一場由毛澤東和共產黨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作了認真比較之後，得出它確乎是“史無前例”的悲慘結論。而且，不論誰出於感情原因而要去粉飾它，還是要借粉飾它來寄托自身的感情；也不論誰還想在文革的血海中，撈出幾件浸透了人民鮮血的革命造反“珍品”來，“史無前例”的這面鏡子，都只會再一次送給我們“荒唐”二字而已。或曰：縱然是“滿紙革命言，一把造反淚”，最終亦只能讓朋友們“都云作者痴，盡解其中情”。

如果我說得不對，還請當年的造反派戰友們原諒，因為那時，我畢竟只是一個可憐復又可恨的“文革逍遙派”。







### 人間多少傷心事 忍看兒孫遭活埋

1967年8月19日的“蓮板戰役”，“革聯派”俘獲“促聯派”分子三十餘名，在“革聯派”總指揮部杏林地區遊行示威後，被集體活埋，廈門市第六中學“促聯派”頭子陳昌明，父母因工作關係而參加“革聯”，眼見愛子被俘活埋亦無法救助，其母憤而脫離“革聯”轉入“促聯”。

## 前紅衛兵陳永生先生

### 廈門紅衛兵武鬥記實美術作品選載（續）

#### 刑場

武鬥期間，廈門市影劇院全部停演，“促聯派”佔據了中華，開明，思明等幾家電影院，作為臨時刑場，不管抓到多少俘虜，必須用不同的酷刑處治，“小閹將”們一個個挖空心思，要“發明”新奇“刑法”。







### 血流成渠 屍滿室

武鬥期間，廈門市昇平路“民立小學”為設備最完善專供觀光之用的小學，被“促聯派”強佔以停放“烈士”屍體，可容兩千學生的全部教室宣告“屍滿”，傷亡之重，可以想見。

### 名勝古迹成灰燼 八卦樓頭硝煙灰

福建漳洲的八卦樓為歷史悠久最負盛名的名勝古迹，1967年12月，被“促聯”同盟軍“八二九主力軍”據守，“革聯”盟友“東野戰鬥派”用槍炮坦克猛攻，八卦樓夷為平地。







### 攻佔“廈門市政府”

1967年12月8日，“革聯派”集中坦克大炮，竟日轟擊，攻佔“廈門市政府”，雙方傷亡數百人，為廈門武鬥時期著名“戰役”之一。

### 標語“罵陣”

1967年12月，“革聯派”大舉反攻，佔據了廈門市工農東路線的上、中兩段，雙方在廈門市圖書館附近對峙，彼此都懸掛針鋒相對的巨幅標語“罵陣”，成為別開生面的武鬥方式。



# 文革造反期間 被紅衛兵和造反派 抄砸毀壞的部分民族 古蹟與文物

（網文摘編）

**文革時，大陸大量的古蹟文物等被紅衛兵和造反派所毀，從這個角度講，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場浩劫，現將那一時期被毀的部分古蹟文物等統計如下。**

- 1·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揚灰。
- 2· 造字者倉頡的墓園被毀，改造成了「烈士陵園」。
- 3· 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塚掛上了大喇叭。
- 4· 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遊街示眾。
- 5· 世界佛教第一至寶，佛祖釋尊在世時親自開光的三聖像之一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面目。
- 6· 孔子的墳墓被鏟平，挖掘，『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塑像被搗毀。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孫令貽的墳墓被掘開。
- 7· 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至今日，「橫掃」之後，廟、墓皆被砸成一片廢墟。文革後去霸王廟的憑吊者，見到的只是半埋在土裡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
- 8· 在橫掃一切的風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燭、籤筒被打爛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毀於一旦。
- 9· 頤和園佛香閣被砸，大佛被毀。
- 10· 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毀無遺。
- 11· 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書記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廟宇。全市一百九十處廟宇古蹟，除十幾處可保留外，通通毀掉。他一聲令下，一百多處古蹟在一天之內全部毀掉。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趕到芳林寺，只撿回一包泥塑人頭。

12· 醫聖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聖祠」已不復存在。

13· 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燒。

14· 漢中勉縣「古定軍山」石碑，也因諸葛亮是個「地主份子」而被砸毀。

15· 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佔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祇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陪伴書聖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 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松贊崗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覺拉寺，被搗毀。

17· 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一旦。

18· 河南湯陰縣中學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19·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廟，連岳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揚灰。

20· 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了個稀爛。

21·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炸藥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乾二淨。

22· 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

23· 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24· 北京城內袁崇煥的墳被夷成平地。

25·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掃了個一乾二淨，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的墓給挖了。

26· 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他的人來此憑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現在《西遊記》成為「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裡的「封」，吳氏故居也就「被毀為一片廢墟」。



27·紅衛兵掘開蒲松齡的墳，教書匠蒲松齡真窮，墓裡除了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疊書外，只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於野。屍體被搗毀。

28·建於一九五九年的吳敬梓紀念館在文革中被鏟平。

29·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千古義丐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遊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

30·張之洞的墳被刨開。張是個清官，墓裡沒一點珍寶，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屍體吊在樹上。張氏後人不敢收屍，任屍體吊在樹上月餘，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區的恩濟莊埋有同治、光緒兩朝的宮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墓，鑿開的墓穴裡，只有頭骨，不見屍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後不知所蹤。

32·河南安陽縣明趙簡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毀。

33·黑龍江黑河縣有座「將軍墳」，「因為屬於『帝王將相』，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34·宋代詩人林和靖（公元967—1028）的墓也在被毀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作了犧牲。

36·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氏墓，將他的遺骨拴上繩子拖著遊街示眾。革命小將們一邊拖著骨頭遊街一邊還鞭撻那骨頭，好像相信康氏靈魂附著在骨頭上似的。遊完街，康氏的頭顱被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標籤上寫道：「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

37·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介石舊居，蔣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開，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38·南漳縣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塚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39·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俄、英、德等貪婪商人盜割，賣到西方。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將剩下

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

40·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如今，那對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隻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

41·安徽霍邱縣文廟，雕梁畫棟、飛簷翹角，龍、虎、獅、象、鼈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復原』。山東萊陽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簷斗拱，氣勢雄偉……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成殿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後歷時五年方修復。

42·唐代高僧褒禪結廬安徽含山縣花山，死後弟子改山名為褒禪山。宋王安石遊覽此山，作《遊褒禪山記》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

43·全國最大的道教聖地老子講經台及周圍近百座道館被毀。

44·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經另一宋代大家蘇東坡手書，刻石立碑於安徽滁縣琅玕山腳當初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將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計劃的毀滅古蹟，文物古董毀壞的更多：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過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撲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裡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他被趕回了安徽老家。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沈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八十四歲的杭州名學者馬一浮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滿天下的上海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也是八十四歲。他擔心『反動書畫』累及家人，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裡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人靜時提出家門，倒進蘇州河。

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裡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裡，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祇落得『四舊』二字，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湖南江永縣有一種僅為婦女懂得的文字，人稱『女書』。雖流傳已近千年，因為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燒書污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裡，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骯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的研究資料。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盜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將他的

作品摔了個稀爛。不久，朱淒慘地死去，國寶不復再現。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淩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拿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他化了幾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張古版畫，如今被燒了個一乾二淨。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已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燒。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鐘樓大街的鐘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畫』被一幅幅拿出，批鬥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面上用紅筆打個叉。

因江青點名咒罵了名畫家齊白石。北京的紅衛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跡。上海畫院七十五歲的畫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七十餘方齊白石為他的刻的印章一個沒剩。

一九五二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在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氏為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劉岷（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後，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摺在壁爐旁，然後，點著火爐，一塊一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北京人都知道拆古城牆的事，但是誰知道什麼是雙塔慶壽寺？京城第一皇家名利，兩座 800 多年的古塔，什麼也沒留下來……



# 文革造反時期語匯

## 何彤 收集

**編者前言：**收集整理一些「文化大革命」時期大陸著名流行語，供大家茶餘飯後一笑，但笑後會有怎樣的感覺呢？我的感覺是：

荒唐時代荒唐事，荒唐人說荒唐言；  
荒唐之言使人笑，笑後倍令此心酸。

## 頌毛類

「首先，讓我們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們最最最敬愛的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讓我們共同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最最最敬愛的林副統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爲了向毛主席敬獻忠心，我們可以犧牲一切。」

「一心想著毛主席，一切爲了毛主席

生爲毛主席而生，死爲毛主席而死」

「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對我反對」

「把對毛主席的忠誠，融化在血液中，銘刻在腦海裡，落實在行動上」

三忠於四無限：

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對毛主席要無限熱愛、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

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林彪語）

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地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柯慶施語）

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讀問題多，兩天不讀走下坡，三天不讀沒法活。

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跟著毛主席，永遠鬧革命！跟著毛主席，世界一片紅！

主席教導光芒照，革命戰士逞英豪。

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萬歲！萬萬歲！

## 仇恨類

誰敢反對毛主席，就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林彪語）

誰敢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最高指示）

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最高指示）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最高指示）

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

八億人，不鬥行嗎？（最高指示）

## 對人民的要求類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高指示）

一不爲名，二不爲利（最高指示）

要鬥私批修！

黨叫幹啥就幹啥，做一個齒輪與螺絲釘。

寧可前進一步死，不可後退半步生。

革命戰士是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

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裡需要哪裡去，哪裡艱苦哪安家。

狠鬥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林彪語）

寧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大慶人語）

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先治坡後治窩（大寨），先生產後生活（大慶）

## 工作指導類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農業學大寨 工業學大慶

抓革命，促生產。

深挖洞 廣積糧 不稱霸

要準備打仗

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最高指示）

行動戰鬥化，思想革命化，組織軍事化，領導一元化。

億萬人民億萬兵，萬里江山萬里營！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最高指示）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 文革派仗類

誓作中央文革的鐵拳頭

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文化革命齊造反，革命路上當闖將。

忠於毛主席忠於黨，黨是我們的親爹娘，誰要是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紅色恐怖萬歲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知識越多越反動！

堅決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毛主席呀，毛主席！造反派戰士想念你！

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倍覺主席親！

偷有理，搶無罪，革命的強盜精神萬萬歲！

文攻武衛，針鋒相對。

頭可斷，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頭！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火車）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

### 國際類

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

我們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勞動人民！

幸福的中國人民深情惦記著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美國人民。

把紅旗插遍全球，插上白宮和克里姆林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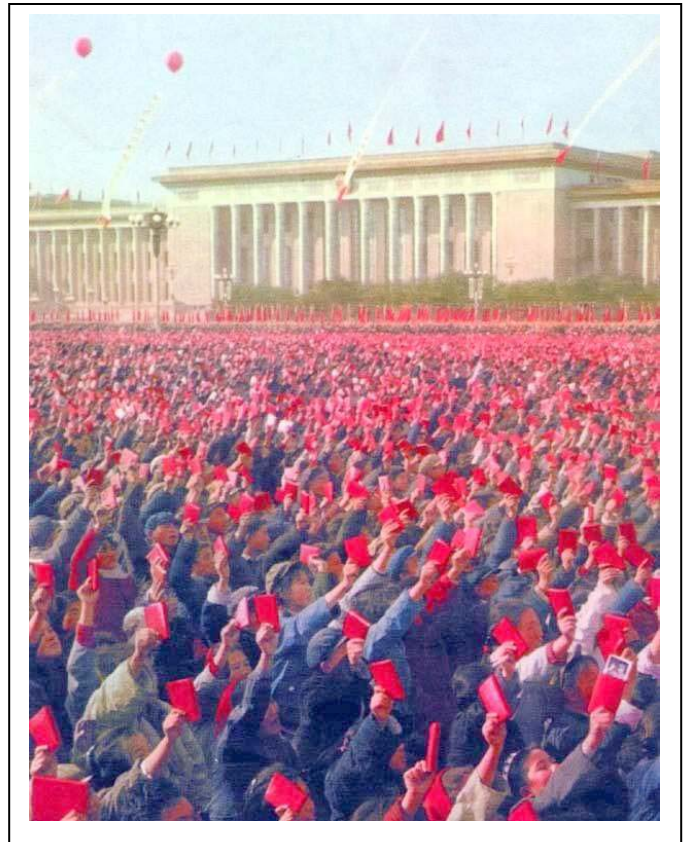
中阿(阿爾巴尼亞)友誼萬古長青

中朝兩國用鮮血凝成的友誼牢不可破。

中國是越南人民最強大的後盾，中國遼闊的國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中國願為越南人民付出最大的民族犧牲。

東風吹，戰鼓擂，這個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 荒唐



# 時代

# 俄羅斯三家電視臺 披露蘇聯八一九政變內幕

莫斯科 王依同

今年 8 月 19 日，是前蘇聯八一九政變 10 周年，全俄電視台、俄羅斯電視台、獨立電視台等三家電視台在當天紛紛報導、播放當年政變和粉碎共產黨政變全過程的錄影和評論。許多世人不知的情節過程，終於大白於天下。許多參加政變和反政變的人接受了採訪，組合起完整的畫面。

## 一. 政變的起因

當時的蘇聯總統，世界上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戈爾巴契夫，在國內打破了許多共產主義枷鎖，推行自由化，逐漸消除兩大陣營的冷戰與對峙，人們開始享受到了空前的自由氣氛。教條冷酷的共產黨黨魁們，感到戈士離開共產黨僵化教條太遠了！特別是取消憲法第六條以後，准許人民自由成立黨派，當時一千四百萬共產黨員，已有四百萬退了黨；預計第二年還會有五百萬人退黨，共產黨馬上就要解體垮台。這是一個因素。戈巴契夫準備在 1991 年 8 月 20 日重新製定加盟共和國條約，讓各加盟共和國取得更多的權利。並讓現任哈薩克斯坦總統的納紮拜耶夫擔任總理。納紮拜耶夫的自由開放形象很受蘇聯人民的歡迎。這就使共產黨的保守派們感到末日來臨。新總理上台，必然要挑選更換自由開明的成員，共產黨的死硬頑固派克格勃的頭子克留其闊夫，私下勾結國防部長、陸軍總司令、內務部長、政府總理和副總統等人(副總統是在政變後才知道的，但同意參加政變，擔任領導人)，他們爲了保住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合謀發動了這場政變。這也是要繼續走共產主義這條死胡同的蘇共黨魁們，向自由民主派人士發動的把蘇聯拖回老路的奪權行動。

## 二. 政變過程

他們選擇戈爾巴契夫到克里木別墅度假的契機。因爲蘇聯所有的政變，例如搞掉改革家赫魯雪夫，都是選擇領導人“度假”時進行的。而這次政變最大的障礙葉利欽，也在他的別墅阿裏桑給度

假。他們準備在發動政變後，葉利欽若不同意，就逮捕他。

8 月 15 日柯留其闊夫下令 KGB 監聽所有領導人的電話。首先派托爾斯泰的一個重孫子--KGB 第九局、戈爾巴契夫所在度假地克裏木的 KGB 頭子，負責包圍了戈爾巴契夫的別墅。戈爾巴契夫是從美國之音廣播那裏知道發生了政變的(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不偷聽美國之音廣播的。只是幹擾人民收聽)。

8 月 18 日下午 13 點由成立的“該該辦”(政變委員會)派人下令讓戈爾巴契夫下台，宣佈副總統依納耶夫爲“總統”。下午 16 點戈爾巴契夫對外的所有聯繫被切斷。但是戈爾巴契夫拒絕簽字下台。於是政變委員會宣佈：“戈爾巴契夫生病，國家進入緊急狀態。”8 月 20 日戈爾巴契夫在別墅裏，用一架自己的錄影機，錄製下對全民的宣言，擔心被殺掉。當天政變委員會成員、政府總理巴布洛夫宣佈退出政變委員會。

8 月 19 日 0 時 30 分，政變委員會正式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由依納耶夫出任總統。這時所有在場的人都看到，依納耶夫“總統”手在不停地顫抖。人們知道，他在害怕，缺乏自信。早晨 6 時政變委員會舉行新聞發佈會，對全民發表宣言。

第一位反政變的英雄是位女記者，在新聞發佈會上她大聲質問：你們是否明白，昨天發生了政變？你們自己怎麼認爲？應該和 1917 年相比呢？還是和 1964 年相比？尖銳的話語喚醒了人們，使政變委員會無言以對。

## 三. 葉利欽領導莫斯科人民反政變



早在 8 月 16 日，柯留其闊夫下令 KGB 七局和國防部共同組織制訂計畫，捉拿可能成為政變障礙的俄羅斯領導人葉利欽。葉利欽最早是從妻子那裏獲知政變消息的。

8 月 19 日 9 時，當時幾乎所有聞訊政變的俄羅斯領導人，都跑到葉利欽的別墅商量對策。蘇維埃議會主席哈斯部拉達夫，也跑到葉的別墅。葉與眾人商討起草對全蘇人民的宣言。俄政府當時的總理哈德布拉德夫、列寧格勒當時的市長卡恰朵夫，莫斯科當時的副市長盧什科夫，共同簽署了對全民宣言：宣佈政變非法。

俄羅斯第一任國防部長戈拉喬夫當時是蘇聯空降兵的總指揮，他首先是個政變者，積極參與制定捉拿葉利欽的計畫。8 月 19 日早晨葉利欽給他打電話，他說派自己的部隊來“保護”葉利欽。事實上派來的是 KGB 阿利法的別動隊，他們穿了空降兵的服裝。別動隊的頭子達耶夫上校被葉利欽的一個侍衛認出。葉讓自己的衛士假裝沒有認出他們，導致阿力法失去警惕後，葉利欽從別墅後門逃出。

葉利欽跑到了俄羅斯政府和議會所在地“白房子”。立即與將出任蘇聯新總理的納紮拜耶夫及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聯繫，聯合抗擊政變。但沒有得到回復，證明他們在觀望，看哪頭風硬。

柯亞利比捷夫（此人後來出任俄羅斯安全委員會主席），是蘇聯在阿富汗戰爭中的英雄。他派了一個團的部隊來保護葉利欽所在的“白房子”。8 月 19 日 12 時 25 分，葉利欽跳上坦克，發表告俄羅斯人民書，宣佈政變非法，號召人民反抗政變，保衛俄羅斯政府和議會。要求“讓戈爾巴契夫出來工作！”“讓戈爾巴契夫出來工作！”8 月 20 日 14 時，柯的四輛坦克和一個團奉命開走，留下葉利欽自己面對敵人（編按：如果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或更早，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趙紫陽也能象葉利欽那樣，八九年之後的中國將會怎樣？顯然，在葉利欽的面前，被當今保共改良派們所稱頌不已的趙總書記，顯然在利用了民主運動之後，卻根本不敢對民主運動和中國人民負責，他的黨性還是戰勝了起碼的人民性……）。

政變總統依納耶夫下令列比捷夫和戈拉喬夫制定攻擊白房子計畫。當時阿利法別動隊有六十名隊員受命指揮向白房子攻擊，十輛坦克包圍了白房子，決定

凌晨 3 點發起進攻議會。但被反政變的英雄的莫斯科市民組織的人牆晝夜阻止。當時所有的電視台都被政變委員會控制，但在白房子內尚有天線電台，記者們就用天線電台組織反擊。21 日凌晨 1 時，三名市民為了阻擋裝甲車被殺害。人們在大街上高喊：“兇手！”“兇手！”（編按：回憶一下八九年吧，你就可以知道，由此可見，我們中國人民的素質一點也不比俄羅斯人民差！差的是那些直到今天還在被歌頌的共產黨領袖們！）

#### 四. 政變流產，人民勝利了！

政變委員會派來的十輛坦克，一直堵在議會的橋前。20-21 日是最危險的時刻：白房子失守，則政變成功。但是政變委員會低估了人民保衛民主進步、反對 KGB 和共產黨的決心和力量。以為坦克出現，一恐嚇，一輾壓，人們就會退卻。所以坦克沒有帶炮彈，士兵也沒有槍枝和子彈。相峙之下，人們開始登上坦克，拆卸坦克（蘇聯人都當過兵，熟悉坦克性能）。

在關鍵的時刻，指揮這十輛坦克的上校達吉莫瓦決定支持葉利欽，率坦克向人民投降了。達吉莫瓦成了自由俄羅斯的像征，獲得自由勳章。但是十年後的回顧說，歷史對這些人並不公平。這些人只得到一枚勳章，就被忘記了！達吉莫瓦後來說，政變委員會確實膽怯了！最後也沒有準確命令進攻白房子。“就是下令進攻，我們也不會進攻。因為擋在我們面前的是人民，我們怎麼能向人民開槍呢！”（編按：可見，素質低的，並非我們的人民，而是共產黨領袖和他們的軍隊。因為，我們的人民在當時，已經做得夠好了，太好了，比俄羅斯人民還要好！）

8 月 22 日，最後勝利的人民高喊著，消滅 KGB！人群從白房子擁向 KGB 總部所在地的捷仁斯基廣場，打砸 KGB 創始人捷仁斯基的巨大塑像，這是全世界鼓吹共產主義道路的國家，無一不學習和擁戴的萬惡的鎮壓人民的劊子手鼻祖，大獨裁者的像征。工人開來吊車吊索脖子把這傢夥吊走，只留了個基座，被人民塗上黑漆，畫上骷髏頭，永留恥辱在那裏。這個魔鬼廣場現改叫魯賓廣場（編按：中國會有那一天！）。

#### 五. 戈爾巴契夫回到莫斯科

戈爾巴契夫被圍困，每天只能靠聽美國之音廣播

判斷形勢和消息。8月20日形勢異常嚴峻緊張，葉利欽派自己的助手顧柯夫去同政變方面的指揮官格拉喬夫談判。顧柯夫打電話報告：“他們已經控制不住形勢了！”要求葉利欽和自己一塊兒去接回戈爾巴契夫。葉利欽不同意親自前往，讓俄羅斯副總統魯斯科依前去見戈爾巴契夫。KGB頭目柯留其闊夫也搶著去見戈爾巴契夫。在空中他們就展開了競爭。

當魯斯科依和柯留其闊夫同時到達戈爾巴契夫在克里木的別墅時，戈爾巴契夫還沒有決定跟哪一派走。戈爾巴契夫明白：在勝利的葉利欽面前，沒有他的位置。

爲了防止KGB暗算戈爾巴契夫的座機，魯斯科依把柯留其闊夫押作人質，同戈乘一架飛機飛回莫斯科。到達莫斯科烏奴哥瓦機場，柯留其闊夫立即被逮捕。當天，所有政變委員會成員均被捕。兩天後，蘇聯政變總指揮長官和內務部長自殺。

在葉利欽的壓力下，戈爾巴契夫宣佈暫時取消共產黨。葉利欽下令，葉的助手顧柯夫成爲安全委員會主席。

8月22日早8時，政變總統依納耶夫自己認罪求饒。說“一時糊塗，犯了錯誤”，請求留下他的生命。因爲他十分清楚前蘇聯是怎樣消滅叛徒和敵人的。

所有的政變領導人都進了監獄。但是幾年後，由於蘇聯解體經濟沒搞上去，共產黨又伺機東山再起，雖起不了主導作用，但在議會（杜馬）佔有席位，把參加政變的所有罪犯都赦免釋放了。

歷史的笑話是，8月22日，那個副總統哭喊著讓戈爾巴契夫留他一條狗命，承認自己參加了政變，承認自己是有罪的人，十年後他重新獲得了自由，又變了嘴臉。高喊：“沒有發生任何政變，戈爾巴契夫知道我們要搞什麼，是他宣佈‘緊急狀態的’！”（編按：這就是共產黨！）

戈爾巴契夫回到克裏姆林宮，立即召集各加盟共和國重新簽訂聯盟協定。但此刻葉利欽強硬起來，他自食其言：“讓戈爾巴契夫出來工作！”的話言猶在耳，利用戈爾巴契夫的名義反政變成功（因為只要不接回戈爾巴契夫，自己所做的一切仍屬非法），現在已經不聽總統的領導了！他帶頭拒不簽訂新的聯盟協定。儘管戈爾巴契夫一再讓步，可以簽成“聯邦”或“邦

聯”的形式，保持蘇聯。但是葉利欽不聽他的了。使戈出來無工作，未能發揮他早已具有、等待契機成熟、再大膽的領導蘇聯人民全面走向自由民主繁榮。只是在政變中被雙方爭取利用，粉碎政變後，失業、“下崗”，世界上最優秀的政治家、領導人，未能再發揮更好的作用和影響，是整個蘇聯和俄羅斯的巨大損失。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經濟方面，現在看得更清楚了（編者按：我們切不可用假設來代替歷史。首先，前蘇聯的崩潰，罪不在葉利欽，而是在共產黨頑固派們企圖倒退的政變。其次，是共產黨七十四年的倒行逆施，才為它垮台之後的俄羅斯留下了一個“爛攤子和窮攤子”，而不是葉利欽和俄羅斯人民的反共革命之罪。況且，進步，同樣需要“過程”，非能一蹴而就。第三，復辟，乃是一切失去了權利者共同的倒退願望，今日俄國共產勢力的抬頭，恰恰說明，十五年前的俄羅斯反共民主革命雖得之於共產黨，又失之於共產黨。據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一九九一年八月之後，俄羅斯共和國的層層權力，依然與昔日蘇聯共產黨及其整個官僚體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其層層掌權者，絕大部分依然是當年的共產黨人……。這是一個教訓，雖不沉痛，卻異常麻煩。來日的中國人民尤當記取之）。

大國俄羅斯領導人帶頭拒簽，再加此前一直鬧獨立的立陶宛、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等小國不參加，聯盟等於自然解體。

葉利欽自己與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兩個大點的原加盟共和國，簽訂了一個“獨立國家聯盟條約”。導致蘇聯徹底瓦解。蘇聯的解體，共產黨的死硬分子發動欲把蘇聯拉回老路的開歷史倒車的政變，是第一原因；反政變成功的葉利欽，不服“天朝”管了，借機分裂獨立。是第二個原因。（編者按：前蘇聯的許多所謂加盟共和國，本來就是列寧和斯大林用機關槍和坦克車強奪而來，原來就存在著民族壓迫和專制壓迫所製造的深重民族矛盾。所以，前蘇聯共產制度的崩潰和共產黨的垮台，就勢必會帶來這樣一個使前蘇聯解體的效應。這不是民主之錯，而是專制垮台之後的伴隨現象。但前蘇聯的悲劇，顯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在共產黨誕生前就是一個民族和睦、並且獲得了基本統一的國家。特別是自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創建之後，更鮮有邊疆

少數民族要鬧獨立者。而台灣獨立運動，則為第三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一手製造。歷史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分裂了中國，並出賣了自己的疆土，同時欺壓著境內的少數民族。此罪在中共，而不在漢族和中國。所以，中共垮台，中國民主，理應不該產生如是的效應。如果屆時出現前蘇聯的情形，則必定是國際國內分裂勢力企圖利用中國民主變革而欲製造混亂，其結果，便是我民族精神的重新凝聚、民主進步的必然實現和國家統一的必定完成）。

戈爾巴喬被全面架空、廢置了。（也許跟隨失敗的政變分子回來，政變分子能依靠讓步，戈能進一步改革開放，保持蘇聯。）戈巴契夫無奈的宣佈：蘇聯到1991年末正式解體。（編者按：歷史何能假設？）

## 六. 綜合各電台報紙評論

改革家的赫魯雪夫當年提出要建設一個“帶著人的面孔的社會主義”，蘇聯歷史學家評論：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具有人性，無論如何不可能具有人的面孔，所以赫魯雪夫必定失敗。此後進入勃列日涅夫、契爾年科、安德羅波夫的“穩定時期”（即保守時期），沒有什麼作為和變革。而戈爾巴契夫在八五年——相繼死掉了勃列日涅夫、契爾年科和安德羅波夫，才可能進行改革。即改革掉社會主義的反人民的本質部分。

共產主義這條蠱惑人心的死胡同全世界都走到了盡頭，只是為了維持統治，有的國家領導人，雖然心知肚明，還要打著這個破旗，再欺騙半個世紀。

共產黨的專制、獨裁亙古未有。戈爾巴契夫給人們以寬鬆的氣氛後，葉利欽帶頭退出共產黨。在八一九政變前，葉利欽就要把共產黨趕出俄羅斯政府和議會。思想激進，與戈爾巴契夫總統意見常常相左。1987年，中國當時的領導人趙紫陽訪問莫斯科，作為莫斯科州長的葉利欽幾次想要會見趙紫陽，就中蘇未來走向，世界格局分佈等問題交換看法。趙紫陽堅決拒絕會見葉利欽（編按：請注意趙的黨性本質，還有趙的不可能背叛性）。人們都遺憾這次歷史性的會見沒有進行。也可能這次會見會改變趙紫陽的一生和中國人的命運（編按：還是不要假設的好）。後來人們才知道中國的總書記、政府總理，屬於傀儡。他們的身後真正掌權者，是古羅馬帝國元老院的中共特色的

“八老干政”。鄧小平死後才宣佈，第二代領導人華國峰；第三代胡耀邦、趙紫陽，都是掩人耳目的牌位，只有鄧小平自己才是真正在幕後操縱的領導人。（中國人稱為“垂簾聽政”，後來凶相暴露：原來是垂簾聽政）老傢伙們自己說“廢除了終身制”，只是“人民不答應”。

星轉鬥移，欺世盜名半個多世紀的“共產主義”，後來遭到全世界人們的唾棄。社會主義紛紛垮台，中共領導人慌了。南面與越共打鬥正酣，趕快叫停。否則世界上再沒有可作陪葬的共產黨國家了。古巴卡斯楚政權全世界嗤之以鼻；剩下一個反人民反民主的社會主義北朝鮮，1999年餓死了15%的人（370萬）受苦受難、大饑荒，是社會主義的“專利”。追求現實的中共領導人不再完全理會它，在抗議聲中和南韓建立了外交關係。被中共領導曾經視為敵人的蘇聯（後來的俄羅斯），曾被中共領導人討厭過的堅決反共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中共後來也不得不回頭緊緊抓住，“講友好”，講尊重，講“戰略夥伴”。能夠搭上話，就自我安慰“外交勝利”，以避免徹底孤立。所以中共七常委，才會走馬燈似的訪問莫斯科，拜謁葉利欽，表示敬意，能受到接見，已求之不得。而葉利欽對社會主義、對共產黨可謂厭惡極了。後來一直遭到軟禁的趙紫陽，反過來想求葉利欽接見居然已不可能（編按：這才是歷史的嘲諷！）當年趙紫陽總理到蘇聯訪問，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要求會見，趙躲開了他——也許當年葉利欽就要忠告趙紫陽，當坦克開到人民面前時，你就應該跳上去演講莫遲疑……

歷史證明，雖然葉利欽搞經濟一竅不通，治理國家也並非能人。一年四次隨心所欲地換總理，盧布一年恰好貶值四倍！一半人的生活還不如以前。98年盧布穩定時的統計：23%的人非常富有；27%的人生活超過共產主義時期；25%的人生活下降；25%的人沒有工作、沒地方找飯吃。但是，每一次大選，人們還是投葉利欽的票。為何？就是因為葉利欽反共最堅決！人們害怕共產黨再上台，能頂住共產黨，非葉利欽莫屬。這就叫寧肯挨餓也不要共產黨，這就是葉利欽的歷史政治價值之所在！雖然久加諾夫的共產黨上台也不能全走老路，不會再走過去的社會主義。但只因人民對共產黨怕透了，也恨透了，才就是不選他！

現在的普京上台，人們也只好認可。雖然他崇尚

共產時期的一部分，但是還不敢放棄民主。例如他兼併了私人電視台，使之聽從官方導向。全世界評論認為俄羅斯現在是半自由國家，但是自由還是有的。例如九一一恐怖行動後，莫斯科電視台公開評論：普京自己製造的莫斯科幾處爆炸案，嫁禍車臣，以能爭取民心民意，大規模出兵。穩定提高了自己的地位。這種說法無論真假，戲言也好，諷刺也好，都說明了俄羅斯還有自由的。不是純社會主義那種只准秉承一個人的禍國殃民思想、講話去硬性貫徹宣傳。老百姓永遠被愚弄。

葉利欽執政時期，許多方面顯示他很霸道，但是允許民主，從不含糊。例各電視台經常報導，葉利欽第一次出國訪問出醜記：一分鐘後還不知如何跟隨儀仗隊長下去檢閱，站在那裏發傻：應該從正面走下去？從左側和右側面走下去？廣告也允許人們利用畫面：葉利欽和俄總理交頭對話，畫外音：他倆說，我們公司的產品最好！

葉利欽對蘇聯和俄羅斯的貢獻，就是膽識並俱，率領人民粉碎非法政變，消滅了共產黨；引進了全面民主。缺點是沒有完全排出不斷製造麻煩的共產黨餘孽，使他選定的最優秀總理、改革家蓋達爾沒完成俄羅斯經濟快速恢復與轉軌，就被轟下了台，而使俄羅斯經濟迄今不倫不類，未能走進迅速發展的良性快車道。



圖片說明：1991年8月19日，葉爾欽在莫斯科向民眾呼籲舉行全國總罷工和大規模示威（法新社圖片）。

## “六四”

### 不能為紀念而紀念

（2006年6月3日在海外紀念六四集會上的講話）

魯德成



女士們、先生們：

我是前不久剛從中共“在秦國的監獄”被大家救出來的魯德成。十七年前，我和餘余志堅、喻東嶽只是以象徵性的方式，吼出了千千萬萬中國民眾對亙古未有的專制、暴虐的中共鬱積已久的憤怒。可是，卻慘遭中共歇斯底里的報復。十七年後的今天，我們終於重見天日。艱難的勝利使我們再也沒有鬆懈反抗中共暴政的權利了。今天，我們站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遙祭“六四”的死難者，如果僅僅只是為了記住這個特殊的日子而集會“紀念”，那麼，它勢將失去其應有的意義和目的。

十七年來，年年集會，十七年來，年年紀念。可是，集會的規模卻越來越小，參與紀念活動的熱情也越來越淡泊……這是為什麼？難道是我們的心腸變冷變硬了嗎？難道是我們真的已經忘記了當年那些為保護廣場上的學生、挺身而出擋坦克、臨危不懼擋子彈、義憤填膺燃軍車的“王維林們”了嗎？不！我決不相信。



現在在海外有一種極不正常的論調，只談民主，不言反共，只反專制，不反中共！朋友呵！請切記，中共才是阻撓中國民主化和破壞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礙。只有融化中共一黨專制的鐵屋，才能踏上中國民主化的最初台階。而中國的民主化則是保障世界和平的重要前提之一。因為中共和世界恐怖主義從來就是難兄難弟一家親。

胸無全局，則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是錯的。中國民運的理論家們，必須具有高屋建瓴、旗幟鮮明的立場。不然，中國民眾將無所措其手足。“中共必亡”的宿命論，亦將成為自我安慰的笑談。

台灣當局對中國民運的“冷漠”，對中共的怯懦，是偏安、苟且的表現。“中共問題”不解決，1996年的飛彈，遲早會落入台北的凱格蘭格大道，此非戲言。

當代眾多的民主自由國家對中共的綏靖、姑息，是典型的飲鴆止渴。一旦中共自認為可以放棄“韜光養晦”時，殺人狂波爾布特必將復活。

不要以為這是危言聳聽。中共的本質從一誕生就已決定了它必然的走向。

今天，中國大陸的民眾為什麼毫無反抗中共高壓、恐怖統治的能力呢？一句話，是因為他們看不到堅強後盾的存在，因為在海外的我們還沒有形成團結堅強的陣容，還缺少強大的吸引力量。這也是海外中國民運每況愈下，有些地方甚至已頹變成“休閒民運”的原因。

十七年了，我們難道還要繼續這樣消極地等待下去嗎？

十七年啊，歷史還能留給我們多少個十七年呵！

消除對自己各種各樣的不利影響，丟掉對中共所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加強與國內國外各民族、各派別、各國人民反對專制、獨裁、恐怖的合作，以達成全方位解體中共的偉大目標，把人類最後一堵“柏林牆”推倒，還我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天賦的平等和自由！

雖然不能為紀念而紀念，但今天的“六四”紀念仍然是必須的。而且希望明年的規模更大。這樣，中國大陸的民眾將不會因失望而喪失鬥志。

謝謝大家！

## 憶喻東嶽

劉建安

### 評喻東嶽

——生吞活剝陸遊《訴衷情》

布衣初入九重城，相邀三豪英。對聯一副傳檄，蛋汁驚幽並。

時易失，志未成，鬢絲生。忘卻歲月，不識江山，也是功名。

### 歎喻東嶽

——生吞活剝李清照《聲聲慢》

平平淡淡，傻傻癡癡，清清冷冷寂寂。似耆似稚情景，如何待看？三親四友深情，怎奈何，不識顏面。刑滿也，憑誰說，東嶽不在牢監。

滿地淫雨枯草，神州悲，當代誰挽狂瀾？萬緒千頭，壯士三君赴難。慷慨更兼慷慨。六千天，滴滴點點。這次第，能一場絕食解懸？

——生吞活剝張孝祥《水調歌頭》（步原韻）

編輯喜塵靜，騷客愛雲留。何人敢畫悲壯，碎丸古城樓？瀏陽書生豪氣，瀟湘如今風景，九州忘吳鉤。詠歎觀禮處，駭浪與天浮。

憶當年，余喻魯，富春秋。為己作嫁，錦策不解，勳業睽優遊。赤山島失落照，洞庭湖邊衰草，渺渺喚人愁。我欲乘風去，擊楫誓中流。

### 狀喻東嶽

——生吞活剝喬吉《天淨沙》

寂寂寞寞天天，呆呆傻傻晚晚，事事倒倒顛顛。糊糊塗塗，活活神神仙仙。





## 問佛祖：好人平安乎？

喻東嶽是個好人，是個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廉恥諸備的好人。

在沅江赤山，喻東嶽與我交流有兩年多。每月有一兩次長談。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故舊新交，政治、歷史、監獄，但從無一句惡言惡語，也不予人惡評。記得 91 年秋，他說起澧縣籍犯人頭范子平等與他過不去，他也只是說起自己處置不當。他自責甚嚴，如說他對他舅父關心之不夠，說害得爲他裝收音機的服刑人員進了小號子，連累另一人爲送煙又進了小號子，等等。他是個愛人的人。

同在沅江赤山的牢友一直在盼望他歸來。他的一個現在官場的同學爲關懷他屢施援手。

他的情人曾幾次前去赤山接見。志堅則看他比自己還重。他的家庭以他自豪。愛人者，人恒愛之。

愛人，人愛，於是得乎仁。

對於 1989 年城樓事件，此地我不作贊否，不論是非，不評得失。

但，他們不爲富貴，不爲利祿，非偷非竊，這應當誰也難以否認。

他們爲國爲民之心，我想大多數人是會認可的。許他一個義字，我想決不過份。

東嶽是個謙謙君子。

他背有點駝，此形乃自謙、自卑之心的外露也。

待人以禮。可惜，在監獄那流氓爲主的小天地中，禮多視爲虛偽，視爲窮酸。他正是以禮、以理待人而鶴立雞群、不被見容的。

他守禮。

我智商未測試，但我估計是平平之質。但由於勤學，也頗有自豪之處：

僅僅初中二年級的學歷，1978 年暑假，沅江縣陽羅區 4 個公社組織 300 名教師考試，我獲得了全區語文第一的成績。

離開課桌 13 年後，以高於重點大學分數線 50 分、益陽文科第一的成績，成爲湖南師大曆史系 1979 級學生。

喻東嶽君卻是我結交中自愧不如、甘拜下風的學人之一。

他一筆好書法，擅長繪畫，這是我望塵莫及的。

他善於文章，短短的篇幅，能屢出脫俗之語，既畫龍栩栩如生，又點睛活現生龍。幾個詞，一兩句話，便嶄露洋洋才氣。

他更酷愛朦朧詩。他的朦朧詩，琴音月色，多可若見若聞；抒情吐志，堪列懷瑾抱瑜之屬；嘻笑怒罵，皆入無人之境……朦朧詩是他的第二生命。由於常常要搜監，不知他那卷詩稿何在？那是他靈魂的“舍利”，是湘地物華的晶體。

東嶽 4 歲啓蒙，小學跳級，15 歲上大學，18 歲大學畢業，1989 年他 21 歲多，同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年齡一般般。

他是聰慧的。

於是，可謂“智”。

他守信。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君子之交莫如信。在那源于不自由的特殊的環境中，他亦重承諾。對於借還的不得不失信，他很痛苦。與人相交，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他清澈如一潭潔靜的水，沒有城府，沒有狡詐。你完全可以信任自己一樣信任他。

他是信人。

志堅告訴我，當年，是他鼓動東嶽投入到 89 風波之中的。意氣相投，但，東嶽家困難，他是長子，一個妹妹在讀高三，一個弟弟他帶到單位上在縣城讀書。

東嶽面臨“忠孝”的選擇，自古“忠孝不能兩全”的抉擇。終於，他義無反顧地去了，

一去近 17 年。

臨行前，志堅借給他 50 元，寄給 1983 年“嚴打”入獄的他舅舅。

臨行前，東嶽買了一袋米、一壺油，送給妹妹交學校食堂。

於是，可謂“忠”、“悌”。

東嶽之父英葵先生，年逾花甲。

英葵先生兩歲失母。內向。少語。

東嶽之母吳平花老人，外向，善談。

喻吳氏總說起東嶽小時候的順，說起他對於父母的愛，說起他 18 歲即扛起贍養弟妹的重擔。

東嶽是個孝子。

東嶽有節氣。

他守著正義的標準，守著是非的大處。

他不隱瞞他的觀點。

他不為逆境放棄他的操守。

他正是守節，才遭到“管理犯”羅桂文的毆打。

東嶽沒當官，我無能證明他是廉潔的。但他物欲較低。如果當初讓他選擇，大概一間書房、一間畫室，應是他的天堂。

他常常一文不名。

他的嗜好，是吸煙。

東嶽是有恥之人。

我認為他過於自責了。

他象愛惜自己的羽毛一樣愛惜自己的榮譽。

總之，喻東嶽是個好人，是個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廉恥諸備的好人。

“好人一生平安”是中國社會頻率很高的流行語之一。

反語是，“壞人將遭報應”。

老天開眼啊！

這是佛教倫理。

喻吳氏老夫人信佛。

今天，她約我陪東嶽去關帝廟去燒香，請我佛保佑，保佑她的兒子早日康復，保佑他兒子的見面與未見面的所有朋友們平安。但我要回去，明天要上班。

過幾天，她要帶兒子去離社港鎮 20 多華里的老家雙江村去祭祖墳。5 斤香，5 斤燭。喻母說，東嶽的曾祖父松岩（繼芳）公，是湖南有名的慈善家。祖宗有德。她相信，有德的祖宗，其後代應能擺脫厄運。

東嶽，何時能共飲、齊歌，何時又以文會友？

問佛祖：好人平安乎？

喻東嶽，這個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廉恥諸備的好人，能平其身、安其神乎？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我佛，合十為禮了！

## 魂兮歸來，喻東嶽！

2005 年，我有《歸來兮，喻東嶽》一文，刊載在海外《黃花崗》雜誌。

如今，喻東嶽身已歸，而魂卻不知在何處。

2006 年 2 月 28 日，我到瀏陽市社港鎮喻府上去訪問東嶽。

我離開沅江赤山是 1995 年 2 月 2 日。一別整整 11 年。

我記憶中，東嶽 1.73 米的個子，五官線條如雕如塑。濃眉、大眼、隆鼻，英俊、漂亮。

白白淨淨，質質彬彬。背微駝。一個謙謙君子。

幸好，沒有很大很大的改變。當然，是指 11 年前的他，而非 16 年前的他。

最明顯的變化，他的頭髮白了一多半。比我的頭髮白得還多。

他今年將滿 38 歲。比我小 17 歲 10 個月。

比我的頭髮白得還多呀。

昨天下午見面時，他在電視機前，離僅 30 厘米，好像在看，又好像僅僅在那兒發呆。

我喊他，他置若罔聞。

他在二樓。

他母親示意、拉手，於是，東嶽在三人中間，一步步地下樓。

他不知入席，也不知落座。

用語言，加手推拉，坐下了。

他笨拙地扶起了筷子。

他一粒粒地吃飯。一莖莖地吃菜。

大概 20 克左右。他放下了碗。

端坐。

肥厚的大手掌一左一右按在大腿上。

喊他再吃點。聞若無音。

她母親說：他中餐也吃得少。厭油。膽有病。

飯後，上三樓。

步履不穩、不流暢。笨重。

扶梯太矮，我在後很爲他擔心。

示意、拉手，他坐下了。

他有時眼神一掃，似乎與你交流眼神，那一剎那間，眼神真有神，亮，靈，應是這眼神，1992-1995年間迷惑了我。現在我才得以反反覆復觀察，得出結論：他仍不知他看什麼，他仍沒看到什麼。

大多時候，他的眼神是內斂的，可謂之“睜眼瞎”。

內斂的眼神，反映出他在不停頓地有大腦的運動。

15年，他艱難地、而不是無效地運動著他的大腦。

他的大腦的自動恢復的功能至今是失敗的。  
無意識的大腦活動。

家人多次問他：你認識他麼？

他好像在回憶，有那麼“似曾相識”的表情，他妹夫拿著小黑板，讓他寫，他居然寫出繁體字的劉字，寫了“劍”字，又自語說，不對，他又寫了“建”字，接著，卻再不能繼續這一活動。

他又呆坐著。黑板聽之任之地擱在腿上，粉筆癡癡地夾在指中。眼神又呆了。呼之不應。

他有時抽煙。別人爲他擊火，他能就著把煙吸燃。

他沒有吸完過一支煙。

他總是把手中的煙忘記了。

煙灰不知彈掉。

煙燃到拇指也不知處理。

他也敬人的煙。

見人就敬。

他11歲多的侄女，他也恭恭敬敬地送上煙。

他有時保留著遞煙的老習慣：拇指捏著煙尾，豎著，讓煙嘴朝上，遞到別人手前。

他老有沉思狀。

二三十分鐘間，一般突然有幾句話蹦出來。

一句是“是大動物，不是小動物。……脊椎動物……”，我估計是生物課的記憶殘留。

一句是“……惟妙惟肖……”，上下文沒聽清。

突然有句英文，一般是片語。

稍縱即逝，飛快地來，飛快地消失了。

他又陷入呆呆的狀態。

喻母晚上煮了甜酒。

他吃了三小碗。

她媽媽愛憐地說，伢子，三碗了。

東嶽興奮地蹦出“三碗不過崗”。一笑復呆。  
那是武松打虎的名句。

整個夜晚，他沒有再朝著電視機望一眼。

他忽然站起來，走到大鏡子前。我也站到他跟前。

反復嘗試，沒有說成一句話。

他望著哪里？沒有望哪里。

僵硬的身姿，他卻能僵持許久許久。

他如飛地吐出幾句話。又是稍縱即逝。

腔調是授課。

他也許回到了課堂。他大學畢業後，是先在湘潭教書的。他的學生幾乎是他的同年人。

讓他睡覺。

這次他妹夫脫他的衣服。

妹夫試著讓他自己脫。他把幾條褲一下拉下，好像感覺不對頭，又都扯上去。

他妹夫把被揭開，他往床上一倒，不知扯被蓋，捲曲的身子，不知調整。

用力推他睡到床中間。

我睡在他隔壁。前幾晚是他父親睡在那兒。

他輕輕咳嗽。

他有輕微感冒。

晚上沒有起床。

他母親護持他，幫助他穿衣服。

上廁所方便。

他說：你畢竟是女同志，我是男同志。

他要自己方便。

他能分男女。但不識父母。不能區別長幼。

她母親說：

他以爲是住在旅社裏。

問一晚多少錢。

他誇獎他 11 歲的侄女：你這個總經理不錯。

她母親猜測：他記憶中的家還是老家的老房子。

他乾淨。

他文靜。

他母親爲他穿衣時，他突然打了自己一巴掌。

很響亮。

22 日，監獄有兩個員警送他到了他家。員警要他下跪以感謝父母之恩情。他真的下跪。

因爲招呼他坐、起、走，有時推、拉、引的動作，往往出他意料之外，他似乎是習慣性地驚恐著站住不動，作點頭蝦腰狀。

他有見警徽（國徽）帽的人下跪的習慣性動作。

他有打自己的耳光的習慣性動作。

這種屈辱他的動作，是員警行爲？是監視他的服刑人員的行爲？

我欲哭無淚。

我不相信監獄會派出低劣如此的員警一路跟到瀏陽來。

合理的解釋：以此測驗他的精神狀態。

我自責，這就是我的同胞。

我來了。他不知我來了。

我走了。他不知我走了。

我悄悄地走，正如我悄悄地來。

東嶽無動於衷。

我要得出我的判斷。

我不是醫生。

我對於精神病是外行。

對於腦科是外行。

這本來應該是省第一監獄的義務。

何況有 15 年的時間。

我猜測，監獄當局送他到醫院的診斷，是排除法。

排除了他是瘋子。

這是我 1992 年問陪護東嶽的服刑人員答曰“沒有給他服藥”的合理解釋。

對於喻東嶽的病情，我的獨斷，並非獨斷專行之獨斷，是獨自之獨，是判斷而非診斷之。

斷：喻東嶽是呆子。

由於 1991 年臘月外力破壞性地作用於喻東嶽的大腦，使他的腦受到器質性的破損，由於這部分大腦功能的缺失，東嶽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維能力、行爲能力。

不是完全的破壞，他不是植物人。

不是混亂性的破壞，他不是瘋子。

是局部性的破壞。他是呆子。

好比：瘋子是一個亂開車的司機，無視規則地橫衝直撞。呆子是一個不能開車的非司機，他開不動車。

他不能應對。

他不能合作。

他無生活自理能力。

他無生存選擇能力。

他需要外援。

他的機能 15 年沒有自動修復。

從他的“沉思”狀說明無意識的努力是多麼辛苦。

白頭髮也說明了這點。

到這裏，請大家原諒，我爲什麼寫這麼多“廢話”。

我想如果海內外的腦科專家看到我的描述，請憑藉經驗幫助診斷喻東嶽的病情。

魂兮歸來，喻東嶽！  
喻東嶽，魂兮歸來！

### 詠歎傻子喻東嶽（竄改唐詩）

#### 一、竄改賀知章《回鄉偶書》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未改鬢毛衰。  
爹娘相見不相識，  
卻問客房何處來。①

#### 二、竄改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獨在家中爲異客，  
不知佳節不思親。  
何知兄弟想何處，  
笑語歡言少一人。②

#### 三、竄改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

春雪連天晨布湘，  
朝陽送客楚山孤。  
海外朋友如相問，  
一片冰心在玉壺。③

#### 四、竄改王昌齡《閨怨》

白髮壯年不知愁，  
春日華裝上二樓。  
忽見窗外陽光遍，  
不悔兒子未封侯。④

#### 五、竄改韓翃《寒食》

瀏河無處覓梅花，  
寒食東風壓柳斜。  
日中祖墳燃蠟燭，  
輕煙佈告慈善家。⑤

#### 注釋：

- 1、回家後，東嶽不識父母。曾偶問道：住這旅社花多少錢？
- 2、喻東嶽陪坐一旁，一家人談談笑笑，他置若罔聞。
- 3、2006年2月28日，吾去瀏陽，反常地遇到春雪。因爲去冬無雪。第二天離開喻府，漫天陽光。
- 4、東嶽已經白頭。17年前的一件長呢衣仍留到他回來，穿在身上，可想見當年瀟灑。東岳母以子爲自豪。
- 5、東嶽曾祖松岩（繼芳）公，是湖南著名慈善家。喻母說，當擇日去祭祀乃翁。

2006,03,01

### 高優鏢先生的一封信

灝年兄如晤：

讀寄來的黃花崗雜誌，看到你在墨爾本演講後答聽眾問的《五胎說李敖》，真是一語中的。說出了很多人想說而不知怎樣表達的話，真是言簡意賅。

李敖在北大大放厥詞後，弟曾寫過一首七律，現在抄如下，請兄一笑：

敢捋貓須忌虎猖，宣稱鬥士附炎忙。<sup>1</sup>  
自由談擬青樓妓，媚共歌吹千壽長。<sup>2</sup>  
斷續僵蠶思路閉，不差老醜利名張。<sup>3</sup>  
可憐北大莘莘子，聞道胡言醉若狂。

#### 注釋：

1、李敖敢反國民黨，因國民黨只是一隻貓，被激怒了，爪你一下，皮肉之傷，無性命之虞，共產黨是老虎，一口噬下，魂兮歸來；

2、李敖在北大演講稱中共能活千歲；

3、愚者，絲之諧音。

即頌 新年好！

高優鏢

二〇〇六年一月十一日



# 六月血

## ——誰來保佑我！

南雁

假如歷史事件都能順理成章，歷史絕對不像今天這樣，絕不像今天這樣雜亂無章。但願世界大部分人乾脆忘掉那一天，忘掉那天發生的事，忘掉鮮血，忘掉悲傷，忘掉痛苦。活著！怪誰？怪所有的人，還是怪我們所處的時代。

1989年6月3日晚上，北京傾刻間就變成巴黎的街壘。

大難將至的感覺，在人一生經歷中絕不多見。

天沒黑我就躺下了，我告訴妻子說：我今天晚上不出去。我輾轉反側睡不著，乾脆爬起來，騎上自行車穿呼家樓、三里屯、農展館、東直門，每一個十字路口都上萬人攢動，不詳的預感將顯現。人人都六神無主，噪動不安，他們在街上竄來竄去，說不清是人在跟時間賽跑，還是時間在跟人賽跑，再遲鈍的人也覺出風雲際會，雷霆將至，人變得越來越緊張不安，危險飄浮在空氣中，連鼻子都聞出了火藥味。

謠言不脛而走，因為人們相信它或許是真的。人人都在馬路上打探消息，馬路消息比什麼都來的快，口傳心授——最古老的交流方式超過現代聲光電。人人在爭論，喧鬧的人群即創造出一種統一的節奏，這節奏帶著一種說不出的狂熱，人人都瘋了！本能竟像會場的鼓掌，列隊朝著一個即定的方向，一個悲慘的目標衝去。關鍵是誰也無法選擇，也不能控制，一群籍籍無名、平常被人想不起名子的人，在危難時挺身而出或被捲入旋渦。毫不懷疑他們中有精英，有痞子，也有人渣，但因為共和國的大事使他們人格得到

了昇華，像火山噴發那樣，他們被拋向天空，災難又把他們重重的摔在地下。

**20點12分：東直門路口。**

公共汽車司機用電車和大通道車擋住了幾輛軍車和指揮車，人群全都爬軍用卡車，爬上了引擎蓋上喊叫爭執著，軍車看牌照是野戰軍的V14—1356，一個上校軍官在向群眾解釋著，他請群眾放心，絕對不會鎮壓群眾，部隊沒發子彈，他把56衝鋒槍拉開，槍膛是空的，彈匣也是空的。他的表演像蹺腳演員不自然。

**21點50分天安門廣場**

繞城一周，最後又從小道插進天安門廣場。貼在廣場邊邊上，把自行車架好，我找個安全點地界，座在紅白相間的隔離樁上，萬一出現情況好溜，點上一隻煙噴雲吐霧。看看表21:50，地點離國旗100米。此時我冷靜的出奇，仿佛等候著有什麼重大的事件發生。紀念碑高音喇叭嘈嘈聲，不時有講演的喧鬧聲，有口號聲，還有鼓掌聲。

23點50分高音喇叭聲很急：

「我是軍博的一名文職，軍博以西已經打起來了！軍博以西已經打起來了！他們在開槍！他們在開槍！我確認在我離開時，已有5人被打死！有人說是橡皮子彈，有人說是實彈，我相信他們會包圍廣場。」廣播未完，人們就全站起來了，依稀聽見西邊像過年時放鞭炮聲，聲音時緊時鬆，聲音連成了片，看西方有些泛紅，很可能還有火光，動靜不小。我從15歲就當兵，我確認是槍聲。廣播又響起，號召人們去木樨地救援。忽忽拉拉站起一批人就奔木樨地，一大批自行車流直奔響槍的地方。

**0點15分：裝甲車**

突然，傳來重型馬達的轟鳴聲，一大漢舉著望遠鏡四處尋找，兩輛裝甲車飛速而來，從南邊插過來，分別從人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通過天安門時速不低於60多邁，車號是337-339，真來了，時間是0:15。我嘴

上不由自主咕嚕一句：「63 裝甲運兵車。」那手持望遠鏡大漢手也搭拉下來：「你再說一遍。」我張口就來：「63 式履帶裝甲運兵車，自重 12.8 噸，乘員 13 人。你還需要啥？」大漢睜大眼把我打量個遍。看啥？我心說我 15 歲就是偵察兵。這時瘋狂的裝甲車會車拐彎都不減速，駕駛員開瘋了。等到人們反應過來，裝甲車也跑遠了。憤怒的人群蜂湧而至，有人喊出：拉路障！幾千人頓時響應，一聲聲號子過後，僅僅幾十秒，道邊隔離樁全橫在長安街上。

西邊槍聲更緊密了，我起身向遠處眺望。

### 23 點 20 分：木樨地

最偉大的軍事行動也不能超越其政治目的，單單看到冒煙的槍口是不夠，必須找到它背後的東西。對於國家重大事件快速解決，就等於什麼也沒解決。

我弟小波他們在木樨地，從一開槍就在，他們從木樨地一直退到天安門，他比我勇敢。

裝甲車、坦克集群已經衝過了木樨地大橋，小波和英則偉倆醫科畢業生爬在復興醫院前的草地上：「真打啊！打越戰也沒這樣的。」能聽出班用機槍、衝鋒槍的散佈射，79 阻擊步槍的點射。當槍聲漸稀後，裝甲車、坦克車一馬平川開過來，誰攔得住啊！憤怒人群手無寸鐵，只好罵開了：「操你媽，法西斯！」槍械、裝甲車、坦克是不怕吐沫星子的。有些人去扒地下的花磚，把花磚再摔碎砸過去，雖然無濟於事。

### 1 點 06 分：西單路口

我抄起自行車迅速奔向西單，行至西單路口，聽到槍聲連成一片，不時夾雜著阻擊槍的點射和坦克高射槍打平射很沈悶的散步射。1 點 06 分槍響起的同時一輛輛汽車被點燃了，西單路口燃起一道火障，火光中鋼盔的反光很搶眼，五個、十個、十五個，越來越多，沿長安街左右兩側，成兩列縱隊半蹲半貓腰前行。我心頭一沈：壞菜了，突擊兵！

隨即 59 衝鋒槍作動筒火光四閃，我處地型位置好，看見衝鋒槍作動筒打出扇面火光，槍口火光比這要小。我當即也半蹲著，他們運動我運動，他們停止我停下。我們學的是一個教程，停下就是瞄準射擊。我向後觀察：還有幾個人在掩護人群撤退，一看就是

退伍兵，在最後邊壓陣，十幾人要掩護上萬人的撤退，對上萬人和十幾個退伍兵來說，此時正是他們一生中最大的冒險。離突擊兵最近時就是 40 米，子彈打的滿地面冒火星，像過年放鞭炮，我聽不到槍聲，只看見火花四濺，我得踩著火星跑才不會受傷，因為火星就是前一彈著點，兩顆子彈不會落在同一地方，這是常識。

我跑著跑著，不時地回頭看看後邊的大兵有多遠，80 米、100 米了，身邊開始有人倒下，有人像被割的草軟軟的塌了，有人硬硬地發出很響動靜，有人像紙片一樣飛出去，千姿百態。突然，我面前像爆開一朵紅菊花，跑在我前頭是一個穿白襯衣的人，紅色就在白衣上開放，我們跑一條軸線，伸手可及他的肩膀。他還在跑，我拍拍他肩膀：「哥們，你中彈了，背後。」他伸手觸及背後，一看一手血，忽的倒地，還未觸地面，我的一條胳膊就夾住了他，另一個人胳膊也伸過來，同時把他撈起來。平常想練練這份功夫都不容易，這叫寸。終於脫離了危險區，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大樓工地的胡同口，自發救援的人，打接力把傷員轉移走，效率很高。一個女孩大叫：「媽喲！」捂著手衝進胡同，我一看她手指打斷了，隨手扯下一條男人圍在脖子的毛巾，給她捆住動脈。這當口，一夥子衝過人們的阻攔，手抓兩塊板磚：「他們槍殺平民，我跟他們拼了！」我縱身一撲，將他強按到在草地上，他嘴上黏著白沫喘粗氣，我也喘著粗氣，等他冷靜了，我小聲說：「他們有槍！」

我躲在胡同裡喘一口氣，人們全龜縮在胡同裡。奇怪，又聽見槍聲了，緊張時聽不到槍聲，全是視覺感受。點射穿過街道是回聲，還有脫音，散步射打在地面上是啪啪聲，打在土地上啾啾聲。老兵知道回聲是子彈離的遠，「啪啪、啾啾」子彈是離的近，得當心了，這也是常識。

### 01 點 45 分：吸煙老人

大兵們開過來了，看到胡同的人群，他們把槍栓弄得山響，繼續挺進。我醒悟到還得換安全地界，民航售票大樓是工地比較安全，有大鐵門，是鐵皮的，也可一檔穿透力，於是，我翻過大鐵門，從鐵門縫隙觀察，突擊兵過後就是裝甲車隊，黑影幢幢的墨綠色裝甲車 133、135、144，首尾相顧。裝甲兵過後是軍用車卡，指揮車、通訊車，遊動步兵分隊，連綿不絕。

這會兒槍聲停了，人群又從胡同冒出來，工地的牆頭翻出來，人群並不比打槍時少。兩女孩不聽人勸告，一直尾隨著大兵走到街口，她們還穿著拖鞋，我忍不住大聲吼：「不要命了，還穿拖鞋，要跑都跑不了！」女孩子平靜地說：「那你哪？」人類的大無畏精神來源於女性，正是女人使男人更勇敢。

一個老人就座在馬路牙上，手拿煙斗吸煙，從他座的姿勢來看好久沒動，續煙也續好幾鍋了，當兵也覺得怪了，圍攏他轉幾圈，就見煙火一紅一滅的，眼光迷茫，目空一切，當兵的覺得：這老頭怪兮兮的，他不怕死嗎？不怕死就能永遠不死，神了！在這大屠城時節，他是練的那份功啊，他想些什麼？煙火一紅一滅。惦記自家孫子，還是八隻鴿子一隻貓。當兵放他一馬。

### 03 點 05 分：白衣少女

2 點 10 分我趕到了金水橋，是沿護城河沿繞東華門，穿午門進天安門城洞的。尾隨著我的還有幾個不怕死的人。一路不多話，大家都想：廣場肯定完了！又想知道廣場的切實情況，進廣場肯定全包了餃子。我尋思著：當兵的起碼不會向毛主席像開槍，我認定天安門城洞裡最安全。站在金水橋隔著長安街看天安門廣場很遙遠（整個句式像最最蹩腳詩）。此時此刻，安全最重要。不時傳來口號聲，還女孩尖叫聲。廣場華燈滅了，紀念碑只三四個燈亮著，能見度很低，還瀰漫著硝煙。

我弟小波跟同學一路退至天安門廣場，我在外邊時，他剛好在裡邊。關鍵時刻到了：1:30，廣場高音喇叭傳來：「有武器的同學，請你們放下武器！有武器的同學，請你們放下武器！」廣場上稀稀拉拉的槍聲全停下來了，人們漸漸的冷靜下來。

喇叭裡傳來一個低沈的聲音：「我是侯德建，我們已經流了很多血，我們不能再流了。同學們，市民們，全體公民們，我敢說，就現在我們已經取得這場運動的勝利，不是今天，我們早已取得很大的勝利！我相信——在場的人都是英雄，都是民族精英，我們不怕死！但我們要死得有價值。我是侯德建，我們四人剛剛到指揮部談過，我們已經答應盡量說服和必需說服同學離開廣場，他們接到了死命令，5:30，必需清場。這一點上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國際歌從廣場中心的紀念碑升起，人們的聲音嘶啞、咽哽、悲壯，人們唱國際歌唱了很多次，從來沒像這一次投入那麼深厚的感情，這是第一次，興許也是最後一次。大軍壓城，兵臨天安門，面對坦克、裝甲車，面對手 59 衝鋒槍的全副武裝的軍警。第一次對國際歌理解得如此之深，女孩子的高音清晰可辯。

遠處有軍人過來，我想上前看看是武警還是老野（野戰軍），我有心看看他們的領花和肩章，是武警，手裡還拿根棍棒，這我就放心了。武警驅趕人群，把人往城門洞趕，城門洞像一條直直隧道，要是開槍就全沒命了，幸好他們手裡只有棒子。一大批軍警壓過來，群眾就退下，軍警一停，群眾再回來，反反覆覆像拉鋸。又一批軍警從東華門後頭包抄，沒退路了，人真成了老鼠，人群只好爭相逃命，我拎著自行車就跑，得抬高後輪，因沒開鎖，跑遠了再開鎖，飛身上車，一路狂奔出午門口，前邊故宮兩側門同時開進幾輛吉普，我一看是武警的車，別叫他們堵住，得快跑啊，急不擇路從故宮側門斜坡上衝下來，我方鬆了口氣。沿護城河急行，旁邊一白衣女子騎車跟著我問：「能出去嗎？」我說：「跟我試試吧！」一路騎行，她在說著今晚她挨了三棍子。我們在逃命，大難不死遇到第一個人，把我當成救命稻草，我一直不吭氣。一直騎到東華門，我們終於脫險了。我說：「現在可以停下來。」東華門一群一群的人向我們打聽天安門廣場裡面的情況，我們只堅持到三點多，很難說清裡邊情況。人人在歎息，國家完了，共和國完了！我知道我們該分手了，我們一起逃命，卻不知對方名字。我想鼓起勇氣想問問她的名字，湊上去卻變了：「早點回家！」她說：「好！」比我的聲音還小，只記得她音色挺好，言談之間有著一種超乎少女的成熟。我旋轉身分手後，心裡似乎有些空落落的。面臨危局一旦脫險，強大的壓力就會釋放，這是人的生理需要，機器叫過載保護。無論行公益，作惡事，唱國歌，哼小調的，是精英，是草民，是猛男，是少女。隨後都將面臨高壓政治，讓我們屈從、隱忍、龜縮、偷生。不問為什麼，不知所以然，無視正義，無視法律，一切向錢。

### 6 點 12 分：血色黎明

4 點我回到家打了一通電話，也接了幾個電話。知道雙方家裡的情況。我跟妻子告訴了天安門的情況，妻子眼含著淚水。老岳父說：「我 70 多歲了，聽一夜槍聲，等著倆孩子回家，5 點多還沒影兒。」不行，我還得走一趟台基廠，我妻子的姐姐、姐夫全沒回來。

走建國門、長安街，到王府井，我本可以向南拐進台基廠，可南池子傳來槍聲，6 點 12 分，我本能地尋著槍聲就來到南池子，南池子口上，人群縮在裡面喊口號，軍隊一字排開封住路口，後排的大兵座地休息，前排大兵有些異樣，擰胳膊卷袖，胳膊上繫條白毛巾，單手拎著衝鋒槍，不符合軍事條例規範，不時向南池子方向射擊，裡邊喊幾句口號打幾槍。幾個當兵的神情顯然恍惚，就那野勁，還是吃藥啦，真瘋了！打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像打鳥一樣。一個尉級軍官拿 54 手槍，左手扣右手為依託，對南池子躲在垃圾筒後一個個平民開槍，喊幾句口號打幾槍，直到一個個平民中彈。一響一個平民倒地，傷員有的比軍官年輕，有的比他大不多少，一會倒下一片，年青人殺年青人是不是很過癮。我頭一次看到殺人像打鳥一樣。我離著 30 多米，清楚看彈匣打空了還樓幾下板機，手槍彈倉打空，槍膛卡在後頭處開機狀態，他又連擣幾下槍機，這太有失常理。一個老人騎自行車說要上班，邊說邊掏工作證，還沒等他掏出，當胸一槍擦倒，連車帶人就這麼給撩了。這傢伙真瘋了，軍官啊，軍官，你也有老人，有父母，你現在要活著，你就不怕 50 年後下地獄，北京人詛咒你，全世界人都詛咒你。

北京街頭創造了舉世無雙傷員搶救，民眾很英勇，隨即就被人們拖進胡同裡，效益速度之高，超過國際紅十字。我再不能這樣看下去了，就這樣假裝冷靜抱著雙肘，若有所思的看下去。

騎行在正義路的林蔭道上，被人稱之正義那個東西，你在哪？你原本就是一場夢。我們流血，我們哭泣，我們忍受，你都看見了沒有。你回答啊！你不回答，你就不存在！勇氣打掉了，尊嚴消失了，思想麻木了，只剩下一條彎彎的脊梁和跪著的膝蓋。當世界上一樣東西消失，我們就要創造她。

6 月 4 日早晨，天陰的特別利害，黑黑的雲，血色天安門，我有幸欣賞這夜半血色黎明。

7 點到 8 點，在老岳父家等了一個小時，我妻子的姐姐、姐夫終於到家了，姐姐的褲角被子彈穿了一個洞，謝天謝地沒出大事。我還得去三里河我母親家。這樣，我沿長安街奔木樨地，看看昨晚到底發生了什麼。長安街沿線，六部口、西單路口上都有汽車在燃燒，冒著滾滾濃煙。到處是碾碎的自行車零件，左一堆，右一攤，剩下的就是很厚一層碎磚，可見昨晚上抵檔坦克有多激烈。自行車在艱苦的蛇行，走到老商業部時，坦克迎面開來，行人紛紛躲避，我繼續直行。車長從車頂鑽出半個身子，手持手槍左手扣右手托著，總處於臨戰狀態，比我還緊張。

一夜間北京變成了戰場，百年罕見。人是什麼？人是動物，動物的本能就既嗜血又愛錢。思想是什麼，是痛苦的積澱，一半是痛苦，一半是血液。

#### 9 點 01 分：木樨地

木樨地公共汽車站站牌子被 12.7 厘米機槍洞穿，西北角少女的不銹鋼雕基座上留下三個 12, 7 厘米高機的槍眼，彈洞鑽得都挺深，是坦克高射擊機槍打平射造成的。地鐵站的大玻璃窗被打碎，有幾扇像開放的菊花，有幾扇是洞穿留下圓圓的彈孔。人行道的隔離桿油漆被子彈打掉了，露出新茬。行道樹的樹皮上有彈痕，有幾個孩子爬上樹，去摳鑽進去的子彈。槐樹枝叉被子彈打折還連著，風吹過後晃晃悠悠，旁邊居民樓的窗戶玻璃被打稀爛，木樨地 22 樓晾的一件衣服，穿了 8、9 個洞。地上橫七豎八散佈單隻的各樣的鞋，一隻高跟鞋殼裡灌滿了血。綠樹籬的灌水槽裡有一大灘血漿，還沒有完全凝固，顯然有人選錯了掩體，他不是單兵，他是老百姓，綠樹籬能檔視線，不能檔子彈，人體被洞穿之後，12, 7 厘米子彈還不解氣，又打在國家計算機中心牆上。要知道這子彈的威力有多大，你伸手指比一下，像手指般粗。

拐到中科院慢行道上，七七八八的血流子，像墩布拖的一樣，彎彎曲曲的長及百米，肯定是凌晨搶救傷員留下血痕，不規則血痕可以想見傷員掙扎的痛苦狀。中科院門口的水泥地上，一大灘一大灘的血痕，足有四、五塊之多。估計出血量有上千 CC 之多，經過幾小時氧化都開始發稠了，還沒有完全凝固。看來這裡是傷員集中地，戰地醫院，可更像屠宰場。人們在科學院門口受傷，在此做最後的掙扎，愛神繆斯她幫

不了她的子民，當然也幫不了她自己。誰來保佑我們！

流血最多的地方，反抗也越強烈。木樨地人行道的花磚扒的也最多，人們用手指摳出來摔碎，把它當成對抗野戰軍那些裝甲車、坦克車的唯一武器。士兵們都丟棄裝備和手中的武器四散。坦克的機槍被人卸下，被掛在紅綠燈燈桿上。孩子們只是比平時更忙合，他們從河裡撈出槍枝和班用機槍的子彈鏈，從火裡搶出退了火的衝鋒槍，孩子們腰裡捌著 64 自動手槍，只是塑膠手柄燒壞了，向人們臭顯嘔！

30 多輛 63 裝甲車，59 坦克車和 40 多輛軍車被檔在木樨地，沿長安街排了足有 2 公里長的各種軍車陸續被點燃，濃煙翻騰著升空達二、三百米高，將近一個輕裝快返師的軍車都報銷了，整條街都在燃燒，長安街在燃燒。車裡彈藥被高溫點燃砰砰的爆響。

成人們則陰著臉，沈默若有所思。一個老工人對一群放下武器的大兵們責問：「你們有父母嗎，你們有兄弟姐妹嗎，有沒有？你們就這麼衝著人腦袋開槍，我操你媽，操你媽！你懂嗎？你們的槍是幹什麼用的，睜開眼，這兒不是越南，動腦子想一想，北京怎能這麼多反革命，父母要是看你們打天安門，哭不哭？你們說不打天安門？怎麼十字路口四處都是槍眼啊——」戰士們低著頭不說話，歲數都像老工人的兒子一般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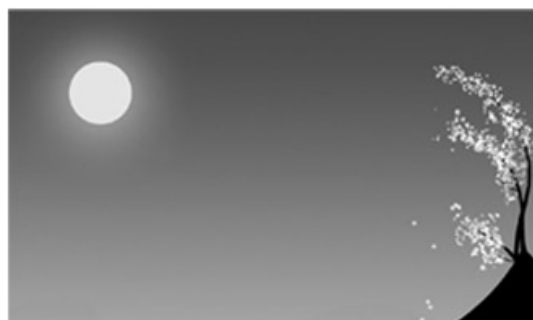
14 點多，陰沈的天空陣陣悶雷從天空滾過，雨終於下來了，落在樹枝上，落在樹葉上，再掉在草地上，大滴大滴的雨水落在大片大片的血跡上。深色的血跡已經氧化，幾乎變成棕黑色。一經雨水泡濕了，融化了，泛起一層醬色的泡沫，急雨又把它沖散了，我騎自行車儘量規避這血色泡沫，她落地不到十個小時，還俱有靈性就這樣四散奔逃了。

15 點天怒人怨的雨水繼續下，落在燃燒的坦克上，落在怒火中燒的人臉上，今天無人帶雨具，任憑雨水打濕全身。雨水把馬路沖溜光，迎賓路變得水色淒迷。沒有人，有人也像個魂兒，彎腰躬背悄無聲，馬路上沒有汽車，連自行車都很少很少，按一下車鈴，嚇自己一大跳。這就是 4:30 的寂靜釣魚台。恐怕，中國近百年歷史不曾有過這麼寂靜的白天。

幾千年來，對付同樣的問題，採用同樣的手段，其相似程度讓人驚訝。歷史證明這是個錯誤，不管什

麼錯誤，錯誤本應當避免的。人們沈默的捌過臉用眼淚、用雨水溫潤自己的心靈。他們似乎睡著了，不用去叫醒他，也不要希望他覺悟，更不能使他產生懷疑，聽天由命是危險的，但大徹大悟更危險，誰也不能強迫人民，偉大的人民在退縮時，把一切都忘掉！包括今天。

誰來保佑我們？誰！





# 反思民族歷史

## 找回民族自尊

——《驅除馬列 還我中華》講演系列之二

辛灝年 2005 年 6 月 18 日講於英國牛津大學

（李剛博士現場英語翻譯 林丹、謝宗延根據錄音整理 辛灝年校閱補充）

### 前言

我們中華民族就像一個又古老又龐大的房子，有很多很多的東西，有好也有壞，有的是寶貝，有的則應該扔掉。我相信，即便是一座很現代的又新又大的房子，它有著美麗的客廳和種種現代化的設備，但它一定也會有個廚房，有個衛生間，也要有個放垃圾的地方。這是常情。但是，近些年來，我們一些號稱是“精英”的朋友，他們因為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恨鐵不成鋼”，從八十年代開始，就已經開始說我們的中華民族的“天不好，地不好，人不好，山不好，水不好，民族也不好，民族傳統文化更不好……”，唯獨沒有說一九四九年以後那個“當家”的馬列黨族、即“馬列子孫集團”不好。這種思想，這個說法，便在客觀上為共產黨開脫了罪責。這種把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民族文化拿來為共產黨做墊背的狀況，到九十年代以後，直至今天，就更進一步地發展了。大家可以上網站去看一看，可以找到國內的雜誌看一看，那上面，有一些人，已經在公開的說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劣等的文化，中國人民是愚昧的人民了……而且說得咬牙切齒。講一句心裏話，我真是聽了很難過，因為事實——根本就不是這樣。

幾年前，有一位朋友，他在和我聊天的時候曾說：“你看，人家俄羅斯民族是多麼的偉大，多麼的

文明，多麼地有修養……我們中華民族是什麼東西嘛！太愚昧無知了嘛！”我當時聽了真是很難受，也很生氣。我回敬了他。我說：“如果你說俄羅斯民族比我中華民族偉大、文明、有修養，那我請問你，馬克思主義是在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國家，首先奪取了政權、復辟了專制、並對人民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專制復辟統治的？是俄羅斯嘛！是前蘇聯嘛！馬克思主義侵入了俄羅斯民族，並且在俄羅斯‘以革命的名義’建立了一個現代‘教政合一’的專制政權，還向世界、特別是向我們中國，強行輸出馬列，蓄意製造辛亥之後我們艱難共和進程中的混亂，瘋狂顛覆了我們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而且，它的共產專制制度一直搞了七十四年才終於崩潰。然而，到今天為止，中共專制政權也不過才五十六年，能不能搞到七十四年，我看還很難說。所以，憑什麼說我們的中華民族就比不上俄羅斯民族呢？就比它愚昧呢？就比它糟糕呢？五十多年來，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文化，難道還沒有被中國的馬列子孫——共產黨罵夠、燒夠、否定夠、踐踏夠，所以，你們今天還要接著罵、接著燒、接著否定、接著踐踏嗎？再說，你們繼續否定和謾罵自己民族和文化的‘成就’和影響，能夠比得上共產黨嗎？”

我們顯然是“僵持”在那里了。但他沒有再反駁我。

由於這件事情對我刺激比較大，所以，我才決心看一看，在我們的民族和文化裏面，是不是真的就沒有任何好東西了？我想再來搜檢一下，號稱擁有五千年文明文化、更有著三千五百年紀年歷史的中華民族，到底還有沒有值得我們肯定的東西？我更想看一看，我們的民族和民族文化，是不是當真像今天的那些所謂的精英們罵的那樣——一無是處，毫無希望。

我看不是。所以，今天我要請在座的朋友們原諒我，原諒我今天是專門來說中華民族好和中華民族的好文化的。因為，該罵的和不該罵的，都已經被別人罵夠了。我也來一次反其道而行之。

我只講四點，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請大家批評。

### 一、樸素的“天人觀念”

我覺得我們的民族文化一開場就不錯。首先就有一個非常好的和樸素的天人觀念。大約三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們就對“天和人”的關係作出了一些樸素的解釋，並且給予了一些很好的發展。用三句話來作個總結，就是：一、開了一個好頭；二、有兩個好的發展；三、造成了三個進步的結果。

#### 開了一個好頭

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的皇帝還有一個名字，叫做“天子”。在上古時代，我們中華民族的先人們把上帝、上天和神“三合一”了。他們不像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民，是把上帝、上天和神分開的。我們的先人認為，上天就是上帝，上帝就是神，所謂“三尺頭上有神明”，就是說，我們中國人是“敬神”的，我們中國人是“畏天”的，我們中國人對上帝是“敬重”的。而把三者合一，就給自己減少了很多麻煩。因為上天就是上帝，就是我們中國人心目中的神。那麼管理著眾人的，管理著我們民族的是誰呢？便是上帝自己派到人間來的兒子，他就叫“天子”。這樣一來，由於上帝（即上天、神）的兒子——“天子”管理著我們，天和民便開始有了關係；天和人也就開始有了關

係。而古人所說的“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的話，就是說，祭天是天子的事情，是祭他的老子，也是代表我們在祭他的老子；祭土，就是祭地的事情，也只需要天子的兒子們、即被分封的諸侯們代表我們去做；而我們老百姓，只要安生過日子就可以了。

所以，中國上古時代雖然也有宗教，但宗教只是一種祭祀的儀式。形形色色的宗教，不論是有記載的，還是只有傳說的，它們都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神派到人間來管理我們人民的，這和歐洲大不一樣。這樣一來，它便產生了一個很好的人間觀念，就是“天人之間”的關係，與宗教和信仰都沒有太大的關係。而“上天、天子、人民”這三個要素，則構成了一個很樸素的天人觀念。

### 兩個好的發展

**1、天人關係的變化** 這種樸素的天人觀念有兩個很好的發展，第一個發展是在大約在兩千五百多年之前，就是西元前四百多年，我們的一個先人，鄭國的大夫鄭子產，鄭重地說了一句千年之前民間就有的傳言。他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他這句話很重要，他說老天在看著你，那就等於是人民在看著你。人民發出的聲音，就是老天要告訴你的話。這樣一來天和民的關係就變得“近”了，上天的意志裏面已經開始滲透著人民的意志了。同樣一句話，“民之聲即神之聲”，這是英國的一位著名神學家阿魯坤說的，可跟鄭子產相比，它晚了我們一千五百年；跟我國民間早已流傳的相比，則晚了二千五百年。

**2、天民關係的革新** 第二個發展，就是它革新了天民之間的關係，由於在那個時代裏面有一些殘暴的君主，他們不是好天子，人們不滿意他，想換掉他，怎麼辦呢？人民必須要拿出一個辦法來，而這個辦法，就是利用“天命”。中國古書裏面有這麼一句話，叫：“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湯武革命，就是指商湯討夏桀和武王伐紂。桀和紂是兩個壞君王，商湯討夏桀和武王伐紂就是要救黎民和天下嘛。所謂順天。就是上從天意。所謂應人，就是下應民心。它說明，天和民是相通的，人民的意志已經在冥冥中變成

了上天的意志。天子對人民的管理和統治必須服從於他的上天，可上天也要聽人民的。所以“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這句話，孟子說得很好。它的意思就是，我們只聽到說殺了一個暴徒紂王，沒有聽說殺了一個君王。這樣一種樸素的政治文化及其發展，給我們中國帶來了難以想像的正面歷史影響。

### 三個進步的結果

**1、神教分離** 很顯然，樸素的天人關係，為同時期和後來中國宗教信仰的發展，規範了兩個十分重要的原則，這就是**神教分離**和**教政分離**。首先，神是天上的東西，教是人間的東西。中國古代的宗教，只是為天子和人民擔負著安排祭祀的儀式而已。據此，中國的宗教，就不能夠去挾著上天的名義，挾著上帝的名義，挾著神的名義，象挾天子以令諸侯那樣，來奴役自己的人民，來表示：只有他，才能和上帝、上天相通；所以，人民必須服從他的統治，只有他們才代表了上天和上帝的意志。

因為，我們的人民，自己和上天本來就是相通的，“直通”的，而且上天還要聽我們人民的，所謂“天命就是民命”。因此，在人間，就沒有任何力量，既可以超越上天的意志——天命，又可以超越人民的意志——民命，以代天、代民立言行事。這樣一來，不僅從一開始，就把天上的神和地上的宗教分離開來了；而且，從一開始，就取消了宗教對神和人的“兩面代表性”。也就是說，在中國，根本就不需要、也沒有存在過能夠既能代表神權、又能代表民權的“教權”。因為，我們的上帝和人民，根本不需要宗教來作他們的中間人，來作他們的代表；更不需要宗教來作為自己信仰、思想、政治和任何一個方面的管理者。這個思想，在歐洲，直到十六世紀，也就是歐洲的千年宗教黑暗統治行將結束的時候，才由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所提出。千萬不要小視這個樸素的理念，這個理念，使中國數千年漫長的政治歷史中，直到西元 1949 年以前，從沒有出現過宗教思想統治和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政體，更沒有出現過歐洲中世紀千年宗教黑暗統治的巨大歷史悲劇。

**2、教政分離** 神教分離所造成的另一個好結果，就是“教政分離”。大家看看我們中國歷朝歷代的天子們，從來都不會讓一個教會的長老、一個宗教的領袖，來為他戴上皇冠。他總是把各種各樣的宗教拿在自己手裏面，或是去配合他的統治，或者是幫助他的統治，或是去解決他統治當中的一些問題。所以我們中國才會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前，都從來沒有出現過“教政合一”這樣一種極端專制的糟糕統治。

佛教在中國倡行的時候，魏晉南北朝最為厲害。我就不說北朝了，我說南朝。南朝有一個皇帝叫梁武帝。他自己非常信佛教，曾三次把自己捐到和尚廟裏去做小沙彌，做苦工。但梁武帝在處理政事的時候，卻從來不跟佛教拉上關係，從來不請他喜歡的和尚們來解決他要處理的人間政治問題。光是南朝就有三位皇帝“愛佛教不愛江山”，特別是梁武帝居然能夠和不信佛教的人在皇宮前面打擂臺，進行辯論，辯論輸了，也不亂殺人。這可是共產黨統治下，連做夢都做不到的事情，誰敢和共產黨辯論馬克思主義對還是錯呢！那不是找死嗎？所以，大家想想看，在我們中國的民族文化裏，這難道還不是最精彩的民族文化之一嗎？

教政合一的要害是什麼？教政合一的要害就是思想統治。人，是萬物之靈。一旦人的思想被統治了，不能獨立思想了，不能獨立思考了，就等於成了“腦死”之人，這樣的人和動物還有多大的區別呢！現在有所謂“豬論”，是說，中國人只要能吃飽就行了，也就是說，我們中國人不需要思想和思考。這就是思想統治的殘酷結果。所以，我認為，在我們中華民族三千年的政治傳統裏面，其精華之精華，就是我們從來沒有實行過“教政合一”的統治。我們的歷代皇帝們在這一方面是相當開明的，也是共產黨和他的統治所無法相比的。

神教分離和教政分離，使得我們中國，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在教權服從神權”虛幻幌子下，使“政權服從教權”，和“人民既要服從政權、更要服從教權”的統治現象。而也正是教政分離，才使得中國在思想文化上從來沒有墮入過歐洲式的千年黑暗時期，使我們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痛苦地中斷過對文化的創造，和對優秀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可以說，直至二十世紀，在馬列驅趕著歐洲千年宗教專制統治的鬼

影，夾帶著蘇俄現代“教政合一”極權統治的惡行，入侵中國，對我們民族施行了瘋狂的文化侵略、無恥的武裝顛覆和殘忍的宗教屠殺，實行了“五千年中國從未有過的教政合一之極端專制統治”，則中華民族便能自始自終地向這個若大的地球宣稱：吾國自古以來何有宗教戰爭？宗教屠殺？宗教統治？更哪有千千萬萬、成代成批的思想罪犯可言？！

**3、思想自由** 第三個好的結果是**思想自由**。大家想一想，中國的皇帝不進行思想統治，雖然他敬天敬神；他不搞教政合一，便能允許各種宗教的存在。所以宗教信仰才不會成為絕對的統治思想，更不可能成為人民的思想桎梏。這就帶來了思想的自由。

而所謂思想自由。就是什麼思想都可以啊。墨家思想也可以，道家思想也可以，儒家的思想也可以，總之什麼思想都可以，只要你這個思想對我好，對人民好，對我統治有利，我就重用你。相反，我也不會消滅你、迫害你，反正讓你存在，讓你自生自滅。除掉你是真正的邪教，並且已經對社會、對統治、對人民造成危害和威脅時，那可就要另當別論了。

在中國歷史上，為思想殺人的例子是極其少的。大家都知道，孔子是怎麼死的？一天早晨，孔子知道自己要死，他就自己穿戴整齊，拿出一個杖梃，走出家門，仰望蒼天，俯看大地，笑呵呵地飄然而逝。而古希臘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怎麼死的？在那個號稱是共和國的雅典的法庭上，“因為他要研究天上的事情和地上的問題”，就被法官賜他一杯毒酒——所謂飲鴆而亡。西方的先哲們、也就是思想家們，包括教權統治下的無數科學家，比如著名的哥白尼、伽裏略們，幾乎都是被教權迫害至死。在我們中國呢？大家想一想，能不能找到我們中國的科學家，我們四大發明的發現者們，有哪一個是被我們的皇帝燒死的？是被我們的宗教迫害死的？沒有嘛！李時珍、徐光啓那些有名的科學家都是善始善終啊。為什麼？就是因為思想自由嘛。沒有思想自由，何能有創造發明的自由呢？而思想自由的成就是什麼呢？第一、就是學術自由；第二、便是文學自由。

第一，**所謂學術自由**，就是各種學說都能夠並生並存。大家想想看，中國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已經有了孔子，他的學生墨子，卻成了他思想的反對面，或是

對立面，可是他們都能夠同時存在，還可以互相批評。中國在兩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諸子百家，大家各執一說，也沒有統治者來迫害他們；相反，這些從民間來的學者專家們，哪怕他們當中有還曾賣身為奴，比如秦國的名臣百里奚，但只要他有思想、有本事，統治者就會重用他們。在諸侯爭雄稱霸的時代，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成了著名的政治家，這就是學術自由啊，就是學術自由所帶來的好現象和好結果啊。反過來，如果沒有學術自由，那有諸子百家？如果沒有學術自由，那來百家爭鳴？那個時候說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是真的；不像後來的毛澤東共產黨，是在耍“陰陽兩謀”，是要“引蛇出洞”，目的則是要“獨尊馬列，殺盡百家”。

第二，**所謂文學自由**。大家都知道，中國歷史上的文學成就是很了不起的。那麼，我們文學成就是從那裏來的呢？還是來自於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和宗教自由嘛！而也正是各種各樣思想領域的自由，才造就了文學創造本身的最大自由。一方面，我們文學在歷代皇帝統治期間，由於皇帝們對文學基本上都是無為而治，他根本就不想管那麼多，所以，你要愛寫你就寫，寫好寫好他都不大管。另一方面，文學家和詩人們，因為傳統的影響，又都有一個自覺地要為社會和人生進行“教化”的想法，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重視文學的社會功用。所以，文學家和詩人們又沒有因為當政者對他們無為而治，就採取不問天下、不關心社會疾苦的創作態度。相反，他們追求的，卻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孔子就說過一句話：“詩言志”。他還解釋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他是在說，詩是可以用來激發我們的激情的，詩是可以讓我們觀查社會和人生的，詩是可以讓我們將民間的疾苦上達天聽的，詩是可以讓我們用心靈來改變我們的人生和社會的。

你們看魏國的皇帝——魏文帝，他就對文學的社會功用發表過這樣的感慨。他說：“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你們看這位皇帝，他把文學看的是多麼的崇高。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文人們，我們的詩人作家們，由於他們有著自我擔負教化社會的那樣一種責任感，也由於整個社會環境基本上是自由

的，社會思想是相當自由的，才創作出了太多的多姿多彩的篇章。

兩千多年前，我們就有了描寫真實社會生活的詩歌總集《詩經》，我們就有了表現痛苦愛國理想的浪漫詩篇《離騷》。到了大漢朝，一方面有著鋪張揚勵的大賦，來歌頌那個大一統帝國的聲威和成就；一方面民間的疾苦又在漢樂府裏面，就象先秦時代的《詩經》一樣，汨汨而流。到了後漢，我們一方面可以從《古詩十九首》裏面，看到整個社會在走向下坡路時，人民的痛苦與悲慘生活；另一方面，當此要變革天命的時候，我們又可以讀到“三曹七子”們雅好慷慨的詩歌，這些詩歌，表現了他們雖生於亂世，卻對建功立業懷抱著何等的美好追求和嚮往。即便是到了南北朝，在北方，雖是“天蒼蒼野茫茫，胡音生於北俗”；在南方，卻是“粉濃花香人癡，豔曲生於南朝”；但也同樣是在這個山河破裂、綱紀敗壞的時代裏，還是產生了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一枝獨秀……我就不說那風格多樣的《唐詩》、精彩斑斕的《宋詞》了。我單講那個根本就沒有什麼文化、卻用武力打敗了我們的蒙人，在他們統治的元代，戲曲的創作和成就居然在中國戲曲史上佔據了最高峰。像《竇娥冤》這樣震撼人心的戲劇，即便是在全世界的戲劇之中，也要堪稱一流。所以，直到今天，它還流傳在我們的民間，活躍在我們的舞臺上。連沒有什麼文化的蒙人，在統治了有文化的中國以後，也產生了如此偉大的文學成就。而文化也不多的滿人，只因他完全地接受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所以，在他統治的專制末世，竟也在文學上，使得我們的小說創作走上了世界的顛峰。我原來是寫小說的，我愛我自己民族的文學，我也喜歡外國人的文學，所謂“不薄洋人愛國人”。可是說心裏話，看了《安娜·卡列尼娜》，看了《包法利夫人》，看了《傲慢與偏見》……之後，真的，覺得它們離咱們的《紅樓夢》，還是差得遠了。這裏有一個民族文化欣賞的界限問題，有一個不好比的民族文化欣賞的習慣問題，但若是站在文學理論的立場上，我還是覺得，《紅樓夢》那種無一字說教，卻全部用文學的描寫和文學的形象，來創造人物、勾勒社會圖畫的那樣一種本領，那樣一種才華，真的是極少有的。

我們的民族，在自身的文學發展當中，還產生了自己優秀的古典美學。大家都知道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他們的美學思想寄寓在他們的哲學思想裏面，在西方綿延了兩千多年，一直到一八七五年，德國的美學家鮑姆嘉通，才把它從哲學的王冠上拿下來，單獨建立了一個叫做美學的理論學科，也就是藝術哲學，好讓有興趣的人來從事專業研究。但是，大家可知道，一千六百年前，我們有一個三十五歲的和尚劉勰，就寫出了一部了不起的美學著作《文心雕龍》。至今我們都可以說，《文心雕龍》，不論是在思想和藝術，理性和形象，抽象思維和形象思維等各個方面，都提出了相當正確和深刻的創作理論和文學觀念。而且，當時中國正處在一個被外來文化侵擾，並且正在產生文化融合的大紛亂時代裏，但他卻能夠把他的文學理想、文學思想和對文學創作方法的理性認識，進行了那麼美妙和深刻的總結——所謂“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這樣一種美麗清越的文字，那樣一種深刻雋永的理論，今天，也只能使我們這些後人，在心裏感到“羞愧”而已。

第三，所謂宗教自由我就不想多說了。在中國，儒家、釋教、道家，神仙家、陰陽家、什麼家都有，什麼信仰團體都可以存在。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取了天下，遍中國便開始只有一家宗教——就是西洋來的“馬教”了。而其他的宗教，要不就是被共產黨指為反動道會門，全部被共產黨殺光剿滅，譬如“一貫道”等；要不就逐步地和迅速地為共產黨所改造，所領導，變成了享受著共產黨的各級政治待遇、卻永遠失去了自由的形形色色宗教團體，比如今天已經在享受著科技級、初級、廳級待遇的各等各級和尚廟，和在實際上必須由共產黨幹部擔任各級主教的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等等。

## 二、開明的王道追求

第二個方面，我以為，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還存在過有一種非常好的現象，被我稱之為“開明的王道追求”。在座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們中國人講“內聖外王”——就是孔子曰仁，孟子曰義；講王道，不講霸道。大家都明白，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政治追



求，即便我們沒有全部做到，或者說我們做的還相差很遠，可是我們有此追求。比如說，孔子在兩千多年前說過，“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就是說邊遠地區的人民不服從，不要打他，而是用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的道德來感召他，來吸引他。孟子對梁惠王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你不是要打燕國嗎？燕國老百姓歡迎你打，你就打；如果燕國老百姓不歡迎你打，你就不要打。這起碼是不主張無端地進行侵略嘛。即便是在今天的世界上，這種政治文化也還是很不錯的政治文化。

二千年前還一個很有名的知識份子叫賈捐之，他曾在一篇著名的《霸棄珠崖文》中說：“欲與聲教治之，則治；不欲與者，不強治。”它指的是，當時，有人要把海南島拿過來，但也有人反對。他就說：如果海南島的老百姓願意讓我們用文化來同化、教化和治理他們，那我們就治理它；如果他不願意，就不要強行地去治理它。我上面所舉的這三個例子，可以說，我們的先人起碼是在思想上，在理論上，在實際的政治主張上，都是在追求著王道、而不是在追求著霸道的。

還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秦始皇修長城和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而且幾千年來，大家都因此而罵秦始皇是個暴君。那我現在想問大家一句，不論秦始皇為修長城是怎樣地害苦了老百姓，但他的目的，卻顯然不是為了侵略，而是為了保護家國。中國歷代的君王們都修長城，也都是為了“護邊”，也就是預防侵略，而不是為了去侵佔他國、他民族的土地。這恐怕也是個基本的事實吧。

漢代直到武帝時，都曾遭遇匈奴不斷的“犯邊”，就是掠奪和屠殺我們邊境上的人民。當時，漢代剛剛歷經大亂才建立帝國，沒有本錢去和匈奴打，他只好把自己的公主（有的並非是皇室的真公主）一個又一個地嫁給匈奴人去和親。用以換取邊境的安寧。等到漢武帝的時候，國家強大了，他覺得不能再讓漢家的女兒，為漢家的人民去忍受這份侮辱，就決心反擊匈奴，結果還真的把匈奴打敗了。打敗了匈奴之後，由於他氣盛了，也就生出了擴張之心，就繼續地追殺匈奴，把匈奴的一支追殺到匈牙利去了，又迫使另外一支逃到了東邊，後來成為我國北方幾個少數民族的先人。由於年年爭戰，使得國力重新走向貧

弱，他晚年因覺悟，就頒佈了“罪己詔”。他認為，我已經保衛了邊境和邊民，就應該知足了；我不應該再為著建立戰功和開疆擴土，而繼續讓人民流血流汗，使人民的生活越來越窮困。

到了唐代，西藏當時叫吐蕃，曾兩次大規模地侵略中原，但最後都被大唐王朝打敗了，打回去了。可是我們的唐太宗和唐玄宗兩代皇帝，卻在打贏藏人之後，派出自己的公主去和親。這就不是因為打不過人家才被迫要去和親了。因為我們唐代的君主們，已經意識到和平的重要性，“睦邊”的重要性。已經弱化了那種要以武力擴展來為自己開疆擴土的欲望。

到了清朝，西元一七二零年，康熙皇帝就曾邀請達賴五世喇嘛到北京來相聚。為了歡迎他，康熙皇帝親自走出北京城二十公里，和五世達賴喇嘛席地而坐，飲茶討論國事。由此看來，我們的漢人，我們的先人，雖然還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夠好，但是，王道的思想和王道的追求，而不是霸道的思想和霸道的追求，畢竟還是他們所不敢輕易忘卻的。

大家都知道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大小朝代。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只有兩個未曾統一中國的朝代，一個尚可說是中華的一脈，一個卻是馬列的邪宗，只有他們這兩家，在打下天下、擁有天下之後，竟敢“大殺天下”。他們，一個就是洪秀全的農民造反王朝，另外一個就是毛澤東的共產革命王朝。除此之外，我們哪一朝哪一代的開國皇帝，不論大小，開國之後都不是“大殺天下”，而是“大赦天下”，非但對前朝的貴族、官吏甚至是戰敗的軍人，不當作“階級敵人”看，不去大批地或一批又一批地屠殺他們；而且把原來就該殺的犯人從監牢裏放出來，給予他們一個在新朝代裏繼續做人的機會。這和農民領袖洪秀全、特別是共產領袖毛澤東在奪取了政權以後，一定要利用“鎮壓反革命”等種種手段，發動各色各樣的政治運動，一再地和連續地殘酷屠殺“戰敗者、敵對階級，投降起義者、甚至是無辜的百姓”，完全不同。

在《走向共和》這部電視連續劇裏面，有一句非常漂亮的臺詞，是從一位記者的嘴裏說出來的。她說：“辛亥革命是歷史上少有的革命”。配著這句說詞的，便是孫中山先生走進已經垮臺的滿清皇宮，告訴隆裕皇后說，“像這樣地優待前朝統治者，唯有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才能做到”。辛亥革命為什麼能做

到呢？因為辛亥革命繼承了中華民族文化、特別是政治文化中的這樣一種優秀傳統。這個傳統告訴我們，敵人已經被我們打敗了，在我們過去的敵人之中，能幹的我們應該用，不能幹的我們也應該留，要讓他們有安全感，以便共同建設新的國家。所以，只有馬列奉行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種殘酷的政治文化，才會把已經被打敗的敵人，把已經投降的敵人，甚至是把無辜的人民，按在他們血腥的鋤刀之下。這實在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傳統所使然。

大家稍稍翻一翻最近國內出版的歷史書籍，看一看國內拍攝的歷史劇，就會發現，辛亥革命之後，失去了權力和貴族尊嚴的滿清王公大臣們，照樣過著自由的生活。有能力的，仍然擁有去奮鬥的社會條件，沒能力的，則可以我行我素地自我消磨。沒有人無來由地便去抓他們，捕他們，鬥他們，押著他們掛牌子遊街，逼迫他們去勞動改造；只准許他們規規矩矩，不准許他們亂說亂動，直至成批地殺害他們……。哪像共產黨那樣，殺了地主，還要奪地主的土地；奪取了人家的財產，還要殺害人家的性命；殺了人家的性命，還要給人家戴上地富反壞右的帽子，要將人家的子子孫孫都踩在腳底下，永世不得翻身……。一次土改就殺了兩百萬地主，一次鎮反就殺了四百六十萬反革命。毛澤東曾又歎虛、又驕傲地說：“秦始皇算什麼，秦始皇才坑了四百六十個儒生，我們一次就殺了四十六萬知識份子！”但是，這絕不是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相反，是對我們中華民族優秀政治文化——“王道文化”的公開背叛和徹底反動。

### 三、理性地反對封建

第三，我們還有一個很好的東西，就是“理性地反對封建”。大家聽到我這句話，一定會覺得很詫異：我們中國是在什麼時候就“理性地反過封建”了？

**第一，反封建反得早。**在全世界，像中華民族這樣，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經“反了封建、置了郡縣”，就自發自覺地從君主貴族政治走向了君主平民政治，非但極其罕見，幾乎絕無僅有。而共產黨卻根據馬列的所謂歷史發展“規律”，把一九四九年前的

中國歷史，全部說成是封建，全部說成是封建社會，這不僅大錯特錯，而且是對中國歷史的蓄意歪曲和否定。

我們真正建立了“封侯建國”這樣一種等級政治制度的大周朝，曾有八百年的歷史。其間，西周三百年；東周五百年，含春秋兩百四十八年、戰國兩百五十二年。距今已有兩千多年了。也就是說，所謂封建制度，只是中國兩千年前的古代政治制度。歷史的事實是，到了春秋時代，封建秩序就已經開始動搖；到了戰國時代，大周朝的封建社會就已經在走向瓦解了。整個社會，等級森嚴的政治秩序正在崩潰，平民意識更已經在迅速擴張。

鄭莊公以一國之諸侯，居然敢與周天子互換人質，歷史上稱做“周鄭交質”；其後，他甚至敢與王師交戰，射傷了周恒王的肩膀，使得周王室的威信掃地。後來，魯國的公子翬已經敢殺掉其父魯隱公，而另立公子允；宋國的華督也敢殺掉宋殤公，而另立公子馮；至於齊襄公竟與已經嫁給魯恒公的妹妹亂倫，而引發了叛亂篡國的悲劇；一些諸侯國的大夫，已經敢於弑君而自立，直至造成“三分公國”的亡國之禍……等等這樣一類無視封建禮法即封建秩序的事情，實已層出不窮。於是，隨著等級制度的日漸崩解，在民間，才會出現許多有思想、有才能的平民，哪怕是曾經賣身為奴的人，或戰敗為奴的人，都能夠憑著他們的才華和本領，而完全可以不依靠“出身好和出身貴”，就能在政治上和各種各樣的舞臺上展頭露角，施展才華和抱攄。奴隸百里奚在秦穆公時代出將入相的故事，蘇秦、張儀等無數民間士人，均可以在各諸侯國成為著名政治家的春秋戰國傳奇，都實實在在地證明了一股進步的政治潮流，已經在隨著封建社會的日漸腐朽和沒落，而預示著一個新的和相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出現。倘使沒有這一歷史的變化和進步，春秋戰國時期，就沒有了所謂的“百家爭鳴”，就沒有了“諸子百家”，也就沒有了後來的秦始皇統一中國，

秦始皇終於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統一了中國。“廢了封建，置了郡縣”。中國終於從封建的貴族政治，走向了相對進步的君主平民政治。就是終於從“只有是貴族出身的人才能按階級管理天下的嚴格等級社會”，走向了一個進步時代。在這個進步的時代

裏，只有君主一家可以世代相襲，其他所有的大臣和官員，甚至是宰相，基本上都是來自民間社會，要靠自己的才華和奮鬥才能夠脫穎而出，施展抱負。

此後，在秦以後兩千餘年的歷史上，出現過許多好宰相、好官僚和好政治家。說句笑話就是，出身於“貧下中農”的大官、好官也有的是。那個時代，在以宰相為“班主”的平民政府和天子皇帝之間，雖然不可能存在“君臣有憲”，卻也是“互有制約”。宋朝人洪咨夔就曾評價中國的君主制度說：“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人主就是指皇帝，中書就由宰相當頭的“政府”。而中國古代的皇帝，大多數都能夠遵守這種制約。大家去看看歷史劇，讀一讀中國古代各種各樣的歷史故事，就會知道，許多的皇帝是不具有絕對的專制權力的。他在許多國家大事上，甚至是皇家的私人大事上，都要受到群臣的制約。他要冊立某一個妃子為皇后，還要“庭議”，還要臣子們一起來討論合適不合適；大臣們如果都反對，他也沒有辦法。他要冊封某個皇子作為太子，就要“朝會”，就是和大臣們進行三番五次地討論；要是大臣們一致反對的話，他也只好讓步。好皇帝聽大臣們的意見，就是聽以宰相為首的那個平民政府的意見；壞皇帝不聽群臣的意見，不買那個平民政府的帳，甚至還敢於濫殺大臣，那他就是自取滅亡。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的王朝興亡歷史上，實在是數不勝數。

中國在秦以後的漫長君主專制統治時期內，一直到明朝那個貧下中農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廢了宰相為止，皇帝和政府的關係，基本上都是互相制約的關係。這個政府，是用吐故納新的方法，也就是用考試的方法、監察的方法、早期則是“舉賢良方正”的方法，和設立諫官制度的方法，從民間不斷的引進優秀人才，自朝廷到地方不斷地懲治和淘汰壞的官僚，不斷地充實和更新平民政府。表面上看，它只是皇帝的辦事機關，智囊機關，官僚衙門，實際上，它掌握著政府的一些基本權力，甚至是和皇帝討價還價的權力。這個統治形態，從整體上來說，到了朱元璋才轉變，才惡化，也才開始了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沒落期。這個農民革命英雄出身的皇帝，他廢了宰相，將整個政府的權力攬到了自己的手中，將平民政府對皇權的制約，基本上毀棄掉了。滿清入關以後，一個少數部族統治了廣袤的中原大地，他害怕漢人造反推翻

他，於是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了朱元璋的統治方法。這個方法，猶如乾隆皇帝所言，就是：“幹綱獨斷，乃本朝家法”。

儘管如此，自朱元璋的大明一直到愛新覺羅的大清，雖然宰相政府的職能，甚至是形態，已經消失，皇帝老子們已經真正做到了“幹綱獨斷”，但通過考試“不問出身好壞貴賤”地選拔官吏制度，和保留諫官及監察部門以制約官僚的制度，卻從來沒有被廢棄。相對於毛澤東時代一切講究成份、一切都要有嚴酷的等級、一切都要從“出身好壞”出發，來決定全體人民的全部命運，甚至是普通人民起碼的謀生要求；相對於共產黨改革開放之後，至今依然是“非黨不官”、“逆向淘汰”、至今連一個象樣的考選制度和監察制度都弄不出來，或根本就願意弄出來，即便是有，也只是過場和形式而已，我們的歷史到底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甚至是早就倒退到兩千餘年前的嚴酷封建等級社會去了？我想，歷史終究會作出一個公正的結論。

**第二，反封建反得徹底。**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焚書坑儒，焚燒了一大批經史子集，坑殺了四百六十個儒生，不僅是歷史的重大罪行，更得罪了世世代代的文人。中國一代又一代的知識份子們，對他可以說是天天罵，月月罵，年年罵，代代罵。今天，在中國，有一些自稱是崇尚“個人自由至上”的知識份子，他們在仍然沒有真正言論出版自由的中國大陸，雖然高聲自號是“自由派”，卻不敢公開地罵史無前例的獨夫民賊毛澤東，特別是昨天的江皇帝和今天的胡皇帝，只敢於繼續大罵秦始皇；雖不敢真罵專制的共產黨、卻敢於惡罵共和的先知孫文——不公平啊！

可是，大家是否知道，秦始皇為什麼要焚燒那些史籍、活埋那些儒生呢？

秦始皇滅六國之後，統一了中國，建立了大秦朝，不但沒有象共產黨那樣，鎮壓反革命，殺地主鬥資本家，實行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發動大規模迫害知識份子的反右派鬥爭，直至發動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幾乎把知識界整個兒推進了血海，相反，秦始皇卻把“舊中國”各諸侯國的著名貴族知識份子們，都請到了大秦的首都——咸陽，讓他們做博士官，好吃好喝好住的款待他們，好讓他們自由地做學問。每年春天和秋天，還親自和他們在一起開會議政，請他

們提意見，還讓他們罵，然後還宴請他們……這些博士官們，以著名的儒生淳於越為代表，整整罵了他八年，十六次，他都沒有將他們打成右派，也沒有把他們打成反革命分子，更沒有抓他們勞教、勞改、甚至“綁縛刑場執行槍決”。

直到第八年，秦朝苛政，民間已屢有動亂，政權也已經不穩，宰相李斯，也是個平民出身的知識官僚，才向秦始皇提出，淳於越們到處講演，要廢除郡縣，復辟封建；要你重新封侯建國，把已經統一的中國，重新分裂成周朝那樣的許多諸侯小國……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重新實行封建貴族政治，推翻君主平民政治，大開歷史的倒車……。於是，秦始皇問他該怎麼辦？李斯說，那就明令頒佈“禁書令”：主要是焚燒六國的史籍，他想借此來剷除六國舊貴族要求復辟封建制度的歷史政治基礎；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他想借此來消滅儒生們企圖復辟封建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礎……。免得他們到處煽風點火，擾亂人心。秦始皇完全聽從了李斯的建議，頒發了“禁書令”。於是，一場秦火，幾乎將秦前三代的史籍和經書，大部燒成了灰燼。當然，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也就隨之而灰飛煙滅。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從政治和文化兩個方面來嚴禁“以古非今”，也就是絕不允許“推翻郡縣，復辟封建”。

開始，秦始皇雖然大規模地焚了書，卻沒有大規模地殺害知識份子。但是，就在他以為“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之後，卻因為為他求長生不死仙藥的方士徐福，竟然騙了他大量的金錢東去而不返；方士韓終不但也和徐福一樣“攜款捲逃”，而且曾被他賜予許多好處的煉丹方士盧生和侯生，也在背後罵他，然後也逃之夭夭……。秦始皇一氣之下，便要御史查辦這些騙他和罵他的讀書人（他把儒生和方士都納為讀書人一類）。未想，儒生們為自保，卻互相“揭發”起來，就象中共發動歷次政治運動整肅和迫害知識份子一樣，許多知識份子為自保，就開始互相揭發、甚至相互誣衊起來。於是，秦始皇便下令將被揭發出來的四百六十個儒生活埋了。這就是他的“坑儒”。

焚書和坑儒，當然都是暴行，更是一種極端的暴行。可幸的是，其後歷朝歷代的皇帝，大多數確實都將他的焚書坑儒當成了一個警戒，當成了一個可怕的

鏡子，而不敢效法。朱元璋興文字獄，是因他出身貧賤，心理變態，並非是志在大規模地鎮壓知識份子。清朝的文字獄，則源於民族壓迫，出自少數部族在統治了廣大中原之後，所必然會產生的恐懼心理，也不是蓄意要對知識份子進行大規模的迫害，甚至只是一個又一個的“個案”而已。兩者均非蓄意發動的全民式的政治運動。

二千餘年來，唯獨只有毛澤東和共產黨，不僅將秦始皇當成了學習的榜樣，而且還“以俄為祖”，“以馬克思、列寧和史達林為師”，創造性地和極端地發展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暴政。毛澤東曾“歉虛”地說他一次就殺了四十六萬人的“語錄”，共產黨曾一次就打了 117 萬右派分子的“革命貢獻”（當時的中國，一共才有四百萬知識份子），只能叫一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矚目而驚心。秦始皇當然只能望塵而莫及，朱元璋和康熙、乾隆怕也只能是“望毛而興歎”！就不說，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千多年，整個世界早已經處在追求和實現民主的光明時代；而中國，也已經在 20 世紀初就開始過“走向共和”了！

秦始皇在兩千二百年前，就廢除了封建，統一了中國；用四百六十顆反動貴族儒生的腦袋，保住了中國從封建貴族政治轉向君主平民政治的歷史性進步。雖然殺人就是暴政，坑儒則是絕對錯誤，燒書不用說便是愚昧和愚蠢，但是，倘使我們能回首兩千兩百年前的時空，然後再想一想，中國的反封建是不是全世界最早的？中國的反封建是不是相當地堅決和徹底的？那也是一場革命啊，而且是決心掃除和結束封建制度的革命啊！

此後，大漢朝取代了大秦朝。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在建國伊始，為了維護剛剛建立的統治，一方面繼承了秦皇朝的郡縣制，一方面也對劉家子弟和異姓功臣進行了暫時的分封，即短暫的“封侯建國”。可是，自秦始皇於西元前二二一年統一中國，廢封建，置郡縣，從封建貴族政治走向君主平民政治，一直到漢武帝最後用《推恩令》的辦法，徹底解決封建的殘餘制度，其間九十三年，曾一再地出現過“要封建和反封建”的長期較量，反復較量和殘酷較量。其中，眾多異姓王國對大漢朝的反叛固然與此息息相關，更多的則是劉氏同姓王國，都曾為了“捍衛”自身的封建貴族權利，而一再地製造過種種的政治陰謀，掀起

過形形色色反對中央朝廷和反對國家統一的背叛行動，直至發動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其中發生在漢景帝時期的“七王之亂”，和發生在漢武帝時代的淮南王反叛陰謀，以及為發動武裝叛亂而不惜出賣國家民族——與北方匈奴相勾結的賣國勾當，竟然險些動搖了大漢的國本，顛覆了大漢繼承大秦的郡縣制，即君主平民制度。

但是，較之封建貴族政治相對進步的君主平民政治，還是在前後長達百年的奮鬥中，在大漢開國初期幾位開明有為的君主們堅持之下，由於一些先進政治家諸如賈誼、晁錯的智慧和獻策，而終於成功在一代雄主——漢武大帝的時代。中國的封建制度，也終於壽終正寢。其後，即便封建社會的種種殘餘形式和殘餘行為，還會在前進的時代裏，時而會沉渣泛起，但是，“封而不建”既已成為政治的規矩，“統而不分”也已成為歷史的理想。世襲的皇室各等貴族，頂多也只能是錦衣玉食，卻再也不能夠“割據稱國、復辟封建”了。即便有，也只能是轉瞬即亡。請大家看一看最近國內拍的一部很好的歷史劇《漢武大帝》，從那裏面，是能夠看到我們的大漢民族，是怎樣為了維護進步的政治制度，而在與落後封建制度和倒退歷史要求的頑強抗爭中，表現了我們偉大民族追求進步的意志和精神的。

**第三，反封建不反民族文化。**我在前面已經說了，我們中國反封建，一是反得早，二是反得徹底。就前者而言，與歐洲反封建較早的英國和法國相比，約早了一千六、七百年；比反封建最遲的德國、日本相比，則早了幾乎兩千多年；至於 1861 年才廢除農村封建制、即農奴制的俄國，那就更不用比了。就後者而論，則正是因為歐洲的封建制度崩解得太遲，所以，歐洲民主革命的一個重要物件和主要內容之一，便是反對“封建專制”；而我們中國的辛亥民主革命，就是孫文發動和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的重大使命和主要內容，則是反對“君主專制”，又稱“君主帝制”；因為“封建專制”在中國，早在兩千年前就反過了，而且反得很徹底。

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只有明白了這個區分，我們才能瞭解共產黨硬要根據馬列的所謂歷史唯物主義，特別是他們的反封建革命口號，將我們中國秦王朝以後兩千年歷史“一筆勾銷”的荒唐不經；和他們

更要籍口“反封建”，而將中國的優秀民族文化予以全盤否定和徹底否定的滔天罪惡。因為，兩千多年前，我們的先人在及早地和堅決地反掉了封建貴族政治之後，除掉秦始皇曾用過“焚書”的極端方式，來維護他奠定的郡縣制度以外，之前和之後，我們的先人都是反封建卻並不反自己的民族文化。雖然一把“秦火”，幾乎燒盡了我們的古籍，但是，其間，不僅尚有民族優秀分子，在暗中保護著和傳承著殘存的文化典籍；之後，特別是到了漢王朝建立之初，我們的先人，就更是自覺地從民間開始了一場“挽救民族文化”的運動。

他們不僅在民間全力搜求殘遺的文化典籍，而且許多昔日的儒生，他們先是憑著記憶，用口耳相傳；後則憑著記憶，用筆記錄；再就是對憑記憶傳承和記錄下來的文化典籍，考據和研究他們的內容之真偽，篇目之缺失。單單是著名的詩經，便既有申培公於魯地授徒教學的“魯詩”；也有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所傳的齊詩和韓詩；還有相傳是從孔門弟子子夏的門徒手裏傳承下來的“毛詩”；……其他諸如“易經”、“禮經”、“書經”和“春秋”等，也都各有傳人。

這一場從民間開始的搶救民族文化的運動，不僅在漢初“要封建和反封建”的艱難較量時代，廣泛地影響了民間，也迅速地影響了朝廷，而且立即獲得了官方的支持、參預和推展。大家知道，從馬上得天下的劉邦，雖是個不讀書、也看不起讀書人的大漢開國皇帝，但是，在大臣陸賈跟他說明了道理之後，他便馬上改變了態度，明確地表示了對於搶救詩書的支持，甚至對儒生叔孫通大加欣賞。其後，他的兒子漢文帝則對少年儒生賈誼更是欣賞得了不得。特別是一些諸侯王，如劉邦的兒子，楚元王劉交、河間獻王劉德等，不但向民間廣求詩書文獻，重用先秦遺老遺少中的著名文化人士，而且還專門派兒子去向大儒申公學詩，以開拯救、學習和傳承民族文化之風氣……。

到了文帝和景帝，朝廷已經將對書經、詩經和春秋的研究，立為有博士頭銜的官學了，董仲舒、胡毋生作了研究“春秋公羊學”的博士，晁錯和張生作了研究“書經”的博士，魯人申培公、燕人韓嬰、齊人轅固生作了研究“詩經”的博士……。由於書經失傳，文帝時，唯有濟南的秦朝博士伏生能治書經，但



年高九十，不能行動，文帝就專派太常掌故晁錯前往學習，將其所傳，全部背誦下來，帶回了朝廷。到了漢武帝時，因著名儒臣王臧、趙綰的鼓勵，更因為武帝自己懷抱建功立業的理想，而開始尊儒，於是又聘請楊何為“易經”博士，後蒼為“禮經”博士，歐陽生為“書經”博士，加上原有的“詩經”博士和“春秋”博士，這就是所謂“立五經博士”。自此，朝廷開始允許五經博士授徒，五經學人，便稱“太學生”，朝廷也開始在這些畢業的太學生中考選官員。

此後，雖然武帝開始了“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改變了漢初的“獨尊道術”，不再對其他思想學術文化流派“予以提倡、納為官學”，但是，既未迫害，更為殺戮，而是“無為之治”，任其自生自滅罷了。絕非象兩千餘年之後的共產黨那樣，一意只在“獨尊洋教馬術，殺盡中華百家”，為建立一個背祖叛宗的馬列王朝，而不知屠戮了我多少中華優秀兒女的性命，毀掉了我們中華多少優秀的好文化。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為何在東西兩漢，除儒學之外，其他各派學術、甚至包括由道術演變而成的上中下三等道教，都能夠為自己拓展一片發展的空間，雖然有的也曾走上了歧途，而成為邪教。

漢初從民間開始、由朝廷推動的“搶救民族文化”的運動，具有極其偉大的意義。

一是它使得在先秦就已經成形、成熟、並形成了輝煌局面的中國民族文化，沒有因為“秦火”而滅絕，卻反而得到了傳承和發展。

二是先秦文化留下來的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自由精神”，因此而影響了其後中國兩千年的文化發展歷史，為後來中國民族文化的發展成就，奠定了牢固的根基。

三是它開了一個“好頭”。其後二千年，直到共產黨用馬列的思想文化來奴役中國人民為止，凡歷朝歷代的興亡之際，都不再出現過“秦火之禍”。也就是再也沒有哪一家開國皇帝，要對前朝和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進行滅絕性的焚燒和毀棄，從而使得中國的文化能夠沒有間斷和不再間斷地流傳了下來，甚至一次又一次地獲得了輝煌的發展。連入主了中原的少數部族統治者——元和清，都非但全盤接受了中華文化，而且為中華文化所同化，甚至在他們統治的朝代，依然產生了優秀的文化成就——中國戲劇和小說的發

展，就正是在元清兩朝才攀登上了世界戲劇和文學的高峰。

四是漢初，正處在“要封建和反封建”這樣一個倍顯艱難的時代。但是，不僅是在民間，而且在朝廷，都沒有因為決心反對和剷除封建，更沒有因為封建勢力的一再反撲、反叛，而要求將先秦的“封建文化”同時消滅。相反，他們不但擯棄了秦始皇為反封建而採取的簡單粗暴做法，相反，卻一再地和持續地為搶救民族文化和繼承民族的優秀文化，立下了曠世之功，從而為中華民族未來的文化發展奠定了民族文化的基石。相反的是，在其後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唯有共產黨在中國建立的馬列王朝，只需馬列的一句“反封建”口號，就會在“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馬列反動思想旗幟下，不僅對中國的民族文化進行了無恥的栽贋誣蔑，而且對我們悠久的民族歷史和輝煌的民族文化進行了瘋狂的否定，大規模的焚燒，和一再的、連續的毀滅。直到如今，馬列的思想文化仍然像無以根除的毒汁，浸透在我們當代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在文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仍然在氾濫著其罪惡的影響。稱之為“史無前例”，乃確鑿無疑。

五是在歷經了馬列子孫集團——中國共產黨對我們民族文化的浩劫之後，又為當代中華兒女懷著深哀巨痛而繼承“漢志”，對馬列文化和馬列行徑進行歷史性的批判和否定，從而號召“驅除馬列、還我中華”，留下了歷史的豐富遺產、思想的銳利武器和民族文化的深厚營養。

大家想一想，我們中國人，除掉馬列子孫以外，是不是早就“理性地反對過封建”了？

#### 四、偉大的同化力量

我們中華民族，因為文明開發得早，發展得早，而且發展得好，所以，才會在相當程度上，追求著“內聖外王”的王道文化和王道政治；才使得我們的中華民族，不是依靠武力，而主要是依靠“文力”，也就是文化，來發生影響，產生凝聚；既教化了眾多的化外之民，更同化了許多的週邊民族，從而逐步地開疆擴土，逐漸地形成了一個有著統一政治和統一文化的泱泱大國。這個泱泱大國，雖然合久又分，分久

又合，但是，他的文化，在不斷的分分合合之中，卻不是破裂了，消散了，而是搏合了，融彙了，並且更具有中華民族的文明特色了。這就既形成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同化力量”，又因為這一偉大的同化力量，而促成了我們大中華的形成、鞏固和發展。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歷史上曾出現過幾次大規模的民族融合期，一是先秦時期，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三是元、清兩朝。而次次融合，都既依靠的是我們的文化，又發展了我們的文化。比如，秦、楚兩大國，在東周、也就是在春秋戰國期間，秦作為原來的西北少數民族，就是先“華化”了自己，先接受了華夏文化，然後才“華化”了整個的西北地方諸民族，直至最後了統一了中國，又統一了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南方的楚國，則同樣是先華化了自己，就是先接受了華夏的文化，然後才“華化”了長江以南的諸民族，直至終於成為我們大中華民族的一片美麗南國。

特別具有同化意義的例子是，就是在春秋的內亂和兼併時期，當時對於華夏民族的許多諸侯國而言，最大的危險，曾來自於南方的楚國。當時的楚國地廣勢強，它自己就曾宣言說：“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也就是說，他要趁亂侵略中國了。但是，南蠻楚國，雖因乘機征伐，而滅掉了漢陽一帶不少華夏姬姓諸侯國，但是，它卻在對北方華夏民族征討蠻亂的過程中，受到了華夏民族文化的深沉影響，竟然漸漸地變“嗜侵略”而為“愛和平”，變“亂中國”而為“入中國”了！也就是說，由一個彪悍的蠻夷而逐漸覺醒，並逐漸“善變”為一個“要知華夏文明、欲加華夏之盟”的“盟國”了。據歷史記載，後來，楚莊王雖曾攻打過陳國，卻因申叔時諫言，便恢復了陳國；雖攻打過鄭國，卻又能夠在打贏之後自行退兵而不佔領；於楚晉邲一戰中，它曾將宋團團圍住，卻只因為有人告知宋國國內已經是一片“易子而食，折骸而焚”的苦況，楚王居然能夠以華夏文化的“不忍人”之心，退兵而返。由此可知，此時的南蠻楚國已經發生了變化，以致莽莽楚天，終於變成了我華夏民族的美麗南疆……

而另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則是，從兩晉五胡亂華，亂到南北朝的末年，北方的胡人，不僅佔領了黃河流域，而且入主中原，先後建立了大大小小幾十個國

家。但在經歷了三百年的大紛亂之後，這些已經入主中國境內的鮮卑、匈奴、氐、羌各民族，卻日漸地被我們漢文明所同化了。不但他們的文化幾乎全部融入了漢文化，為漢文化所吸收、所改造；而且，絕大多數的胡人都已經被同化成了漢人，即便是還有一些要守住自己文化風俗習慣的團體和部落，也已經成為我大漢民族的一個部分。其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就不僅強迫鮮卑人接受漢人的衣冠文物，並且下令鮮卑人習漢語，改漢姓，死後連屍骨都要埋葬在中國。也正因為如此，才在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亂紛紛之後，重又出現了我中華民族的偉大統一國家——隋和唐，特別是唐王朝，則更將我們偉大民族的文化和文明，推向了一個更加偉大和高遠的時代。

還有一個宗教上的例子，就更能說明我中華文化非同凡響的同化力量了。東漢以後，特別是在紛紛亂亂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信仰在亂世之際傳入了中華，又因中華亂世而大獲傳播，進而發展、坐大，直至成了一種“有教義、有地盤、有財產、有僧眾的民間‘教政合一’式封建勢力”。但是，從南北朝而至隋唐，中華民族從信佛、傳佛、揚佛而終於走向了“平佛”，即從對佛教的誇張、厚待、甚至放縱，最終地走向了能夠以平常心而待之，直至將它匯入進了中華的主流文化——儒學，從而形成了中國式的佛教文化，這就是唐代中期佛教“禪宗”的出現，也就是說，佛教被我們的中華文化“儒化”、即中國化了。這不僅證明了中華文化的消化能力，而且證明了中華文化的教化力量。此後，不論宋、元、明、清各朝視佛教是尊還是賤，佛教終不過是我們宗教自由之中國的一家宗教而已。

後來，雖然蒙人滅了我們的大宋，但蒙族卻成了我大中華民族的一個部分；滿人滅了我大明，但滿人卻同他的民族一起被我中華民族所同化。也就是說，他能以“武力”贏我，我卻能以“文力”勝人；你滅了我的國，我卻依然能夠用自身的文明和文化，教化和同化了你們，直到讓你也成為我的一部份。所以，著名的康熙皇帝才會說自己是中華的千古一帝；即便是慈禧太后，她在私心之中，也曾對自己說，她也是中華的千古一後。因為，他們都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所以，當我們要自問，中華民族偉大的同化力量究竟來自於哪里時，一言以答之，就是來自我們偉大的文明和文化，就來自於這一偉大文明文化所形成的、擁有無限魅力的“文力”。這個文力，面對著一切企圖滅亡我的國家、甚至是企圖滅亡我民族者，它表現出來的，都是“一個不毒的偉丈夫和一個大量的真君子”的崇高形象。

朋友們：我今天講的，還不過是我們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中很少的一點值得我們驕傲的東西，由於學識所限，還有更多的好東西，就是大量的優秀文化遺產，還沒有被我們這些中華的後輩兒女們所認識。但是，無論如何，只要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特別是我們當代中國的每一個年輕人，都能夠對自己民族歷史進行反思，並在這個反思當中逐漸地、迅速地認識到：中華民族不是劣等民族，中華民族的文化不是劣等的文化，中國人民絕不是愚昧的人民；而且，不是“祖宗有罪”，而是罪在“馬列及其子孫”，我想，我們的自尊心是不是就能找得回來了？



---

## 春天來了

---

日恩

日曆上的春天來了，可是現實中的它在哪兒？

長途跋涉回來休整的閒暇中，就在附近小公園湖邊的散步時，驀然發現了春天。

這是個僅一二畝面積的小池塘，被草坪和甬道攔截在森林的包圍之中。水不盈尺，清澈見底。水草塞

滿了小湖，一縷縷尖稍懶散地浮在水面。除此之外便是花雨，遮得湖面幾無間隙。岸邊那幾棵桃李，枝頭鬧得團團簇簇，風一動，卻又把花瓣灑了一地一池。陽光斜射進水中，晃動的水草像玩萬花筒一般，把落花和光影轉得變幻莫測。無數巴掌長的小魚便在這水草和光影間嬉遊、追逐、打鬧，還不時躍出水面，濺起些摻雜著花瓣的水波來。

一個小小的半島插進湖心，像是專供人們垂釣所設。大柳樹下本是絕好的釣位，卻讓一隻孵蛋的大雁捷足先登做了窩。那只雄雁更是水陸統一佈防，一旦有人靠近便聲嘶力竭，振翅佯攻。一般總是人們忍讓退卻，縱容得它更是囂張。

太陽升高了，空氣被曬得暖洋洋的。湖面上浮著一塊圓圓的木板，那是給烏龜們特設的陽光浴場。大大小小的十幾隻烏龜一溜兒地匍匐在木板上，舒服地閉目養神。龜背曬得發白了，便跌倒在水裏，一會兒又濕淋淋地爬上來。

離開紐約時樹梢剛剛暴芽，從芝加哥回來就已是一片嫩綠。這幾天，每一片樹葉都像是搶什麼似地瘋長，一天一個樣，眼看著樹林已經鬱鬱蔥蔥，濃蔭蔽日了。

啊，這就是春天，這就是我們身邊的春天。你從綠葉看到它，你從魚躍聽到它，你從花粉聞到它，你從拂過臉頰的柳梢觸摸到它。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這麼輕易地感覺到春天的到來，如果心靈深處的冰封一直沒有融化。如果我們耳聾目瞽，如果我們被囚禁在不見天日的地牢，那憑什麼知道春天來了呢？

就像冰裂一樣，我們發現春天到來時心靈會砰然一動的時刻。不管你身在何處，生逢何時——你是否必須費勁地辦出簽證，飛越大洋，來美國找它？你用得著驅車數千英里到德克薩斯，到佛羅里達，到 Key west 找它麼？其實也無需到鄰州鄰縣的德拉瓦爾河谷，到鷹格伍德懸崖去找，它就在我們身邊，它在我們心裏。需要的，只是你的心裏尚存著些年輕人的愛和情。

你還記得在嚴冬的風雪中，因為想到念到所愛的人，而瞬間感到的那種春天的氣息嗎？



# 俄國侵華 的 四次高潮

龍 勝 熊

提要： 俄國的形成和對外擴張 —— 俄國四次侵華高潮  
—— 俄國會不會有第五次侵華高潮

## 俄國的形成和對外擴張

俄國是個成立很晚的國家。在中國元朝時期，只有一個莫斯科大公國。地盤很小。只管轄附近幾個城市。隸屬於元朝建立的四大汗國之一的欽察汗國中的金帳汗國。

一五四七年，中國明朝嘉靖皇帝二十六年，莫斯科大公國的大公（又稱恐布大公），伊凡四世，自己按照拜占庭王朝的儀式加冕，自己稱呼起“沙皇”，把國號改為俄羅斯，這才有俄羅斯這個國家。

“沙皇”（TSAR）原意是莫斯科大公國的俄羅斯人，對拜占庭皇帝及欽察汗國的一種尊稱。可是自伊凡四世自己稱呼起沙皇之後，“沙皇”的原意就沒有了，而成了一種專制、獨裁、暴力、侵略的代名詞。

自伊凡四世建立沙皇制度起，就開始對外侵略和擴張。掠奪、搶佔地盤，奴役、搜刮被征服人民。

西伯利亞廣大地區，原本都是中國的領土。為中國歷史上肅慎、匈奴、烏孫、東胡、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女真、蒙古等各部族的居住地。自沙皇統治後，從十六世紀中葉開始，俄羅斯就連續向東部地區侵略、擴張。侵略步伐越來越快。

自 1582 年至 1638 年，在這五十六年時間裏，沙俄向東部就侵佔四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侵佔的土地，比中國大陸現在的土地面積都多。

1638 年，沙俄在西伯利亞強行建立鄂霍茨克城。在這裏，俄國人從達斡爾人那裏聽到有個卡拉穆河（即黑龍江），才知道有黑龍江。俄國人也就把它稱為“阿莫爾河”。此後，俄國侵略野心就指向黑龍江。

1643 年（明朝崇禎十六年），俄國羅曼諾夫沙皇就陸續派出最野蠻的哥薩克兵侵進黑龍江，進行搶劫和扣押人質。

1644 年（清朝順治元年），沙皇政府更下達兇狠的侵華訓令，說“要是新土地上的任何居民變得難以駕馭、不可能用文雅的手段將他們置於崇高的統治之下的話，……就應該用武力加以鎮壓，使他們居住的地方變為廢墟；……一旦他們被置於沙皇的崇高統治之下，就應該在這些歸屬的人中，挑出一定數量的次要王公和頭面人物，把他們輪流扣押在勒拿哨所作為人質。通過這些人質的扣壓，可以保證從新征服的土地上的居民中及其它臣服的居民中徵集皇家的貢賦。”

俄國人侵華，很重要的一個手段，就是扣壓，收買漢奸、走狗和中華民族的敗類；通過這些漢奸、走狗和民族敗類替俄國侵華賣命。幾百年來，俄國侵略者這個手段一直使用不衰。直到近世，俄國這個手段使用到中共黨徒及毛澤東的身上，也很成功。

當時，英國作家拉文斯坦因敘述說：“當地土著人民，……受到各種各樣的苛求勒索；被掠奪的貢稅達到無限制的程度，……當地的資源，很快就被這些俄羅斯

探險家們不斷地四處掠奪而搜刮一空。俄羅斯人第一次到達黑龍江流域時，當地土著人民以耕種土地和飼養牲口爲生，經過十年以後，這些耕地變成了荒土，而這個本來有穀物出口的地區，變得對本地已減少的人口都不能供應了。“（引自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編《沙俄侵華史》）

以上是三百年前，俄國帝國主義者侵華時，瘋狂掠奪的情況。在三百年後的一九四九年，在蘇俄扶植的中共政權，中國大陸豈不是比三百年前中國人遭受的劫難，更悲慘？大面積土地荒蕪，沙塵暴越演越烈。本來是一個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的農業國，卻鬧得全大陸人民吃不飽飯，餓死數千萬人。至今全要靠進口糧食來維持生命。從人們現代的遭遇，完全可以想像當年俄國侵略者，對待中國人的殘暴掠奪。

中國只要落入俄國侵略者的泥坑，就難以擺脫被壓迫的命運。

自沙俄啓動侵略步伐後，就馬不停蹄的向中國境內侵進。侵犯我國黑龍江地區，佔據尼布楚城，又佔據黑龍江邊的雅克薩城。

由於俄國侵略者侵華野心實在太大，侵華行動實在太猖狂。當時康熙皇帝實在忍無可忍，遂決定堅決回擊俄國侵略軍。使俄國侵略者不得不與中國談判，訂立劃分中俄邊界的條約。

1689年9月7日，中俄訂立《尼布楚條約》。

《尼布楚條約》確定的中俄邊界線，是經康熙皇帝親自批准的一條中俄邊界線。這份條約把中國與俄國兩國之間，東北部的邊界線劃分得清清楚楚。一山一水都規定得明明白白。條約寫得很清楚：“議定永遠和好之處，奉行不得違誤。”這是中國與外國簽訂的第一份正式邊界條約，具有永恆的意義。它是劃分中俄邊界的唯一根據。

根據中俄《尼布楚條約》，庫頁島是屬於中國的島嶼，它與臺灣島、海南島，同爲中國三大海島之一。黑龍江爲中國的內河，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伯力，就如同香港和澳門一樣，都是屬於中國的地方。

1690年1月23日，中俄兩國還派遣官員立定《大清國遣大臣與俄羅斯議定邊界之碑》，將尼布楚條約用滿文、漢文、俄文及拉丁文四種文字，刻在石碑上。刻有多個石碑。這是用石碑明確記載中俄兩國的分界線。“勒石記碑”，日久長存。

中國人是很守信用的，滿以爲有條約爲根據，石碑也把條文刻得清清楚楚，對石碑安放何處，就沒過多考慮。當時，有的石碑安放在分界線上，有的沒有安放在外興安嶺的山巔。這就給俄國鑽了空子。結果，俄國就借此大耍無賴，硬說，碑立在那裏，才能從那裏算是分界線。而不是按條約規定爲准。這樣，俄國又從尼布楚條約規定的分界線，向中國方面多侵佔五萬九千多平方公里。這五萬多平方公里，比現在的臺灣島面積大一倍半。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俄國這個國家是個非常喜歡耍無賴的國家。絕對不是一個君子國。更可看出，俄國侵吞中國土地是無邊無沿的，盡一切可能，用一切手段，挖空心思，千方百計，侵吞中國。坑、蒙、拐、騙、詐、偷、摸、搶、賴，任何卑鄙手段，它都可使用。對俄國這個國家千萬不可掉以輕心，絕對不能把它看成是一個君子國或友好國。俄國這個國家，從來說話是不算數的，對這個國家絕對不可以信任。

## 俄國侵華的四次高潮

中俄之間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之後，雙方相互間保持一百多年的穩定。雖然有不少磨擦，但大體上還沒有出現大問題。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俄國對外侵略本性又發作了，特加別是對中國的侵略，一次比一次加劇。直到二十世紀，侵華更加瘋狂，給中華民族造成巨大的、難以挽回的損失。

總結起來，在過去兩個世紀裏，俄國進行了四次侵華高潮。

第一次侵華高潮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英法聯軍侵華時期。

第二次侵華高潮是在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時期。

第三次侵華高潮是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

第四次侵華高潮是在二十世紀之末。

### 俄國第一次侵華高潮

十九世紀中葉，英法聯軍侵華，當時，中國境內有太平天國作亂。清朝政府處於內外交困狀態。這時，隨時窺視中國政局的俄國，看到侵華機會來了。於是一方面迅速派遣大批軍隊來華，用武力要脅中國割讓黑龍江以北領土。一方面派遣外交官來華，伺機敲詐勒索。



俄國外交官上竄下跳，來往與中國政府與英法聯軍之間，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俄國政府在給它代表團的訓令中說：“在和中國政府打交道時，要放棄舊的一套不夠果斷的作風”，要不顧一切，不擇手段。

俄國使者來華後，向俄國政府提出，要拿出三百萬到五百萬盧布，用來賄賂和收買中國政府官員，以便談判時對俄國有利。他還向俄國政府建議，要封鎖白河口，不讓運糧船進京，造成北京糧荒，迫使中國政府接受俄國提出的要求。

從俄國使者這兩條意見看，俄國在外交事務中是很喜歡使用賄賂手段。自清朝至如今的江澤民及其大小官員，那麼喜歡與俄國打交道，他們都收受俄國多少賄賂，能不讓人懷疑嗎？這位外交官的另一條意見，非常惡毒。這就是要用饑餓政策，迫使中國政府屈服。毛澤東長期包圍長春，眼睜睜餓死幾十萬中國同胞，或許也是從俄國人這裏學來的。

俄國使者對英法侵略者獻計獻策說：“除去向北京施加壓力之外，對中國政府沒有其他辦法，而使這種壓力生效的最好手段，莫過於用吃水淺的軍艦逕自開進白河口。”他還提到，五、六月天氣晴爽，溫度適中，是在渤海灣採取軍事行動的最好時機。

俄國使者還對英法代表說：“和中國人打交道時，如果沒有堅定和恐嚇，就不能達成令人滿意的結果。”“可能在使武力的時候，這種辦法也是行之有效的。”

在俄國使者與英法侵略聯軍互相勾結，挑撥離間的同時，俄國大批軍隊侵進黑龍江。

1858年5月27日，俄國用大軍壓境的情況，逼迫中國政府訂立《璦琿條約》。俄國用這份條約，強行割去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共六十多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同時把中國的內河，變成中俄之間的界河。還把烏蘇里江以東四十多萬平方公里中國的領土列為中俄共管。

在《璦琿條約》簽字後，俄國侵略者得意忘形地說：“阿莫爾界約今天在璦琿簽訂了。俄國人統治阿莫爾的權利已得確定。”他們狂呼：“夥伴們！我向你道賀，我們的勞動沒有白費，阿莫爾變成俄國的財產了！”

試問，俄國有什麼理由，把中國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強行割去？在這份條約之後，中國歷屆政府為什麼不能，或不去收回自己的這片國土？

就是這份蠻橫無理的《璦琿條約》，也明確規定：江東六十四屯為中國人“永遠居住”，俄國“不得侵犯”。在二十世紀後期，江澤民在與俄國劃界時，根本不去根據條約收回這塊土地。他是喪心病狂地把中國的土地都出賣了！

1858年6月13日，在《璦琿條約》後，僅只半個月的時間，俄國趁英法打下天津之時，搶在英法之前，又逼迫中國簽訂《天津條約》，再次從中國掠奪大量權益。取得沿海通商權。開闢通商口岸。買土地、設教堂以及停泊軍艦的權利。享有領事裁判權。享有最惠國待遇。建造教堂，自由傳教。俄國人在中國內陸通商人數、資本、攜帶貨物，不受限制，等等。通過這份條約，俄國人幾乎把中國變成了他自己國土的一部分。俄國人可以在中國橫衝直撞。這份條約，還包含再侵吞中國土地的條文。

1859年底，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密令俄國侵略軍，要“運用我們的軍隊，實際去佔領這些邊界-----烏蘇里江右岸，並用軍艦去佔領滿洲的各個港口。”命令艦隊去佔領直至朝鮮的沿海各重要港口。

這時，俄國為了達到侵佔中國大片領土的目的，又煽動英、法攻打北京。

英、法起初無意攻打北京，只是要求去京換約。但是，俄國使者卻極力煽惑、鼓動英、法攻打北京。在俄國侵略者的大肆煽動下，英法軍隊才進軍北京。俄國侵略者並為英、法提供攻打北京的情報、路線。

倘若，沒有俄國鼓動英、法打北京，英、法不攻打北京，也就不會有中國最富麗的皇家園庭----圓明園被燒毀的事件。俄國侵略者是燒毀圓明園的始作俑者。

1860年11月14日，在燒毀圓明園的火光中，俄國侵略者搶在英、法之先，急忙逼迫中國政府簽訂《北京條約》。通過這份不平等條約，俄國除了從中國掠奪很多特權，並要侵吞中國新疆西部四十四萬多平方領土。

以上，自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〇年，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裏，俄國馬不停蹄的侵略中國，連續逼迫中國簽訂三份不平等條約，強行侵佔中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領土。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俄國成了對中國領土掠奪最多的一個侵略國。是欠中國債最大的一個侵略國。是世界上強佔土地最多紀錄的一個國家。

當時，馬克思、恩格斯還都在世。這兩位老先生對俄國乘英、法聯軍之機，趁火打劫，侵略中國，都看得

清清楚楚。他們明確指出，這次英、法戰爭，不是對英、法有利，而是對俄國有利。恩格斯說：“英國和法國對中國進行戰爭，只是爲了讓俄國得到好處。”還說：“俄國從中國奪取了一塊大小等於法德兩國面積的領土和一條同多瑙河一樣長的河流，-----竟能挺身出來充當衰弱的中國的秉公無私的保護人，而在締結和約時儼然以調停者自居；……這次戰爭不是對英國和法國有利，而是對俄國有利。”

馬克思也指出：“如果有誰在北京擁有政治影響，那一定是俄國，俄國由於最近的條約得到了一塊大小和法國相等的新領土，這塊領土的邊境大部分隻和北京相距八百英里。約翰牛由於進行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使俄國得以簽訂一個允許俄國沿黑龍江航行並在兩國接壤地區自由經商的條約。又進行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幫助俄國獲得了韃靼海峽和貝加爾湖之間最富庶的地域，俄國過去是極想把這個地域弄到手的，從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維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圖佔有這個地域。”

馬克思還說：“我曾設法指明：實際從這次海盜式的英中戰爭中取得實利的唯一強國是俄國。（以上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或是事實，從鴉片戰爭中真正獲得實利的是俄國。而這樣一個獲得實利的俄國，卻能出來充當中國“秉公無私”的保護人。中國人從一百五十多年前，就被俄國人耍弄，命運多麼可悲，可歎。

俄國第一次侵華高潮，以掠奪中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而記錄在案。

### 俄國第二次侵華高潮

俄國第二次侵華高潮，是在八國聯軍時期

俄國強佔中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很自然的引起一些國家侵華的欲望，特別是召惹日本來侵華。俄國也唆使日本來侵華。只要日本侵華，俄國就會像英法聯軍時期一樣，再趁火打劫。其實二十世紀的日本侵華，也是俄國挑撥起來的。俄國最喜歡在中國製造事端，或唆使他國侵華，或鼓動中國內亂，只要在中國出現任何動亂，它都可以混水摸魚，或敲詐勒索。

一八九四年，發生一場日、中甲午戰爭。

《走向共和》電視劇，特別演出了李鴻章在馬關談判時的驚險場面，及被日本浪人行刺的情節。這次戰爭

完全是俄國侵華誘發、召惹和參與的。由於俄國侵佔中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才誘發日本也要強佔中國領土。在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談判時，伊藤就明確提出：“貴國何以將東西伯利亞割讓給俄國？”

（東西伯利亞就是西伯利亞東部，即指俄國侵佔中國外興安嶺以南的事情。）這就是說，你中國既能把東西伯利亞割給俄國，那爲什麼不能把臺灣割給日本。

早在甲午戰爭戰爭暴發前四個月，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就提出：在朝鮮即將發生的衝突中，“我們當然不能置身局外”。五月，俄國就先把炮艦開進仁川。

甲午戰爭一打起來，親俄派李鴻章馬上去引狼入室，請俄國來遏制日本。這對俄國來說，真是正中下懷，求之不得。

俄國像在英法聯軍時期的兩派表現一樣，對中國表示：“對中國持有最友好的態度，並將竭盡一切以支持中國的和平願望。”另一方面，卻暗中支持日本，聳恿日本侵略。趁機把自己的勢力伸入朝鮮。當時，日本外交大臣陸奧宗光就已經看出俄國的野心，他說：“當時俄國對中、日兩國的真正企圖，如果不能兼獲鷸蚌之利，也必須嘗到熊掌或鮮魚一項美味，只是等待時機而已。”

當時，恩格斯老先生還在世，雖然已到晚年，但頭腦還清楚。他明確指出：“我認爲中日戰爭是把日本作爲工具的俄國政府挑起來的。“俄國像過去鼓勵英法攻打北京一樣，現在鼓動日本侵華。

不管那一個國家侵華，只要一侵華，俄國就可趁火打劫，從中漁利。這幾乎是俄國侵華的一個規律。二十世紀的中、日戰爭，亦複如是。

俄國曾與日本密謀，允許日本佔據臺灣，但不要侵佔中國東北。

1894 年底，當日本佔領了全朝鮮，接著侵進中國東北，佔領了遼東半島。這時，俄國就忍耐不住了，認爲日本是侵犯了俄國的勢力範圍。妨礙了它的侵略意向。俄國立即派兵到中國吉林。到一八九五年三月下旬，俄國增兵三萬多人，與日本爭奪遼東半島。

俄國在任何時候說是爲了幫助中國，其實質都是爲了維護它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從中掠奪特權。

中國在《馬關條約》中除被日本割去臺灣等地，日本還強索兩萬萬兩賠款。俄國，就在這筆賠款上大做文章，對中國敲詐勒索。

俄國夥同法國，對中國進行“四厘貸款”，即要中國向俄、法借錢，支付對日賠款。俄法實際是放“高利貸”，在每年的借款中抽取百分之四的利息。中國一方面對日賠款，一方面對俄、法支付利息。這筆貸款的總額是一萬萬兩白銀，要中國在三十六年內還清。要用中國海關關稅擔保。俄、法得派人充任中國海關稅務司，不許他國享有管理或監督中國稅收等項權利。這等於俄國成了中國的太上皇。俄國從財政上掐住中國的脖子，什麼事情都要聽命俄國。這筆貸款主要是由俄國主導。但是法國也起了惡劣的作用。中國人民應該注意，就是至今法國也是獻媚中共政權，投中共所好，而對中國人民並不友好。

俄國通過這筆貸款，對中國進行了敲骨吸髓的榨取和掠奪。

接著，俄國就逼迫中國簽訂鐵路合同。

俄國爲了修築西伯利亞鐵路，處心積慮要通過中國東北，甚至要修改中俄邊界，把俄國邊界擴展到中國境內。俄國在報紙上大造“借地”造路輿論。當時，未得中國許可，俄國就先派人到中國境內勘查。

1896年4月12日，俄國的財政大臣微德給俄皇尼古拉二世上書，力陳通過中國境內修築鐵路的重要性。微德說：“所擬聯接外貝加爾省與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不僅有經濟意義，還有政治的及戰略的意義。”“我們的敵手（指英、法、德、日等國）都竭其全力要在中國鞏固地確立自己的勢力”，在這種情況下，俄國“必須用種種方法將中國北部的鐵路網轉入自己手中，首先要將由外貝加爾湖穿過滿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幹線握在手中。”因爲“從政治及戰略方面來看，這條鐵路將有這種意義。它使俄國能在任何時間內，在最短的路線上，把自己的軍事力量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及集中于滿洲、黃海海岸及離中國首都的近距離處。相當數量的俄國軍隊在上述據點出現，一種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國不僅在中國，並且在遠東的威信和影響，並將促進屬於中國的部族和俄國接近。”從經濟主面來看，“依此一方向建築鐵路，則符拉迪沃斯托克會成爲滿洲大部分地區的主要港口”，“提供非常有利於俄國的商業條件”，俄國“就能在滿洲及毗連滿洲的中國省份堅固地站穩。”

從微德這份上書，可以充分看出，俄國侵略者侵華用心多麼險惡！

俄國爲了修築這條深入侵華的鐵路，挖空心思，千方百計，把大親俄派李鴻章籠絡到莫斯科，收買李鴻章的隨身官員，並用三百萬盧布賄賂李鴻章，簽訂了《中俄條約》（原名《中俄（6）敵互助援助條約》）。

這份條約簽訂於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這是一份充滿侵略性的不平等條約。等於俄國在中國佔據一條路殖民地。鐵路沿線土地、礦藏全爲俄國無償使用。等於把中國的土地變成了俄國的土地。同時還訂有許多非常苛刻的條件。更爲嚴重地是，把中國完全置於俄國保護國的殖民的地位。

在電視劇《走向共和》中，李鴻章自己發牢騷：“你這個賣國賊！你這個賣國賊！”其實賣國不賣國，從《中俄密約》這件事情看，李鴻章都是給中華民族造成巨大傷害和損失。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簽訂《中俄密約》卻是他自願的。

在俄國這種步步緊逼的侵略形勢下，到了1900年，八國聯軍時期，俄國這第二次侵華達到最高潮。

由於外國連續侵略中國，特別是俄國和日本侵略中國，給中華民族造成巨大損失和負擔，人們對洋人積蓄極大憤怒和仇恨，十九世紀末在一部分省市出現義和團運動。有的殺教士，燒教堂，甚至殺害外國使者。引起八個國家派軍隊來華保護使館。最後，攻打並佔領北京。慈禧太后帶著光緒皇帝，匆忙離開北京城，向山西、陝西逃去。這就是八國聯軍事件。在《走向共和》電視劇中都有演出。

慈禧太后這一生，有過兩次逃難。第一次是英、法聯軍時期，她逃到熱河避暑山莊去了。爲什麼？這個時候，俄國十七萬五千軍隊，已經佔領了東三省。她怎麼還敢向熱河逃跑呢！

《走向共和》演到八國聯軍，慈禧要大臣向她報告，各國來華軍隊數字時，卻把俄國來華多少軍隊給略去了。這可能不是導演的疏忽，而是中共有意抹煞俄國侵華的問題。

應該說明的是，八個國家，甚至達到十一個國家出面，看起來令人眼花繚亂，但最根本興風作浪、妄圖混水摸魚的就是俄國這一個國家。

俄國的國策是要吞併全中國，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俄國極力要中國衰弱，再衰弱。中國越衰弱，越便於它的侵略。

各國派兵來華數量不多，主要是來保護使館。而俄

國卻不同，從海上、陸地連續派遣大批軍隊來華。

1900年7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親自任總司令，動員十二個軍區，十七萬五千多人，動用四十多艘船隊，緊急運送軍隊到遠東。七月十四日，俄國軍隊侵進中國東北。

俄國阿莫爾軍區司令官公開叫囂：“不要貽誤時間，更不用談批准不批准的問題”，“堅決地、迅速在以哥薩克人的方式來解決”中國人。這裏所謂用“哥薩克人的方式”，就是最野蠻的大屠殺方式。俄國歷次侵華，都是用野蠻的哥薩克開路，這次也不例外。

7月16日，俄國開始海蘭泡大屠殺。

7月20日，俄國又進行江東六十四屯大屠殺。

接著，連續進行江北大屠殺、伊爾庫次克、尼布楚、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庫頁島，以及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東等地，所有的中國人一律被殺光。他們所謂用“哥薩克人的方式”，把中國人關在屋子裏燒死，推到江裏淹死。用刀砍，用刺刀挑，用槍殺等等罪惡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據一個俄國兵說，七月十八日的戰場上，有上千具滿（洲）人屍體。這些屍體顯然是被殺害的中國居民。俄國侵略兵把“未及過江者，不分男婦老幼，農夫工匠負販商賈及民間各行等業一同逼入江中，通過浮水得生還者不過六七十人，其餘均被逼溺死江中，浮屍蔽江者數日。”“浮屍蔽江而下，江水為之奇腥”。

“水面浮著一層油，江水都不能喝了”。

當時，俄國侵略者的江北大屠殺，引起國際輿論的譴責。

日本人石光真清指出：這是黑龍江有史以來“最大的屠殺，最大的悲劇，最大的罪惡！”

俄國人多伊奇則認為，“沙皇現在的這種慘無人道的做法，只有與中世紀審判異教徒的宗教法庭和西班牙對異教徒、猶太人和摩爾人的迫害才可以相比。”

俄國人就是用這種斬盡殺絕、滅絕人性的殘酷手段，強佔了按條約規定“永遠屬於中國”的領土江東六十四屯。

7月21日，俄國在璦琿城東二十八屯進行大屠殺。俄國兵把屯中居民，無論男女老幼，通通趕到一個大屋子裏，然後放火焚燒，所有的人活活被燒死。

7月25日，俄國兵在海拉爾，在琿春，在三姓，在哈爾濱，在牛莊。“俄逆所到村屯，悉行焚燒，不論男

女大小，盡行屠戮。遇害者不下數千村，被燒者不下萬戶。”接下來又在黑龍江、吉林、遼寧等地大屠殺。這一次俄國侵華的大屠殺，總共殺害中國同胞一百多萬。屍骨成山。血流成河。

俄國派這麼多軍隊來華，這樣瘋狂大屠殺。他們是來保護使館嗎？這不是侵略嗎？這是中俄“睦鄰友好”，“歷史傳統”（江澤民語）嗎？

8月15日，八國聯軍佔領北京。

《走向共和》電視劇特寫鏡頭，是英、美士兵如何搶劫故宮財寶，就是不寫俄國兵是怎樣搶劫的。其實俄國兵在故宮搶劫、搜刮最凶。他們把藏在掛匾後面的、李鴻章簽訂的《中俄密約》都給偷走了。

9月25日，聯軍統帥、德國瓦德西將軍抵華。瓦德西來華時，俄國尼古拉二世的皇子、上校，也隨瓦德西一起來華。在來華途中，這位俄國皇子對瓦德西說了一席話，最充分地暴露了俄國的侵華野心。

“這次開戰我們希望西伯利亞鐵路的修建不致受阻，在一二十年後，東三省將落入我們手中，所可慮者日本出兵二萬到南韓，為我們所不能忍受。……貴國皇帝當有佔據山東以致運河之意？”

“俄國方面甚願直隸一省能劃入俄國永久而獨有的勢力範圍。俄德之間對於當地之勢力範圍可以協商諒解，因為雙方曾結過以黃河為勢力範圍界限之條約。至於英國在直隸省開礦建路，發展貿易，俄國不能忍受。所以中國亂世開始，俄國便將山海關到北京鐵路取入手中，有了實物易於進行和談，俄國或可在和議時取得這條鐵路，不過現在英國於山海關、秦皇島駐兵過多，實為隱患。”

據瓦德西說：“該上校複用許多甜言蜜語，……其後更坦白直言，倘若德國對中國施以壓力，最好是派遣大批軍隊，直向長江流域而進，必能如願以償。”

從這裏可以看到，俄國老沙皇對他的皇子侵華，訓練得多麼深入細緻。俄國侵華都是一代一代相傳的。非常遺憾，在中國卻極少有人把反對俄國的侵略，一代一代的傳下去。相反的是，卻一代一代出現賣國賊。中國焉能不四分五裂？

1901年9月7日，在各國脅迫下，簽訂了《辛丑合約》，強迫中國對被害外國人賠禮道歉，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按年息四厘計，賠款總數為九萬萬八千二百二十三萬八千多兩。當時全國財政收入是一萬萬兩。全國

人民十年不吃不喝，才能付清這筆賠款。

俄國從這筆賠款中敲詐最多，達總賠款的三分之一。俄國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非常得意忘形地說：“這是歷史上少有的最夠本的戰爭”。

毛澤東把中國人民的貧窮落後的原因，歸罪於地主、資本家的剝削，對嗎？

中華民族貧困落後，根本不是地主、資本家造成的。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是一個極其富裕的民族。所以，她才創造了最豐富的文化，對人類作出了最優越、最寶貴的貢獻。在近世，中華民族貧困落後，主要就是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的，特別是俄國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的。

毛澤東投靠蘇俄，引進馬列主義邪教，硬把俄國侵華的罪惡移栽到中國地主、資本家身上。這不管他有意，還是無意，都是在幫助俄國人損害中國。

八國聯軍中的各國，在從中國敲詐一筆賠款之後，都陸續把軍隊撤走，唯獨俄國的侵華軍，一直賴在中國東北不撤。以致召來日本與俄國在中國的土地上大打惡仗。中國老百姓遭殃。

俄國在這次侵華高潮中，殺害中國居民一百多萬；強佔中國領土江東六十四屯，至今一百多年，尚沒有還給中國，敲詐三萬萬多兩賠款。這就是俄國第二次侵華高潮。

俄國這次侵華高潮，是由沙皇尼古拉二世親自指揮下進行的。尼古拉屠殺中國人民，強佔中國領土，敲詐巨額賠款，其罪惡遠比後來的日本侵華戰犯大得多。就是這樣一位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沙皇罪犯，在二十世紀，俄國的葉利欽卻給他補行葬禮，頂禮膜拜。葉利欽在繼承什麼？

中共投靠俄國的這幫小丑，抓住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大做文章，為什麼對俄國給侵華元兇尼古拉二世補行葬禮，不去抗議？不去說“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難道俄國這種侵華也是“睦鄰友好”，“歷史傳統”嗎？

江澤民明目張膽篡改歷史，欺騙人民，豈不太喪心病狂嗎？胡錦濤為何極力掩蓋、抹煞俄國侵華的罪惡，去和俄國侵華老兵共唱“喀秋莎”；而一味抓住日本人的所謂“歷史問題”大做文章。胡錦濤究竟是什麼人？還有一點中國人的味道嗎？

當年，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將軍對俄國侵華問題，有過極為深刻的論述。他說，“至於俄國之利益，在於

得一虛弱中國為鄰，此固系當然之事，不待智者而知；因此彼雖對華極講口頭親善（此種親善效果在實際上只使中國土地日減月損而已！）而其方針卻在努力保持中國虛弱現狀，或者更使此種虛弱程度愈為增加。”

瓦德西將軍講得很清楚，不用聰明的人都可知道，俄國的利益，是要保持一個虛弱的中國為鄰。俄國根本不希望中國強大起來。那麼，以毛澤東主首的共產黨人是知道，還是不知道這個問題呢？

瓦德西的話是在一百多年前講的，過去的一百年，證明瓦德西的論述非常準確，很值得中國人民深思。

### 俄國第三次侵華高潮

俄國第三次侵華高潮，是在二十世紀的前半世紀至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時期。

八國聯軍之後，西方各國侵華都已退潮。只剩下俄、日兩國繼續對華侵略。

由於俄國本來就是一支紙老虎。中國元朝時期，斯拉夫人不是被蒙族人打得一敗塗地！這次俄日戰爭也是被打得落荒而逃。二次大戰期間，蘇俄也是被希特勒打得慘敗。如果不是盟軍援助，在地球上早就沒有了“蘇聯”這個名字。大概只有中國的土八路，才最沒有出息，被蘇俄豢養，對蘇聯崇拜得五體投地，怕得要死，無限效忠。

俄日大戰之後，俄國與日本進行了妥協。雙方由對抗性的競爭，改為相互平行競爭。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各幹各的，互不干擾。

俄國及蘇聯侵略外蒙古，日本則侵略東三省。日本侵略中國最酣的時候，也正是蘇俄侵略外蒙古最激烈的時候。只是由於中共一方面拼命叫嚷“抗日”，另一方面卻千方百計掩蓋蘇俄侵華，以致造成中國人民只知道日本人侵華，卻完全不知道蘇俄在加緊侵華。其實，當時正是俄、日雙方相互承認對方的侵略。蘇聯用承認滿洲國，換取日本承認蒙古國。日本承認蘇聯侵佔西內蒙在鼓，換取蘇聯承認日本侵佔東內蒙古。蘇俄先在中國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日本跟著在東北成立“滿洲國”。兩廂就是沆瀣一氣，密切配合，共同侵華。

蘇、日這種共同侵華形勢，一直持續四十多年，到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侵華以失敗告終，而退出中國。蘇聯侵華卻以全勝達到高潮，形成蘇聯獨吞侵華的形勢。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國歷經八年艱苦抗戰，終於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然而，就在中國即將取得抗戰勝利前夜，蘇聯史達林逼著美國羅斯福總統及英國邱吉爾首相，簽訂雅爾達秘密協定，瓜分中國，用把中國的領土外蒙古“獨立”出去，作為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所謂外蒙古“獨立”，實際就是把外蒙古從中國分割出去，變成蘇聯的殖民地和附屬國。

當時的形勢是：中國一方面經過八年艱苦抗戰，從日本人手裏收回失地及甲午戰爭時期被日本人割占去的臺灣等地。另一方面卻被蘇聯割去外蒙古。臺灣島僅只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而外蒙古卻是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外蒙古比臺灣大四十五倍。也就是說，收回的是一點點，被俄國搶走的卻是一大塊。

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蘇聯一直與日本保持外交關係。蘇聯隨時掌握日本的動態。當蘇聯已經瞭解到日本即將投降時，當美國已經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時，搶在日本投降前夕，蘇聯突然宣佈對日開戰，立即派遣二十萬大軍，侵進中國東北，來“抗日”。蘇聯一槍沒放，卻成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者，中華民族的“解放者”。中華民族、中華民國歷經八年艱苦抗戰的巨大付出全部被掩蓋和抹煞。

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時，中華民國政府嚴正聲明：“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因日本之侵略，遭受重大之損失；為抵償此種損失之一部分起見，中國政府決定沒收日方在華之公私財產，以及日方在華之一切事業。”提請美國及蘇聯，對上述日方財產，幫助保護。

然而，毛澤東卻喪心病狂，大喊反對“摘桃派”，攻擊中國領導抗戰的政府是“摘桃派”，阻撓和破壞中國自己的政府接受敵佔區和接收敵偽財產。另一方面，卻放手任憑蘇聯軍隊在中國東北燒殺搶掠，大肆姦淫，禍害中國的良民婦女。

日本在東北曾投下一百多億美元的資金（戰前幣值），從事各種輕工業建設；已經形成一個完全軍事體系的工業系統。據統計：發電能力達到一百八十萬（八）（千瓦），年產鋼鐵二百萬噸，煤炭二千五百萬噸。其他如水泥、紡織、石油、車輛、飛機、坦克、軍火、化工等工業，都有最新設備，每年出品甚多。這些輕重工業體系和設備，及其生產，都是東北老百姓及淪陷區老百姓的一滴汗、一滴血積累起來的，中國自然應該接收。

二次大戰期間，中國東北沒有遭到破壞。戰爭結束時，日軍沒有抵抗和破壞。就是這樣一個強大的工業基地和設備，在蘇聯軍隊侵進東北後，蘇聯政府有組織、有計劃地拆卸、包裝、運走。幾乎把日本在東北經營十四年的全部工廠、機器、設備等等，全部一掃光，統統運回蘇聯。不能搬走的，則全部加以破壞和砸毀。一個具有現代化的、先進工業基地，就這樣被蘇聯人搞得滿目瘡痍。一片荒涼。淒淒慘慘。破爛不堪。

據《日本賠償調查團報告書》載：

“擁有東北工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南滿，實際上未經任何抵抗且無任何損失而為蘇聯所佔領。

“蘇俄人員于到達東北工業區時，即開始對糧食及其他儲備存品作有系統的掠奪，從九月開始對工業機械作選擇性的拆遷。

“他們集中力量掠取幾種物資、機器和設備，在掠取儲存品與某類全部工業設備之外，蘇俄人員還將大部份動力機器、發電與轉電的設備、電機、實驗廠、試驗室與醫院搬走，對於機械工具，他們只擇取最新式和最好的，而將舊式工具留下。

“東北工業系統之最大部分，于蘇軍佔領時期，遭受破壞，要旨由於蘇俄拆遷設備及不能維持秩序所致。”

據中國東北工業會及東北日僑聯絡處組織的二十一人調查團指出：

“自俄軍摧毀後之工廠殘跡觀之，不難證實彼等行為系出自預謀！彼取其所欲引為己用者，而毀其餘，以防為他人所用。拆遷工作均在蘇俄技術軍官監督之下，命令日本技師執行之。裝箱所需木材，均系就地徵用，拆去之物，分海、陸運往蘇俄，其經陸路運往者，統一集哈爾濱後北行，而大連及北韓之元山、清津、羅津等港，則為海運孔道。”

（以上資料引自吳相湘著：《俄帝侵略中國史》一書）

以上，就是被毛澤東稱為“偉大的友好盟邦”，要向其“一邊倒”下去的蘇聯所做的“友好”表現。

就是一個小學生也能懂得的道理：如果東北全部工礦機械設備，由中國國民政府接受，在毛澤東奪取政權後，也還可以從中國政府手裏得到東北這些全部工礦機械設備，也可為“新”中國建設強大基地。可是，這些工礦機械設備，被蘇俄搶走了，在中共取得政權後，蘇

俄連一個螺絲釘也沒給它。毛澤東的屁股坐到那裏去了？毛澤東的骨子裏是在爲誰服務？毛澤東的腦子裏有爲中國、爲人民著想的細胞嗎？

日本人在東北撤退時，按規定他們只能攜帶隨身衣物，根本沒有帶走任何工廠機械設備，也沒有破壞。在戰爭時期，日本兵表現很惡劣，但是，在天皇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日本兵還都是接受天皇的命令，守規矩的。

中國東北的被破壞，完全是蘇聯造成的。

此外，蘇聯還把東北公、私銀行存款、外幣、金銀首飾等搶劫一空。另還發行紙幣進行掠奪和剝削。

這次蘇聯在東北搶劫，總共達一百億美元以上。

史達林完全繼承老沙皇的依歸，就是不能要中國強大起來，而是要中國衰弱，再衰弱。因爲中國衰弱，俄國才好侵略，才好騎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任意敲詐和掠奪。

俄國這次侵華高潮，以一九五〇年初，毛澤東、周恩來在莫斯科簽訂一系列賣國條約，達到高潮。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底，隻身一人赴蘇訪問。他這次去蘇究竟是想幹什麼？很值得人們研究。按他自己說是：“想做點事情”，究竟是想做點什麼事情，他從來沒有交代過。後來，毛被史達林關了“禁閉”，開了“鬥爭會”，才匆匆忙忙把周恩來調到莫斯科。毛、周在二十幾天內的時間裏，卻簽訂數十份喪權辱國的條約，甚至是賣國條約。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他來蘇聯“想做點事情”，所要做的事情。

毛、周在莫斯科簽訂以下賣國條約：

1，《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份條約完全是李鴻章五十多年前簽訂的《中俄禦敵友好密約》的翻版，把中國置於蘇俄保護國的地位。

毛澤東訪蘇公報，公開宣佈出賣外蒙古。

2，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秘密〈補充協定〉。這份〈補充協定〉，出賣了中國新疆和東北爲蘇俄獨自所有的勢力範圍。

3，簽訂兩份《協定》及兩份協定的秘密《協定書》。它們是：《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及《議定書》；《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和《議定書》。這兩份《協定》及《議定書》純粹是喪權辱國，出賣中國主權和利益的。

如，關於長春鐵路的協定，允許蘇聯隨時可以使用

長春鐵路，共同使用旅順口海軍基地；而中國卻不能使用該鐵路運兵及軍需品前往新疆。蘇聯霸佔旅順港，要由中國支付“恢復和建設費用”。

又如，關於貸款協定的秘密《議定書》，規定中國要把戰略物資、稀有金屬鎢、銻、錫等約蘇俄，作爲償還貸款。實際上，蘇俄不是貸款，而是購買中國的戰略物資。可憐的丘八毛澤東、周恩來，在當時根本不知道這些是戰略物資，不知道它們有什麼用處，就隨便送給了蘇俄。

4，簽訂關於在中國創辦四個合營公司的協定。

這四個合營公司是：中蘇民用航空公司，有色金屬合營公司（在新疆），石油合營公司（在新疆），及大連造船廠合營公司。

這些合營公司都是不平等的，也就是都是出賣中國主權和利益的。它們都是由中國出資源、礦山、土地，而資本卻按各占 50%計算。實際蘇方出的資本只達 20%---30%。可是利潤卻要給它 50%。看起來只有小學算數水平的毛澤東，確實是趕不上熟讀《政治經濟學》的史達林。小朋友真要學好數學啊！數學水平低，也可能會賣國。

5，簽訂 50 份“經濟合作”專案。這 50 份“經濟合作”專案，是史達林與中華民國政府談判時就提出的 154 項經濟合作專案中的 50 項。當時，因爲蘇聯提出的這些“經濟合作”項目極不平等，中華民國政府拒絕了史達林的要求。現在，毛澤東、周恩來把中華民國政府拒絕了的“合作”專案，全部讓給了蘇聯。

上述一系列協定、條約、議定書，其中以出賣中國東北和新疆的領土和主權最爲嚴重。據說，當史達林提出這個問題時，毛澤東也曾“猶豫”一下，可能是感到這個賣國問題實在太嚴重。但是，在史達林的逼迫下，毛澤東還是同意了。由毛澤東首肯，由周恩來執筆簽字。白紙黑字的賣國文書，就這樣遞交給蘇俄。

後來，爲了實現出賣新疆和東北的《補充協定》，赫魯雪夫提出，要把被蘇俄佔領的濱海省建設成爲工業區，把中國的東北變成農業區，徹底把中國東北變成蘇俄的附屬地。

江澤民在大陸主政時期，藉口工業調整，全面收縮東北的資金，造成東北的重工業全面萎縮。大慶、鞍山、瀋陽等地重工業都在收縮。這是不是按赫魯雪夫要求，要把東北變成農業區，中華民族的子孫去觀察和研究

吧！

以上，總共 60 個檔，是在僅只二十幾天的時間裏敲定。人們可以想像，按平均每天簽訂三個檔，對這三個檔，僅只起草、閱讀、通過，時間都不夠用；更不要說是討論了。可以說，這些條約、協定、議定書，等等，都是史達林一方早已準備好了的，毛澤東、周恩來只不過是“遵命”簽字罷了。

人們還可以想像到，在當時，無論是毛澤東，也無論是周恩來，這兩位都是傾注全力在“打內仗”，對中國的經濟狀況，國家的礦山、資源都一無所知，對今後如何建國也毫無想法。加之又是對蘇俄有所求，乞求蘇俄幫助他們。在這種情況下，與蘇聯簽訂所謂的“經濟合作”專案，除了被蘇俄“拿大頭”，對中國絕對沒有好處。

人們不要忘記，蘇俄是一個絕對唯利是圖，貪婪無度的一個國家。史達林是個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者。他是每時每刻都在想著如何侵略中國。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簽訂條約、協定，就是要從這兩個人的手裏掠奪更多的利益。人們對周恩來有很多評價。其實，他用自己的手，寫下這份賣國契約，就可以確定他無法擺脫的賣國身份。

按中共的規定：中共黨員被俘，寫了“自首書”，被敵方放了出來，就定為“叛徒”。那麼，毛澤東、周恩來在敵人的首都，簽訂出賣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密約，這還不該定為賣國賊嗎？

無論毛澤東，也無論周恩來，不論他們的“革命”是為什麼，但是，竟然簽下這種出賣中國領土和主權的賣國契約，給中華民族造成數不清的損失，給子孫後代留下無窮的後患。他們的罪惡也就罪不容誅。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毛澤東在史達林的手上，就像小把戲一樣。史達林耍弄毛澤東，就像玩耍小把戲一樣。蘇聯這第三次侵華是以史達林教唆毛澤東去“抗美援朝”，達到最高潮。一個飽經八年抗戰的損耗，又經歷三年內戰之苦的民族，早已疲憊不堪，身心衰竭。任何一個能夠體恤國家苦難和人民疾苦的人，都不會再去打仗。然而，毛澤東根本不顧這些，竟然受史達林指使，去“抗美援朝”，使中華民族再一次遭受極大損失和災難。成百萬的青壯

年，葬身朝鮮。戰後不幾年就鬧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

毛澤東後來也承認，抗美援朝是對蘇俄的最大援助。事先，蘇俄極力鼓動毛澤東去朝鮮打美國。戰爭真正打起來後，蘇俄卻後退得遠遠的，只叫毛澤東去“抗美援朝”，蘇俄不參戰。蘇俄既不參戰，它就不出戰費。中共仗一打起來，就去向蘇俄購買軍火，蘇俄借此大發戰爭財。中共不僅消耗戰費，而且把一百多萬青壯年送到朝鮮喪命。這就是毛澤東的“抗美援朝”。

史達林根本是個帝國主義者，他是繼續奉行沙皇依鉢，要使中國衰弱，再衰弱，以便他再侵略。這次“抗美援朝”之戰，就是史達林要中國衰弱，再衰弱的實際操作。這是史達林搞的一次軍火生意。由史達林借錢給毛澤東，叫毛澤東去打仗。戰爭中，中國大陸損兵折將。毛澤東把自己的兒子都搭進去了。中國大陸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戰後，中共欠下蘇聯二十多億美元的債務。蘇俄卻增加二十億美元的收入。蘇俄一增，中共一減，雙方國力就相差四十個億。不知土八路懂不懂這道算術題？中共爲了還債，就加緊對國內人民的壓榨，把大量物資拿去還債，弄得國內老百姓無衣無穿無吃，以致餓死人。所謂“困難時期”，就是被蘇俄逼債時期。此外，那有什麼天災？

毛澤東就是拿中國人民身家性命作資本去投靠蘇俄，被史達林所玩弄。

蘇俄這第三次侵華高潮，是最大最大豐收的一個高潮，其豐收的侵略果實有：

侵佔中國領土外蒙古，計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

強行霸佔唐努烏梁海，計十七萬平方公里土地。分裂了中華民族，把一個完整的中國大卸八塊，弄得四分五裂，已經沒有完形。

毀壞了中國的山莊田園。

搶劫中國財富一百多億美元。

獲取中國大陸“抗美援朝”戰費二十億美元。

蘇俄第三次侵華之所以能獲得這樣巨大的成果，主要是由於中國內部出了一個毛澤東。這個毛澤東叛國投敵，認敵爲友，從中國內部幫助蘇俄侵華，甚至主動送貨上門，敞開大門，大拍賣，任憑蘇俄侵略。如果沒有毛澤東叛國投敵，甘心賣國，蘇俄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如此重大成果。

無論毛澤東，也無論周恩來，他們罵別人賣國，脫口而出，特別麻利。因此，他們不會不知道什麼是賣國。

他們也不會不知道他們自己所做的正是在賣國。人們有理由相信，他們的賣國是自覺的，自願的。他們用自己的手，給自己寫下了“民族敗類，千古罪人”的歷史。

### 蘇俄的第四次侵華高潮

蘇俄的第四次侵華高潮，是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也就是江澤民篡奪中國大陸黨政軍領導權時期。

俄國這個國家的貪婪是沒有止境的，其侵華野心也是無邊無沿的。其第三次侵華高潮，雖然取得極大豐收，但是仍然沒有滿足它的貪婪欲望，也沒有阻止住它無止境的侵華野心。反而使它認為中共是它的“同志加兄弟”，能夠給它侵華更多的方便。因此，在中共統治大陸時期，蘇俄對中國的侵略不是減少了，也不是放鬆了，而是更加緊了。它們認為中共統治大陸時期，是它們侵華的最佳時機。所以，在中共統治大陸時期，它們一天也沒有放鬆侵華的腳步。

它們蠶食中國領土。據中共透露出來的，在中共統治大陸時期，蘇俄又新佔領中國土地達三萬五千多平方公里，幾乎等於又侵佔了一個臺灣。

蘇俄逼毛澤東的屁股後面要債，要毛澤東還“抗美援朝”欠它的債。鬧得毛澤東加緊對大陸人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以致餓死幾千萬人。

更有甚者，蘇聯把大批導彈佈滿中俄邊界，揚言要用導彈攻擊大陸。蘇聯雖然沒發射導彈，卻打了珍寶島一仗。

蘇俄逼毛澤東，要毛簽訂中俄邊境條約，要毛澤東承認俄國過去侵佔的中國數百萬平方公里土地為蘇俄所有。也就是要毛賣國。

在蘇聯這種咄咄逼人的侵略形勢下，毛澤東開始有了一點覺悟。毛澤東搞了一場“批判蘇修”運動，連續發表九篇批判蘇修的文章，即中共的所謂“九評”。借著批判“蘇修”，毛拉出蘇聯是個“帝國主義”國家，也就是明確蘇聯是個對外侵略的國家。這當然也包括蘇聯對華侵略。

應該承認，毛澤東從一頭栽在“一邊倒”的泥坑裏，到承認蘇聯是個“帝國主義”國家，想從這個泥坑裏爬出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變化，也是一個轉捩點。在此之前，他是“一邊倒”親蘇的。這個時間很長，從他參加革命，一直到他批蘇修之前。

從他批判蘇修是個“帝國主義”國家，他是反蘇

的。從“一邊倒”到批“蘇修”是個帝國主義國家，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極大轉變。他的這個轉變，一方面可能是由於蘇俄的咄咄逼人，教育了他。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它不敢再賣國了。在毛澤東有周恩來在世時期，一直沒有同意按蘇俄意圖劃分中俄邊界。他們這個堅持是對的。

在“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允許紅衛兵去蘇聯大使館貼大字報，“砸爛蘇修狗頭”。這也是毛澤東要出一點氣。

後來，林彪外逃，是逃向蘇聯，這可是對毛澤東反蘇的一個極大打擊。以致使毛澤東的精神很快垮了下來。

自中共批判“蘇修”和打了珍寶島一仗之後，以及毛澤東在世時，中共與蘇聯一直是處在僵持、對立狀態。到鄧小平掌握大陸政權，及江澤民上臺後，蘇聯看到侵華大好機會來了。這時，蘇俄就趁機加大了侵華的步伐。

按媒體揭露，江澤民在俄國期間曾參加蘇聯最兇狠的克格勃特務組織，為克格勃份子，替蘇聯監視中國留蘇學生，並給蘇聯遞送情報。江澤民的親生父親是個不小的漢奸，替日本進行反華宣傳，毒害和麻痹中國人民，為日本侵華的幫兇。江澤民自小就由這個漢奸家庭撫育長大。接著又在漢奸汪精衛成立的偽中央大學念書。在他成長的過程中，接受的就是鮮廉寡恥，嫉恨中華民族，嫉恨中國人民的漢奸教育。日本投降後，斷絕了他仰仗日本人升官發財的路，他又隱瞞漢奸家庭出身，偽造學歷，欺騙共產黨，混入共產黨內，至今連入黨時間都交代不清。就是這樣一個江澤民，靠著欺騙、偽裝的本領，爬上中共黨政軍的最高寶座。

江澤民純屬小人得志。小人得志便猖狂。江澤民在任內幹了很多壞事，犯下很多罪行。屠殺和平居民，對法輪功施行極度酷刑，進行群體滅絕；以“江家幫”、“上海幫”為首帶頭貪污盜竊，使中共黨自上而下成為名符其實的貪污盜竊集團；尤有甚者是江澤民背著全大陸人民偷偷賣國。俄國侵佔中國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經江澤民之手一股腦賣給了俄國。給中華民族造成無法估計的損失。

由於江澤民有俄國克格勃的特殊身份，俄國人自然要利用他這個身份，要他向俄國賣國。也由於江澤民有漢奸的家庭背景，出自他個人內心，他也願意賣國。同

爲賣國，可以給他個人帶來無窮的好處。在這種內、外因素的結合下，使得俄國的侵略在江澤民執政時期，獲得非常大的豐收。而江澤民的賣國，也創造了空前的紀錄。

在毛澤東時代，蘇俄的侵略目標，就是要把俄國過去侵略的中國領土合法化。蘇俄這個侵略目標，在毛澤東時期沒有達到。現在，就要從江澤民統治的手裏達到。江澤民的統治，是俄國實現這一侵略目標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

自 1991 年至 2002 年，在這十幾年間裏，江澤民與俄國葉利欽、普京相互勾結，穿梭來往達十幾次。幾乎每年，不是江澤民去莫斯科，就是葉利欽來北京。

江澤民第一次去莫斯科，當時，他還只是總書記，沒有國家領導職務。他就要錢其琛與蘇俄簽訂“中蘇國界東段協定”。這個“協定”本身就是一份背叛毛澤東時期與蘇俄談判邊境問題的原則，背叛中共曾經向全國宣佈的原則。如，蘇俄必須承認過去逼迫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爲不平等條約；又如，過去歷屆政府不承認蘇俄佔領的中國領土，中共也不承認。江澤民就是這樣，通過所謂劃界的方式，把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劃給了俄國。他就是用這種方式賣國。

以後，又連續簽訂《中俄國界西段協定》；

《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敘述議定書》；

《關於中俄國界西段的敘述議定書》；

《關於中俄邊界問題的聯合聲明》；

《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另外，相互來往勾結，連續發表《聯合公報》九份。

上述一系列“協定”、“議定書”、“聲明”、“聯合公報”、“條約”等文書，貫穿一個問題，就是江澤民大賣國，而且賣的極爲徹底。

過去，中共堅持要蘇俄承認的九項不平等條約，被江澤民抹煞了，不要蘇俄承認了。這就是，俄國過去的侵略，都不算是侵略。江澤民把過去的侵略國，變成沒有侵略過中國的國家。所以，在江澤民與俄國簽訂的檔裏，公然篡改歷史，歌頌俄國侵華是“友好睦鄰，歷史傳統”。這不僅是抹煞過去歷史賬，而且是鼓勵俄國今後繼續侵華。在俄國人看來，反正侵華也不要緊。以後中國還會出現像江澤民這類人，再把俄國的侵略給抹煞掉。這樣，俄國今後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侵華。

由於九項不平等條約不算了，就使俄國過去侵佔的

中國領土，沒有了法律憑據；而是把中國的領土變成俄國的土地。今後，中國收復失地都變得困難。中國去收復失地，俄國就會說，那是他們的土地，會把中國收復失地，說成是侵犯他們的領土。所以，江澤民出賣這九項不平等條約，實際上是斷絕了今後子孫收復失地的路。

中共很喜歡抓住日本人一點問題，如所謂篡改日本侵華歷史，如所謂南京大屠殺的人數等等，向日本人提出“抗議”。可是，中共卻拼命替俄國篡改和抹煞侵略中國的歷史，把一個長期、一貫侵華的兇惡的帝國主義國家，打扮成“睦鄰友好，歷史傳統”。這不是誠心欺騙中國人民嗎？這不是給中國人民留下無窮的後患嗎？

俄國這個第四次侵華高潮，是以前三次侵華高潮的總結和概括；是以前三次侵華高潮的鞏固和擴大；是前三次侵華高潮的總豐收。

難怪俄國總統葉利欽，在第四次侵華高潮完成時，特別高興，得意忘形地說：江澤民幫助俄國解決了“過去幾十年沒有解決的問題”。俄國過去幾十年苦心孤詣，夢寐以求，所要達到的侵華目的都沒有實現，如今竟然通過江澤民之手達到了。俄國人怎麼能不歡欣鼓舞，得意忘形呢！

俄國的這個第四次侵華，不僅鞏固了過去侵華成果，而且還爲未來防犯中國人民討還土地，作了安排。他們與江澤民還用“條約”規定：不許中國人民有討還土地的組織和活動。如果中國人民要求俄國歸還土地，中共政權就要鎮壓。由此可見，江澤民的賣國多麼徹底。

俄國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侵華高潮都是由於得到親俄派的幫助才得以實現。俄國這兩次侵華高潮是用放長線釣大魚取得的。在二十世紀初期，列寧搞了一次十月革命，放言要在全世界搞共產主義，要消滅不平等。用“共產主義”的旗幟，迷惑一些國家的人群，從而擴充自己的帝國主義勢力。蘇俄派人到中國來收買少數民族敗類、野心家、陰謀家，出錢成立中國共產黨。這個中國共產黨從組織上、思想上、政治上，完全聽命于蘇共的指揮和調遣；爲蘇俄侵華賣命。蘇俄要他們幹什麼，他們就幹什麼。蘇俄要他們打“內仗”，他們就不顧一切，拼老命打“內仗”。蘇俄叫他們去“反日”，他們就乖乖地去“反日”。總之，中共對蘇俄是絕對服從命令，聽指揮。蘇俄正是在這樣的中國共產黨的死心踏地



幫助下，實現它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侵華高潮。

特別是俄國第四次侵華高潮，不僅是得到親俄派的幫助，而且由於俄國收買和豢養特務，打入中國大陸黨、政、軍最高層，使得俄國的對華侵略更加得心應手。江澤民完全是站在俄國一方，盡全力幫助俄國侵華。俄國要什麼，江澤民就給什麼。非常慷慨大方。因此，俄國掠奪最多，中華民族損失最大。

親俄派在極力幫助俄國侵華的同時，就對中國人民千方百計隱瞞和掩蓋俄國侵華的罪行。因此，長期以來，中國人民對俄國侵華不知不覺。就是有人知道俄國侵華問題，也不敢提出這個問題。一旦有人提出俄國侵華問題，中共就瘋狂進行鎮壓和屠殺。中共對俄國人絕對忠誠，對中國人民絕對冷酷無情。這就是二十世紀，發生在中華大地的怪現象。

過去八九十年的歷史事實，最充分的說明：蘇俄搞的“共產主義”其實質就是帝國主義，就是對外擴張主義。中共搞的“共產主義”其實質就是投降主義，賣國主義。

中共的賣國主義、投降主義遠比汪精衛、溥儀的罪過大無數倍。溥儀、汪精衛只是做了漢奸和傀儡，但是他們沒有出賣中國領土。中共的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以致當今的胡錦濤，卻出賣了中華民族三百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啊！

### 俄國會不會有第五次侵華高潮？

肯定地說，俄國會有第五次侵華高潮。不僅會有，而且俄國已經提出第五次侵華的目標和戰略部署，以及在輿論和實際行動中進行操作。

俄國國家戰略參謀部軍事大學杜金教授把俄國下一步的侵華目標和戰略部署講得清清楚楚。杜金教授在他的《基本地緣政治》一書中，寫得非常明白。他說：“中國大陸永遠是俄羅斯的最大威脅和潛在敵人。”俄國根本沒有把中國看成是朋友；而“永遠”是敵人。面對中國這個“敵人”，俄國怎麼辦？按杜金說：“最根本的解決辦法就是使中共的滿洲、內蒙、寧夏、新疆、西藏完全獨立，以與俄羅斯建立一個緩衝地帶。”杜金教授在這裏把俄國的下一步侵略目標講得多麼明確！

滿洲、內蒙、寧夏、新疆、西藏，這些地區土地加起來，共五百多萬平方公里。中國人都可以查查地圖，

看看當中華大地這些土地都“獨立”出去以後，中國的地盤還剩多少？屆時的中國還有多大？難道中華民族還不會亡嗎？

中共大小官員撕破嗓門，天天叫嚷“反對臺灣獨立”，可是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反對俄國要把上述地區獨立的說。臺灣土地僅只是三萬多平方公里，而俄國將在第五次侵華高潮中，卻是要把中國領土五百多萬平方公里獨立出去啊！

俄國人不僅提出下一步的侵華目標，而且提出明確的戰略部署。他們指出：“中共在收回香港之後，無疑需要一段時間來消化，然後是澳門和臺灣，此外還有南中國海。俄羅斯的上策在於應引導中共向南部擴張，以使其喪失對北部和西部的注意力。”把中共的注意力都引導向南方，不要去注意北方和西方，這樣俄國就可以更好的下手去搞“獨立”了。

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政權，對俄國的戰略部署心領神會，多年來就是按照俄國的這個戰略部署在跳動。如拼命熱炒武力犯台，時不時攻擊日本，千方百計掩蓋俄國侵華問題等。

最近，胡錦濤又放出解放軍少將朱成虎大炒核大戰的謬論，都是受俄國指使，替掩蓋俄國侵華服務的。中共的這個解放軍也是受俄國指使的，為俄國侵華賣命的。過去打“內戰”是替蘇俄人打；抗美援朝是替蘇俄人打；下一次打核戰爭，也是替俄國人打。

這都說明，俄國不僅會有第五次侵華高潮，而且，已經為第五次侵華高潮的到來在行動，在積極準備。

俄國第五次侵華高潮什麼時間會到來？

按照過去俄國侵華的規律，大約五十年為一個週期，即五十年一個高潮。這樣算來，俄國的第五次侵華高潮將會在二〇五〇年實現。

俄國第五次侵華高潮會不會成功？

可以說，會成功，也不會成功。

首先說，俄國第五次侵華高潮會成功。在以下四個條件下，俄國第五次侵華高潮會取得成功。這四個條件是：第一，由江澤民扶植的親俄派上海幫，繼續掌握大陸中共政權；不去與俄國劃清界限。第二，不肅清馬列主義精神鴉片在中華大地的流毒；第三，中國人民繼續昏昏沉沉，死不覺醒，不去提高民族覺悟，不知去與俄國進行鬥爭，不去為民族解放而奮鬥。第四，不去收回被俄國佔領的領土。在這樣四個條件下，俄國第五次侵

華高潮一定會取得勝利。

按照過去兩百多年俄國侵華的經歷，每五十年一輪回，一個高潮。俄國第五次侵華高潮將在二〇五〇年後實現。亦就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五十年代達到高潮。現在二、三十歲以下的人，屆時都會遭受亡國的劫難。

其次，再說說，俄國第五次侵華高潮不會取得成功。

俄國第五次侵華高潮不會取得成功，這也有幾個條件。

第一、中國人民必須提高民族覺悟。過去八十多年，在中共的毒害下，中華民族完全喪失了民族覺悟。敵友顛倒，把朋友當成敵人，把敵人當成朋友。是非不分，好壞不分。整個民族麻木沉睡。爲了扼制俄國第五次侵華高潮的到來，中國人民必須迅速提高民族覺悟，深刻認識俄國是中華民族的世敵，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敵人。

第二、必須打倒中共賣國政黨。中共這個黨比蘇俄黨更反動。它比蘇俄黨多一條罪狀，就是它賣國。中共這個黨不僅害國害民，而且喪心病狂，大量賣國。中共政權，就是一個賣國政權，就是靠向蘇俄賣國來維持政權。不打倒中共政權，就不可與俄國劃清界限。

第三、今後大陸政權及大陸掌權者，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即能夠與俄國劃清界限。不能與俄國勾勾搭搭，更不能像江澤民那樣去與俄國人熱烈擁抱。接受江澤民賣國投敵，賣國求榮的教訓。凡是不能與俄國劃清界限的人，不能擔任中國大陸黨政軍的最高領導人。留俄人員不能擔任中國大陸的最高領導人。

第四、必須收回被俄國侵佔去的失地。這個收復失地，維護中華民族的領土和主權的完整，是比任何問題都重要的問題。中共提出不惜一切代價要攻打臺灣是錯誤的，反動的。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收復被俄國侵佔的土地。寧失千軍萬馬，絕不讓俄國侵佔一寸土地。

只要中華民族能夠做到以上四點，就可制止俄國第五次侵華高潮的實現。中華民族就真正屹立於世界的東方，成爲真正強大的、獨立的國家。

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中華民族絕對不會侵略任何國家。但是，中華民族也絕對不是好欺侮的。任何人膽敢再欺侮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絕對不會輕饒。

民族解放的擔子是偉大的。但是，也是沉重的。任重而道遠。所有炎黃子孫共同爲中華民族的復興，堅強奮鬥吧！勝利永遠是中國人民的！

## 關於中共賣國的

# 幾點思考

彭小明

### 一、中日對北方領土的不同態度

1999年，江澤民爲首的中國黨政領導集團在中俄兩國邊界談判中簽字，永久承認歷史上沙俄對我國的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領土主權。此後陸續簽字，到胡錦濤上任以後，由胡錦濤簽字最後完成了對俄國歷史上強佔我國領土的國際法認可。中國歷屆政府，無論國民黨時代，還是毛澤東時代都拒絕承認的不平等條約造成的邊界未定狀態，已經被官方劃定了。中國失去了北方大約140個台灣那麼大的領土，失去了圖門江的出海口。江澤民和胡錦濤是當今中國最大的賣國賊。爲什麼這樣說？我們對比日本北方四島的問題，就一目了然。

日本北方的色丹、齒舞、國後、擇捉四島，原來也是因爲沙俄時代在戰爭和不平等條約的情況下被俄方佔領的。1855年曾經回歸日本。二次大戰後期，美英希望蘇聯出兵打擊日本，在雅爾達條約中同意將千島群島給予蘇聯，於是北方四島重新被蘇聯佔領。而北方四島是否屬於千島群島，雙方存有爭議，歸還北方四島的問題，至今沒有解決。但是日本歷屆政府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從來沒有退縮和讓步。

反觀我國的北方領土，從清帝國、到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和毛澤東、周恩來政府，都沒有承認俄國的不平等條約，而俄方的列寧執政當局還曾經明確承認這是不平等條約，願意全部歸還所有佔領的土地，情況要比其他國家有利得多（編者按：前蘇俄曾於上個世紀初宣佈廢除沙俄時代曾強迫中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非但從不兌現，而且，1929年當中華民國東北行政當局要收回中東鐵路的主權時，斯大林甚至悍然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史稱“中東路戰爭”；並同時命令中共武裝起

來保衛蘇聯，以與之里應外合。中共為接受斯大林的命令，曾發佈數十份通告號召武裝保衛蘇聯，並立即受俄命在全國範圍內發動武裝暴動、工人罷工和學生的反政府游行，最後招致中華民國收回中東路主權的失敗。參見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選集》第十卷和《誰是新中國》一書的相關內容）。可是中國共產黨現任領導卻拱手出賣了這些領土。有人說，他們為了換取俄國的石油，所以做出讓步。簡直豈有此理！哪有當家的人為了一時的柴薪炭火，竟將自家的院落邊門永久地拱手讓人？有人說，這些土地長期被俄國佔領，當地人民生息繁衍百年以上，已經無法收回。此話太無是非！**歷史遺案的解決當然不能罔顧現實，但是更不能罔顧是非。**中國人民要求俄方承認那是不平等條約，俄國應該承認。中華民族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另外，中國並不求歸還全部被佔領的領土，而是應該要求重新勘定邊界，甚至大部分被占領土都不再歸還，但是一部分對於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歷史上又是明顯故意阻礙中國發展、故意不讓中國瀕臨日本海的領土割讓，必須通過談判，合理回歸。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圖門江出海口。俄國硬將吉林琿春這個緊靠日本海的江海出口徹底封死，距離海岸僅十五公里，聽得見海風呼嘯，卻望不見海水浪花。中國應該堅持談判要求取得這個出海口的出海權（到1938年為止，中國船隻仍可直接沿圖門江駛入日本海）和建港權。退一萬步說，即使不能完全主權返還，至少也要取得共同開發的雙方主權共管。可是江澤民和胡錦濤根本沒有做這樣的努力。

## 二、國力強盛時期的喪權辱國

歷史上滿清政府割地賠款，南京條約、馬關條約、北京條約、璦琿條約，除了中法戰爭以外，都是抵抗失敗，不得已而簽訂的城下之盟。中國國貧民弱，無力再戰，只好接受屈辱條件。可是在今天，國際上主權不容侵犯已經得到全面的確認，尤其是俄國這個世界上擴張最厲害的國家已經徹底暴露了它的霸權本質，而且由於蘇聯共產黨長期專政而一朝崩潰，國力式微，已經失去超級大國的國際地位，在國際組織中更失去了衛星國囁嚅一呼百應的簇擁，國內的核武裝打擊力量也因加盟國脫盟獨立而分散和削弱，常規軍力連對付一個車臣地區的叛亂也束手無策，筋疲力盡。反觀我們中國，經過文

革浩劫，終於改革開放，國內的經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綜合國力有了相當的提高，國防開支不斷增長，黨政宣傳甚至自詡為“盛世”，誇耀生活水平和人權狀況達到了最好時期。**恰恰就是在這樣的雙方國情之下，江澤民、胡錦濤簽訂了賣國的中俄邊界新約！我們不需要乘人之危，我們也沒有超強的地位，我們只需要雙方都以平等的，而不是以一個強權對一個弱鄰的態度來談判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和平地解決其中不平等和明顯屈辱的部分，例如圖門江出海口的部分。但是恰恰相反，除了黑瞎子島的一小部分之外，江澤民和胡錦濤幾乎把不平等條約的內容照單全收地接受了下來。我們一定要把中共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 三、愛國和捍衛國家主權必須要有民主權利

江澤民、胡錦濤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沒有經過全國人大的討論，沒有在國家的媒體、廣播電視和報刊上全面具體地公開，據說僅僅在人大的網路上披露而已。這樣的決策是未經人民知情和准允的非民主決策。人民幾乎完全蒙在鼓裏。江澤民、胡錦濤何嘗不知簽下界約，必招罵名，所以鬼鬼祟祟，不事張揚。回想五四運動時期，北洋政府的外交官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人也不事張揚，結果留法的中國學生得知了日方“二十一條”的內容，先電告留美的同學，然後通知國內新聞媒體，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突然爆發，成為歷史的里程碑。五四的歷史告訴我們，愛國和捍衛國家主權也要有民主，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否則愛國也是盲目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被賣國賊出賣了，人民還不知道，或者知道時已經來不及反抗。人民哪里有權賣國？只有當權的領導才有可能賣國。他們為了收受賄賂，為了維護統治的特權，不惜出賣主權，割讓領土。人民要捍衛主權，保衛領土，首先要知情，然後要表達，或問責，或抗議，或通電，或遊行，或靜坐，才能迫令外交代表拒絕簽字，否決辱國條款。知情、問責、表達、抗議、示威，歸結成一句話，就是民主權利。所以，要愛國，首先就是要民主，人民有了基本的權利，才能說到做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能自由地選舉政府，有效地監督政府，堅決地捍衛國家的主權、保衛領土的完整。所以我們說，專制導致喪權辱國，民主保障捍衛國家主權。

陳映真

## 應以文学为自由呼喚！

李勇

我在香港從事新聞工作的時候認識余光中，我可以確定他是一個立場堅定的反共知識分子，而當年那批高叫「鄉土文學」與「工農兵文學」的人，決大多數是台灣的左傾份子（也就是親中共人士），他們之中有陳映真。這些人痛恨國民黨統治台灣的獨裁作風，不滿國民黨的仇共反共立場，並認為台灣的文學被國民黨約束控制，阻隔了他們與「父親之國」（指中國大陸）的交流，也切斷了他們對祖國文化的傳承，而以余光中為代表的文學，忽視底層民眾需求，因此，他們懷念三十年代左翼文人，推崇中共提倡的「工農兵文學」，並認為那就是「鄉土文學」。

尤其是陳映真，此人崇共愛毛若狂，響應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對中共在反右、文革中摧殘中國文化、迫害知識份子視若無睹，對中共禍國殃民無動於衷。相反，他邀集一批左傾份子，研讀「毛語錄」及「毛選」，把一個變態、顛狂、殘忍、惡毒的盜匪當作偉人吹捧，他既痛恨國民黨，也不認同中華民國，甚至希望中共解放台灣，因此，他被台灣聯合報記者楊蔚檢舉，遭到警備總部逮捕，判了七年徒刑。

在中共處心積慮要血洗、解放台灣的戰爭狀態中，國民黨的防共政策也許過於嚴苛，但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陳映真明知故犯可以說求仁得仁，怨不得人！

陳映真犯的錯誤有兩個。第一，他認為每個人都應尊重他的政治理念，何況他為了這個理念遭到國民黨囚禁，是一種了不起的犧牲，別人不應該對他堅持的理念菲薄。第二，他把所有反共的人說成是國民黨人，否則也是被國民黨收買利用的人，好像反共是國民黨的專利，被國民黨包辦。

陳映真有沒有想過，當飽受共產迫害而家破人亡的人到了海外，看到陳映真如此推崇加害於他們的政權，他們的心里有什麼感想？當在海外從事新聞採訪工作，知道中共政權在大陸殺害近億中國人、餓死四

千五百萬中國人時，看到陳映真對那個屠夫凶手唱讚歌會有什麼反映？

陳映真生活在資訊流通迅速的台灣，並有機會經常出國，豈有不知道共產黨的殘虐，為什麼他還有這樣離奇的認知。到二十一世紀，他目睹共產黨在俄羅斯、東歐瓦解，即使堅持只有「共產黨可以救中國」的中共政權，也舍棄共產教條，全面走資，這才使十三億中國人擺脫一窮二白，略得溫飽。事實證明，共產主義、馬列教條有如「薩斯」「禽流」，所到之處一片死亡蕭條。

蘇聯的列寧、斯大林殺戮異己，屠宰同胞，數達千萬。中共的毛劉周鄧緊隨其後，更是青出於藍，其它共產小國如高棉、越南也不遜色，除了大屠殺，就是迫使人民大逃亡，數百萬人逃奔怒海，逾半葬身魚腹，其慘烈曠古未見。這些政權及其政治手段，居然是陳映真向往的政治理念，今人百思不解。

且不說平民百姓，就以陳映真的同行文人來說，他們在大陸的遭遇，就足以叫陳映真同情。除應為他們仗義執言，這些文人從三十年代起，就像五零到九零年代在台灣的陳映真一樣，是一群為共產黨奪權鳴鑼開道的左傾份子，但看到中共君臨中國大地，他們應該可以分享解放果實，結果，他們不是家破人亡，就是妻離子散，僅一個反右及文革，被整死的文人就不止百萬，陳映真難道全然無知？這種政權難道就是陳映真所認同的？

陳映真親共，而且誤把中共當作中國來熱愛擁戴，為了親共，他遭到國民黨人迫害，因此，他認為所有反共的人如非國民黨，就是被國民黨收買利用，他不相信大陸淪共後中國人所受的苦難，也不相信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中國人會挺身出來反對中共的禍國殃民，他把一切反共的行動歸入國共鬥爭的範圍，這不但是偏見，而且是犯罪念頭！

海外華人看得很清楚，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只有奪權之恨，並無毀家之痛，而大多數中國人與中共不但有國怨，也有家仇，為了逃避他的統治，中國人千方百計離鄉背井，求庇異國，到處流浪，他們不怕死，就怕被驅逐出境送回母國，這種心情比猶太人、吉普賽人更傷痛。最好的證明是：在台灣的國民黨此刻已不反共，而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對中共也不再有敵我意識，香港暢銷的幾本反共政論雜誌在台灣沒有銷

路，但在香港、大陸則是人人都看，陳映真如何看待這種現象，難道還認為這又是國共鬥爭在海外的延續？

今天在海外堅持反共立場的華人決大多數來自香港或中國大陸，而在中共控制下的香港人是中國人中最有勇氣、最有風骨者。他們關心在大陸的骨肉同胞，過去五十年來寄錢寄糧接濟親友。當中共八九年六四屠城後，逾百萬人走上街頭示威抗議。香港被中共接受後，他們不斷向中共的倒行逆施抗議。他們要求中共還政於民，停止殘民擾民，此次都有五十萬人走上街頭，他們要求撤換無能親共特首董建華，連元旦也有十萬人聚集情願，如此種種，均可見香港人比台灣人更有道德勇氣，陳映真是不是以為香港人被國民黨收買了？

今日在台灣的國民黨人，因反對台獨及民進黨，早已把中共視為製止台獨的希望所在，千方百計討好巴結中共，希望得到善意回應，若干國民黨人如馮滬祥之流，從「驅逐馬列，復興中華」轉變到認同「一國兩制」與不要民主的「和平統一」。

經過文革被否定，大審四人幫，毛夫人江青入獄之後，海外有一批曾經左傾入迷的作家覺醒，開始撰文暗貶中共（不敢明批）。到了八九年六四北京屠城，不但有作家倒戈，也有一批共干棄暗投明，變成海外批共反共的文化鬥士，只有陳映真不為所動，仍然對無產階級專政充滿幻想，不但不敢為過去冤死的文人學者申冤，甚至不敢對毛共有任何一點非議。

二〇〇一年底，陳映真以台灣代表身份去大陸參加「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這個被共產黨掌控的會議，出席者必須與馬列徒眾有相同的理念，在那種眾左雲集的會議中，陳映真自然變成局外人，大陸女作家王安憶事後回憶，不知就理的形容陳映中「在熙攘的人叢里他卻顯得寂寞」，他當然寂寞，在「馬列大家庭」中，他的“斯人獨憔悴”乃是必然之事。甚至在台灣左傾狂潮泛濫中，他也佔不到一個位置，因為後來居上的聰明人太多了，多到他目迷五色，心志茫然，處境之可憐可以想象。

過去陳映真除了熱愛「父親之國」，還把國民黨視為大逆不道的死敵，他大概不知道，今日中共為了打擊頭號大敵——台獨的民進黨，把過去國民黨的「忠貞之士」與「反共大將」拉去變成他們在台灣的

代言人，這些人去大陸開會，不但領導接見，並在紅地毯的貴賓席上與他們杯酒言歡。當此之時，一貫反國民黨的陳映真在中共新貴眼中已成了過時過氣的攔腳石，誰也不會再把他當作人物接待，當然也不會為他鋪上紅地毯，更不會為他高舉「國產」名酒「茅台」互助大家走資發財，他的寂寞可以想見。

大陸美女作家王安憶對陳映真的斯人獨憔悴有這樣一段話來形容：「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為落伍者。」一點也不錯，在中共全面走資，拉攏「美帝」的政策下，一向反對萬惡資本主義、墮落資產階級的陳映真，當然是落伍者。過去國民黨走資討好美帝，他口誅筆伐，並寫了很多小說形容台灣資產階級的沒落、美帝「殖民台灣」的可恥。但對共產黨他不敢也不願撻伐，因為中共除了是他「父親之國」外，他更知道共產黨不是國民黨，你反對他你就是敵人，一旦定為敵人就得按毛賊的「敵我矛盾」理論來處理。清算鬥爭後再加以鎮壓，豈容你信口雌黃、以文犯案。

一個人堅持自己的理想信念，擇善固執當然了不起，但如果堅持的是一個比盜匪更邪惡的流氓政權，那就叫擇惡固執，不值得炫耀吹噓。別人如對他批評，他應該接受，豈可隨便為別人栽植戴帽？

就我在海外生活多年，睹盡華人在政治認知上的左右飄蕩之後，曾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左傾親共的人有兩種：一種是被共產黨人的宣傳所騙，一種是蓄意欺騙共產黨。這兩種人都不是什麼愛國者，前者是愚蠢，後者是狡詐。

從陳映真在文壇上得到評價看，他決非什麼愚蠢的人，因為愚蠢的人寫不出這樣好的文章，也沒有資格被稱為「大文豪」，那麼陳映真的左傾親共是什麼原因，誰都可一目了然，假如他不是落伍，假如共產黨堅持教條，不全面走資，陳映真當然不會寂寞，更不會憔悴，北京的中共頭目自會以紅地毯接待他、以茅台酒敬他，尤其當他以台灣代表身份出席「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黨和人民」將會眾星拱月般的包圍他，推崇他，不致讓他在熙攘的入叢中孤坐一隅，沉默寡言了。

陳映真在演講中提到他的摯友尉天聰，並感謝尉對他的培養。這句話，勾起我與尉一段交往的回憶。尉是台灣研究三民主義專家任卓宣先生的夫人尉素秋



的姪子。一九五四年我結束香港難民生活到台灣求庇並升學，曾經奉父命去拜訪任先生，蒙任夫人視為子姪給予勉助，並在任府見到當時仍在高中求學的尉天聰，彼此雖無太多來往，但卻很羨慕尉天聰在姑父母家有家庭的溫暖，也知道任夫人自己掏腰包為尉天聰出版「筆匯」雜誌，那時候我過的是流亡學生生活，溫飽不足，前途渺茫，根本說不上對文學有什麼興趣，只知道自已自一九四九年之後到處逃共禍到香港再逃到台灣，目的是避開中共清算鬥爭與血腥鎮壓。我擁護中華民國，認同三民主義，相信國民黨必會反共復國讓我們重返故里，因此對「筆匯」為何培養出陳映真這樣的「大文豪」全然無知。日後，由於我在香港「星島日報」撰文批評陳映真投共左傾，尉天聰從此把我視為仇寇，某次我從美國打長途電話去台灣，告知他共同的朋友去世，他居然沉默以對，拒絕與我傾談。

尉天聰的表現，使我很難忘懷，而且十分氣憤。當台灣文學界在為鄉土文學爭論時，正值中國大陸文革期間，我記得尉天聰在聯合報副刊上發表一篇論文學的文章，文內一再強調「工農兵文學」的重要與「資產階級文學」之可恥，同時並讚揚中國大陸文革中所出現的「新生事物」，假如這篇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必讓人以為是出於江青主導的寫作班子「梁效」之手。

在文革初起的年月，從台灣到海外，有一批自以為有理想的知識份子對文革發生充滿了好奇與幻想，文革語言瑯瑯上口，由於不敢對蔣及國民黨過於明目張膽地反對，於是在文字與言談中對中共頗多暗喻讚揚，尉天聰也許不像陳映真那樣親共左傾，但他的“無產階級想法”在他文字中卻非常明確的表達出來。

八十年代，我在香港星島日報的金山客語專欄上批評陳映真親共言行，陳映真在接受香港「百姓雜誌」記者訪問時，硬說這是國民黨派人在海外打擊他。其實我既非國民黨人，也與國民黨人沒有來往。但他卻毫無理由的替我戴上藍帽，這與此刻紐約的親共份子把所有反共人士形容為台獨份子一樣無聊。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日，陳映真從台灣去吉隆坡接受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所頒的第七屆「花維」文學獎，並發表「文學是對自由的呼喚」的演講。一

個認同共產黨的人，居然如此向往自由，令人驚訝不已，難道他完全不知道從史大林到毛澤東這些大狂魔對言論自由鉗制之嚴苛，難道不知道數以千萬計的文人在史毛統治下被封口殺頭。既然向往自由卻把最自由的美國視為仇寇，把此刻開放自由的台灣視為分裂國土的一個省。

陳映真這類在自由世界享受資產階級生活、卻擁護共產制度的人，自以為是有理想有抱負的愛國者，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表現才是真正叛國賣國，因為一個愛國的人，豈可贊成自己的國土被一群認洋人馬列為祖宗的人糟蹋破壞，豈可忍受自由的骨肉同胞被那批馬列徒眾摧殘殺害。

但是，陳映真就是熱愛那批馬列洋奴。多年前，他去「父親之國」旅行，接受當年紅衛兵頭頭譚立夫招待，詳談甚歡，他難道不知道，譚立夫在文革開始之際鬥死數不清的「反動學術權威」，兩手粘滿了善良中國人民的鮮血，對中共政權而言，他是造反英雄，所以文革浩劫結束，他依然安坐良位，擔任北京歷史博物館副館長，陳映真持什麼心態才去把譚立夫此人當作「骨肉同胞」來親近？

陳映真得「花維」文學獎的作品是他在「聯合文學」上發表的一篇中篇小說「忠孝公園」。那是一篇諷刺有皇民的台灣人與曾經作做過國民黨特務的大陸人的對話及他們悲慘下場的文章，前有暗喻李登輝，後有暗喻當年拘捕迫害他的「國特」。我怎麼看也看不出它的文學價值，但生活在自由世界而對共產制度擴張戒懼的人，卻把它視為瑰寶，台北「聯合文學」大篇刊登，馬來「星洲日報」則隆重頒獎。假如亞洲真如陳映真所願全面解放赤化，看還有沒有人欣賞他的文學思想與擁共立場，說不定老舍的下場就是他最佳寫照！

此刻中共為了改變毛時代一窮二白、恐怖落後面貌，被迫開放，大陸人在開放空隙中冒險披露了部分文革中受辱傷亡的史料，一向熱愛文學、關心同胞的陳映真應該看到文人學者在大陸挨整的慘狀，比起他與李敖、柏楊等人在台灣的遭遇，大陸文人的悲慘何止百倍、千倍。

就以陳映真崇拜的三十年代左翼文人巴金來說，他在文革中被鬥被批，精神和肉體受到嚴重摧殘，他的妻子蕭珊更被活活整死，劫後餘生，他也只敢以溫

和模糊的文句寫了几本「真話集」，並「鬥膽」建議中共成立「文革浩劫博物館」，在中共與陳映真鑒識標準中，巴金如此「反動」，是不是國民黨留在中國大陸與共產黨作對的文化特務？

陳映真在講演中說：「二十歲前後，我偶然在一條舊書店街，闖進了被戒嚴體制嚴禁的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的禁區，我讀了魯迅、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說，在我心中點燃了向往人的自由與解放的火炬，一九六八年入獄，魯迅、茅盾、高爾基……等作品的情節、人物和語言的記憶，在囚禁的歲月中給了我力量和心靈的自由，至今難忘。我於是體會到文學是對自由的呼喚，而文學本身也是自由的本身。」

看了陳映真這段話，使我啞然失笑。這些三十年代為中共奪權制造輿論的人，只要不死都嚐到大陸淪共後中共剝奪人民自由的種種殘毒手段，更體會到中共高叫的「解放」卻是一場古今中外罕見的浩劫。陳映真繫獄可以看書，可以寫作，大陸人民即使在獄外也只能背毛語錄、看毛選，所有著作一律禁絕，而那些「解放」前後對共產黨謳歌吹捧不絕的文人學者，也不准自由閱讀寫作，甚至還得被囚被辱被勞改，為什麼那時候陳映真不體會到文學對自由的呼喚。

「星洲日報」頒獎給陳映真，是欣賞陳映真的文學造詣還是欣賞他的左傾親共立場？這是我對陳得獎最大的疑問。我之所以有此想法，因為「星洲日報」的老板張曉卿，是一個親中共的馬來亞華裔，木材商人，與中共的政商關係密切。當他斥資逾億買下與他商務毫無關係的香港「明報」及「星洲日報」時，還有人猜測他的動機，香港新聞界一度盛傳真正拿錢出來投資並非張曉卿，而是某個重視宣傳的政治集團。說白了，就是中共政權在背後操縱。

「明報」打著中立的招牌，卻肯定中共就是中國，張曉卿雖是馬來華人，卻與陳映真一樣熱愛「父親之國」，他們不必受中共過去五十三年加諸中國人身上的苦難，卻享受到他們的榮冠與照顧，由於彼此「愛國」立場一致，由「星洲日報」頒獎給陳映真乃是理所當然的事。何況陳映真既痛恨國民黨統治台灣，也反對民進黨的台獨傾向，他的政治理想應該是台灣讓中共解放，使台灣二千三百萬人享受「社會主義幸福」。並使中國在台灣富、大陸強之下統一，這是盼望「中國」富強的陳映真最大願望，這樣一個

「愛國人士」，「星洲日報」豈有不頒獎給他的道理？

陳映真說：「文學為的是使喪志的人重新點燃希望的火花，使仆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到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請問：過去五十多年來，因為中共高壓而喪志、喪命甚至禍延三代五族的人何時才可重燃希望的火花？被中共打殺仆倒的人有幾個又站起來了？被中共凌辱的文人學者如何找回尊嚴？事實證明，中國大陸因六四屠城而喪子的人得不到安慰，因反右、文革而沮喪消沉的人至今還沒有恢復勇氣！直到今天，大陸的文學還被共產黨的條條框框所約束，作家不能暢所欲言，只不過在網絡上發表几篇與當中央不一致的文稿，便立即被拘捕入獄，就連一個北京師大剛畢業的二十二歲女學生劉荻，只不過寫了幾篇暗諷中共政權的文章，就被當局如臨大敵到她家中抄查、帶走電腦、光碟，然後把她關在看守所，不准家人探望，一年之後才在國際輿論壓力與「美帝」過問下放人。

面對如此倒行逆施的中共政權，陳映真在得獎演講中一句也不提，只知高叫自由，並說文學是對自由呼喚，請問陳映真，你什麼時候以文學為大陸上渴求自由的文人作家仗義執言過？

零四年二月中旬，香港基督教會辦的浸會大學聘請陳映真做他們學校的「住校作家」，為期兩個月，在此期間，他為學生講述「我的寫作與台灣社會嬗變」的課程，他到校首日，發表「我的文學制作與思想」的公開演講，敘述他被國民黨政權迫害的經過，一點也不為他當年瘋狂研究毛選、熱愛魯迅批判國民黨的言行有一點悔意。

他在演講中說：「沒有任何一門學科能像文學那樣讓人們認識自己的民族、文化，文學是一切關於人與生活知識的開端。」

希望陳映真在停留香港期間，聽聽香港人講述他們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目睹中共殘害中華民族、摧毀中華文化、禁絕中國文學的種種惡行，有了這樣的「認識」，他應該為他過去的種種言行作補償式的修正。

因余光中遭遇批判，使我想起以左傾馳名海內外的陳映真種種往事。我希望，自稱有原則的陳映真，不要再擇惡固執，應該實踐他以「文學呼喚自由」的真正理念。

# 中共黨軍高級將領 對中共本質逐步認識的 藝術寫照

推薦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新書《亮劍》

辛明（加拿大）

一、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6 年 3 月出版的新書《亮劍》值得一讀。從 1940 年抗日戰爭相持階段起，至 1967 年文化大革命武鬥最瘋狂的時候止，全書的時間跨度為四分之一世紀。作者在介紹相關歷史背景的基礎上，精心而大膽地進行藝術創造，刻劃了一批性格各異的中共黨軍高級將領（1955 年授銜時都是少將）的成長過程。在進行如此刻劃的過程中，不管作者的主觀願望如何，在客觀上他向讀者展示了中共黨軍高級將領對中共邪惡本質的逐步認識過程。

思想最深刻、因而也覺醒最早的是丁偉少將。他“可不是個粗人。他在參加紅軍之前就念完了初中，在當時的紅軍隊伍裏算得上是個大知識份子了”、“打錦州時就當上縱隊司令了”。中共建政初期是蘇聯關係的蜜月期，中共公開提出“一邊倒”地學習蘇聯。丁偉少將在高級指揮系的畢業論文卻“語驚四座，在軍事學院引起一場八級地震。”他談的是“我國領土的防禦重點問題”。在詳細研究分析之後，他指出東、南、西部都無大礙，因而得出結論，“我國領土的防禦重點應該放在西北部、北部和東北部”。這種直接把蘇聯“老大哥”當作最大假想敵的言論，使南京軍事學院高級指揮系的師生（都是中共黨軍高級將領）感到無法接受。要不是劉伯承院長出面保護，他不但不能畢業，反而可能在 1955 年剛戴上少將肩章就被投入監獄。

劉伯承能一時保住思想深刻的“學生”丁偉少將，卻無法保住勇敢倔強的大軍區參謀長丁偉少將。在 1959 年“廬山會議”後大軍區的反右傾大會上，丁

偉少將挺身而出，當眾為彭德懷辯護，並聲稱絕不改變自己的觀點。他“立即被扯掉軍銜宣佈逮捕”，帶著手銬。其時，他還“對著會場上的幾百名高級軍官喊道：‘同志們，我們的黨和軍隊有危險，這種空氣太不正常了，連個戰功赫赫的元帥按組織程式提點兒意見尚且被定為反黨分子，照此下去，將來黨內人人都難以自保，好人會越來越少，小人會越來越多，這個黨還有什麼希望？’”

如果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先知先覺者丁偉少將的認識過於深刻，過於超前，在很大程度上有人為拔高和過度虛構之嫌，那麼第二個覺醒者中共黨軍總參謀部的趙剛少將就顯得真實得多。趙剛少將是燕京大學的學生，一·二九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是八路軍中貨真價實的大知識份子。他有知識份子的思想深度，又象許多知識份子諳熟自我保護之道。在 1957 年反右浪潮洶湧而至的前夕，從來沒有使用過每年療養假的他，第一次主動提出要休療養假，並且強制要求在北師大工作的妻子馮楠和他一起去度假，於是雙雙躲過了這一劫。

但是，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1965 年底，總參謀長羅瑞卿被撤職逮捕後，趙剛便被算做羅瑞卿黑線上的人，也被停職做檢查。”在批判會上，趙剛少將的良知不容許他揭發批判羅瑞卿。他“站了起來，默默地解開軍裝上衣的鈕扣脫下軍裝，然後摘下軍帽連同軍裝一起扔在桌上，只是淡淡地說了句：‘既然這個黨這個軍隊如此忠奸不分，這黨籍和職務不要也罷了。’接著，他又“凜然說道：‘同志們，近來我常常失眠，夜深人靜時經常捫心自問，趙剛啊，你參加革命時的那個黨，那支軍隊現在到哪兒去了？我想起戰爭時期我們這支軍隊中戰友之間的關係，同志們，咱們都是過來人，想想吧，好不容易弄到一口吃的，戰友們你推我讓，誰也不肯多吃一點。打仗時，你根本不用擔心負傷，因為戰友們絕不會扔下你。我趙剛能活到今天，是因為曾經不止一個戰友為我擋過子彈，他們犧牲了，我卻活下來。同志們，這就是我們這支軍隊，這就是戰爭年代戰友之間的生死情誼。可是這種傳統現在哪兒去了呢？我們的黨和軍隊到底是怎麼了？打擊陷害，落井下石，這太危險了，這會毀了我們的黨和軍隊。同志們，大家都拍拍自己的良心想想吧，難道你們真的認為羅總長是反黨

分子？難道認為只有落井下石才能保住自己？你們錯了，如果對這種邪惡的風氣不加以制止的話，那麼將來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成為受害者。我們正在走蘇聯的彎路……”

趙剛少將“輕蔑地環視著會場，目光中飽含著一種憤怒和憐憫……轉身頭也不回地走了。”他回到家裏，懷著滿腔的悲憤和絕望自殺了。他在反右鬥爭中保護過的妻子馮楠，就象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陪同十二月黨人去西伯利亞流放一樣，和他一起踏上了黃泉之路。在夫妻雙雙自盡之前，他們還以陳毅元帥在戰爭年代被圍時所寫的絕命詩“我欲泉台集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來自勉。

最後的覺醒者，也是認識水平最低的人，是全書的男主人公李雲龍少將。他原是一個苦大仇深、苗正根紅的要飯孩子，徹頭徹尾的大老粗。1927年他就參加了黃麻起義，長征時期就是團長。他對黨、對革命無比忠誠，毛澤東就是他心目中的神。他的好友丁偉少將、趙剛少將等人一個接一個被逮捕、被打倒、甚至死於非命，他覺得很不對頭，但是仍然沒有懷疑過黨的偉大、光榮、正確，更沒有懷疑過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他義不容辭地領養了與他合作多年的老政委趙剛少將的四個兒女，卻從來沒有想到過要為老戰友申冤或者報仇。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武鬥卻終於使他覺醒。作為福建海防前線的野戰軍軍長，他不能容忍造反派佔領泰山師師部，搶走該師的槍支、彈藥、火炮、坦克、車輛、文件。他清楚地知道，瘋狂的造反派使用這些現代化武器“對打”，就意味著整個城市的毀滅，就意味著海防前線的崩潰。他率領警衛營去收回泰山師師部。造反派的密集射擊把三十多個戰士撿倒在師部大樓前。一怒之下，他下令開火，打死打傷一百五十多個造反派，闖下了彌天大禍。中央文革小組派來專人對他逮捕法辦。

他親手建立的特種部隊士兵把他從囚車中劫出。但是，他不願意逃亡。他回到自己家裏，穿上將軍服，掏出了珍藏的勃朗寧手槍，主動打電話叫負責他專案的政委馬天生到他家來。政委勸他不要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抗。他的回答是，“我找你來不是為了和你爭論這些理論，因為我這輩子就沒鬧明白過，你比我也強不到哪兒去，儘管你比我有文化。我只想告訴你，我李雲龍這條命，不喜歡聽別人擺佈，誰都不

行，日本鬼子和國民黨不行，現在的中央文革也不行，我這條命得由我自己擺佈，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死法。我李雲龍這條命雖說不值錢，可也不能被別人輕輕鬆鬆就拿走，這活兒得由我自己幹，你知道一個軍人最體面的死法嗎？上吊？服毒？都不行。那是老百姓的死法。告訴你，軍人的死法應該用子彈。你看，我把槍口對準太陽穴，當我扣動板機時，子彈會從我另一側太陽穴穿出，隨著子彈噴出的是我的血和腦漿，那時你會看到，我李雲龍的血是熱的，滾燙滾燙的，冒著熱氣，我的腦漿是白的，象沒點好鹵的豆腐，糊裏糊塗的，這是因為我這輩子沒鬧明白的事太多……”

李雲龍就這樣開槍自殺了。在臨終前，他對黨的邪惡有了一定的認識。他起碼認識到了這個黨並不完全代表人民和國家的利益，如果聽任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搶掠野戰軍、搞“文攻武衛”，城市就會毀滅、海防前線就會崩潰。但是，由於他僅僅對中央文革有所認識，所以他“這輩子沒鬧明白的事太多”。事實上，如果你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邪惡本質缺乏深刻的認識，你“這輩子沒鬧明白的事”必然很多很多。

## 二、

作者都梁是一位企業家，“終日在商場拼殺”、“從來沒有寫過小說”。此書以其廣闊的場面、細膩的描寫、豐富的史料、深刻的思想內容獲得了讀書界的好評，並榮獲第四屆中國人民解放軍圖書獎。其部分內容已拍成同名大型電視連續劇。

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嚴酷政治環境裏，本書不能不帶有嚴重的思想局限性。首先，全書的主調充滿了對党的光榮傳統的頌揚，把抗日戰爭的功勞加在並沒有抗戰的中國共產黨身上。對毛澤東消滅異己的“延安整風”亦持肯定態度。第二，對共產黨的揭示批判僅限於共產黨已經承認的錯誤，例如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殺等可以引起解放軍官兵高度覺醒的事件本來值得大書特書，作者卻沒有提及。（作者在後記中寫道李雲龍和趙剛的兒子在二十年後都成了中共黨軍高級軍官，衣錦還鄉、重返故居。但是對六四屠殺卻隻字未提。）第三，思想挖掘的深度仍嫌不夠。中國共產黨罪大惡極的基本原因

是由其反動的封建邪教組織的本性決定的，而不是由於其個別領導人（例如毛澤東）或者少數奸臣（例如中央文革）所決定。作者對此深層原因揭示不夠。

在藝術上本書也有值得改進之處。次要人物太多，有的人物用過就丟，缺乏應有的交代。有的關鍵人物又出現得太突然，缺乏必要的鋪墊。作為小說（而不是話劇），對話太多，某些情節缺乏正面的細緻描寫，卻以對話或電話匆忙地告訴讀者。某些對話、獨白、講話過長，不符合其時其地的氛圍。句子太長、逗號使用過多，許多逗號似乎應該改為句號。錯別字也比較多。

在排版印刷方面本書也可以更上一層樓。書中有較多排版錯誤。有的段落的首行有領行空白，有的段落的首行又沒有領行空白。在情景和人物轉換、展開對另一事件的敘述之際，沒有開闢空白行與前文隔開，缺乏直觀手段告訴讀者新的事件已經開始。讀者要讀過若干句子、甚至若干段落以後，才能自己領悟到。

但是，這些小毛病絲毫不影響此書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筆者對都梁先生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敢於寫出具有如此思想高度的藝術作品表示由衷的敬意。對於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為此書所做的工作表示誠摯的感謝。筆者希望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繼續努力，多出好書，為把中國人民解放軍變成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多多貢獻力量。

---

[注] 本文的全部引文皆引自長篇小說《亮劍》（都梁著，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6 年 3 月出版）



---

# 中華自由論壇

---

本欄文章不代表本刊立場

---

## 以黨治黨有黨享 殘害中國大陸華人

---

短評中共“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的欺世謊言

比利時 子口

中共的理論家們已黔驢技窮，謊言制造者們已枯腸才盡。“四個堅持”、“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連過去的“最高指示”也不如，大陸華人在無數次受騙後，除了清楚騙子是真的，一切中共口號全是一派胡言。對中共“聽其言、觀其行”，說來說去，就是中共一黨是上帝，大陸華人祇有“敬奉”，不可他想。中共幾十年來依靠“口號、文件、運動”治國，一切“法律、制度、規範”不如黨官一個便條，十足一個黑幫竊國。中共的目的非常明確——“紅色江山萬年牢”：凡我中國大陸境內，祇有我中共一黨天下，莫過“黨治、黨有、黨享”而已。這就是今天中共國之國情。中共改革開放，對東、西方先進均無動於衷，尤不感自慚形穢，害民上癮，卻厚顏無恥之極，居然說：“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共”。中共何曾給過人民那選擇權呢？毛賊《新民主主義論》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政治謊言，騙倒當時多少熱血青年！毛賊睡入水晶棺，乃我民族之奇恥大辱。中國人不信“上帝”信“活佛”，這正是可持續發展的“仁制”難建，也是中共可以繼續行騙的根本原因所在。

甚麼是“科學發展觀”？在中國大陸有制度配套嗎？中共自身的發展有一點科學嗎？中共壓根從未“自主創新”過，還配談“科學發展觀”嗎？中共有的就是憲政亂倫，謀獨竊國，然後就是化私有、公有為“黨有”。



甚麼是“和諧社會”？沒有民治、民有、民享，社會低層一無所有，社會能“和諧”嗎？中共黨內，迫害公行、腐敗公行，黨內有“和諧”嗎？

“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是文明政治制度的產物，決不是一句口號、一個紅頭文件可以解決的。中共在中華大陸已為千夫所指，至今連其“黨內改制”都舉步維艱，何談如此“高調”？政治為“核心”服務，經濟為“腐敗”服務，文化為“全黨”服務，社會為“中共國”宣傳服務，誰在“為人民服務”？這就是今日中國之寫照。

中國歷史五千年，尚憶孔子之“仁政”，孫文之“仁制”，端視“中共之恥”有多久？全球華人醒醒吧，人的尊嚴需要文明的政治制度來保障。

二〇〇六年二月六日

## 請不要再讓中山先生流淚

致馬英九主席的公開信

陳榮利

**編者按：**這是給本刊的投稿，雖然已經發表在網站，但因其頗有些真知灼見，故本刊仍然予以發表。

“近來時常夢到中山先生流淚”——所以馬英九主席每次進中央黨部時必要在中山先生銅像前鞠躬致敬，以示尊崇。那麼，中山先生為什麼會流淚呢？是悲哀於中共實行專制冥頑不化嗎？是哀歎於民進黨圖謀台獨漸行漸遠嗎？——還是失望於國民黨偏安台島不思進取呢？

依我對中山先生的研究，中山先生一生歷經艱難、愈挫愈勇，面對專制與台獨只會奮鬥奮鬥再奮鬥，斷無流淚之理！故中山先生之流淚一定是失望於國民黨——他親手締造的革命政黨，失望於中國國民黨曾經勿忘在莒、枕戈待旦，如今卻錯把台北當南京；失望於中國國民黨曾經清醒地認識到“偏安不能

自保、分裂必然滅亡”，如今卻糊塗地拋出了“台獨選項”！

“聞道中原遺老，時時南望，不見王師久！”在中山先生銅像前行禮如儀的同時，我們也欣慰地注意到馬主席近期亦多有振作之宣示，如提出了“支持大陸民主、維權”說，提出了“兩岸終極統一”論，又提出了“不排斥大陸民眾加入國民黨”之說，尤其是後者，令我耳目一新，重新燃起了對國民黨的熱望！我——陳榮利，中學時代就成為中山先生的信徒，1995年因在南京參與組建“以三民主義為指導，旨在推翻中共專制統治”的中國民主黨被中共判刑8年。但吾志所向、一往無前！出獄後旋即孤身冒險赴台，力圖重啓三民主義偉業——無論身在大陸還是在今日台灣，本人“捍衛中華民國、結束中共專制”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在馬英九主席的感召下，我於2006年2月20日毫不猶疑地正式向中國國民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然而，得到的初步答復竟然是：因我沒有中華民國國籍，礙於人民團體法，我還不能加入中國國民黨！

所以，廣東省的孫中山先生如果和我一樣前來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他親手創建的一個曾經建立了中華民國的革命政黨，中國國民黨的官員也會以同樣的口吻對國父說：“尊敬的孫中山先生，因為你還不是中華民國國民，礙於人民團體法，你無法加入我們中國國民黨！”

面對這樣的國民黨，你叫中山先生怎麼能不流淚？！

我不知道究竟什麼原因使國民黨從原先的立場忽然大幅後退，做出如此令人心情沉重的初步反應？

難道僅僅是懼于副總統呂秀蓮女士的質問——“如果馬英九主席不排斥大陸民眾加入國民黨，那麼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加入台灣的政黨（國民黨）呢？”，一個真正的三民主義政黨對於這樣的問題給出的答案會很簡單：當然可以！只要共產黨員棄惡從善，認同三民主義，願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均富、統一”大業打拼，中國國民黨為什麼不歡迎這樣的人加入？但面對呂秀蓮女士的責問，國民黨卻低下了高貴的頭顱，選擇了沈默……

難道僅僅是屈於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先生的責難——“如果馬英九主席不排斥大陸人民加入國民黨，國

民黨是不是準備在南京、上海設立黨部？”一個真正的三民主義政黨給出的答案也會同樣簡單：完全必要！只要大陸一天不實現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的奮鬥就一天不會停止！但面對游錫堃先生的責難，國民黨同樣低下了高貴的頭顱，選擇了沈默……

面對這樣的國民黨，你叫中山先生怎麼能不流淚？！

在此，我不想責備中國國民黨：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台灣與大陸同樣都是中華民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陸人民同樣也是中華民國國民，中華民國的大陸國民申請加入中國而不僅僅是台灣地區的一個政黨有何不可？

在此，我也不想責備中國國民黨：如果你自己連中華民國憲法都不遵守，你還有什麼理由振振有詞地要求民進黨政府堅持“憲法一中”？你還有什麼理由氣勢洶洶地反對民進黨政府“廢統”、“制憲”、“正名”？

我只想心平氣和地與國民黨簡單討論一下三民主義。三民主義被國民黨束之高閣並行之有年矣，尤其是民族主義，國民黨在台灣視之為洪水猛獸、票房毒藥，避之猶恐不及，豈會觸碰並宣揚之？然而，就我在台灣的兩年經驗來看，台灣人民（包含被稱為獨派的民眾）卻莫不對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敬重有加。那麼，我們的民族主義究竟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民族大同主義！民族主義在完成“排滿”、“反帝”兩大使命後，現已進入第三階段即“大同”階段，中華民族世界最大，未來幾年世界最強，最大、最強的中華民族對世界的責任是什麼？就是實現“全球一國、世界大同”！我們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家園，為什麼要彼此怒目相向？我們要實行全球一國，建立一個共同的地球政府，共同協調全球資源，共同保護我們的生態環境，把原先的軍費開支用於非洲兄弟身上……逐步實現人類的大同夢想！我們也知道，大陸“憤青”有一小股民族沙文主義情緒；我們當然也知道，在藏、台、疆另有一小股民族分離主義傾向；但這些狹隘與偏激的民族情緒，怎能跟恢宏與寬容的大同主義相碰撞？所以我在台灣從不諱言我是一個民族大同主義者！

近年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不敢講民族主義，到大陸又不敢言民權主義，藏頭露尾、窘態百出。我們

其實未嘗不理解國民黨的偏安心態——不要節外生枝，一切等熬過 2008 掌握政權再說，但問題是 2008 年前國民黨真的能夠回避得了大陸的民權問題嗎？且不說民進黨絕不會將政權輕易拱手相讓，台灣隨時可能被引爆，就大陸的形勢發展來看其實更不容國民黨樂觀。中國大陸近年來迅速崛起，但財富分配不均、社會矛盾激化，故在崛起的同時中國大陸實際上已瀕臨崩潰的邊緣，若要繼續維持政權，08 年前中共對外發動戰爭、轉嫁危機是不二選擇——台灣是中共“出口”危機唯一、也是最好的場所！到時候國民黨連作階下囚的資格都沒有，還妄談什麼 2008？那麼，台灣與大陸的命運就沒有辦法改變了嗎？答案是只要國民黨重鑄黨魂、重振三民主義信心，一切均可迎刃而解！大陸目前的社會危機，其唯一的化解之道就是和平民主轉型，而這個任務只有三民主義力量才能完成。中共與國際社會均不得不承認三民主義力量在中國歷史上代表的就是穩健、寬容、理性！只要三民主義力量推動中國民主化，中國只會變得更加繁榮富強，而決不會出現大家擔心的暴民政治！所以，只要我們三民主義力量在“四大民權”、“五權憲法”的民權主義基礎上堅持“穩定兩黨制”，只要我們牢記中山先生“知難行易”的教誨輕輕敲擊民主中國的大門——門就會開！兩年內，中國大陸一定會實現和平民主轉型！大陸民主轉型了，台灣的一切問題也將消弭在無形之中！2008 自然就是囊中之物！

所以，要讓中山先生不再流淚，僅僅由馬英九主席在國父銅像前鞠躬致敬是遠遠不夠的，僅僅由馬英九主席作一些沒有實際行動的政策宣示也是不夠的，而是要整個國民黨臥薪嚐膽，不獨在台灣做民族大同主義的棟樑，更要在大陸做民權主義的幹城！而如此做的第一小步就是讓我——陳榮利，一個至死不渝的三民主義者、進而千千萬萬個真正的三民主義者能夠加入到中國國民黨中來，為台灣的和平繁榮、為大陸的民主轉型、再創中華民族新的輝煌篇章！

陳榮利 2006 年 3 月 2 日於台北



# 唱支山歌給黨聽

紀念“七七事變”60周年及中共建黨85周年

紫丹

上海異議人士韓立法先生，屢經政府綁架，最近被放回家。所謂“屢經”，據我所知，起碼是三進三出勞教所。韓先生不說是“每次判處三年勞教”，而說是“政府綁架”，這是因為每一次都是非法的，即便是按中共自己的“法”。

在自由亞洲電台採訪他的過程中，他說了他80多歲的老母剛剛告訴他一席過去從未說過的話：“當年日本鬼子進村，村子裏到處都是日本鬼子，我都沒有害過怕，更沒有向日本人下跪。可是我向共產黨的員警下跪，哀求他們放了我的孩子；”

這使我想起層出不窮的類似的事件，類似的話：

去年6月18日，《世界日報·大陸新聞》標題是：河北某地暴徒“比日軍還狠”。內中文稱：“全案經國際媒體報導後，已引起全球關注。據太陽報報導，香港傳媒親赴繩油村採訪，有死裏逃生的村民控訴，上週六凌晨闖村行兇的暴徒，比侵華日軍還要兇狠，‘日本人來了還讓你投降，那天你投降都不行，暴徒馬上打死你。’”

前年，河南省鄭州當局出動防暴員警以霰彈槍、警犬、電棒等武器鎮壓師家村上訪村民。群眾就說是“鬼子進了村。”

《晚年周恩來》一書作者高文謙接受電視台採訪談“六四”，他引用一位拉三輪車的老工人非常傷心地說：“當年日本鬼子進北京也沒有像這樣恐怖，坦克碾人，見人就殺……”

一位曾是狂熱的毛澤東思想崇拜者，因寫《歐陽海之歌》而名噪一時的金敬邁先生，說起他在秦城監獄，一半人瘋掉了，他在獄中受過酷刑，被打得很慘。如不是共產黨給他深刻的感受，他決不會說：

“中國人絕對不比日本鬼子善良”（《開放》2005年5月號，第15頁）我聽過許多老幹部說過這樣的話：

“國民黨、日本人的監獄我都住過，卻沒受過住我們共產黨監獄的那份罪。”

我在網上看到，一位遭受日本殘酷毒打欺凌侮辱的慰安婦，親眼目睹日本人殘殺中國姐妹，把牙齒一個個打落……她虎口餘生，當然恨死日本人，但到晚年她卻說，她最恨的是中國人；讓她在各次運動中經歷了椎心泣血的迫害。

我在趙紫陽家鄉滑縣，聽到農民爭相控訴幹部，說他們敲詐勒索，比日本鬼子還壞。有一位老農民說：“你們年輕，哪里知道：共產黨的幹部再壞，也總有一點比日本人強；幹部說的話不管多傷天害理，你總還能聽懂吧；日本人進了村哇哩哇啦你不明白他要你幹什麼。”總是還有人對共產黨說好話；中國共產黨人在說中國話這一點上（總算找到一點），還是比日本人強的。

諸如此類，數不勝數。如果你去參觀文物古跡，幾乎所到之處，都能聽到這類的話：什麼什麼文物，日本打過來都沒有遭到破壞，可是在土改中，或鎮反中……特別是在文革中，給予了毀滅性的破壞，如今蕩然無存……

這是一件說怪不怪的事情，大家總是不約而同地把共產黨與日本鬼子相提並論，合二而一……

值此中共建黨逢5逢10大慶之際，讓我也跟一跟主旋律，唱支山歌給黨聽：

唱支山歌給黨聽，  
我把黨來比鬼影：  
鬼子殺我幾千萬，  
黨殺同胞萬萬千；  
鬼子殺我中華身，  
黨更洗腦滅良心；  
鬼子篡改侵華史，  
黨史全是騙人言……  
唱支山歌給黨聽，  
中華兒女在覺醒！



## 談中共的根基

鐘 民

不知是誰把英文DEMOCRACY稱為民主，這真是十分精彩的翻譯。從漢語來看，民主兩字的涵義十分明顯，就是由民作主的意思。民主思潮以不可阻擋之勢頭在世界上迅速蔓延。隨著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立足、生根、壯大，一個全新的世界正在向我們走來。

現代化的民主在舊世界裏是找不到的，因為沒有這種土壤。從人類發展的歷史來看，人類初期都崇拜神祇，一切當然由神來作主。人民的願望祇能求神來實現，人民的命運實際上往往由那些代表神的宗教領袖來決定。從舊約聖經中可以看到，猶太人在摩西時代是一種政教完全合一的社會。這種社會很統一，但也十分封閉、排外。當耶穌出來宣佈新的教義，並宣稱自己是神的兒子時，立即遭到來自當時宗教領袖們的全力封殺，用最殘酷的刑罰對付他。

歷史上凡政教合一的政權都是最反動、最黑暗的極權統治，在現代更是如此。中國第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是太平天國，中共現政權是第二個。中共是師法歐洲的共產教義上台執政的。共產主義從表面上看是無神的，但因為它自封是惟一掌握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這就使它主觀上把自己抬上了超乎眾生之上的地位——等同於神的地位。共產黨人自封為有覺悟的超人，其使命據說是要『解放』人民。共產黨的領袖自然而然的是神的代表，有權統治一切，比秦始皇還要厲害。假如共產主義祇是一種學說，祇用說教吸引人們信服，那也不失為一種可以容忍的信仰。但共產教義最可惡的一點是立志用暴力搶奪政權，公然號召用暴力消滅他們認為的敵對分子，即異教徒。這就使它成為歷史上為害最烈的邪教之一，與法西斯並無本質的區別。蘇聯的斯大林，中國的毛澤東，以及眾多的共產黨領袖在掌權時，都一次又一次的搞政治清洗，殺害無辜，這不是他們個人的瘋狂，乃是出於共產黨人的本性，是共產教義的要求，是意識型態的自然驅動。就如同中世紀十字軍殺害異教徒一樣，沒有本質的區別。

共產教義既然認為共產黨的使命是解放人民，共產黨的意志自然就高於人民的意志。共產黨從來不認

為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所以共產黨本質上就是反人民、反民主的。從本質和方法上都不可能建立什麼美妙的新社會，而祇能是復辟中世紀式的極權統治。中國和東歐的實踐經驗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共產黨是民主的天敵，對它不應抱有任何幻想。在中國目前環境中，不把共產教義徹底批臭，在共產黨意識型態統治之下，想實現現代化的民主是不可能的。

現在有一些人寄希望於共產黨的自我改良，希望共產黨內出現開明派。這種願望不能說不好，但恐怕很容易讓人失望。因為共產黨很難有產生開明派的條件。所謂開明派，在共產黨看來就是黨性不純分子、動搖分子、叛徒。這種人很難在共產黨內立足，更不要說能爬到領導層裏去。趙紫陽在1989年下台，是必然的結局。不錯，現在共產黨自己說要改革了，政治環境比以前似乎寬鬆了一些。但應該看到，這種變化不是共產黨自己主動的，而恰恰是被迫的。因為國內外氣候迫使共產黨必須作一些讓步，否則日子就混不下去了。**共產黨的某些『進步』，完全是保命的權宜之計，也是廣大民主鬥士堅持不懈努力的結果。**主導權是在人民一邊，人民手裏緊握鞭子，趕逼得緊了，共產黨這頭畜牲才會心不甘情不願地作出讓步。

現在中共政權的壽命似乎還未到頭，它依然有力量抵制世界的民主潮流，不理會人民要求進步的呼聲。憑什麼？就是憑著共產教義在人民中間還有市場，憑著共產黨精心營造的意識型態羅網，仍籠罩在中國人的頭上。一切致力於中國進步的力量，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就是要揭穿共產教義的虛偽與邪惡，撕破它意識型態的羅網，讓廣大中國人民醒悟。這是一項艱巨且浩大的工程。人民醒悟了，共產黨的騙人謊言無人聽信了，共產黨的氣數也就到頭了。總之，極權的基礎就是共產黨的意識型態。無怪乎中共總是緊抓住新聞、教育、出版等宣傳領域不放，因為如同槍桿子一樣，筆桿子也是它的命根子。到時候也許用不著什麼暴力革命，就像蘇聯和東歐國家一樣，有一天中共這個龐然大物也會轟然倒地，那時中國大地的民主之春，才會真正到來。





## 黃花崗雜誌董事會公告

2006年3月7日，黃花崗雜誌董事會於紐約召開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周光亞董事長近兩年來曾多次提出的——“關於在海外暫停印刷發行黃花崗雜誌”的建議。為此，董事會決議如下：

鑒於近年來網路媒體的發展異常迅速，黃花崗雜誌在電腦互聯網上的影響力與日劇增——黃花崗雜誌網站的閱讀量，已達本雜誌海外印刷本的數百倍以上，甚至已經遠遠超過海外許多同類雜誌，被港媒譽為最受大陸讀者歡迎的雜誌之一。因考慮到本刊通過電腦網路對中國本土的傳播，已產生了如此廣泛的影響，同時，海外絕大多數讀者都有條件上網閱讀本雜誌，特別是為了確保黃花崗雜誌在中國本土的傳播發行，故在雜誌社現存資金十分有限的情形之下，決定自第十七期起，暫停在海外印刷發行黃花崗歷史文化季刊。

黃花崗雜誌在海外暫停印刷發行之後，本刊將仍然按期於網站出版黃花崗歷史文化季刊，發行網路PTF版，以便各地志同道合者自費印刷發行本刊。本刊更將努力利用尚餘的有限資金，加強黃花崗雜誌網站的建設——逐步增設《黃花崗論壇》、《黃花崗網文選刊》等欄目。並將應許多作者讀者的請求，積極創造條件，籌備創辦《黃花崗網路聲像中心》和《黃花崗出版社》，刊載有關歷史文化的聲像資料和作品，出版《黃花崗叢書》。

黃花崗雜誌在海外暫停印刷本發行之後，將立即歸還雜誌原海外榮譽訂戶和普通訂戶的訂閱餘款（編按：已經全部寄出，反饋令人感動，下期刊出），務請各訂戶查收。若有遺漏者，亦請立即來信告知。黃花崗雜誌的一切聯係地址和方式均不會改變。

黃花崗雜誌在海外暫停印刷發行之後，將一如既往地往在雜誌網站按期公佈財務報告，直到我們彈盡糧絕的那一天。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研究並批准了黃花崗雜誌董事會“關於暫停本刊海外印刷發行的報告”。

特此敬告本刊讀者。

黃花崗雜誌董事會

2006年5月17日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黃花崗雜誌社董事會

### 第17次財務報告

（02/1/06 - 04/30/06）

總收入（雜誌銷售回收、訂閱及捐款） \$1845.86

總開支 \$20117.12

雜誌印刷、打字、郵寄、稿酬、運輸開支、郵政信箱等	\$6551.68
研究中心及雜誌社房租	\$4800.00
電話費（含寬頻上網及網站月費）	\$706.42
辦公室用品及雜費	\$858.62
研究中心購買資料書籍	\$640.33
雜誌社差旅費（包括邀請人員）	\$503.00
雜誌社招待費（董事會年會及招待剛到海外的民運人士、本刊外地編委等）	\$829.07
會計師事務所報稅及律師諮詢費	\$1700.00
捐助大陸及海外民運人士	\$3528.00

說明：

- 1、主編回捐稿酬\$496美元。
- 2、黃花崗雜誌社董事長周光亞核定（06/2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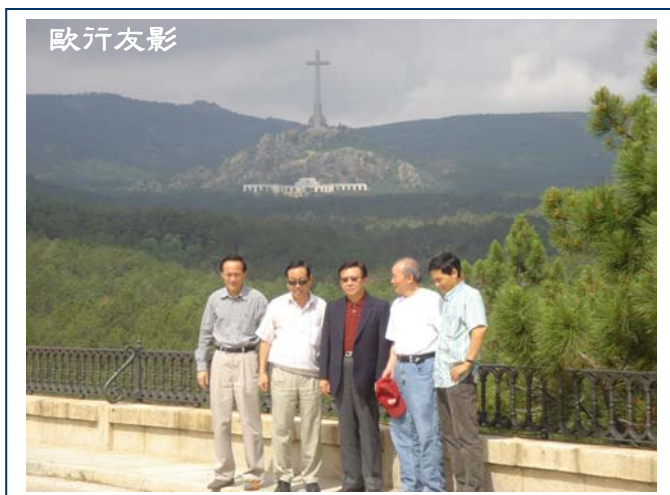


元 趙孟頫 畫馬圖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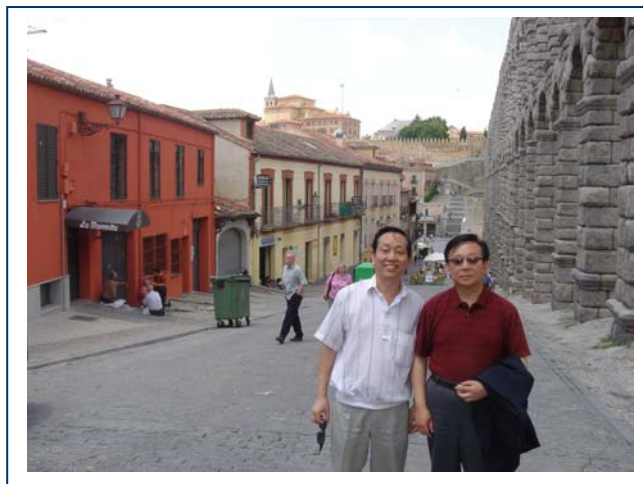


宋 馬麟 黃鸝喜春圖 冊





徐文立（右2）辛灝年與王策  
（左2）等友人合影於西班牙風景聖地佛朗哥陵前



著名民運人士王策博士與辛灝年  
合影於西班牙西哥利亞古城



辛灝年與八九學運領袖張健、歐洲大紀元負責人張健平  
及法國著名民運人士江先生合影於巴黎街頭



旅歐學者、比利時歐都商務所總裁蔣學敏先生主持  
了辛灝年在布魯塞爾的講演研討會



辛灝年與來自新西蘭的著名攝影藝術家夏建國先生  
攝於柏林波茨坦（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即誕生於此）



陸錦林教授（中）王策、辛灝年與作家黃河清  
（右1）、西班牙大紀元負責人（左1）合影



愛國愛族的華僑們 請支援海外這本  
沒有任何背景 沒有任何資源  
完全沒有工薪 全面義務奉獻  
只願依靠民間 財務徹底公開的歷史文化刊物  
黃花崗雜誌



閱讀《黃花崗》  
就是對孫文革命的深情緬懷  
就是對三民主義的嶄新理解  
就是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公正澄清  
就是對中華優秀文化的重溫 and 傳承  
就是對大中華民國民主統一的竭誠追求  
就能夠幫助你將陸 島的命運緊密相連  
《黃花崗》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會溫暖更會堅定你那顆熱愛中華的遊子之心！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NON - PROFIT  
U. 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PERMIT NO. 619